

1968^年 反叛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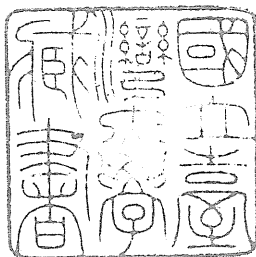
塔里克·阿里 苏珊·沃特金斯 著
范昌龙 李宏 王彦兴 李尚杰 译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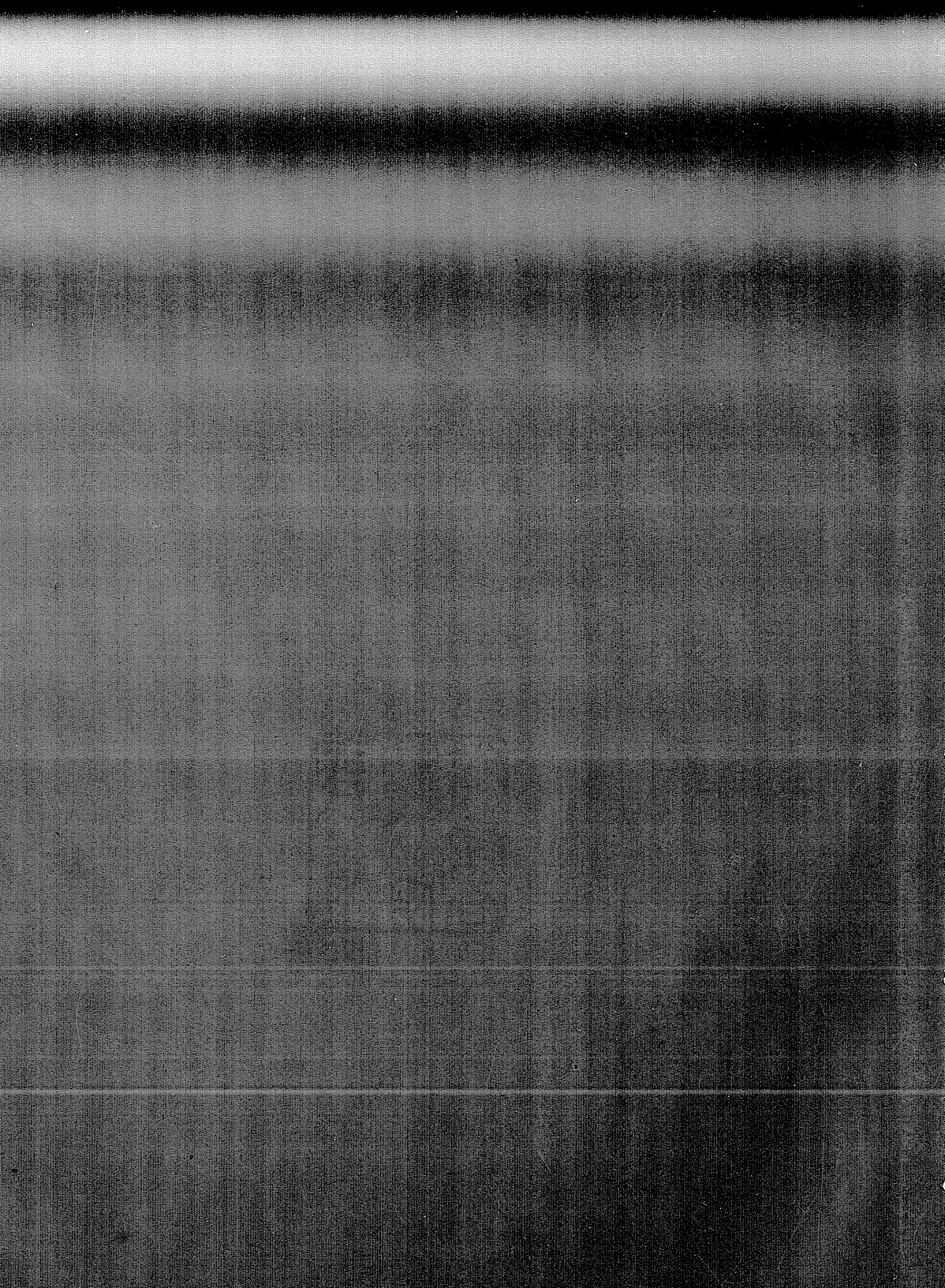
2 2 5 4 2 8 7

161982844



山東畫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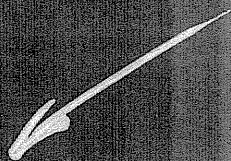
2254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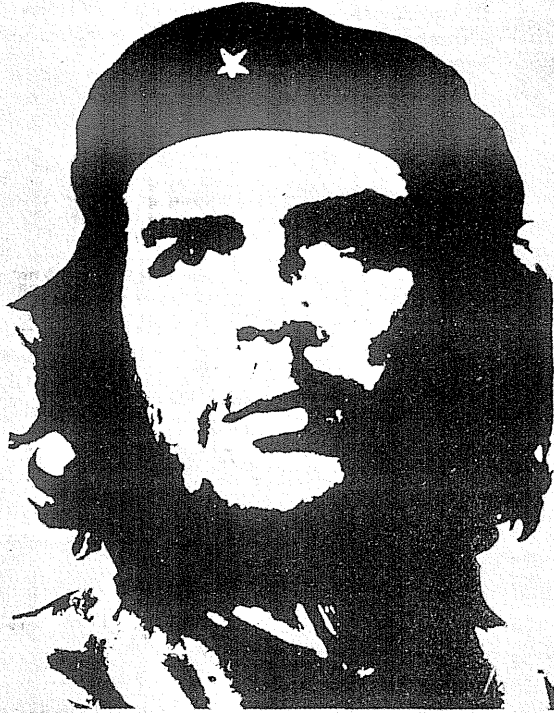




目录

引言	1
一月	1
二月	27
三月	49
四月	71
五月	93
六月	121
七月	141
八月	161
九月	181
十月	201
十一月	221
十二月	239
跋	255
参考资料	262
图片来源	264
致谢	265





**y nuestros brazos se alzan
para rendirte homenaje
con el trabajo creador...**

CON PCC 01E

1968年1月哈瓦那发行的切·格瓦拉的招贴画原件。

引 言

“质疑权威的年代”

无论是作为悲剧，还是作为喜剧，历史都不会重演；但它自有其不变的唱腔韵律。30年后的今天仍有1968年的回响。重读有关1996—1997年法国罢工和学潮的文字，30年前让法国瘫痪的那更为激烈的一幕幕便浮现在人们眼前。劳伦特·卡比拉(Laurent Kabila)领导的横跨刚果的胜利大游行和西方支持的对暴君莫布托(Mobutu)不光彩的空运提醒人们：民众的激愤仍能以组建解放军的形式表现出来。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诗人托马斯·麦克格拉斯(Thomas McGrath)在他的‘致假想的朋友的一封信’中写到了那些讥笑过去的人。他当时写的是30年代，但今天看来对60年代也很适用：

狂妄的言论，易被人笑为痴呆，
不解其中味，你从来就不明白！
真实的
是那份慷慨与期待，
坦荡而真诚地
梦想创造美好世界。

秋去秋又来，今夜的秋凉
是否比古人多了份凄凉？
星光下，寒霜

覆盖在
我那庭院的残垣断壁上，
覆盖在
我希望和韶华的荒冢上。

眼前寒冷的大街上
我听得见
追名逐利者的叫嚷
和名利那愤怒的回响

……

经历过1968年的人，无论在政治分野上属于哪一边，都将不会忘记这一年。这一年在每一个大陆都标志着整个一代人。早在“全球化”成为自由市场的政治文化中的时髦语之前，作为要永远改变人类生活状况的斗争的一部分，1968年的事件就已使政治激进主义全球化了。它也是希望的年代，当有些人感到权利被剥夺但又不得不认命时，世上受苦的人——那些一无所有者，却开始恢复了他们的权利。

有关60年代的性、吸毒和摇滚的书比比皆是。迷幻的60年代的印象（尤其在英国）已经模糊了这一时期的政治。我们生活在认为乌托邦是不着边际的幻想的时代，生活在被恬不知耻的机会主义所窒息的文化氛围之中。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只专注于历史，只注重1968年实际发生的全球现象。

1968年是创造新世界的尝试，是政治、文化和个人关系的新起点。我们认为不能以“成败”或物质财富论英雄，而应以人道主义的理想抱负：经济应该重组以服务于大众而非少数人，社会主义的命运与真正的自由和有实际意义的民主密不可分。要使世界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就必须重建一个新世界。

1968年的英国像现在一样，也有一个工党政府。工党政府的全面失败导致了激进主义，导致数万人脱离工党，而拒绝加入它的人则更多。以下摘自经济学家肖恩·哲瓦西(Sean Gervasi)登在1968年7月11日的《黑侏儒》(Black Dwarf)上的一段评论，显然像是现代话语，只是福利国家的任何扩大，都被新工党视为极左的凯恩斯主义和“老工党”的愚蠢行为。有些事情已然发生了变化。

“工党的新不列颠蓝图又是什么呢？首先，应该说新不列颠与社会主义虽有经济增长率提高和福利国家有所扩大的浮华，但它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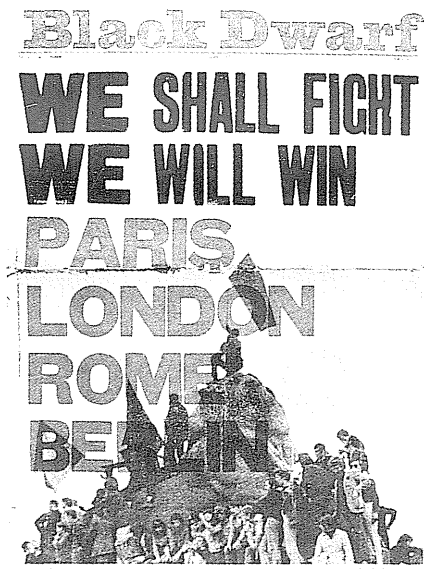
态。”

总部设在伦敦的《黑侏儒》第一期于1968年6月1日发行，本书将从中摘引新闻资料。当时，五月风暴的巴黎街头伤痕累累，它所引发的共振让全世界独裁主义的领导人大大为震惊。《黑侏儒》取名于19世纪早期的宪章派刊物，既含讽刺又喻报道民情民意之义，存世两年。它是先锋派青睐的表达手段，也是新左派的心声。更确切地讲，编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与以下诸君——他们是剧作家大卫·默尔瑟（David Mercer）、戏剧导演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诗人克里斯托弗·朗格（Christopher Logue）和阿德瑞恩·米歇尔（Adrian Mitchell）、女权主义者谢拉·罗伯特汉姆（Sheila Rowbotham）、弗雷德·哈利代（Fred Halliday）、克莱夫·古德温（Clive Goodwin）和我——的

卓见结合了起来。使我们团结在一起的，首先是我们都相信质疑权威的时代到来了。政治的、社会的、性的，所有的清规戒律，都该受到挑战并予以打破的时候到来了。解放的观念传遍全球，速度之快让人吃惊。亚洲一个贫穷的农业国组建的一支军队可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进行对抗，战况鼓舞人心。越南大卫让美国歌利亚尝到了厉害。曾在1954年打败法军的传奇人物、越南军司令武元甲（Vo Nguyen Giap）当时曾镇定自若地说，美国也会是同样的下场。他预言美国将输掉这场战争：

“我们的人民为我们的国家利益而战，也是为社会主义和世界上争取解放的其他民族而战。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个靠氢弹虚张声势的大国，正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无论它的军事和经济潜力多么巨大，都不可能摧毁一个为独立而战的民族的意志……”

“为什么美国认为它会胜利呢？它在我们的国家部署了庞大的战争机器。威斯特摩兰（Westmoreland）将军有办法让美国的远征军从2万人激增至五万多人，但除了一线胜利的希望，他并无其他礼物回报华盛顿。美国佬把赢得战争的希望建立在他们的优势兵力、强大武器、大量美钞和他们投掷的一吨吨炸弹上。



《黑侏儒》第一期（1968年6月）
反映着时代精神。

“当发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时，他们只会指责他们的将军们试图用数学解决问题，如在力量平衡的问题上，而不会像越南人那样使用三角法战略。那是正义的人民战争可以利用的再简单不过的战略，但他们永远也不会明白。”

越南人胜利的意义直接而且巨大。“我们要战斗，我们会胜利：巴黎、伦敦、罗马、柏林。”1968年5月我为《黑侏儒》封面题写的这句话可谓是片面的典型。布拉格、华沙、德累斯顿和莫斯科又会怎样？越南的例子向所有人表明：没有一个大国是不可战胜的。它们都是纸老虎。

另一个鼓舞是厄内斯特·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²，拉丁美洲的革命烈士，60年代惟一的政治偶像，是今天仍能激起人们兴趣的人物。1997年，他被中央情报局杀害30周年之际，大量有关他的图书仍在世界各地出版。

格瓦拉是一位阿根廷的内科医生。他成了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³的同志和密友，并加入了一支决心解放古巴的游击小分队。他们要把古巴从华盛顿选定的黑手党独裁统治下的妓院，变成全美洲的革命熔炉。

1960年，卡斯特罗、格瓦拉和他们的同志们已处于巨大胜利的前夜。古巴的农民、工人、学生和由医生、律师组成的职业界决定支持革命。古巴撵走了美国佬。一夜之间，大胡子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成了拉丁美洲的英雄。

切·格瓦拉是古巴革命主要的军事战略家。作为游击队的司令员，他在不得人心的决策面前从不畏缩，但是古巴革命胜利后，他的兴趣却转向了对社会和经济的研究。

越南人民的斗争依然让这位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寝食不安。1966年，他在哈瓦那三大洲的代表大会上，呼吁“把越南一分为二为三或更多”，以孤立、击败五角大楼的军队。那时，为开展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斗争，他已经离开了古巴。尽管他的确做过当地游击队领导人劳伦特·卡比拉的鼓动工作，但他在刚果的努力并未取得成功。

在玻利维亚——依照任何标准它都是误判的审判地，他试图重古巴模式，在丛林中发动农民。他的小队人马被孤立并最终遭到围困。格瓦拉被活捉；中央情报局特工下令枪杀了他。

格瓦拉的殉难使人们忘却了他的失败。他的遗容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漂亮[约翰·伯格(John Berger)誉之为曼特尼亚(Mantegna)⁴的基督]。他成了世界上千百万人的行为榜样，成了一名传奇英雄。为代表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而进行斗争，他毅然放弃了他在古巴享有的权力和待遇：这一点使得他更加与众不同。

有一篇用诗歌形式写就的遗嘱寄给了他的妻子阿莱达 (Aleida)，诗的名子叫《乘风破浪》。这是一篇感人的悼文，悼念一位音容笑貌让敌人和朋友都难以忘怀的人：

我的签名在这诗（《乘风破浪》）上
我送你六句片语铿锵
多么想看你一眼，
（像受伤的鸟儿）柔情无限

多么牵挂你，怕你水温时忘了水深
多么希望我的诗行为你点亮黑屋的灯
长夜漫漫陪伴你的是我的旧顶针
我愿再把我们两个儿子的照片遗赠

我愿把一直伴我的这支枪内
最美的一颗子弹送给你
还有我对孩子们难以忘却的记忆
（总是那么深切，可又总是隐而不见）
孩儿是你我的血脉
是我生命的延续

我要把他们交给革命（幸福而坚定）
这是我们举家团圆的最大的力量源泉。

切·格瓦拉希望创造新的世界和新的国家形态，但西方许多人仇视他这样的思想和活动。为什么国家要管理个人的生活？为什么同性恋长期以来被认为非法？为什么堕胎直到1967年才被宣布为合法？为什么年轻人就该被迫以特定的方式着装？为什么妇女不能享有相同的报酬和地位？谁决定了公共住房的建筑设计？（为什么不是由住房的人来决定？）为什么全世界的官僚政权对普通人的疾苦和生活都漠不关心？为什么大学生不得不在拥挤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为什么第三世界要屈服于第一世界的长期凌辱？这些问题，在每一个地方

都被以不同的方式提了出来。传统的政治家们未能就这些问题做出适当的反应，因而导致了1968年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发生。

在那个年代，各地动荡的激烈程度是不一样的。在英国，性、吸毒、摇滚与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 Square）上群众性的反越战示威，都想引起人们的关注。享乐主义的潮流与革命的政治洪流亦成犄角之势，尽管两者偶尔的融合是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的特点。其他地方则是政治问题唱主角。尽管伦敦有国王路（King's Road）和卡那比大街（Canaby Street），但具有“明星”资格的还得数巴黎，因为那儿有个拉丁区。

回首往事，30年前的那份宽容、希望和乐观无不让人动容。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相信，让所有人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是可能的。这些思想的力量迫使政客们必须把改革与镇压结合起来以应对局面，但两者如何结合在世界各地的差异则很大。

1968年开始时，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们都一定程度上沾沾自喜地统治着他们的国家，这是可以理解的。此前的20年，他们成功地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东方就没有这样太平了：1953年在东柏林、1956年在布达佩斯爆发了起义，波兰在1957年爆发了群众性的示威游行。正是这些事变使得莫斯科的老人们对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感到特别紧张。

早期的这些起义增加了西方的优越感和自满情绪。西方的当权者认为，那样的事不会在他们这里发生。对大多数的公民而言，社会民主党治下的社会制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满意。

上一次革命浪潮波及整个欧洲的时候是1848年。那一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因害怕巴黎暴民的不良习惯传播到布鲁塞尔而病倒，他写信给他的侄女、英国维多利亚女王：

“巴黎恐怖事件之后，我的身体状况极为不好。我们会变成什么人，只有上帝知道；在我国发动革命的力量会是巨大的；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有穷人和坏人，所以革命就有可能成功。”

几个月以后，维多利亚这样回复他：

“自从2月24日以来，我对存在的一切都有一种不确定感，这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当一个人想到自己的孩子们，想到他们的教育，他们的未来——并且为他们祈祷时，我总在考虑并想对自己说，‘孩子要任其发展。无论将来的社会地位高低，只要他们自己能适应就行。’过去我从来不想这个问题，但是

现在我却总在想。”

1968年的欧洲在主要方面已不同于1848年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欧洲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了社会动荡，但是1945年在罗斯福、斯大林和邱吉尔之间的雅尔塔交易把欧洲大陆划分成不同的势力范围：斯大林统治的东方和北约统治的西方。和平得以维护且西方政府对充分就业和建设福利国家的政策坚定不移。这就是为什么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以前，激进主义左派的动力来源于古巴、越南和中国的原因。二十多年来，欧洲的左派力量第一次发现，他们一直欣羡的远方其他大陆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暴，突然有一天也在自家的门前发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的改革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值。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改革直接导致了教育界文化觉悟的提高，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个新的中间层。1967年美国有600万大学生，西欧有250万，日本有150万。1968年在校的这一代学生既不知道何为失业，也不知道什么叫失败。他们对他们的上一辈——他们的父母——很挑剔。他们的父辈未能战胜失业，而且让法西斯主义得了势。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学生们公开反叛自己的父母，因为父母曾集体屈从于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东条英机的法西斯主义。世界各地的学生见到的是：一个不能实现诺言和满足他们精神和社会需要的政府，一个不愿接受任何严肃批评的政治制度，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对一个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残酷的战争。

这是一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之后不久出生的学生组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他们所具有的道德良心和政治敏感很快在各大洲的每一个首都的街道上迸发出来。

1968年作为二战后独特的一个年份的原因正在于此。越南人民抵抗美国战争机器所取得的胜利，法国的“五月风暴”和苏联坦克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的摧毁，代表了世界范围内三个主要阶段的斗争。这些事件都对历史产生了影响。

（在越南的失败，使得美国不再愿意直接干预其他洲的事务。）此后它更喜欢依靠当地人做代表、雇佣同盟军和利用联合国的招牌以及先进技术来代替过去的直接干预。

“五月风暴”现在仍然是法国人集体的记忆。在1996—1997年的学生占领和工人罢工的运动大潮中，这一事实被法国媒体的每一位评论员提及。甚至连那些性情暴戾、曲解是非的观察家们想到最初的这些事件也会露出微笑。这就

是历史的韵律。

俄国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羞辱其改革派领导人的决定，敲响了苏维埃制度及其东欧附属国体系的丧钟。如果1968年在莫斯科执掌权柄的是戈尔巴乔夫而非勃列日涅夫，那么“布拉格之春”的花蕾很可能就在这年的盛夏开遍整个东欧。

现如今，一些当年参加者的习惯做法是称这些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为建立乌托邦的空想；善意的讽刺称他们是体面而怀旧的自由党人，恶意的讽刺则称他们是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后期让人不愉快的步兵或野心家不顾一切的趋炎附势之举，或者用“冲动”二字把整个时期一带而过。作幸福状地插入一句概括性的话“60年代的政治不行”，则是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时髦评论。

这样的评论者不仅仅局限于摆出一副极左的样子，而且暗中勾心斗角，谁都说自己是继承了列宁、托洛茨基或毛泽东的理论，要不就把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的学生运动中的某些派别的决定挑出来作为恐怖行动的开始，借助恐怖行动能使大多数人认识到帝国主义的罪恶。尽管那个时代充斥了各种各样的暴行，但批评60年代的人不只是批评这些。他们的矛头直指那些挑战美国强大战争机器的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越南战争美国应该而且当时就应该赢的。

近来批评家批评的另一个主要对象是取得重要成果且载入史册的运动，即性政治领域。妇女解放，同性恋的合法化、“正常化”的斗争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已经取得的成果是相当巨大的，现在这些已成为二十几岁的这代人常识的一部分。

60年代的有些方面需要而且也应该受到批评。对国家和所有相关著作无知的无政府主义并非只出现在左派的身上，也反映在右派身上。从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向乌托邦式的资本主义的转变并不困难。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利用人们对政府不加掩饰的偏见，宣称只有基于自由市场创造的条件，那个真正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60年代那并不严谨的、空想的理论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海伊克(Hayek)⁵和弗里德曼(Friedman)⁶的追随者手中变成了威力致命的毒素。信奉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民委员们原来与他们国家的前辈们一样平庸、官僚。现代资本主义采用的“休克疗法”不仅损害了前苏联、东欧数百万普通群众的生活，而且摧毁了这些社会的文化。

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并非是年轻人惟一热衷的哲学。1968年的革命动乱重新唤起了整个一代人对俄国革命早期岁月的记忆。对于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每一个小团体都有自己的版本。这些团体办的许多左翼报纸都认为自己是列宁《星火》(Iskra)的当今版。今天用最辛辣的语言说列宁是魔鬼的那些人当中，在那时有些曾是最奴颜婢膝、最阿谀奉承的列宁主义者。需要补充的是，那些希望自己的周刊成为新《星火》的人，都急不可捺地去听鲍勃·狄伦(Bob Dylan)⁷和“滚石乐队”的歌，同时又急不可捺地去看戈达德(Godard)⁸的电影和跟踪晚间电视新闻中有关越南情况的最新报道。差不多可以说，当时的每一个激进主义分子都过着双重人格的生活。

这种通过回溯、从过去寻求希望的做法无异于部分地放弃了提出创见的责任。每一代革命者都会从历史的成功中寻求榜样。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动力问题就深深困扰过俄国革命者；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⁹、丹东(Danton)¹⁰和马拉(Marat)¹¹并不是不清楚17世纪英国革命形成的过程。正是英国教会了世界如何把国王的头颅砍下。

尽管回溯是可以理解的，但它的确容易使斗争的形式和手段浪漫化。有趣的是：学生反抗运动初期，即“言论自由运动”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Berkeley)¹²开始时，人们普遍感到愤怒的对象是计算机，理由是：“不可告人的东西都藏在计算机里”；反计算机的思想不是要求把这一技术对所有人开放，而是建议将它摧毁。

德国诗人、文化理论家汉斯·马格那斯·恩贞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当时注意到了这一倾向，他在1969年这样写道：

“巴黎‘五月风暴’期间回归古老的生产方式的特点尤为明显。在工人中进行鼓动宣传时，学生们用艺术学校的手动操作的印刷机而不是摩登的胶印技术印刷海报。政治标语也是手画的；用模版印刷肯定可以一下子全部印出来，但这会妨碍作者们富有想像力的创造。他们缺乏战略性地适度使用最先进的媒体的能力。造反派攻占的不是无线电台，而是有着悠久传统的欧迪翁剧场(the Odeon Theatre)。”

恩贞斯伯格的话并无不当之处，但他认为，走向保守的传统主义的标志其实是与第三世界的农民，主要是组成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员的农民站在一起的。人们对技术抱有明显的敌视态度，因为我们每晚都能从电视屏幕上看见数以百计的炸弹被投掷下来，它们炸毁了南越农民的村庄。有人认为，为了使

用而不是为了利润的生产，都必须以手工艺为基础。这正是巴黎艺术学校制作的令人称奇的海报的由来；这些海报后来自然成了宝贝，在全世界被收藏、复制和买卖。初版都到了收藏家的手中。不过，德国诗人总的说来是正确的。法国学生和工人在1968年五六月间应该占领无线电台，向全体人民广播他们的主张。

本书仅仅是1968年的政治日历，它一五一十地报道和描述了这一年的事件。每一个月在世界的某个地方都有事件爆发。事实上，巴基斯坦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学生运动触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起义，导致军事独裁者被推翻和国家的最终分裂；原国家存在的合法性连其缔造者都对它表示出了怀疑。

对于今天读这段历史的人们来说，那时的世界似乎是一个沉沦的大陆。然而令我们难以相信的是，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希望已是一去不复返了；自我反省和利己主义已取代了人人平等的信仰。人类仍然有能力使世界再来一次这样的变化，但本世纪最后几年取得胜利的这种制度，是宁愿使我们成为无用之人，也不会放弃其特权的。

塔里克·阿里

1998年1月

〔注 释〕

1 威斯特摩兰 (Westmoreland, William Childs, 1914—) 美国陆军上将 (1964)，曾任西点军校校长 (1960—1963)，在越南战争中任美军司令 (1964—1968)，后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1968—1972)。

2 厄内斯特·切·格瓦拉 (Ernesto ‘Che’ Guevara, 1928—1967)，生于阿根廷的古巴革命领导人之一、F. Castro 的得力助手、游击战专家，曾在古巴新政府任要职 (1959—1965)，后到扎伊尔、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受伤被俘，遭杀害。“Che”是个惊叹词，在阿根廷是朋友或亲人之间用来打招呼的用语。古巴人用这个绰号称呼参加他们事业的格瓦拉。卡斯特罗说：“这个名字后来出了名，成了一个象征。”

3 菲德尔·卡斯特罗 (Fidel Castro, 1926—)，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1959年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后，曾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

4 安德里亚·曼特尼亚 (Andrea Mantegna, 1431—1506)，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巴杜亚画派画家，开创仰视透视法及天顶画装饰画风，主要作品有《恺撒的胜利》、都卡莱宫的装饰壁画《婚礼厅》等。

5 海伊克(Hayek, Friedrich August von, 1889—1992), 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经济学家, 反对凯恩斯经济学, 倡导自由市场经济。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6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 美国经济学家, 货币主义学说创始人, 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物价水平和经济活动变动的根本原因。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81—1989年担任里根总统政策顾问。

7 鲍勃·狄伦(Bob Dylan, 1941—), 美国歌手和歌曲作者, 20世纪60年代城市民乐复兴运动的主角。以创作和演唱政治及抗议歌曲闻名。主要唱片有Highway 61 Revisited(1965)和Blood on the Track(1975)。

8 戈达德(Jean-Luc Godard, 1930—), 法国电影导演, 以电影革新著称。其执导的影片有Breathless(1960), Alphaville(1965)和Wind from the East(1969)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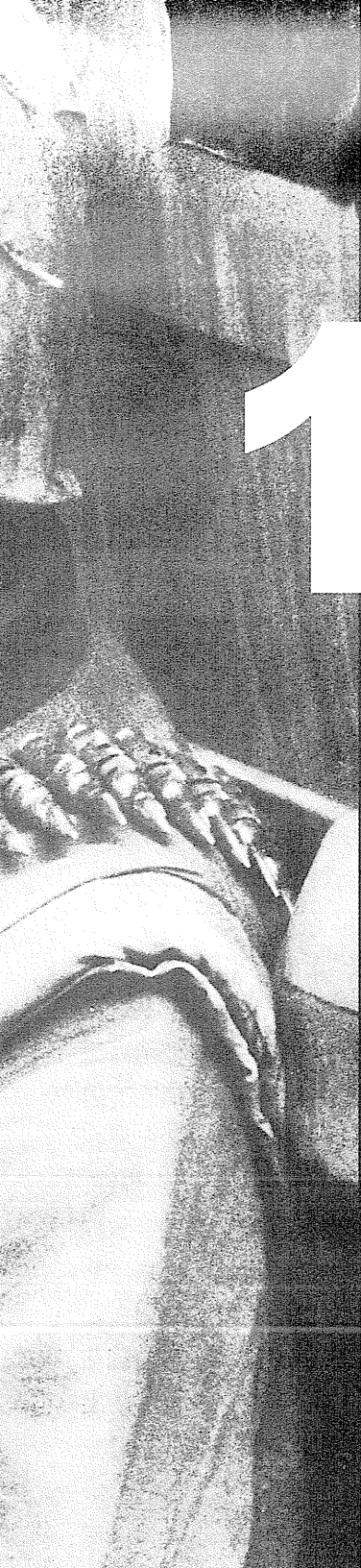
9 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 1758—1794),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 领导雅各宾派政府—公安委员会(1793—1794), 平定反革命政变, 镇压忿激派和贝尔派, 在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中被逮捕处死。

10 丹东(Georges Jaques Danton, 1759—1794),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 雅各宾派领袖之一, 选入国民公会后试图调和吉伦特派和山岳派, 后因反对雅各宾派革命政府的各项政策而被处死。

11 马拉(Jean Paul Marat, 1743—1793),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导人之一, 国民公会代表, 创办《人民之友报》(1789), 参与领导推翻吉伦特派的起义(1793)和建立雅各宾派专政的活动, 后被刺杀身亡。

12 伯克利(Berkeley),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城市。





1968

年

1月

“喂！喂！喂！”

LBJ (林登·拜恩斯·约翰逊的姓名首字母缩写—译者)

今天又有多少孩子被你杀害？”

一名被打垮的美国士兵在“春节攻势”的间歇。同年晚些时候，像他这样的美国兵将在美国的大街上游行示威，反对战争。



玻利维亚空军上校瑞恩·亚德里亚左拉 (Rene Adriaola) 向世人展示1967年被玻利维亚特别行动队杀害的厄内斯特·切·格瓦拉的尸体。

切·格瓦拉和他的同志们的尸体躺在雾蒙蒙的玻利维亚山谷里腐烂着。3个月前，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特工把他们秘密埋葬在这里。但是，当1968年开始时，他们所具有的那种大无畏的革命豪情和国际主义精神仍在世界范围内激荡着。切呼吁通过扩大前线、通过“制造两个、三个或更多个越南”来消除美国轰炸对越南造成的负担，这个呼吁已经在许多人的心中产生共鸣。游击队已经在哥伦比亚、乌拉圭、委内瑞拉、危地马拉作战；在莫桑比克、几内亚、安哥拉、罗得西亚（现在称津巴布韦）作战；学生们领导的抗议活动正在攻击美国驻欧洲和亚洲的使馆；而在越南自己的国内，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战士们正计划着一场攻势以庆贺新春，该攻势将震撼美国军方，戏剧性地改变战争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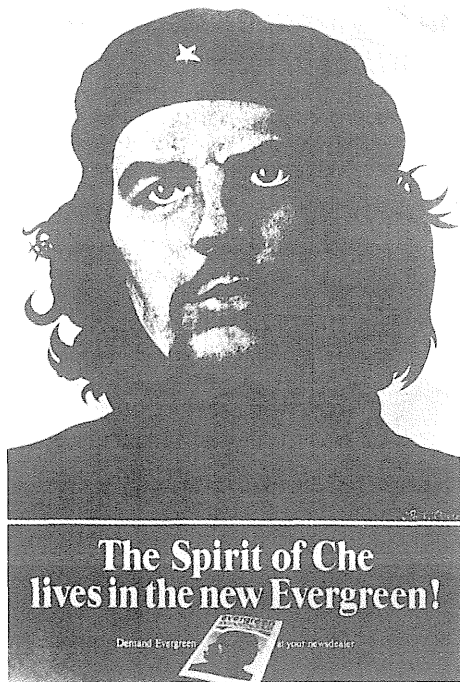
新年伊始，世界上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就陷入了危机之中：美国的统治阶层错误百出，在越南战争行为的问题上产生了公开的意见分歧。随着战场上的不断惨败，这个危机将一周一周地加剧；大批的人群正竭力阻止美国的“企

业号”(Enterprise)航空母舰停泊日本港口；装载原子弹的美国空军的飞机在格陵兰岛坠毁；美国海军主要的情报舰船“普韦布洛”(Pueblo)号错误地向北朝鲜投降；最后一点是：在春节攻势的一开始，人们就看见了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攻占西贡(Saigon) 美国使馆所带来的震撼。

与此同时，在美国，整个年轻的一代似乎都处在反叛之中。长长的头发、奇装异服、嘈杂的音乐、放荡的性行为、吸毒、印度宗教和光怪陆离的迷幻灯光表演，都是这种反叛的本能表现——垮掉的一代和以恶作剧为乐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自我表现，是对整个美国生活方式的反叛和对政府、“猪猡”(警察)、美国战争机器的恐怖以及美国用炸弹、汽油弹轰炸越南的反抗。

1968年开始时，考虑到反对帝国主义支配第三世界的“热战”迫在眉睫，“冷战”便被暂时搁置一边。美国统治者最害怕的一件事是：苏联或中国会把它们的信条付诸实践，站到越南一边参战，从而把“当地的泥潭”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与他们在别处见到的革命相比，莫斯科谨慎的官僚们在美国人看来似乎相对更安全、可靠些。

事实上，苏联的官僚们也在泥潭中挣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之后进行的改革，给了知识分子更多的活动空间，但勃列日涅夫的追随者们惟恐失去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在未来几个月的发展，让苏联的一些官僚部门相信：苏联的未来也会是这样。其他一些权力更大的领导部门十分害怕将会失去的权力和特殊待遇，害怕对西方开放带来的危险。苏联在军事和经济上比它自己对外宣传的要落后得多，所以，一个联合的“苏维埃集团”的门面，对于保持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切牺牲后的第二年，美国《常青评论》(Evergreen Review)刊登了切的呼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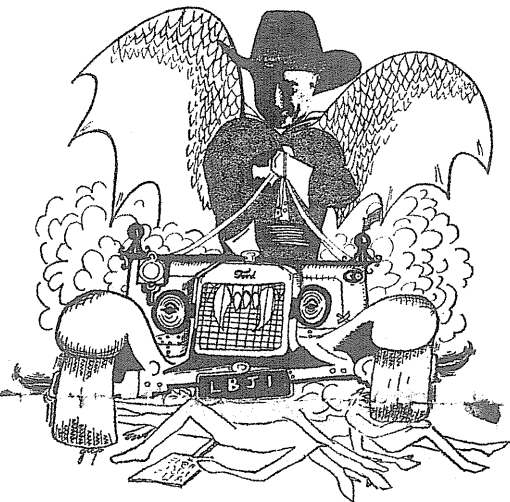
1968年共产党国家的多样性和蓬勃活力给人的印象深刻；同样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在制定共同目标和一致对敌问题上的彻底失败。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起初为消灭批评他的人而发起的群众性抗议大潮——导致了国内大

乱，毛不得不动用军队，北京的《人民日报》还谈到了引发内战的危险。美国记者安德鲁·科普金德(Andrew Kopkind) 1968年初在北越问它的一位政府顾问：在反对美国轰炸的战争中，中国向北越提供了多少帮助？一般说来，涉及越南的盟友时，言词都要谨慎些，而这位顾问却大叫道：“他们疯了。他们已经停开了向我们运送给养的火车，他们的帮助是在本国召开政治会议。对他们完全没有了指望。”

不过，如此一个大国存在的本身（似乎在苏联的左翼）已经在影响着世界力量的平衡。在东欧和苏联，也同样存在着多样性和意见分歧；知识分子争论着文艺自由。与此同时，古巴，这位后来者，依然决心独立于苏联集团之外，指责哈瓦那拥护克里姆林宫的人是“对莫斯科的旨意俯首帖耳而问心有愧的小矮人”，决心像切·格瓦拉一样推行自己的国际主义进程以打破苏联一统天下的局面——“革命的革命”。到一月底，这样的革命在全世界又拥有了新一代的支持者。

威斯特摩兰将军，这位尖下巴的越南战场美军总司令，在他给约翰逊总统有关战争前景的新年报告中称美军“有一线胜利的希望”。

按照威斯特摩兰的说法，由50万美军实施的“搜寻与摧毁”战略已把越南游击队逼回到了他们在丛林深处的基地，现在他们没有机会再对城镇实施大的攻击了。1968年，他所需要的是更多的部队、炸弹、坦克、战舰和飞机，以便一劳永逸地把越南的战事摆平。



《黑侏儒》上刊登的一幅约翰逊总统残暴对待越南抗议者的漫画。

约翰逊的脸疲倦而焦虑，对前任约翰·肯尼迪暗杀事件的了解——或不了解——使他增加了许多皱纹。

美国的上层又出现了政策危机。领导层分裂。总统羁绊于鹰派和鸽派之间：鹰派如威斯特摩兰希望在越南孤注一掷，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和老挝，如果需要，就进行核战争；鸽派则指出，在耗资数十亿美元、死亡2万美国士兵之后，美国并没有比三年前离胜利更近些。鸽派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妥协以避免付出更高的代价。他们认为美国军队已经扩充过度：50万军人羁绊于东南亚，超过了美国作战部队人数的一半；一半以上的空军战斗轰炸机中队，海军所有战斗舰的三分之一，包括航空母舰都已卷入了战争之中。现在，甚至指定用来保卫美国本土安全的空降部队也在飞往越南的途中。

五角大楼的官员说，他们在年底以前会打赢这场战争，但正像鸽派指出的：他们从1965年开始就这么说了。与此同时，成百上千的古老村庄被摧毁，村民们被迫搬进“战略之村”——用铁丝网围起来的、有士兵把守的院落。这样做

美国学生谴责战争并与国民警卫队对峙。





国民警卫队把黑人骚乱者从密执安州 (Michigan) 的底特律(Detroit)西城区的一幢被放火烧着的大楼前赶走。当 1968 年的战争转到国内时，黑人的愤怒使该市和其他几座城市一片狼藉。

是为了防止他们救助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员，而这些游击队员攻击的是只有少数外国人支持的南越政府。

战略之村是民族解放阵线的新兵培育基地。几个世纪以来，围满栅栏的越南村庄处于一种社区自治基础之上的管理形式之中。侍弄水塘、稻田和固坝强堤一直是集体干的活。稠密的竹林环绕着古老的村庄，低矮的砖土结构的房屋环绕着庙宇寺院。在那里，村里的长老们议事、收税、解决纠纷和驱鬼安魂。这样的越南社会的基础组织一旦被美国侵略者所摧毁，这些愤怒的、流离失所的难民们就一无所有了。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必须在把自己、母亲或姐妹出卖给骄横跋扈的侵略者与逃进森林参加民族解放阵线之间做出选择。

为了破坏游击队藏身的茂密森林，美国每年花在除草剂和脱叶喷雾剂上的费用达 1 亿美元。最古老的树木，有的高达 50 米，给化学工业设置了难题。为了让独立的北越人民放弃他们南方的同胞，数百万吨的炸弹雨点般地投向了他们的田园和村庄。

尽管这一切，尽管几十万越南人失去了生命，但是“敌人”的力量似乎还

和原来一样并没有被削弱。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依然是腐败和低能的代名词。尽管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和枪支，但南越正规军仍然不愿作战，即使是为自己的政府也不愿意。

约翰逊总统还有其他问题要处理。从东京到巴黎，从伦敦到柏林，美国使馆外都爆发了对美国战争行为的抗议活动，外交界对此不知所措。总统的姓名缩写被人们编进了全世界街头传唱的顺口溜：“喂！喂！喂！LBJ，今天又有多少孩子被你杀害！”

在国内，未受影响的美国年轻一代都处于叛逆中，吸食致幻药品，逃避服兵役，攻占学院以抗议学界与大公司和战争机器沆瀣一气。学生们，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非常愤怒，眼中那股凛然正气让统治集团骇然，他们用难以置信的口吻相互询问：“这些真是我们的孩子吗？”

严重的预算危机正在逼近：越南战争的费用已使国际收支超常亏空并使美圆的金价过高。

好像事情还不够糟糕似的：过去的两个夏天，在六个以上的美国城市中的黑人聚居区，抗议白人警察、住房危机和黑人失业的示威活动如火如荼；暴乱者抓到什么就砸就抢什么。抢劫即解放。防暴警察正忙于为1968年的夏季准备大威力的步枪、达姆弹、机关枪、催泪瓦斯、梅斯催泪毒气、武装直升机和装甲车。

更为重要的是，1968年还是美国的大选之年。

对四位年轻知识分子的审判在莫斯科开庭。安德列·西尼亚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和尤里·丹尼尔(Yuli Daniel)因用假名在西方出版他们的著作而于1966年被判入狱。四位年轻人因支持这两位作家而被指控犯有散布反苏宣传罪。

1968年被证明是继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文化解冻的最重要的转折点。诗人特瓦德夫斯基(Tvardovsky)在1960年写道：

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
在敬畏的先父的墓地

世间的一切
开始由我们全权负责
负责到底。

正是苏联的知识分子——作家、科学家和大学师生们——发现自己处在这种“开始负责”的前沿。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化的一连串的创伤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噩梦之后，苏联的民众已在任何形式上都不是团结统

一的了，因此他们在面对1953年的危机时无能为力。

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并不存在（例如，工程技术工人进入该行业还不到十年）。勃里斯·加基里茨基（Boris Kargilitsky）指出，“对于这个国家的官僚而言，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的和阶级的抉择；但对于斯大林主义，文化上和道德上的抉择的确是存在的。”



尤里·加丹斯可夫、亚历克西·多勃罗沃尔斯基(Alexei Dobrovolsky)和亚历山大·金斯伯格：因提出斯大林主义之外的选择而受审的三名知识分子。

知识界通过其正式和非正式的文化学术机构、友情和家庭关系保留了一些团结的因素。当《真理报》(Pravda)发表了叶夫图申科(Yevtushenko)¹ 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新世界》(Novy Mir)² 发表了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³ 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时候，始于赫鲁晓夫1953年在第二十二次党代会上的著名改革演说的苏联新创作的涓涓细流，到1962年已变成了一股洪流。《新米尔》的著名理论家之一V·拉克辛(V·Lakshin)这样写道：“文学与批评充满了人文主义的生机与活力，人文主义并非等同于取悦每个人、宽恕每件事。”

与此同时，罢工浪潮也暴露出人民群众对风雨飘摇的苏联经济的不满：食品价格的不断上涨；拥挤不堪的住房条件；没人想要的劣质商品；许多其他货物的短缺；农业体制严重低效无能。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⁴ 在西方出版《日瓦戈医生》时，苏联官僚以在报纸上对其进行一番抨击了事；西

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则因同样的原因被判了刑，官方想以此来吓唬吓唬知识界。

但是政府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因为在这一年，压制的策略常常是适得其反。人们的情绪已发生了变化，共同的义愤使知识界团结了起来。1965年12月，200人在普希金广场集会游行。两位作家入狱以后，抗议活动——范围虽小，但十分认真——扩散的速度很快。在1968年1月受审的四位青年知识分子中，亚历山大·金斯伯格(Alexander Ginsburg)因主编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的《白皮书》一案将被判处5年徒刑；另一位叫尤里·加丹斯科夫(Yuri Gadanskov)——一本地下出版的和平主义杂志的编辑，将被判处7年徒刑。

人们出于好奇心，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同情心而聚集在法庭外。抗议活动将持续到令人伤心的8月21日。

与此同时，苏联经济学家——他们与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同时僚们有着相同的想法——掀起了建构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大潮：在总的计划经济的框架内，把市场关系中的诸要素——买、卖、价格波动——结合起来。这将包括经济民主化过程，给予企业更多的权利，基层享有更大的控制权。这个控制权是掌握在企业经理之手还是工人之手，是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苏联共产党改革派——包括年轻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支持这些思想。但是，他们被从赫鲁晓夫手里接掌权柄的总书记里奥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为代表的保守派所压制。勃列日涅夫的追随者们相信，专家治国派的改革思想和电子计算机化，是解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有经济问题的最佳办法。“控制论社会主义”将是新的光明的开端——而且允许懒惰、臃肿的经理们和党的官僚们保有工作和特权。

勃列日涅夫的追随者们代表了保守的稳定：他们不希望回到恐怖的斯大林时代，因为那时候执政党的党员们无不战战兢兢；另一方面，他们又绝不愿向政治民主改革或经济改革让步，因为那可能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但这样的政策只能导致致命的停滞。

勃列日涅夫自己就是这种趋势的缩影。他是一个冷酷、世故、好色之徒，腐败、狭隘且目光短浅。他真的相信：只要堵死所有的异议，官僚统治就能世代相传。没有一个亲信告诉他：他所痛恨的“知识分子”一词，是他自己的国家首先杜撰出来的，许多沙皇也痛恨该词所指称的那些人。与所有的官僚——无论新、旧——一样，勃列日涅夫害怕有独立思想的人。他最害怕的是那些拒绝被收买的人。

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 人性化的社会主义

恰当地说，莫斯科政权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挑战将来自布拉格市。这是一座欧洲最美的、拥有真正历史意义的城市。正是在这里，简·胡斯(Jan Hus)⁵强烈要求宗教改革，反对“赎罪券”；这比路德(Luther)⁶整整早了一个世纪。胡斯被处死，胡斯派的叛乱被镇压。但是，有关那次斗争的记忆犹在：莫斯科就是当代的罗马教廷。



捷克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契克。摄于1968。

最后，新胡斯派取得了胜利。在一次疾风骤雨般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上，亚历山大·杜布契克(Alexander Dubček)⁷取代了第一书记安东宁·诺沃提尼(Antonin Novotny)⁸。

党的领导人的变更，使党内是否改革停滞的工业和经济体制、给予斯拉夫少数民族以更大的自治权和给民众以更多的政治和文化自由而进行的长达四年的斗争达到了高潮。

这场斗争从1967年10月底开始变得异常激烈起来。当时，一支小规模的学生游行队伍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出发，抗议大学宿舍里缺少供暖和照明设施。学生们走向位于赫拉德卡尼城堡(Hradcany Castle)的政府所在地时，一个个斗志昂扬。他们手里拿着蜡烛，烛光照亮了黑暗中的年轻的脸庞——平时他们就只能点蜡烛读书。

武装警察封锁了鹅卵石铺就的街道。学生们被推到一边并遭到殴打，有的被棍棒击倒在地，有的被逮捕拖走。约有五十人住进了医院。第二天，官方报纸称他们为“痞子”，说他们袭击了警察。

政府的镇压及赤裸裸的谎言，激起了更多人的义愤，许多人因此加入到抗议活动中来。

年轻人要求使用电灯读书而被打断骨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

不能为年轻人提供灯泡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社会主义？

两位持有不同政见的作家，因在1967年夏季的作家代表大会上公开批评现政权而被开除出官方的作家组织，学生们站到了作家的一边。

不久，辩论变成了积极主动的抗议行动。那年冬天，学生们在街头发放传单、与过往行人就警察的行为和内政部的作用展开激烈辩论的情形，使外国记者们想起了伯克利大学(Berkeley)的一幕或西方其他校园的骚动。

杜布契克和改革派在群众——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反叛的知识分子、工业现代化论者、对推迟改革既感到气愤又缺乏耐心的斯拉夫代表们和渴望改善生活的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呼声最高的时候掌握了对共产党的控制权。对某些人而言，选择杜布契克本身就是件料想不到的事。此后不久当选为国民代表大会主席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Josef Smrkovsky)回忆说：

“许多人被作为第一书记的人选提了出来；人选之一的诺沃提尼遭到反对；另一个人选又遭到斯拉夫人的反对；到了最后，有希望被接受的人选就只有杜布契克了。所以，主席团最后一致同意杜布契克作为候选人。据我所知，只有杜布契克本人不愿接受。事后有人告诉我：从星期五到星期六的那个晚上——那时会议已经结束，杜布契克是如何表示反对的。瑟尔尼克(Cernik)(另一位改革派骨干)请求他担起这份工作，并许诺他们都会支持他。一句话，实际上杜布契克是被推到第一书记这个位置上的。他对这样的一个职务事先并没有思想准备。第一书记的桂冠落到他的头上是很突然的。”

接下来的一个月，杜布契克把自己关起来苦读，以便为以后的艰巨工作做准备。他和其他人主张的社会主义包含政治民主和经济改革，一种保护大多数但又不排斥那些个人开设自己的小店、餐馆或企业的社会主义——“人性化的社会主义”。

已经有人强烈反对了。仅仅四个星期之前，勃列日涅夫为助诺沃提尼一臂之力于1967年的12月8日亲自飞抵布拉格。

这不仅仅是个政治原则问题。改革派已清楚地表明：他们决心对庞大、陈旧的政党机构进行整顿，因为其中的元老们阻挠了太多的改革。工作、权力和地位都岌岌可危，保守派什么都有可能失去。在武装力量的头头们中间，已经有动用军队干预的谈论——国防部长塞伊纳(Sejna)将军指出：要想在中央主席团表决时形成反对改革派的多数，只需逮捕几个人就行。

(两个月以后的3月8日，塞伊纳逃往美国之举，使诺沃提尼最终垮台。当提议阻挠杜布契克上台时，他是否已经与华盛顿商量过了?)

美国，纽约 激进斯波克(Spock)先生

本杰明·斯波克医生，世界著名的儿科医生，畅销书《婴儿与儿童护理》(Baby and Child Care)一书的作者，因组织抵制征兵、鼓动年轻人不要去越南作战而受到联邦大陪审团的指控。同时受到指控的还有耶鲁大学的牧师小威廉·斯朗·科芬(William Sloane Coffin Jr)，华盛顿特区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肯尼迪政府时期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白宫工作人员马库斯·拉斯金(Marcus Raskin)等其他几个人。

美国政府拿几位最受尊重——而且是最可敬的——反对越南战争的人开刀，被看作是鹰派在与国内反战运动正面冲突中取胜的标志。

斯波克医生坚持认为，他的行为在最崇高的意义上是合法的——他反对的是政府反人性的罪行，符合纽伦堡战争法庭的决议。尽管这样，当时他还是被判有罪；虽然日益高涨的抗议浪潮转向越战后，对他的指控后来被推翻。

古巴，哈瓦那 文化革命

为时一周的文化代表大会在古巴——这个非资本主义世界的婴儿——召开。革命后的古巴对东欧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与灰暗的单调和官僚主义惰性不同的是，这里有彩虹的每一种色彩，有新的音乐和激情。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对苏联模式十分不满。

新古巴十分重视艺术和文学，重视创作它们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当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⁹和西蒙纳德·博瓦尔(Simone de Beauvoir)¹⁰



斯波克医生在一次反越战游行中对记者发表讲话，之后他便被逮捕和受到审讯。

访问哈瓦那时，卡斯特罗亲自接待了他们。据传，提出激进知识分子集会想法的正是这位法国哲学家。

文化代表大会计划把全世界进步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召集起来，讨论政治和文化以及作家怎样才能加入到帮助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中去。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如何超越纯粹向后看的宗教或民族文化是一个30年后仍将困扰着世界的问题，无论是在爱尔兰，还是在南斯拉夫，还是在穆斯林世界，只有在1968年那样的时候才有可能设想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博姆(Eric Hobsbawm)，一从哈瓦那回国就在《时代周刊》的“文学副刊”上做了这样的报道：

“古巴当然是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理想场所。它不仅是一个严阵以待、敢于冒险一试的国家，而且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国度——尽管卡斯特罗自己认为古巴远远比不上越南。单就其民众确实喜欢和信任政府这一点，在其他国家就不多见。此外，目前这个国家自由、繁荣的文化活动，令人钦佩的社会和教育成就，以及让人喜爱的反物质主义的完美境界的体验，不能不吸引着知识分子。

“商店货架上的货物可能是少了些，但打电话是免费的。汽油虽是定量供应，但国家为情侣们提供了做爱的客栈。如果说这个国家的传统——诙谐、娱乐和最重要的一点“公开”——是看不见的，那么，其看得见的艺术则出人意料的辉煌。

“也许最有趣的是关于在不发达国家发展真正的原住民文化问题的讨论。无论是深刻剖析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影响下的文化渗透，还是研究民族民粹主义遭到极其普遍的拒斥，都是十分有趣的。

“正如阿尔及利亚的马默里·莫洛德

1968年，古巴在哈瓦那组织文化代表大会以纪念100年来的抗争。





厄莎·基特把反战运动带进了白宫。她正向困惑的第一夫人(中)和凯瑟琳·皮登(Catherine Peden)高谈阔论。

(Mammeri Mouloud)所说,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自己面临着既要假定有一个需要继承的本土文化,又要使用一个后来获得的殖民文化的双重需要。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像穿上件成衣那样简单。传统文化作为已经部分毁坏了的文化制度的产物,无论保留了怎样的要素,都不可能作为新文化的基础。

“为此所做的努力要么失败——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要么产生现代观光旅游业的民俗奇观,或‘对其他时代的暴力和苦难更危险的快速掌握’。海地的M.戴佩斯特(M. Depestre)带着我们能理解的感情谈到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传统和大众文化中的某些因素——摩洛哥的贝莱尔·阿布戴尔·阿齐兹(Belail Abdel Aziz)博士提出的有关马格里布(Maghreb)¹¹社区的概念就是这样一种因素——可能是任何反资本主义社会或任何不愿整个屈服于技术逻辑的一个社会的本质部分。”

同样出席这次大会的还有墨西哥画家、老斯大林主义分子大卫·阿尔法罗·

西盖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 他因参与1940年用机关枪袭击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科约厄康(Coyoacán)的住址而臭名昭著。当西盖罗斯在哈瓦那现代艺术馆外被年轻的法国代表们认出来时, 他们喊他“杀人犯”。接着, 年轻的女诗人乔伊丝·曼苏尔(Joyce Mansour)在西盖罗斯的背上踢了一脚, 叫道: “这是代安德烈·勃雷东(André Breton)¹²踢的!”

总部设在伦敦的《新左派评论》的编辑亚历山大·考克本(Alexander Cockburn)和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这两位年轻代表,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窘境。布莱克本写了一篇托洛茨基主义的讲演稿, 但这个漫骂讲演他自己做不了。他不知道他勾引的可爱的古巴同志是古巴警察总长巴巴·罗亚(Baba Roja)的女友, 而此君也并非宽宏大量之人。布莱克本临时缺席, 亚历山大·考克本便代他做讲演。当他意识到这篇反斯大林主义讲演稿言辞的激烈程度时, 他的双手都颤抖起来。演讲一结束, 他就逃离了讲坛。

18日

美国, 华盛顿特区

“难怪孩子们要造反……”

对激烈的抗议大潮感到恐惧、对幻想破灭的反叛的年轻人感到担心的总统之妻伯德·约翰逊(Bird Johnson)夫人, 以“在帮助维护街头治安问题上公民能做些什么?” 为题在白宫举行了一个女士午餐会。

黄白相间的餐厅将放置5张餐桌, 每桌坐10名妇女。桌上将放有一盆盆春天的鲜花, 金色、绿色和象牙色的餐具, 金色的匙、叉和刀, 金色的烟灰缸、薄荷盘, 五道装在银盘里的午餐: 蟹肉汤、白宫鸡脯、鲜芦笋、时令色拉、白葡萄酒、上面浇有热的巧克力沙司的薄荷冰淇淋、曲奇饼、薄荷糖和一小杯清咖啡。

为体现总统新的人权法案提案的精神(目前因议员们反对提案中有关取消种族隔离的条款而在众议院受阻), 来宾名单中包括黑人歌手、唱片明星厄莎·基特(Eartha Kitt)。

厄莎是贫穷的收益分成佃农的女儿, 生于位于南方腹地的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贫穷而又极端种族主义的乡村世界。十几岁上, 她就在哈莱姆的一家工厂靠缝制二战制服养活自己和她的姨妈, 后来又继续建立自己的事业; 她身材苗条, 长相很酷, 会说多种语言, 是见多识广的“巴黎左岸”观众的卡巴莱明星。

这位歌手并没有与她的人民失去联系。厄莎坐在那儿听事先准备好的悲叹

年轻人的罪行、呼吁给警察加薪的演讲，她越听越不耐烦，进入提问阶段时，她站了起来。

“这个国家有很多事情很气人，”她打开了话匣子。闻听如此不同的见解，出席白宫午餐会的女士们惊呆了，客厅顿时鸦雀无声。

厄莎一字一顿地继续说道：“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都很气愤，因为他们赋税太高，国家整天在打仗，而美国人又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年轻人反叛并非毫无道理。他们反叛的事，我们不能假装不知道。

“全国我所认识的男孩子都觉得做个好孩子并没有什么好处。他们估摸着有个犯罪记录，就不必去越南了。

“约翰逊夫人，您也是位母亲。我是位母亲，我知道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含辛茹苦养大了一个孩子，而你们却要把他送去当炮灰。难怪孩子们要造反、酗酒。你们把这个国家最优秀的青年送去送死或致残，所以他们要反叛。他们在街上造反。他们酗酒、吸毒，因为他们将要从他们母亲的身边被拖走，送到越南去挨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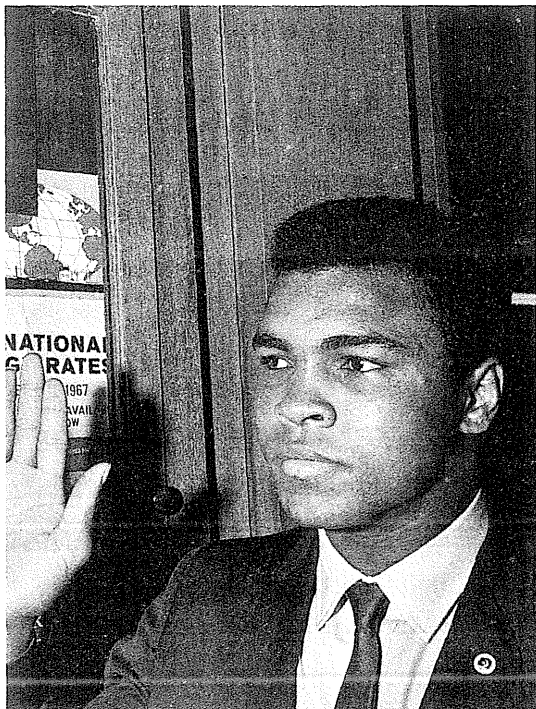
美国 不！我决不会去！

位高权重的五角大楼坐办公室的长官们遭受一记重拳：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美国最强壮的人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拒绝为他们去越南作战。

“我和越共素来无怨。”他这样告诉新闻界。

美国统治集团将永远不会原谅这个傲慢的黑鬼的背叛行为。

1月18日，穆罕默德·阿里



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穆罕默德·阿里因拒绝应征加入美国武装力量而被禁止参加职业拳击比赛，并被剥夺了冠军称号。

的上诉被法院驳回。

18—21 日本，佐世保(Sasebo)¹³ 学生武士

当美国7.5万吨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即将到达日本并前往越南时，日本爆发了抗议活动。示威者包围了美国在东京的大使馆；学生们占领了日本的外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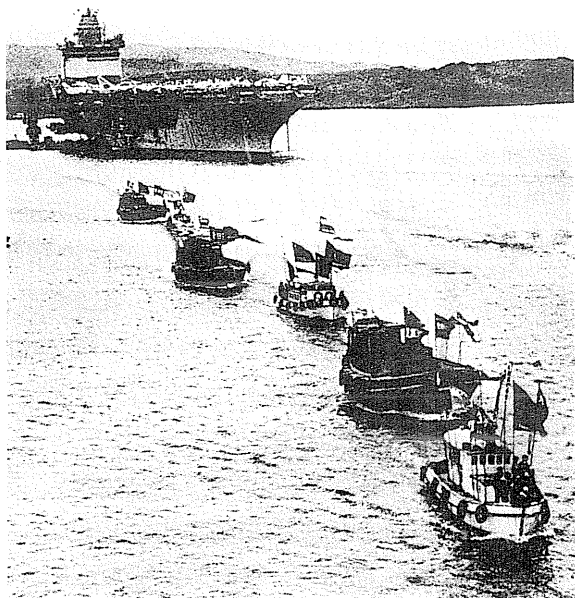
4.7万名示威者聚集在佐世保港口——美国庞大的海军基地，“企业号”将停泊在这里。除了冲绳岛之外，美国在日本还拥有147处军事基地，包括港口、空军基地、给养仓库、医院和康复中心：为打越南战争，所有这一切都被动员了起来。日本工业成了战争装备的巨大供应商：运输工具、弹药、配件、凝固汽油和磷光体——甚至装尸体的袋子都是在日本的服装厂缝制的。

佐世保的抗议活动受极其激进的日本“全学联”¹⁴学生部的领导。他们有充足的理由进行抗议。1941年，他们的父辈违背自己的利益，被拖进了一场非正义的、残酷的战争；青年学生决心不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日本人清楚美国轰炸机在他们头上飞来飞去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站在美国战争机器一边反对越南人民呢？

自己的国家被人作为战争基地使用，既丢人又危险：如果鹰派当道、冲突真的升级为原子战怎么办？如果中国被拖进战争怎么办？1960年与华盛顿签署的“安全条约”把日本变成了美国事实上的军事领地，人们对该条约中不光彩的条款和佐藤(Sato)首相在美国的要求面前完全屈服普遍感到愤怒。

简而言之，“企业号”是由原子反应堆驱动的，并被相信装备了核弹头。佐世保位于日本的西南，属长崎县。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处于美国军方的强

反对美国“企业号”前往越南参战并途经日本的抗议者，在该航母停泊时乘小船来到了它附近的水面上。





在一系列的游行示威活动中——其中一次占据了美国使馆，学生们拥上东京街头抗议核动力航母“企业号”使用佐世保港。

大压力之下，美国军方要求其消除人民的“厌核症”和对所有形式的核战争一概反对的做法。现在五角大楼决定启动“顺势疗法”，希望以核动力潜艇和核弹头的形式作为长期小剂量的“变应原”来治愈日本人的“厌核症”。

抗议者决心不让它得逞。“全学联”已来到佐世保，他们拿着10英寸的木板，戴着头盔，为防催泪瓦斯而在脸上裹着头巾。他们聚集在通向港口远端美国海军基地的桥上，唱着歌，跳着蛇形行列舞，头盔在瓢泼大雨中泛着白光。5000名防暴警察与他们发生了对抗。警察们手持警棍、消防水管和催泪瓦斯向学生发起冲锋。

“全学联”受同志们有节奏的口哨声的鼓舞，力图坚守阵地，但是被击退。那些被抓住的人被警察用警棍打得失去了知觉。共有450人伤亡。警察追捕学生时残酷无情：受伤的示威者试图逃进当地医院时（从医院的窗户，病人和医

院的工作人员一直目睹着这场冲突)遭到追赶和棒击;催泪瓦斯被扔进了医院的建筑中,医院被消防水管弄得一片汪洋。病人们把同情心完全倒向了示威者的一边。一个眼部受伤的学生几乎被他同病房的病人送来的牛奶、水果、卫生纸和内衣等礼物淹没。

“企业号”这个平顶、灰色的庞然大物由八个原子反应堆驱动,周身布满弹头,可供多达100架战斗机起降;它盘踞了整个港口,成为日本屈服于美国军事野心的醒目标志。

反战的“美国和平联盟越南和平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诚小田(Makoto Oda),乘着小舢板绕着航母用喇叭筒鼓动船员开小差。他保证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去处:美国和平联盟小组已经保护了一批去年秋天开小差的美国海军士兵。

数千人组成的人群阻挡了十几辆装着“企业号”水兵去佐世保红灯区的出租车,人们拍打着车顶和挡风玻璃。为确保水兵们能够完成军事穿插的任务,日本政府不得不调派了防暴警察。在通往基地的桥上,警察和示威者还发生了另一起冲突,冲突造成150人受伤。所有离船上岸的请假一律被取消。美国水兵按捺不住了,因为他们曾被允诺会让他们玩得开心。

“企业号”比原计划提前四天离开了佐世保。当它起航南下越南时,沿岸抗议的人们向它挥舞着拳头。

22日

希腊

喋血雅典卫城(Acropolis)

在希腊攫取政权的军人集团的监狱里,这年的漫长黑夜显得更黑、更让人胆战心惊。

希腊左派在纳粹占领期间通过领导“抵抗运动”,在群众中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和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已做好了掌权的准备。但是1945年雅尔塔的大国协定(此协定为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分割欧洲的基础)却把希腊划给了西方。在希腊共产党最需要援助的时候,斯大林却抛弃了他们。在激烈的内战(1946—1949)中,左派武装力量先是遭到英国,后又遭到美国的重创,内战导致了几十万人死亡以及国家政治的混乱和经济崩溃。为了“自由世界”,希腊被保留了下来——尽管不是为了西方式的民主,正像它后来所证明的——并在1952年加入了“北约”。老牌的右翼似乎牢牢地掌握着政权。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希腊似乎正在迎接一个新的春天。乔治·

帕潘德里欧(Georgios Papandreou)自己就是前反纳粹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遭德国人囚禁;他联合了自由党和民主力量组成了新的政党——中央联盟,该联盟在1964年大选中获全胜当权,主要受仍占希腊人口50%的村民的支持。中央联盟开始了一项温和的改革计划,包括审查警察权力,并开始公开质疑希腊完全听命于美国的意愿是否总是符合希腊人民的利益。与此同时,由帕潘德里欧的儿子安德鲁斯(Andreas)领导的中央联盟的左派要求更深远的改革。

1965年,帕潘德里欧在处罚右翼军官的问题上与国王发生冲突,国王在形式上是希腊军队的统帅。国王康斯坦丁(Constantine)解除了他的职务。这导致了一段时期的政治动荡,到1967年时很显然必须进行新的只有中央联盟能赢的大选。由最恶毒的专制主义的上校们组成的军人集团,抢在人民表达意愿之前的1967年4月21日夺取了政权。

上校们仇恨自由党和左翼;憎恨对两性关系采取宽容态度和邪恶的宗教蒙昧主义;他们在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时,信奉力大为王,尤其是严刑拷打。穿着靴子的审讯者向受害人施暴,大把大把地扯下他们的头发,拔掉他们的手指甲和脚指甲,对未经审判而被关押的2777名政治犯实施了多种形式的电击,这些都被大赦国际¹⁵详细记录在案。

小资产阶级的上校们对把军官军饷压得很低的传统的右翼权势集团,也是忿忿不平。他们还与君主、旧军人和政治精英们寻衅吵架。尽管如此,希腊的富商巨贾们——运输、炼油及其他行业的企业主——很快便与这个新的军人集团狼狈为奸;监狱里充满了那些敢于为文化和政治自由挺身而出的人。在那些臭名昭著的牢房里,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是不会缺席的。电影Zorba the Greek的配乐者米济斯·西奥多拉济斯(Mikis Theodorakis),就是其中之一。

“我自豪我尽到了作为公民、政治家和艺术家的责任。”西奥多拉济斯就因发表反对军人集团的言论而遭囚禁一事提出上诉。1968年1月22日,他在上诉途中这样说道:“我一直在为自由而战;作为作曲家,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了我的工作。我希望我是这个国家的最后一名政治犯。”

格陵兰,图勒(Thule)¹⁶ 放射性弹头

一架装有四枚氢弹的美国B52型喷气式轰炸机在格陵兰坠毁。当地工人被征集来协助维修人员把放射性的积雪装进麻袋,但是无论他们刨多深,盖革

(Gerger) 计数器的滴答声都不会停止……

23日 西德，汉堡(Hamburg)¹⁷ 顺从即是罪恶

在西德，激进的学生们正在为辩论的权力、授课结束前向教授提问的权力和表示异议的权力而斗争。生活在“冷战”的前沿阵地，他们已开始质疑自己所属的“自由世界”的神话和现实。在针对学生的生活条件、有轨电车的票价和学生宿舍规则的抗议活动中，警察使用了暴力，而这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抗议。1967年6月，西柏林的警察朝抗议伊朗国王来访的示威人群开火，打死了一名叫本诺·昂尼索格(Benno Ohnesorg)的学生。

当局对昂尼索格无端死亡的漠视和警察的行为，刺激了学生运动向更大规模和更加激进的方向发展，它激起了学生们对西德国家和世界体系所有价值观念的更深切的排斥；而价值观念是最重要的柱石。

联邦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中的左翼知识分子一直寻求把压迫社会的精神性欲、社会和文化因素与政治和经济的内容并重，并对整个社会制度进行最彻底的批判。

在路德的家乡，神学院的学生们正为他们质疑本堂牧师的布道，尤其是涉及支持被很多学生称为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不道德的战争的布道争论不休。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是西柏林一个神学院的学生，他试图把教堂变成道德和国家的思想论坛。1月23日，汉堡圣迈克尔教堂右翼牧师黑尔穆特·蒂利克(Helmuth Thielicke)竟召来军队驱逐教堂内质疑他布道观点的学生们。学生们散发传单，上面写着他们自己改编的“主祷文”¹⁸：

我们在西方的财神，
我们祈祷，
您的投资得以偿，
您的利润日日升，
您的利率天天长，
在华尔街和在欧洲都一样。
但是，
您要保佑我们日常周转的正常，

并赐予我们以信用，
因为我们要靠它向债权人赊帐，
千万不要让我们破产，
并能把我们从工会中解放。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
您就是权力、财富和世界的一半。
玛门。（玛门指被视作偶像或罪恶的物质财富——译者注）

北朝鲜 战争游戏

美国重要的情报收集船普韦布洛号在北朝鲜纵深水域作业时被发现，被北朝鲜海军部队捕获，它被监押到了元山（Wonsan）港。

对华盛顿而言，这是一次全面的危机：普韦布洛号是唯一装备了截获和破译所有美国海军密码设备的船只；其无线电发射机处于与全球美国海军部门进行通信联络的工作状态。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猛烈抨击政府，指责它在如此紧张的时刻允许普韦布洛号在北朝鲜水域非法作业。痛上加痛的是：乐于见之的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柯西金又拒绝利用他与平壤的良好关系从中进行斡旋。不管怎么说，普韦布洛号明显违反了国际法。

美国“企业号”在去越南的途中掉转船头，重又北上朝鲜海峡。



阿瑟·戈德堡(Arthur Goldberg)，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对联合国撒谎说普韦布洛号是在北朝鲜水域外被羁押的。

30-31日 南越，西贡 春节攻势

南越首府的夜晚。从卡拉维尔医院屋顶酒吧，美国记者可以俯视全城，这



左：美国宪兵检查在1月31日突袭西贡美国使馆战斗中阵亡的越共战士的尸体。

下：在美国对使馆失去控制的当天，威斯特摩兰将军举行记者招待会。



个曾经被称为东方之珠、东方巴黎的城市，有长长的林荫大道、宝塔和公园。建筑设计为35万人的西贡，在过去的三年里人口膨胀至300万。街上挤满了家园被毁后逃难来的乡下难民，他们住在用铁皮和纸板搭建的棚屋里，靠出卖苦力和肉体勉强过活。

空气中散发着浓重的廉价汽油味、下水道的腐臭、越南人的炊烟和食物的辛辣味道。这是春节，也是越南人民族新年的假日，人们放炮仗、送礼物和鲜花来欢庆它。在拥挤的棚屋和弄堂之间，仇恨使得这座城市气氛紧张。广告牌和霓虹灯的背后始终潜伏着战争的威胁。

突然，一阵密集的炮火骤起。不久又来了一阵。接着又是一阵。

从南越军营、总统官邸、政府无线电大楼，从警察局、武器库，从拥挤的堤岸(Cholon)区、行灿(Hanh Xanh)郊区，突然之间，在这座城市里，狙击枪和机关枪的枪声大作；火炮和迫击炮的炮弹遍地开花。

春节攻势开始了。

从北纬17度一直到最南端的金瓯半岛长达六百多英里的前线上，民族解放阵线向140个城镇发起了进攻。他们向南越军队的基地、机场、无线电台、监狱、海军司令部和后勤中心等发动了攻击。

1月31日早晨，当世界醒来的时候，人们发现民族解放阵线的三色旗在整个国家的上空飘扬。顺化(Hué)的古老城堡被占领，一支勇敢的游击队占领了美国在西贡的使馆大院。星条旗被拽了下来，民族解放阵线的彩旗居然在美国使馆的上空光荣地飘扬了几个小时。

现在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美国永远赢不了这场战争。美国人明白这一点，反战示威的人数一下子增加了三倍。全世界都能在电视上看见威斯特摩兰将军。他不再虚张声势了。他被撤职了。

〔注 释〕

1 叶夫图申科(Yevgeny Aleksandrovich Yevtushenko, 1933—)，苏联诗人，作品反映了苏联批判个人崇拜后的社会思潮，有长诗《娘子谷》、《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喀山大学》及诗集《情诗集》、《清早的人们》等。

2 《新世界》(Novy Mir)，苏联杂志名，米尔是沙俄时代的一种村社组织。

3 索尔仁尼琴(Alexandr Solzhenitsyn, 1918—)，苏联小说家，曾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被逐出苏联(1974)，定居美国，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长篇小说《癌病房》、《第一圈》等，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

4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Leonidovich Pasternak, 1890—1960)，苏联诗人、小说家，其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获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此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在苏联国内出版。

5 简·胡斯(Jan Hus)为约翰·胡斯(John Huss, 1372?—1415)，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家，布拉格伯利恒教堂教士，反对天主教会的专制压迫，抨击教士的奢侈堕落及教皇兜售“赎罪券”，主张宗教改革，遭诱捕后被判火刑处死。

6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德国人，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公布《九十五条论纲》(1517)，抨击教廷发售赎罪券，否定教皇权威，将《圣经》译成德文。

7 亚历山大·杜布契克(Alexander Dubcek, 1921—1992)，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1968—1969)。推动1968年政治改革，导致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被革职。1989年捷共丧失政权后，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新议会——联邦议会主席。

8 安东宁·诺沃提尼(Antonin Novotny, 1904—1975)，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

第一书记 (1953—1968)、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1957—1968)。

9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 法国哲学家、作家, 存在主义代表人物, 拒绝接受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 著有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 小说《恶心》和《自由之路》, 剧作《群蝇》和《魔鬼与上帝》等。

10 西蒙纳德·博瓦尔 (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 法国作家, 女权运动者, 萨特的妻子, 存在主义的信徒, 写有小说《应邀而来》、论文《第二性》等。

11 马格里布 (Maghreb), 北非一地区, 濒临地中海, 包括阿特拉斯山地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等国的沿海平原。

12 安德烈·勃雷东 (André Breton, 1896—1966), 法国诗人、评论家、编辑, 超现实主义运动创始人之一, 鼓吹艺术创作的“纯心理的自动作用”, 坚持内心经验不容外部的任何控制, 著有诗集《傅立叶》颂诗等, 代表作为小说《娜佳》。

13 佐世保 (Sasebo), 日本九州岛西北岸港口城市。

14 “全学联” (Zengakuren), 成立于1948年, 全称为“全日本学生自治联合会”, 其英文名为日语“极端左翼学生运动”的缩合词。


15 大赦国际 (Amnesty International), 总部设在伦敦的一个国际性组织, 自称专事“调查各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及“争取释放因政治、宗教原因而被关押者”。

16 图勒 (Thule), 格陵兰岛西北海岸上的爱斯基摩人居留地, 设有丹麦贸易站和美国空军基地。

17 汉堡 (Hamburg),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北部港口城市, 汉堡州首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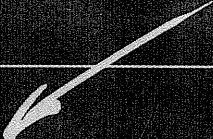
18 主祷文 (Lord's Prayer), 基督教最常用的一篇祈祷文, 其开端为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即“我们在天上的父”。





1968^年

2月



“我们打仗是因为我们受压迫，是因为我们受剥削……”

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队投入战斗。

贝 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¹ 在他的诗歌《赞美怀疑》中写道：“所有的怀疑中，最美的莫过于受压迫者和依附者昂起了自己的头，不再相信压迫者的力量。”这样的情形正在越南发生着。1月底发起的为时一个月的春节攻势，开始了越南战争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战斗：大卫（民族解放阵线）向歌利亚（美国军队）发起了进攻。事实上，这在军事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国内训练的游击队员和他们在城里的支持者们，从北纬17度到金瓯（Ca Mau）半岛最南端的一百四十多个城镇，向美国和南越政府军的基地及后勤中心发起了攻击。顺化古城落到了民族解放阵线的手中，他们的旗帜在美国使馆大院的上空光荣地飘扬了数小时。

越南人民攻势的意义是世界性的。快乐和激情荡漾全球，数百万人突然之间令人振奋地不再相信压迫者的力量了。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人们上街游行，挥舞着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抗击葡萄牙殖民军队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²的游击队员们在他们的丛林基地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欢呼了起来。这有一个“如果他们能成，我们也能成”的道理在里边。在里斯本，垂暮之年的法西斯主义以受“北约”支持且处于巅峰状态的萨拉查（Salazar）³独裁统治的形式表现出来；手持冲锋枪的警察被派去驱散美国使馆前的亲民族解放阵线的示

1968年2月23日版《洛杉矶时报》登载的有影响的日报漫画家康拉德(Conrad)的漫画，讽刺五角大楼和白宫在越南战争的问题上迷恋“逐步升级”的政策。漫画上的字义是：“欲拯救地球，必先毁灭地球。”



威游行。与切·格瓦拉鼓舞人心的话语一起出现的还有列宁的语录：“主要的敌人在国内。”在巴基斯坦，深受人民喜爱的诗人哈比布·贾力布(Habib Jalib)警告亲美的军事独裁者阿尤布·汗(Ayub Khan)陆军元帅：“笼罩在越南上空

的硝烟正朝你飘来。”在巴黎，学生把左岸的中心区域重新命名为“英雄越南区”。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在巴黎大学图书馆的上空飘扬。

在西柏林，德社学联(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呼吁召开“有关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响应如潮水般从美国、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一些正与独裁统治作斗争的国家涌来。二月份的第三个星期，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们在柏林自由大学那宽敞的、挂着条幅的大厅里集结在了一起，在这里他们有了一种大家庭的感觉和发现：感觉就在这个大厅内，一个新的共产国际已经萌芽；发现在这里有说有笑的人们，都快乐无比且息息相通，人们对春节攻势的每一个新的胜利都会报以更为响亮的掌声。正是这些青年男女的思想、希望和乐观激励着未来斗争的最前线。在这次大会的最后，约有两万人参加了游行。西柏林的大街上非常寒冷，人们呼出的气立刻变成了雾。他们举着切·格瓦拉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⁴的画像作为他们的旗帜。切，阿根廷医学院学生，在危地马拉参加革命，推翻了古巴旧的独裁统治，在非洲打过仗，为了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在玻利维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罗莎，一位跛足的热心的波兰犹太裔的国际主义者，1919年因反对德国资本主义而在西柏林被害。新一代的歌声回荡在灰色的柏林墙内。

对于美国的权势集团，春节攻势的突然袭击导致了他们政治上的巨大失败。



约二万名示威者高呼“胡、胡、胡志明(Ho Chi Minh)”在西柏林游行，以表明他们与越南人民团结一致、抵抗侵略的态度。

三年来，他们一直对美国人民和他们国外的盟友——欧洲的北约成员国政府以及在中东、亚洲和拉丁美洲美国支持的独裁者们——讲，他们在越南已处在巨大胜利的边缘，但春节攻势已使他们全线溃败。

既被误报又误报他人的五角大楼里一片混乱。在遥远的一个小国，一些装备很差的贫穷农民的决心摧毁了他们所有的把握。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整个历史上，还没有遭遇过军事上如此不体面的失败。美国权势集团中明智的人士开始发表反对越南战争的言论，呼吁通过谈判和立即撤军解决问题。他们知道他们赢不了这场战争；现在力求避免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失败这一难以接受的现实。下个月，威斯特摩兰将军将被解职；林登·拜恩斯·约翰逊将宣布不再竞选连任；“有关谈判的谈判”也将开始。

1 南越，西贡 结局的开始

春节攻势使威斯特摩兰将军胜利在望的预测落了空。他的“一线胜利的希望”带来的是南越民族解放阵线进攻的炮火。当美国人用大炮和飞机轰炸民族解放阵线占领的区域时，西贡仍处于酣战中。不断落下的炮火把白天变成了黑夜。此时，越南人把他们的物品捆在自行车上，纷纷逃离首府；在过去的三年中，无数的村民像这样逃离他们的家园。其他人则请求美国军官停止闪电袭击，但是恐怖的轰炸仍旧继续。常常只是为了消灭几个民族解放阵线的狙击手，整条街的房屋、店铺和货栈就被炸毁。

越南人在春节攻势期间实际部署的兵力少得惊人：四周用混凝土围了起来，被认为固若金汤的美国使馆大院，竟被一支20人的游击队攻占。美国人在直升飞机猛烈火力的掩护之下才将其夺回。

试图攻打大理石砌成的总统府的那股游击队中的一部分已经撤退到一座建成一半的旅馆，并使政府军和美国部队难以迫近达三天之久。当一名穿着条黑裤子的17岁的少女领着一队人数为9名的游击战士，双手举过头顶走出来时，围攻结束。他们都被毫不留情地全部处死。

西贡工人阶级居住的堤岸区，也是一个华侨众多的居民区，在那里，民族解放阵线已经把政府军作为打击的对象。这个地方的警察分管区和军事禁区都成了被街道包围的孤立的堡垒，淹没在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美国要用炮弹和汽油弹轰炸数周后才能使这个地区重新变得“安



1月31日袭击美国使馆之后，美国宪兵拘捕了一名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员。

全”一些。整个南越首府都是这样。十多年里，美国向南越倾注了大量的钱财。

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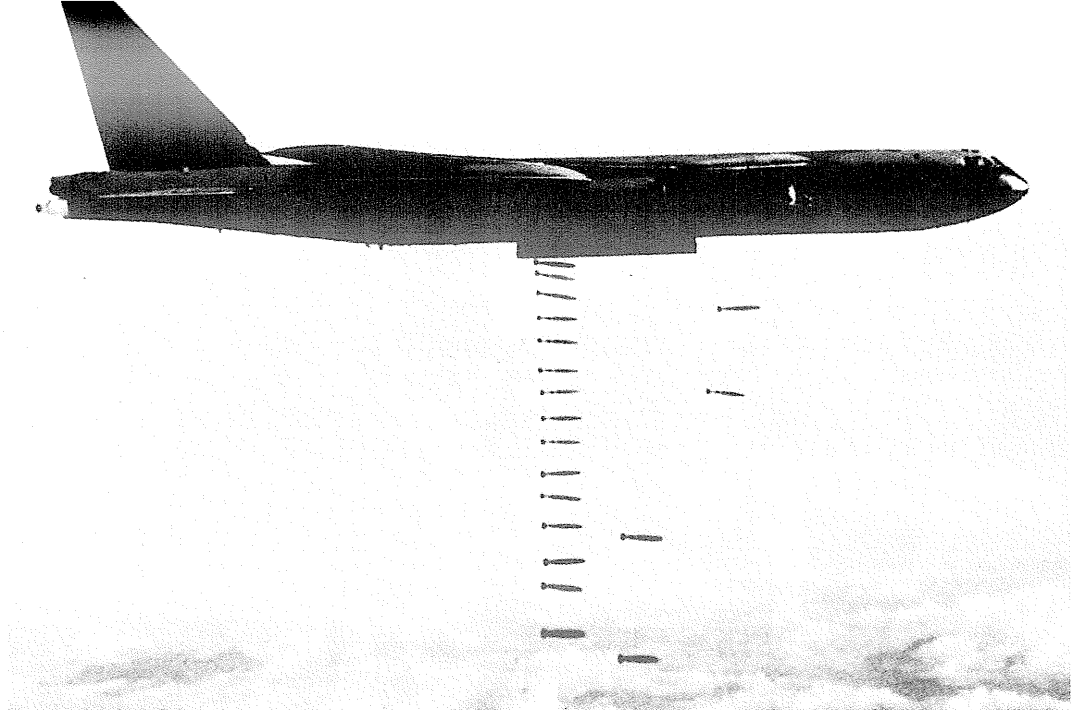
南越，槟知

“拯救槟知的惟一办法就是摧毁它”

美军和南越政府军的反击所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春节攻势期间民族解放阵线炮火对槟知的破坏。

槟知，湄公河三角洲一座住有35000人的宁静小城，自春节攻势之夜起，就被一支约有二千五百名战士的民族解放阵线部队占领。此刻，政府军的残余部队被围困在军营里；美国顾问的住处也遭到袭击。

一位美国军官作出了“流芳百世”的声明：“拯救槟知的惟一办法就是摧毁



一架从美国空军基地关岛起飞的B52高空安全轰炸机地毯式地轰炸越南。但这种轰炸未能奏效。

它。”

那里的人民是无权选择的。“自由和民主”正朝他们走来——免费服务的美国空军。摧毁槟知的炮火从空中、地面一起到来，用了50个小时，使用了500磅的炸弹及燃烧弹、火箭、各种各样的杀伤炸弹和105毫米、155毫米的迫击炮。

轰炸机在2英里居民区投掷燃烧弹；茅草屋化成了灰烬。直升机向市中心的集市扫射，墙体被摧毁，屋顶成了一堆堆废铁皮。民族解放阵线控制的电台被夷为平地。可怜该镇北边和西边的临近地区也遭受着持续不断的炮火的轰炸；切斯特·布朗（Chester Brown）司令坐在一架盘旋在小城上空的小型飞机上，指挥着这毁灭性的炮火。成千上万的人被烧死，或被自己房屋的废墟活埋。更有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在试图逃离这座小镇时被炸死——阻止民族解放阵线招募新兵的惟一办法就是屠杀儿童。

南越,顺化 攻占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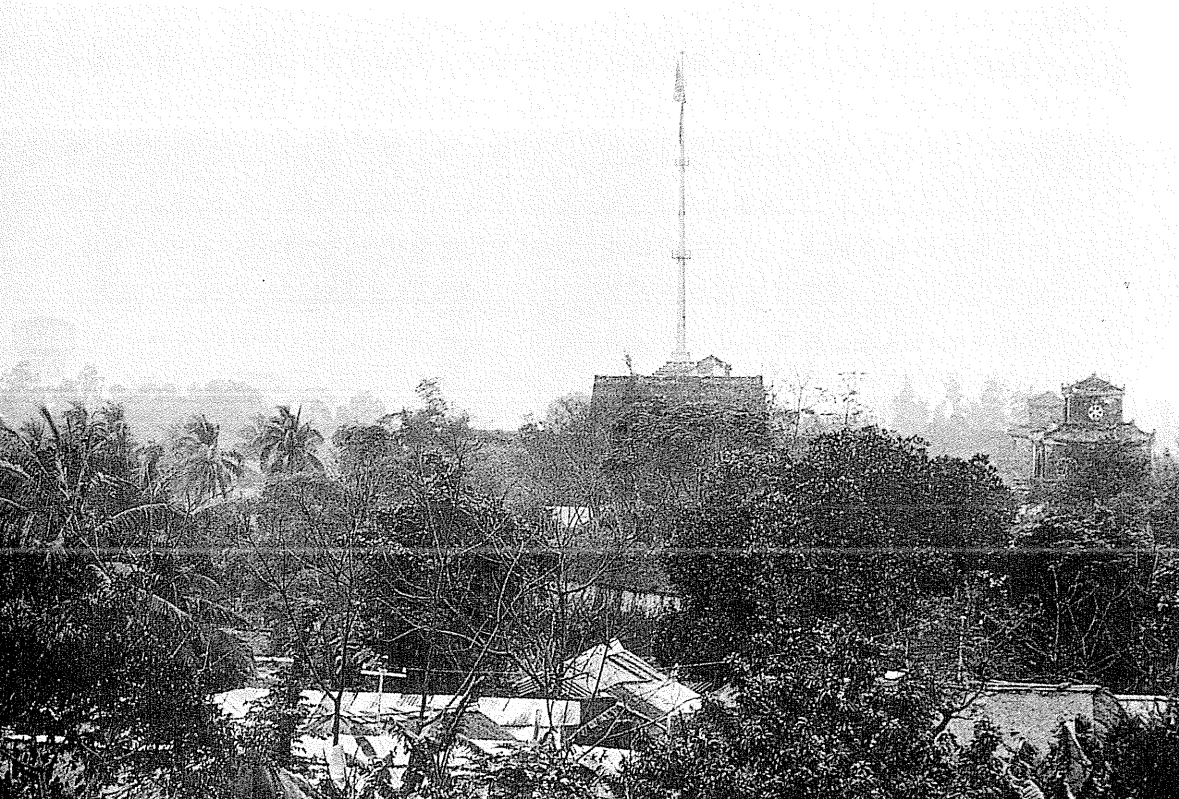
古老皇城顺化，位于西贡以北300英里，建于几个世纪以前，是为统一越

南的第一个皇帝修建的。它是按照中国泥土占卜术的复杂要求布局的：井然有序的花园内，建有精雕细刻、金碧辉煌的宫殿和宝塔，它们是世界的缩影。它的四周是高大的城墙；而整个皇城又处于更大的城堡之内，这个城堡的墙有20英尺高、14英尺厚。

这个国家许多最杰出的人物在顺化大学的古树下游过书。武元甲在那儿求过学。北越总理范文同（Pham van Dong）是宫廷内务大臣之子。胡志明的父亲曾一度担任过皇宫仪典处的书记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胡志明自己还只是个学生。

现在，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飘扬在城堡的上空。美国进攻部队穿过厚厚的云层，冒着狂风暴雨，对越南进行的持续不断的轰炸已经超过了一周，但他们没有向前推进多少。上面印着黄色五角星、红蓝两色的旗帜似乎可以让他们发疯。请求他们不要毁坏古老的神殿庙宇的市民代表的意见未被理睬：要将越南拯救出共产主义，炸毁皇城是必要的。只要云雾消散，他们就开来飞机向城堡

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飘扬在顺化的城堡上空，与此同时，上千名的抵抗战士保卫着这座越南前帝国都城，抵抗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进攻。



越南的抵抗

黎荣 (Le Vinh)，一位四十多岁的身材矮小、瘦弱、黑头发的男子，民族解放阵线的师政治指导员。长年的野外生活使他的面庞黎黑。

十年前他在西贡靠经营一家零售服饰用品的小店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他听说充当美国傀儡的警方——吴庭艳(Ngo Dinh Diem)，因为他在50年代反法抵抗运动中起过一些非常微小的作用而把他列入了嫌疑犯名单，于是在警察突然搜捕他的店铺前几小时设法逃脱。他前往西北，到了西宁(Tay Ninh)森林，在那里遇到了游击队。

十年之后的现在，民族解放阵线已在森林中建起了牢固的根据地，并用沿着危险的“胡志明小道”从北方偷运来的物资部分装备了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联系网络以及城市、乡村中的暗中支持者无处不在，甚至在南越军队基地内都有他们的内线。越南人在战略上也存在分歧：军事主义者以及为其撑腰的中国人赞同增强军事硬件，拓宽“小道”以使其能够运送坦克和装甲车辆。

甲将军——奠边府(Dien Bien Phu)战役的胜利者，一个到60年代后期仍然让法国军队的中枢神经发颤的名字——

及其支持者坚持认为，这场斗争除了军事的，还必须是政治的：只有人民加入了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在西贡的“傀儡政府”的起义，并与游击队的武装斗争结合起来，才能赢得这场战争。此时，“政治—军事主义”似乎占了上风。

黎荣告诉了澳大利亚战地记者他们游击队的新兵是如何来的：一些来自民族解放阵线攻占的村庄；一些来自从美国人的“战略之村”逃进森林的难民；而另一些则是携带武器从南越正规军投诚来的南越士兵。

新兵中有中产阶级家庭的姑娘和小伙子，有从顺化和其他城市来的学生，有店主、工匠和农民。他们世代居住的村庄被摧毁，房屋被夷为了平地，家人被杀害，庄稼被烧毁，牲口被赶跑。黎荣负责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所有的新兵在发给枪支以前都要接受15天的培训，最初的5天用来进行政治讨论、提问与解答。

“我们为什么打仗？为谁打？这是我们需要引导新兵寻找答案的最初的两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打仗？我们打仗是因为我们受压迫，因为我们既受外国侵略者，又受西贡压迫者的剥削，受封建势力的剥削。每一个到我们这儿来的人，多少都有那样的经历。

“以前，父亲或兄弟遭吴庭艳的警察和外国侵略者逮捕、摧残或杀害的事被认为是天灾、上帝的行为——事实上，没有一个家庭能够免于这样的压迫。现在，这些被置于他们压迫我们的背景下看待。

“农民们从传奇和诗歌中，从庙中诸



一名民族解放阵线的女战士。

从最后的胜利中受益？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穷人和受压迫者。新兵很快就毫无保留地讲起地主、收租人或收税人对待自己的经历。穷人和被剥削者应该在社会中拥有崇高地位的思想，常常让他们真相大白，并在讲话时有了自豪感。以前，他们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耻，觉得贫穷是一种罪恶，因此尽可能地掩盖自己贫穷的事实。

“一个新兵回忆了他以前去西贡时，常常用浮石粉磨自己的手，尽可能多地去掉老茧，以便让那些可能与他握手的人不再猜测他是穷苦人。

“在‘为什么’和‘为谁’这两点之外，还有必要加上第三点，即胜利是肯定属于我们的。

“我们会赢。”

神到昔日的英雄身上，从流浪的说书人和剧团那里，知道他们的祖先抗击并战胜外国侵略者的故事。他们不难懂得他们是优秀的捍卫祖先传统的人。

“第二个问题：我们为谁打仗？谁会

投掷燃烧弹和催吐性毒气弹。第二周，美国部队在武装直升机、俯冲轰炸机和投掷燃烧弹的飞机的支持下，将发起地面进攻。巨大的橘黄色的火球将在古老的城墙上方翻滚。

最终旗帜落了下来。树木或被烧焦或被炸毁；绝大部分的建筑只剩黑黢黢的梁柱；到处都是破碎的陶瓷——被陶瓷专家称为顺化蓝的古花瓶的碎片。在泥浆四溅的废墟中刨挖的越南人感到郁闷和气愤。为什么？为什么为了几百名解放战士而摧毁整个城堡？为什么不使他们弹尽粮绝后投降？

南越，溪山 (Khe Sanh) 被包围与被孤立

与此同时，孤立的、靠近北部边境的美国溪山基地仍然处于民族解放阵线和北越军队的包围之中。美国部队钻进了掩体，从一个出入口跑到另一个出入口，躲避着狙击手和炮火的袭击；而民族解放阵线的坑道则离他们更近了。溪山标志着威斯特摩兰“搜寻与摧毁”策略的彻底失败。美军非但没有孤立敌人或从后方截断他们，反而被敌人包围并被截断了补给线。

莫桑比克，柏林，巴黎，罗马 同志们

当春节攻势的镜头在全世界闪现时，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员的大胆、无畏可谓极端惊心动魄。当看到美国西贡使馆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时，很多人高兴地笑了起来。

抗击葡萄牙殖民侵略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员们，在他们的丛林基地从收音机里听到这条有关溪山的消息时欢呼了起来。

在柏林、巴黎和罗马则发生了盛大的示威游行。

这个月晚些时候，(联邦)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发出了召开“越南问题国际大会”的呼吁。

在巴黎，警察使用防暴盾牌和长木棍袭击了在拉丁区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游行示威者。一枚催泪瓦斯手雷在“双叟猴”咖啡馆里面爆炸时，引起了人群的恐慌。一名从影院出来的教师被警察当作阿尔及利亚的示威者，在带到警察局前就被打得不省人事。

美国，芝加哥 鲍比·肯尼迪竞选总统

在美国国内，春节攻势引起了一个大危机。背后有鸽派的支持，纽约参议员鲍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向约翰逊的政策和战争行为发起了猛烈抨击。他问道：为什么越南人在反对民族解放阵线时糟糕到如此地步，既不能保卫他们的城镇，又不能保护他们臭名昭著的、不受欢迎的政府呢？

“人民不会为中饱将军的私囊或为富人的银行帐户而战。他们对自己的政府多半不予理睬或拒之门外——就像他们上周所表现的那样。

“这一事实比任何大选都能说明问题。我们仅有一个名义上的同盟。我们正

南卡罗来纳州学院骚乱的第三个晚上，警察和国民警卫队驱赶投掷火焰炸弹的学生时，美国公路巡警站在两名伤者前。



在支持一个没有人支持的政府。没有美国人的帮助，那个政府一天也支撑不下去。

“据说越共占据不了城市。这也许是实情。但是，他们已经表明：尽管我们所有的报告都说取得了进展、政府如何强大、敌人如何弱小，但是，拥有完全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有巨大资源和现代化武器做后盾的50万美国士兵和70万越南盟军，却不能保证一座城池免于敌人的攻击。

“对越南的情况讲真话的时候到了。我们无法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政治妥协不仅是通向和平的最佳道路，而且是必由之路。”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伯格(Orangeburg) 诀别非暴力

在南卡罗来纳州学院仅限白人进入的地滚球场外进行的抗议活动持续到第五天，三名黑人学生遭白人警察和国民警卫队杀害，另有差不多五十人受伤。绝大部分的学生是在躺在地上或寻求庇护时背部中弹的。

警方和罗伯特·麦克奈尔(Robert McNair)州长把枪击事件归咎于学生；三十多名黑人学生被捕。

同月，小说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⁵写道：

“记得在60年代初的一次选举人登记中，我站在亚拉巴马州塞尔玛(Selma)市的街角上。黑人们在县政府大楼前排起了队，天空飘着美国国旗；县治安官及其部下头戴钢盔，别着枪，手里拿着警棍和赶牛刺棒；一群游手好闲的白人站在街角。治安官举起了他的警棍，他和他的两个副官把两个黑人男孩打倒在地。人群四散逃去的情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警察已经给他们发出了信号。

“一位非暴力的黑人学生几年前告诉鲍比·肯尼迪，他不知道他的非暴力还能坚持多久，因为他不知道他对于殴打、轰炸、恐怖还能忍耐多久。他说他绝不会拿起武器来保卫美国——决不！决不！决不！如果有一天他拿起了枪，那一定是因为别的完全不同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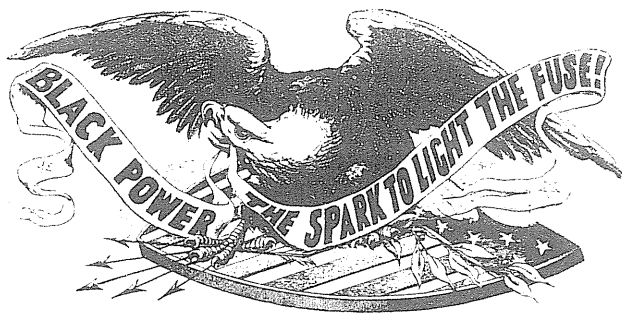
“和许多他那样的人一样，那男孩已经长大——我们将不提那些无法挽救地堕落了或死去了的孩子们。我真不知道什么是白人美国所希望发生的。难道他们真的以为15岁的黑人男孩子永远只有15岁？难道他们真的相信那些在静坐抗议、涉水抗议、游泳抗议、设置纠察线和游行示威中投入巨大能量和过人胆识的青年人不能将其能量转化为对现状的公然攻击。在塞尔玛的同一天，我看

见一排未来的黑人选民从他们还不能进入的县政府大楼边走开了。我当时想，他们不再愿意排队的一天就要到了。

“让我们努力面对这个事实：我们是一个种族社会，极端种族主义的社会；我们正在打一场种族主义的战争。在自己的国家里处于桎梏之中、每天都看见身边有很多死去的黑人，此刻根本不会相信美国会在乎亚洲的自由。作为一名美国黑人，我自己的处境告诉我美国人真实的感受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告诉了我他们轰炸的到底是些什么人。所以，每一个被炸的村庄都是我的家乡。”

11月 美国，芝加哥 戴莱(Daley)的匪徒

于白宫判定芝加哥警察局在镇压骚乱的装备上优于对手迈阿密(Miami)之后，芝加哥就战胜了迈阿密从而成为这年夏天民主党年会的召集地。没有人怀疑会有麻烦。芝加哥黑人社区对贫民窟的住房、教育和就业条件的无望感到痛苦。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⁶已经呼吁人们进行示威游行，抗议民主党的越南政策及其对城市贫困的漠视。学生团体、反战示威者和新左派正组织群众，准备在“年会”召开之际进行大游行；“黑人权力”的领袖们也正计划着他们自己的抗议活动。



插图上的文字：黑人的力量、点燃导火索的火花。

对戴莱市长辖下的芝加哥防暴警察来说，来复枪、催泪瓦斯和机关枪的练习现在已是警察标准训练的一部分。所有被安排保卫“年会”的12,000名警察将配备防护梅斯神经毒气的防毒面具。在警察、军队、国民警卫队、州警察局、联邦调查局和其他特务机关之间也已设立了联络系统。

阿拉斯泰尔·库克(Alastair Cooke)在《卫报》上写道：

“计划是：总统自己将乘直升机进出；他在‘年会’上短暂的露面将受到任

何一个民主国家领导人从来不曾有过的装甲钢板的保护。西方‘自由人民’通过卫星看见的这一幕将会十分壮观，但应对此进行反思。”战火正燃向国内。

定义的问题

一个人们不能

称之为

真正民主的民主

真的

是真正的民主吗？

——埃里奇·弗里德(Erich Fried)

13日

玻利维亚 婚礼的钟声

里吉斯·戴布瑞(Régis Debray)，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革命的革命》一书的作者，1967年与切·格瓦拉的游击队见面之后被玻利维亚军队逮捕。他被单独监禁在一座叫卡米里(Camiri)的石油小镇上。国际上产生了要求释放他的运动，并迫使玻利维亚人没有杀害他。为显示他们的人道，玻利维亚军人集团允许他与他的委内瑞拉情人伊丽莎白·伯格(Elizabeth Burgos)结婚。他们在卡米里监狱合卺完婚。

14日

联合王国，伦敦 反正统文化

约瑟夫·贝克(Joseph Berke)，29岁的美国诗人、心理学家，宣布“伦敦反大学”运动的开始，“抗击教育界知识的破产和精神的虚无”。

科尼利厄斯·卡迪尤(Cornelius Cardew)将讲授实验音乐；R.D.兰恩(R. D. Laing)⁷讲授心理学和宗教；阿伦·克雷布斯(Allen Krebs)讲授社会学和世界革命；欧比·埃格伯纳(Obi Egbuna)讲授黑人权力；巴里·弗拉纳根(Barry Flanagan)讲授太空。查尔斯·马洛韦茨(Charles Marowitz)、吉姆·海尼斯(Jim Haynes)、大卫·默尔瑟(David Mercer)、阿莎·本维尼斯特(Asa Benveniste)和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也在教师之列。

贝克宣称：“反大学和嬉皮士群居村或地下报纸一样，是反正统文化的一部

分。反医院、反大学、反家庭、反剧院、反国家，所有这些都是文化游击战的形式。为了能看清一种结构，我们必须从中跨出来。但是，如果没有地方踏脚，你从那里是跨不出来的。”

尽管反复要求，但“反大学”拒绝把“狗屁的高雅艺术”作为正式的科目教授。

15日 法国，巴黎 名星们上街游行

警察与举着旗帜向法国实验影院进发的游行示威者发生了冲突，示威者中包括琼-卢克·戈达德、西蒙·西纽雷(Simone Signoret)、马莱娜·戴德丽(Marlene Dietrich)⁸、路易·布努尔、珍妮·莫罗(Jeanne Moreau)⁹。文化部开除实验影院的创办者、导演亨利·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的决定激怒了他们。

这是对戴高乐政府高压、冷酷和专制作风的抗议。官僚们不知道朗格卢瓦追求的价值和意义。30年代还是巴黎的一名年轻记者时，他就对老的无声电影产生了感情，而当时人们认为它们惟一的用处是做指甲油。1934年在圣日尔曼草场(St Germain-des-Prés)中一个拥有30个座位的电影俱乐部里，他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放映。

纳粹占领期间，他必须把影片藏起来，不让德国人看见。德国人想用它们来做炸药。他强烈的念头是保护任何看似电影的东西。“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未来的经典？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能假装一贯正确。”

他这样做的结果之一就是积攒了大量的电影拷贝，其中包括美国“二流”电影、恐怖片和悲剧片；如果没有朗格卢瓦，这些影片肯定早已消失了：它们对法国新一代“新浪潮”派导演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电影教育得益于朗格卢瓦的实验影院。现在，老一辈的布雷森(Bresson)、卓别林(Chaplin)、富勒(Fuller)、卡赞(Kazan)、洛塞(Losey)、明尼里(Minnelli)、雷斯(Reisz)、克莱尔(Clair)、雷诺阿(Renoir)¹⁰、罗塞里尼(Rossellini)和威利斯(Welles)也加入了戈达德、特鲁福特(Truffaut)、夏布勒尔(Chabrol)、戴米(Demy)和瓦德(Varda)组成的抗议的行列——所有的人集合在一起，目的是使艺术想象事业免遭官僚的毒手。在光荣的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朗格卢瓦在热烈欢庆的气氛中被恢复了职务。

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呼吁召开的“越南问题国际大会”在西柏林自由大学里开幕。政治形势十分堪忧：左翼学生与专制的市政当局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社会主义学生联盟要求在第二天进行的示威游行遭到禁止；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正呼吁对禁令进行抗议。

“大会”的气氛紧张热烈：礼堂里挤满了出席会议的人，这里的会议12个小时没有间断；数千人在理工学院巨大的门廊和更远处的两座礼堂间来回穿梭。约有一万名的激进分子与会，代表团分别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希腊、挪威、丹麦、奥地利、加拿大、联合王国和美国。民族解放阵线的旗帜和切·格瓦拉“革命者的责任是发动革命”的标语口号占据着中央大厅。

切对68界的呼吁是什么呢？

他对软弱无能的妥协和冷战外交表示反对。他把他的理论付诸行动；他要去帮助越南人民的努力——虽是唐吉珂德式的但却是勇敢的——失败了。他成了没有任何国界的最纯粹的国际主义的象征。他的行动表明了他对现行秩序极端的厌恶。他的形象成为欧洲的学生和他自己所在的南美洲的农民，在与敌人斗争时所捍卫的一面旗帜。

演讲是急迫、激动人心、富有战斗精神和国际主义的，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壁垒而显示出世界固有的休戚相关。每次的讲演都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争论和毫不留情的质询。克特·斯泰因豪斯(Kurt Steinhaus)代表“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塔里克·阿里(Tariq Ali)代表“越南团结运动”、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代表《新左派评论》、珍妮特·哈伯尔(Jeannette Habel)代表“法国共产主义革命青年”发了言。发言的还有加斯顿·萨尔瓦托(Gaston Salvatore)，萨尔瓦多·阿连德¹¹在柏林读书的智利的侄儿；剧作家彼得·魏斯(Peter Weiss)；诗人埃里奇·弗里德；伊朗革命家巴曼·尼鲁曼德(Bahman Nirumand)；意大利的罗斯丹戈(Rostango)和法国的阿伦·克赖文(Alain Krivine)。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托派分子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从全球的角度考察了越南战争，在“大会”上断言美国注定要被打败。

30岁刚出头的鲁迪·达奇克是德国学生领袖中年纪最长的。他中等身材，

四方脸，一头长发，笑容温柔。他的眼睛总是笑眯眯的。他是一位出众的演说家，只是听众对他国家的历史耿耿于怀。达奇克的演说令人着迷，但很少被报以热烈的掌声。对希特勒蛊惑人心的记忆，使得激进的学生们对所有的演说家都心存戒备。有人建议达奇克的演讲要适度。这些学生的父母曾为德意志第三帝国效过力，他们不愿忘记那些罪恶。

达奇克把在越南的战争与反抗欧洲的阶级统治的斗争联系起来。他谈到“在所有公共机构内进行长征”，从而把学生运动引向深入，要在每一条战线——教育、计算机、大众传媒和生产部门——获取经验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政治觉悟。

“长征的目标是要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建立反机构的解放区，它相当于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期间敌后游击队的解放区。”

两个从越南战场退伍的美国黑人老兵登上讲台，他们向人们挥拳致意。他们讲述了他们所了解的越南战争以及黑人士兵如何充当炮灰。然后，他们臂挽臂地叫喊起来：

我不要去越南
因为越南是我的故乡
决不！我决不去！
决不！我决不去！

当埃里奇·弗里德讲演时，传来反对第二天游行的禁令被法院撤销的消息。毫无疑问，法官已经收到了有关这次“大会”气氛和规模的报告。但有一个条件仍然存在：游行禁止接近美军营区。

达奇克把麦克风抓了过来：“同志们，这最后的限制我们一定要推翻。我们必须争取对士兵讲话。如果由敌人制定游戏规则而我

上图：鲁迪·达奇克在西柏林的一次反越战示威游行中。

下图：两名美国公民在焚烧他们的征兵卡。



们又去接受它们，正如马尔库塞(Marcuse)¹²所言，我们就已经失败了。这意味着我们在照他们的规则行事。”

“大会”意见不一。柏林防暴警察是众所周知的。纽博尔(Neubauer)，他们的政治头目，对他们的局长说过：“死几个人没有关系，必须得有千把人头破血流。”

埃里奇·弗里德，十几岁上就在故乡维也纳街头反对纳粹直至被迫亡命国外。他很快写了张条子递给台下的达奇克。

达奇克停顿了下来，把条子默念了一遍；然后，他转向大会，大声念了出来。

“我们的胜利在于这样的事实：我们游行了。请不要寻衅滋事。我讲完了，我的灵魂得救了。弗里德。”

“同志们，我错了。”他继续说道，“这是我们的胜利。”

第二天早晨集中在选帝侯大道(the Kurfürstendamm)的人群多达二万人，他们举着数千面的红旗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¹³、罗莎·卢森堡、列宁、胡志明和切·格瓦拉的画像。从前一天开始，示威者分乘几十辆长途汽车从西德各地来参加这个遭到禁止的游行。市政当局禁止使用学校和其他的官方建筑，但是，没想到全城团结一致，解决了所有外来者的食宿问题。

西柏林，这个冬日的早晨，覆盖在欧洲历史上的坚冰有一种被打破的感觉。示威者欢欣鼓舞地在大街上唱啊叫啊，边走边喊：“胡，胡，胡志明！”，“切，切，切·格瓦拉！”，“民族解放阵线，必胜！”他们一路叫喊，最后到歌剧院外集结起来。歌剧院是去年夏天抗议伊朗国王来访时本诺·翁尼索格遭警察枪杀的地点。游行的队伍在靠近柏林墙的地方停了下来，游行向大墙对面的人们进行演讲，要他们创造共同的事业。东方的官僚和波恩的“北约”政客，谁更仇视游行令人很难判断。

甲克虫¹⁴乐队显然对世界状况漠不关心；他们飞到了印度，在马黑什(Mahesh)瑜伽大圣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幽所里，开始了他们的默念课程。在这里，他们真的能飘飘欲仙了。

23日

捷克斯洛伐克 质疑斯大林主义

经过中央委员会的激烈斗争，伊凡·克利马(Ivan Klima)、安东宁·利姆(Antonin Liehm)和路德维克·瓦丘利克(Ludwik Vaculik)恢复了作家联盟报 Literarni Listy 的编辑工作。去年秋天，他们被诺沃提尼除名。

捷克的新闻界出现了要求全面质疑战后斯大林主义的呼声。有家报纸公布了那些在将反对派送进监狱或送上断头台的事件中，扮演过角色的部长们的名单和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名单。

与此同时，诺沃提尼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知识分子和白领改革者的工人勇士，以在工厂的地方党组织领导人中争取支持。要求诺沃提尼辞去总书记和总统职务的呼声越来越高。

25日

西德 与集体遗忘症作斗争

在《严厉》(Stern)杂志最新披露的一份修建纳粹集中营设计师的签名的真相之后，人们普遍要求签名人——西德基督教民主党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Heinrich Lübke)博士辞职。他出现在电视上，驳斥对他的有关指控，但未能否认他是签署者。“在过去了25年以后，我自然记不清我签署过的每一份文件了……”他这样说道。

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斗争的对象，是在北约保护下的吕布克那代人染上的集体遗忘症。他们的父母在“第三帝国”期间的所作所为让他们感到惭愧。与日本、意大利的同学一样，他们的愤怒不久化为反抗压迫和反抗新的独裁主义的暴力行动。

吕布克将在1969年初辞职。

28日

西班牙，马德里 充耳不闻

佛朗哥(Franco)¹⁵的警察暂时从马德里大学撤退，上个月发生了学生反对法西斯政权的抗议活动之后，他们就一直占据着这所大学。当被问及在马德里大学的这段日子有没有什么经验教训可资汲取时，警察局长捂起了耳朵。

从大元帅广播他向新生的西班牙共和国民选政府宣战并在马德里举行游行示威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大量的军事援助下，经过三年血腥的内战，民主力量被镇压下去；西班牙军队对反对派的屠杀持续了几年的时间。

佛郎哥现在老了，身体有病且遭人怨恨。整个国家都在等待这个老人死去——希望变化的人已是急不可捺；其他人则因不知他的死会带来怎样的变化而越发惶恐。对他们来说，未来就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盘踞心头的一系列的恐惧皆发生其中；它使人们对于一个惯于依靠长枪党的镇压、依靠祖国的神秘感和教会的箝制力量支撑生存的政府抱有过的恐惧。

当佛郎哥统治集团内部的各部分——军队、教会、长枪党、马德里的银行界、加泰罗尼亚(Catalan)财团，控制一切的200个家族——开始为自己在后佛郎哥时代的地位你争我夺时，在这个政权统治下成长起来的学生们已经感到了控制的松动。学生们只知道左翼认可的政权的反对派。他们是自己父母的孩子。他们对落伍过时、资金不足、过于拥挤的西班牙大学的造反，常常能够赢得老师们支持。在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巴斯克(Basque)地区，这一行动受到反对马德里中央集权的当地群众的支持。到了这个阶段，佛郎哥死后爆发群众运动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了。

这个时候，那个薄唇的屠夫照旧端坐着，微笑着；而他的周围则流言四起。他在考虑他死后任命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¹⁶——西班牙王位名义上的觊觎者的儿子，做他的接班人。

〔注 释〕

1 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德国戏剧家和诗人，提出“史诗戏剧”理论和“间离效果”的演出方法，强调作品的理性分析和教育作用，写有论著《戏剧小工具》、剧作《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等。

2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原为莫桑比克一左派游击队组织，1964—1974年间开展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斗争，1975年莫桑比克独立后成为执政党。

3 萨拉查(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 1889—1970)，葡萄牙总理(1932—1968)、独裁者、曾两度出任财政部长(1926、1928)，就任总理后，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镇压葡属非洲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

4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

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参与创立斯巴达克同盟，与李卜克内西等一同被杀害。

5 詹姆斯·鲍德温 (James Baldwin, 1924—1987)，美国黑人小说家、剧作家，致力于黑人民权运动，作品大多反映美国的种族问题，主要作品有小说《向苍天呼吁》、《下一次将是烈火》等。

6 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美国浸礼会黑人牧师、非暴力民权运动领袖，两次被捕入狱，参与组织20万黑人“向华盛顿进军”(1963)，促使国会通过民权法案(1964)，获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后遇刺身亡。

7 兰恩 (R. D. Laing, 1927—1989)，英国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提出精神分裂的病因理论。

8 马莱娜·戴德丽 (Marlene Dietrich, 1904—)，美籍德国女电影演员，1930年主演影片《蓝天使》一举成名，同年赴美国好莱坞拍片，在英国拍片期间拒绝为纳粹效力。

9 珍妮·莫罗 (Jeanne Moreau, 1928—)，法国女演员，主演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Jules et Jim* 和 *Nikita*。

10 雷诺阿 (Jean Renoir, 1894—1979)，法国著名电影导演，法国20世纪30年代“诗意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幻灭》、《马赛曲》、《衣冠禽兽》、《游戏规则》等。

11 萨尔瓦多·阿连德 (Salvador Allende, 1908—1973)，智利总统 (1970—1973)，智利社会党的创始人和领袖，在1973年军事政变中殉职。

12 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1898—1979)，美籍德国政治与社会哲学家，批判现代社会的反自然性，主张用革命手段加以改造，被誉为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先知”和“新左派”的代表。

13 卡尔·李卜克内西 (Karl Liebknecht, 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创立斯巴达克同盟 (1916)，与卢森堡等一同被杀害。

14 甲壳虫乐队 (the Beatles)，20世纪50—60年代利物浦一支由四人组成的流行歌曲乐队，曾风靡一时。

15 佛朗哥 (Francisco Franco, 1892—1975)，西班牙独裁者、长枪党首领，发动反政府的叛乱夺取政权后，任元首兼大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战争。

16 胡安·卡洛斯 (Juan Carlos, 1938—)，西班牙国王 (1975—)，佛朗哥死后即恢复政党，实行君主立宪。





1968^年

3月

“这里有武装警察。”

格罗夫纳广场：英国爆发反对美国进行的越南战争的敌对冲突。

3月，狂潮袭击波兰。在这个月，席卷该国的动乱的直接原因是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¹的19世纪名剧《先人》（Dziddy）的新编剧本遭查禁。对，是一个戏剧。文化在帮助保留和鼓励异议中的作用一直是前苏联及其东欧辖区的标志。当奥西普·曼德尔斯坦姆（Osip Mandelstam）死于斯大林集中营时，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评论说，政权机构的确欣赏他的诗。它明白该诗的力量。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要处决拒不从它的诗人。邪恶向正直表示了敬意。

在斯大林时代，当所有不同政见几乎都被禁止时，文化就成了社会意见的惟一发泄口。读经典的人数众多。剧场和音乐厅挤满了人。由于国家出版社绝大多数的当代作品到处都是一副乏味的、刻板的官方文献的口吻，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²、托尔斯泰（Tolstoy）³、普希金（Pushkin）⁴等人的作品在整个地区就可以用来鼓励和保持一种批判的、反独裁主义的精神。尤其是剧场，当莎士比亚或索福克勒斯（Sophocles）⁵的、莫里哀（Molière）⁶或埃斯库罗斯（Aeschylus）⁷的特别贴切的台词被针锋相对地说了出来，全场观众突然报以掌声的时候，人们由此真正地感受到了彼此之间的团结。

随着文化限制的放松——这是赫鲁晓夫留给该地区的主要遗产，东欧电影业的新复兴开始了。主要是黑白片的“新潮”电影，它们一方面在视觉上所具有的清新自然是颠覆性的，另一方面是它们仍与20、30年代前纳粹时期的电影保持着联系。他们在形象的塑造和人物——多数情况下是些“普通人”——的情感处理上都很有灵感：透过打字员和铁路工作人员的眼睛，人们看到了历史。

波兰也不例外。1956—1957年间，这里也开始解冻，允许在半官方的出版物上摘要发表讽刺诗和评论文章。审查也放松了。新的领导人哥穆尔卡（Gomulka）⁸撤换了旧的官僚机构。波兰人民得到了进行改革的许诺。但是一切如故。很快，新的领导者们就不可抗拒地被拖回到了糟糕的老路上去了。

宗教和政治的混乱是1968年动乱的特点，但它在波兰却是独一无二的：这里的基督教教会与每一个政权合作，不管它受到这个政权的多大压制；同时又试图控制每一个反对派的领导权。教会没有打过什么交道的政治流派，似乎是改革派共产主义即“人性化社会主义”流派；该流派在邻国捷克斯洛伐克正开始着手众多的可能性的变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共产党人在这个3月份将激活基督教对波兰改革运动根深蒂固的偏见，说它与古老的反闪米特主义⁹是一丘之貉：民主派都是



华沙学生抨击“报界谎言”。在大学和理工学校墙上出现的反闪米特人的标语被指责是犹太学生自己写的。

“犹太复国分子”，群众性抗议活动将被指责为犹太人的阴谋。群众性抗议活动首先在华沙的学生中爆发，继而遍及全国，克拉科夫（Cracow）、波兹南（Poznań）、卢布林（Lublin）、格但斯克（Gdansk）、罗兹（Łódź）、塞青（Szecin）和弗罗茨瓦夫（Wroclaw）等地的学生也群起响应。可悲的是，后来学生们分裂了；催泪瓦斯则使他们彻底溃败。

值得回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被留在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曾有过这样一段不长的时间：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确抱有真诚的热情。也许安德赖伊·瓦伊达（Andrzej Wajda）的庆祝抵抗运动胜利和打败德国法西斯的电影三部曲最能说明这一点。瓦伊达在他1977年的影片《铁石心肠》（Man of Marble）中刻画了这种热情是如何被国家肆无忌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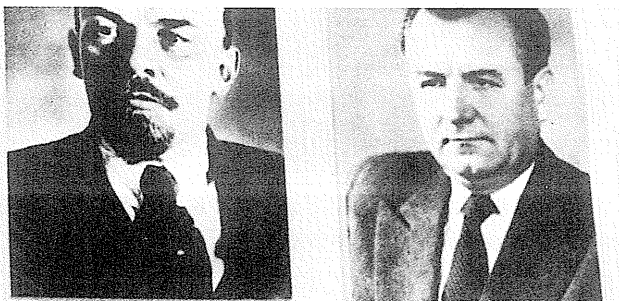
操纵的全过程。此时，团结工会（Solidarnosc）已经撞响了旧制度之门。为波兰人数众多、社会地位重要的工人阶级争取更好的待遇和争取一个在各方面都更民主、更开放社会的新热情又一次被基督教会肆无忌惮地利用。上述过程以及团结工会的腐败和它后来的分裂，目前还没有被瓦伊达或其他制片人拍成电影。

对东欧巨变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文化解释，目前由于自由市场、音乐电视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的肥皂剧的到来而陷于瘫痪。看一下1968年的波兰你就能明白，它并非总是这样。英国《卫报》全文刊登的对密茨凯维奇遭禁剧目的评论提醒我们：在这动荡的时期，英国报界发稿的先后顺序也是很不一样的。



左图：布拉格学生讽刺该市的“最秘密的警察”。

下图：在布拉格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建国20周年的庆祝大会。
从左至右：勃列日涅夫（苏联）、杜布契克、多兰斯基（Dolansky）、
诺沃提尼（捷克斯洛伐克）和乌尔里希（Ulbricht）（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在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是春天；空气中充满了变化。改革变得看得见了；因要求新的政治秩序而被解职的编辑们恢复了职务。在新版作家联盟报 Literarni Listy 的第一期上，简·普罗查兹卡(Jan Prochazka)表达了那份不再局限于布拉格小圈子里而是遍及整个国家的激动心情。

“如果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并创造着这个新的开端，也许我们该在新人的带领下进行。把原班的向导和领导全部关进地狱，炼狱和天堂的经济负担就太重了，即使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国也一样。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时刻，抓住历史给予我们的机遇，把应该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和自由这两件事结合起来。”作家联盟主席戈德斯图克

马耶乐斯(Majales)节——遭捷克政权禁止的学生欢庆春天的传统节日——期间，学生们举行了取笑共产党的集会。游行者举着讽刺共产主义恐外症(左)和援引哈塞克(Hasek)的讽刺小说《好兵施韦克》(右)的旗帜。



(Goldstücker) 说道。

但是，与希望并存的还有有凭有据的恐惧。历史还没有善待过捷克斯洛伐克诸民族：“目前这个阶段也许只是两个冬季间的消融阶段。”

普罗查兹卡补充说：“在最后的年代，许多人不敢公开使用电话，而且也不敢确信他们现在就可以了。你通话时总有只无声的手。监视的目光无处不在。你最好远离有些人，因为他们受雇于一个以上的雇主。

“在过去的年代，我们经常听到‘民主化’一词，而且它总是被描绘成上苍的恩赐。它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只是对缰绳长度的调节。”

布拉格无线电台报道了德国一家报纸的观点：“此刻，犹如春风一样的东西正吹遍捷克斯洛伐克。”“此话不假。”评论员补充道，“但气候状况表明，冬天不会轻易退去。”

尽管如此，消融还是在发生着：冰柱开始融化，鸟儿在歌唱。亚历山大·杜布契克和共产党内支持他的改革者，在全国发起了一系列的群众集会，来为他们的行动计划争取支持，但行动计划仍然未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争论在工厂、俱乐部和酒吧里进行着。新经济计划意味着什么？它会带来的是新的风险，还是新的希望？“灵活性”仅适用于管理，还是指工人积极性的发挥有了新的机会？赞成和反对铁托(Tito)¹⁰在南斯拉夫搞“自我管理”的人们在激烈辩论着。

如果苏联老大不再决定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政策，那么捷克斯洛伐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呢？

Literarni Listy的编辑亚历山大·克莱蒙特呼吁“积极中立的外交政策——一种从我们自己的需要出发、从我们自己的可能出发和出于我们自愿选择的属于我们自己类型的社会主义。”

杜布契克的领导班子知道这涉及到最敏感的领域。在一次有16,000个年轻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杜布契克的同事约瑟夫·斯马里可夫斯基(Josef Smrkovsky)在批评一项拟议中的不欢迎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结盟的决议时受到嘲笑。

最后通过了一份妥协的决议，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在中欧的地理位置使她与其所有的邻国，尤其是苏联，应当保持平等、良好的关系。”

已然清楚的是：既然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已经开始讲话，那么只有毫不留情的镇压才能重新堵住他们的嘴。电影院正在播放一部关于学生抗议活动的新闻

记录片，是去年11月被警察破坏的示威游行的学生版，包括目击证人的描述、对教授的采访和给受伤学生看过病的医务人员的证言。警方的一份声明承认，学生对警察的指控有些是有道理的。

人们呼吁通过自由选举，建立一个拥有真正反对派并行使其应有职能和代表公众舆论的议会。许多知识分子开始主张，国家的前途应该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仅仅由一个党来决定；无线电广播的播音员米兰·维纳(Milan Weiner)就是其中之一。

布拉格无线电台已成为新民主的论坛。在这样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时刻，它谴责自己的新闻审查制度：“公民们，你们迄今为止在无线电新闻广播中已经听到的一切，你们此时此刻所听到的一切，还有我们将要播出的每一项内容，都要经过中央出版署的审查。”

无线电台的记者们遇见司法部新任副部长，向他提出新闻审查与捷克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相抵触。这位副部长表示赞同，他透露说，在诺沃提尼的治下，卡尔·马克思一个世纪前写的抨击普鲁士新闻审查制度的文章，都遭到了捷共审查机关的查禁。

然而，诺沃提尼仍然当他的总统。他得到了基层党组织、军队和治安部队的支持，更不用说苏联和东欧当权者——东德的乌布利希，波兰的哥穆尔卡——在背后的巨大支持。

意大利 教育教育者

学生静坐风潮在最激烈的街头冲突中爆发了。在意大利，这个冲突仍被视为警察和学生为争夺对罗马瓦莱·朱莉娅学院(Valle Giulia)建筑系控制权的斗争。

过去的一年，是暴躁的、高度政治化的学生们掀起巨大的占领大学风潮的一年：都灵、比萨、那不勒斯、特兰托和其他许多大学对学习条件的抗议演化为反对整个意大利大学制度的罢课。比萨的拉塞丕恩泽(La Sapienza)学院的学生写了一组论文，认为大学属于学生，而学生大会应该成为管理它的最高权力机构。他们不只是要求学习的权利，而且要求对学习的内容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在特兰托，学生们占领了社会科学研究所，要求获得研修社会学学位课程的权利(他们成功了)。该所居然是意大利唯一能研修社会学的地方。他们希望能够



左图：民主学生和左翼学生与新法西斯分子在罗马大学发生冲突。

右图：配备防暴装备的意大利警察“防卫”一个用一本书武装起来的学生。

使用社会学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有助于他们构筑对社会、家庭的作用和教育制度本身价值和内容的评论。

在米兰和都灵，为反对古董式课程而战的学生组建了他们自己的学习群体和反课程；学生大会接管了学校的决策事宜。

在都灵大学，原先要研习1879年以后的心理学是不可能的。现在，同学们邀请意大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穆塞提(Musatti)来给他们做报告。他们阅读马尔库塞的《性爱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和无名氏的《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维也纳日记》(Viennese Diary of a Schizophrenic)，争论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学派对精神分析和社会压迫的态度。在科学哲学、异议的教学、资本主义和反正统文化方面都开设了反课程。建筑师在研究帝国主义和

拉丁美洲的社会发展；工程师在研读马克思主义。

当圣诞节到来时，学生们拒绝回家度假。他们更愿呆在他们的“解放区”内。与新年一块到来的还有警察的驱逐和驱逐之后的重新占领。每有一个新的动作，双方的怒气就上升一步。

运动正向中学蔓延。在米兰，罢课的学生抗议出身工人家庭的学生不能进他们的学校。他们希望能在更加随意的学习环境中学习，把课程扩大到能够包容社会问题，并能到教室外去学习。他们的校长、著名的但丁学者丹尼尔·马塔里亚（Daniel Mattalia）拒绝报警，他说：“学生们是在一次全体大会上投票决定罢课的。我认为他们是成熟的人。当局认为他们是一群暴徒，而我一直是以自治和自律的原则教导他们的。”他的异议让教育部中的基督教民主派极为恼怒，他们停了马塔里亚的职。学生们以罢课支持他们的校长。

罗马大学的学生们从前一天开始就一直占据着文学系，并就考试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举行这个问题，与老师们进行着谈判——在意大利，考试传统上是口试。

最后，学生和老师同意：考试应该公开进行而且应该准许每个人参加；老师的最后答案应该允许考生与他们讨论并应该允许所有参加考试的人参与讨论；学生可以以退出考试的方式来拒绝老师的判卷；考试应该成为连续评估的一个过程，即每个月进行一次。

校长和教育部长圭（Gui）面临着要么接受学生的胜利，要么反对全体教师的局面。事实完全证实了学生们所预测的马尔库塞的观点，当局认定社会控制比教育更加重要。他们派来警察清理大楼，学生们被关在了门外。

学生们在3月1日聚集在一起，决心转而去占领瓦莱·朱莉娅学院的建筑系。他们斗志昂扬，他们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正当的。他们惟一的武器是几箱过熟的西红柿。他们甚至还没能进入系办公楼所在的园子，就遭到了警察的袭击；装备着催泪瓦斯和警棍的警察用吉普车组成了警戒线。当学生们在催泪瓦斯中跑着找地方躲避时，有过那么一刻的恐慌：他们想做一些抵抗，但没想到当即发生激烈的战斗。然后，他们开始反击，有的撬起地上卵石掷向警察，有的扯散了木质的长条椅，拿它的木板当棍使。

争夺瓦莱·朱莉娅学院的战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罗马处于被包围的状态，空气中弥漫着催泪瓦斯，警笛啸叫着，警察在大街上对学生们穷追不舍。第二天，多达两倍的学生又集结起来进行抗议。

4000名学生游行穿过华沙大学，抗议他们两名同学的被捕。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着“没有自由就没有学习”，“作家万岁”和“我们需要《先人》”。25辆卡车的武装民兵包围了大学的校舍。挥舞着警棍的民兵封锁了街道，中止了游行，把一些学生击倒在地。

《先人》在人民剧场的演出

哈里·斯蒂文斯为伦敦的《卫报》撰文，评论了人民剧场上演的戴伊麦克导演的戏剧《先人》：

“把《先人》搬上舞台总能反映出导演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是一锅可怕的大杂烩。它以浪漫的恋爱剧开始，以农民的宗教迷信为背景——第一幕的场景是一个教堂墓地，象征对死者即先人的召唤——魔法召魂，然后突然转变成一出具有浪漫和非常政治性、革命性内容的剧目：转变通过一个报告表现出来，报告说主人公古斯塔夫(Gustav)已经死在狱中，只有成为革命者康拉德(Conrad)才能“复活”。从这一刻开始，这出戏就有了一种新的、强烈谴责的、反独裁的特征，并且这个特征一直被保持至剧终。

“但是，与之交织在一起的仍然是宗教内容，除了天使和魔鬼的出现外，还有

祭司的角色。因此，为了解决这个二元对立，如何取舍就一直是导演的一个难题：是将两个方面融合为一体，还是像波兰“左派”所希望的，把有关宗教成分略去而只集中在政治内容上。在人民剧场的演出，戴伊麦克曾试图把两个部分都保留。而他这样做时，似乎已经在政治上摔了跟头。

“这出戏中的政治内容包含有监狱的情节，尤其是‘革命者’古斯塔夫/康拉德和他的朋友们讨论自己和波兰命运的时候；后来的‘参议院的’情节，一位俄国参议员兼总督的人是其中的主要角色。戴伊麦克把革命者和“大权在握者”进行了对比：监狱的情节是非常写实的（虽然是在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现代布景下）；同谋间的讨论是严肃认真的；康拉德严厉的谴责先是让他的同志们感到惊讶，继而感到震惊；当其他人背弃了他时，他的独白达到了高潮——这一幕‘即兴

这场骚乱开始于1月底，当时，波兰当局禁止了一部非常受欢迎的、亚当·密茨凯维奇创作的19世纪的戏剧《先人》的演出；该剧是波兰的经典，连上学的孩子都知道它。

每次演出《先人》时，“我们波兰人为了几块银卢布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或“莫斯科派给我们的东西只有笨蛋、白痴和间谍”这样的台词被念到时总会响起欢呼。其1968年版本中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强调了该剧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成分，并借助60年代戏剧所有表现主义的精湛技巧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夸张。远在

演说’以对上帝的亵渎结束。

“‘参议院的’的情节主要以荒诞的风格表现——参议员自己有一半时间是睡眠，只有在醒来时才处理诸如波兰政治犯这样的‘国家事务’。结尾是一段引人注意的哑剧表演：舞台空了下来，暗了下来；聚光灯照着，康拉德戴着镣铐从背景后走出；当他从舞台阶梯上向下走来时，他的身影似乎变得越来越高。政治犯的象征——谁的呢？”

“古斯塔夫/康拉德由波兰最好的演员之一霍洛贝克(Holoubek)主演。他给这个角色带来了新的东西。在‘即兴演说’一幕中，传统的浪漫的长篇大论不见了，大段陈词中多了份慷慨与激愤。这首波兰文学中最浪漫的诗本是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产物，但它被霍洛贝克演俗了……它成了……一个自我挣扎者的独白，但依然保留其傲慢、自私和笃信他是普罗米修斯再世、他比上帝还要伟大这

些特征。

“但是，在这部戏中，宗教内容一样具有挑战性，这部分是因为导演对作者原文出色的利用，部分是因为一些精湛的表演。正像第一晚演出之后报界激烈争论的那样，人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个在本质上属于宗教的特征给人留下的印象异常深刻。就这样，一根很强的连线把一开始墓地的场景与后面所有的场景联系起来。戏中突出的人物是一个祭司，他同情密谋者，但对古斯塔夫/康拉德的思维方式又感到焦虑：他劝戒过古斯塔夫，但没有任何效果。‘即兴演说’结束后是一场天使和魔鬼为争夺‘死去’的古斯塔夫而进行的肉搏战。但是祭司出现在尸体和魔鬼之间，他们困惑了……接下来的一幕是在一个有唱诗班、管风琴和助祭的圣坛前——场面可谓宏大，展现了一种对祭司的颂扬——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解。”

该剧被查禁之前，在共产党的主要报纸Trybuna Ludu上发表的一篇尽管是说教，但却是非常谨慎的评论，对导演戴伊麦克（Dejmek）作品中所强调的圣坛、祭司和魔鬼提出了异议：

“戴伊麦克尝试把两个要素——政治和神秘主义——调和起来，且神秘主义占了上风。只要我们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即密茨凯维奇的神秘主义在《先人》和他的政治情感中是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把这部作品搬上舞台时，就必须同等地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那么，失败就会大于成功。”

然而，正是观众对该剧欣喜若狂的接受，导致了它生命历程的突然缩短。《先人》最后的演出，人民剧场（Naródwy Theatre）被挤得水泄不通；波兰戏剧界的名流们为了看戏特地从国外赶回来。最后的喝彩是全体起立鼓掌15分钟；其间，演员们一动不动地站着，没有鞠躬。

演出结束的同时，一支约三百人的游行队伍在黑暗的街道上向民族英雄密茨凯维奇的纪念雕像进发。这次夜间集会将被驱散，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和亨利克·什拉伊弗（Henryk Szlajfer）遭逮捕。（米奇尼克，左翼共产党员，因支持左翼不同政见者哲学家莱什切克·科拉科斯基〔Leszek Kolakowski〕对哥穆尔卡政权直言不讳的抨击，已经被赶出了华沙大学的校门；什拉伊弗，一名官方检查官的儿子，因抨击审查制度而被捕。）

3月2日，华沙作家联盟召集特别会议，抗议严格的审查制度。学生们现在跟他们学了。3月9日，华沙大学的学生们在城内示威游行，高呼“自由，民主”和“华沙人，支持我们”。舆论似乎全都站到了他们的一边。警察在大街上追逐示威者，在神圣十字架教堂（Holy Cross Church）的台阶上，挥舞着警棍的警察横冲直撞，要抓捕在那里躲避的50名学生。

11日 华沙，波兰 新的盖世太保

抗议活动的第三天，有一万多人，主要是年轻人，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的街头冲突之后聚集到华沙大学外，表示支持学生。他们高呼口号，焚烧报道前一天示威游行的党报；该报把骚乱归咎于精英的孩子们——因他们偏爱进口水果而被冠以“香蕉青年”的称号。

头戴钢盔的防暴警察为驱散集会对他们棍棒交加，示威者被赶到更多军警等着的小街上。抗议者站在神圣十字架教堂的台阶上，还以“盖世太保！盖

世太保！”的吼声。警察向庞大的人群发射了催泪瓦斯弹。一部分的示威者逃脱，朝共产党的总部方向跑，但总部大楼被警察包围着，遭到驱赶后，他们又回过头来向位于克拉科斯基·普莱德米斯基 (Krakowskie Przedmiescie) 大街上的文化部方向跑。示威者拥进文化部大楼并把大楼洗劫一空。他们试图用大楼家具的碎片来击退警察。

13—22日 波兰 波共玩起了反闪米特人的牌

华沙的抗议运动扩散至全国的其他地方，在克拉科夫、波兹南、卢布林、格但斯克、罗兹、塞青和弗罗茨瓦夫都发生了示威游行。

在克拉科夫，示威者的标语牌上写着：“华沙，你不孤立。我们需要正义。”警察在市中心使用警棍把人群赶出中世纪的集市广场，后来人群被赶进老城的窄巷，很多人在那里遭到无情的殴打。在布拉格，捷克共产主义青年大会通过决议，表示支持波兰学生，谴责波兰官方报纸对他们的攻击。一组学生要求无线电台和电视台设立报道“他们与华沙学生站在一起”的时段，但是他们的要求至少是暂时遭到了拒绝。

政府官员试图通过迎合古老的偏见来激起普遍的敌对情绪。他们指责“犹太复国分子”唆使了骚乱。在一个大批犹太人遭到灭绝、有些犹太人是在回家时被虔诚的天主教徒杀害的国家，统治者打起了种族牌。

他们声称游行示威的组织者们是在华沙犹太人巴别俱乐部里计划了他们的活动。Trybuna Ludu刊载了一份领头的犹太学生的名单，尤其指认一个父亲为一家著名报纸编辑的年轻人是“巴别俱乐部”的活跃分子：显然，这个孩子的父亲只适合做波兰硕果仅存的犹太报的编辑。

官方的反示威游行也被组织起来，他们的旗帜上写着“清除党内的犹太复国分子”和“新的第五纵队滚蛋”。工厂的工人们被指令参加反对“波兰人民的敌人”的集会游行。由坚持强硬路线的内政部长莫奇查(Moczar)将军担任主席的抗战老兵组织——Zbowid 尤其狂热。

处于自由派认为太狠而莫奇查认为太软的双重压力之下的第一书记弗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于3月19日发表讲话，试图对反闪米特主义的言行加以限制并让学生停止其抗议活动。

理工学校的学生对此做出的反应是占领他们的学校。夜晚时分，行政大楼



上图：西柏林学生为支持波兰学生而举行游行示威。右边第二人是彼得·勃兰特(Peter Brandt)，他是西德外交部长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之子。

下图：官方召开党的大会，反击波兰学生的抗议活动。

已经挂满了标语：“华沙与学生站在一起”，“民主与社会主义”，“工人们，你们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报纸要讲真话”，“不要对我们的父亲、工人和农民撒谎”，“提高工资，而不是抬高治安警察的地位”。支持者们通过装有短刺的栅栏向里边传递钱物。学生们向外面的人传递传单，要求进行捷克斯洛伐克式的改革和“言论、集会和游行的自由”。

到了3月22日的晚上，约有一千人聚集在理工学校的门外。7点钟的时候，来了一大堆防暴警察，人群开始散去。再后来，无线电广播和电视里突然传来了政府的最后通牒：如果学生不在一个小时内结束他们的罢课，到9点时他们将被赶出校门。大批的人群在理工学校外面的工人团结广场(Workers' Unity Square)立即重新集结起来。9点钟的时候，一名学生走到能够俯视广场的阳台上宣布：约四千名学生投票决定反抗最后通牒。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整个广场一同唱起了《国际歌》。学生们反抗最后通牒几个小时后从容不迫地从广场走了出来，然后被广大的华沙市民护送至

安全的地方。然而，理工学校的占领是政府镇压前波兰最后的民众行动。反闪米特主义的宣传成功地平息了抗议浪潮。

布拉格的改革者的又一个胜利，是坚持强硬路线的总检察长和内政部长因

镇压去年11月的学生抗议活动而被迫辞职。“很少有人知道如何在恰当的时刻退出，”支持改革的工会报纸Prace报这样尖锐地评论道，“这是一门艺术，运动员要比政治家掌握得好。”

上周，捷克国防部长塞伊纳将军的叛逃美国，是对保守的斯大林分子的沉重打击。接下来的一周，人们还将看到老狐狸诺沃提尼自己被迫辞去了总统职务。这引起了其他高官的一阵恐慌。

捷克电视台现在播放的专题小组讨论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政治辩论。先前的政治犯与关押他们的人在电视上唇枪舌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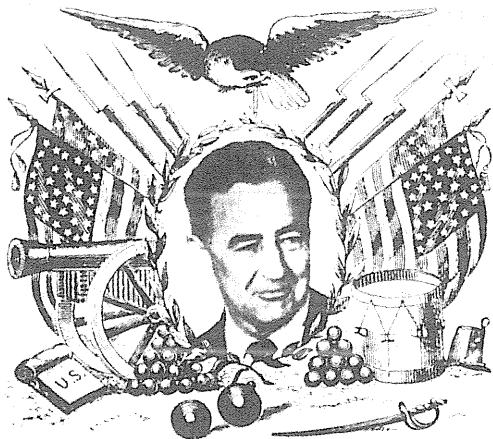
布拉格报纸《今日日报》(Mlada Fronta)收到了“被如此多的公开讨论搞得晕头转向”的读者来信。

副总理切尔尼克(Cernik)答复说：“我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对此还不能适应的表现。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已不知道如何公开表白自己的意见。过去不允许人们在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发表反对官方的意见，听到相反的消息时，人们反而变得不习惯了。”

勃列日涅夫的追随者们同样不习惯听到这样相反的消息。3月23日，在东德的德累斯顿召集了苏联集团的紧急高峰会议。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被列入议事日程的首位。杜布契克左躲右闪。他身上的压力是巨大的，不过，他

下图左侧：尤金·麦卡锡——“清白的尤金”。

下图右侧：竞选活动中的罗伯特·肯尼迪。



在苏联内部也有一些朋友。

美国 民主党选举的进展

总统预选三天后，约翰逊总统毁灭性的失败开始了——3月12日在新罕布什尔州被圈外的反战的候选人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¹¹击败而处在了第二位，麦卡锡获得了42.4%的选票——罗伯特·肯尼迪¹²跳出来宣布他也要挑战约翰逊，竞选民主党提名。肯尼迪是个更加让人敬畏的竞争者，他是一位反战的真正有希望赢得总统竞选的候选人。

17日

美国，华盛顿特区 鸡儿回棚歇息

威斯特摩兰将军要求联邦政府增派206,000名士兵来把越南的事情“摆平”的请求遭到拒绝。战争现在让美国每年花费300亿美元。它成了国际收支亏空的最大原因，而且通货危机眼看就要发生。

美元估价过高导致了“淘金热”：美国的黄金储备正以惊人的速度被从诺克斯堡(Fort Knox)¹³提走。为维持一盎司35美元的金价，国会匆忙通过紧急立法的形式把美国的黄金储备全部放开，“直至最后的一盎司”；美国财政部长宣布“美元将不会贬值”。

通货市场正舔着舌头，识别着绝望者最后的扑腾。

在约翰逊看来，惟一的解决办法是增收10%个人所得税的附加税和采取一项紧缩国家开支的计划。住在市中心贫民窟里的人们，已经如干柴一堆了；而该计划无疑又向他们点了一把火。

为躲避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的抗议活动，约翰逊总统必须掩盖他的行踪。所有的危机——军事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都一起包围了过来。

英国，伦敦 越南团结运动

“幸运的是，在英国，无论怎么说，教育都都没有起过任何的作用。如果它起作用，它会成为上层阶级的严重威胁，并可能导致格罗夫纳广场上的暴力行为。”——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¹⁴著《认真的重要》(The Importance



伦敦典雅的梅费尔(Mayfair)中心：警察抓住了一名女性示威者，并去拍打她的屁股；她是在格罗夫纳广场美国使馆外游行示威的三千人中的一个。

of Being Earnest)中布莱克奈尔女士的话。

为到美国使馆游行示威，英国的“越南团结运动”组织了2.5万人集结在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旗帜上写着“民族解放阵线胜利”。巨大的人群涌向牛津街，巨幅的民族解放阵线三色旗在一片旗海中舞动着。整个街道回荡着叫喊声“胡，胡，胡志明！”一队头戴钢盔的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代表紧跟在越南团结运动前列的背后。游行队伍转向北奥德莱大街(North Audley Street)，然后进入了非常开阔的长方形的格罗夫纳广场。使馆那一大片地堡似的建筑就位于中心花园的对面。组委会对示威者是否应该占领使馆早就有过很多讨论。这时，警察的防线突然垮了。数百人穿过空旷的地面，冲向了使馆。

有人叫了起来：“这里有武装警察！”

骑警列队向前移动。当警察的马匹踏进人群时，示威者紧张起来，他们胳膊挽着胳膊以相互支撑。一个嬉皮士想给一位骑警献花时被警棍击倒在地。

两名示威者抓住了一匹马的缰绳把马拉倒。警察拳打脚踢加膝盖顶，把他们痛打了一顿。其他的示威者把他们拖开，救下了这两个人。广场成了战场：到处是烟雾弹、尖叫声、口哨声以及被打倒在地或揪着头发被拖走的示威者。前线由一队来自罢工的“桥头堡建筑公司”（the Barbican）的建筑工人把持着。两个小时后，示威者决定从广场撤离，虽然他们在与警察的暴力对抗中动摇了，但是有如此众多的人们参加游行以及团结一致还是极大地鼓舞了他们。

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用伦敦的示威游行来说明：他的国家正如何把自己孤立起来，“她在欧洲盟国中最亲近的国家内的使馆竟处于围困之下”。

22日

法国，巴黎，南代尔(Nanterre) 一场运动的诞生

在巴黎西北郊建立的南代尔大学，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学生人数大量增加而产生的教育问题的一个官僚主义的解决办法。一个由玻璃和钢铁立方体构成的野兽主义¹⁵的建筑坐落在工业垃圾场与现成的贫民窟的交汇处，贫民窟里住着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的移民工人。它于1964年启用，现已容纳15,000名学生。它成为不满情绪的滋生地。学生们对琐碎的宿舍规定、教学本质和课程内容发生过激烈的抗议。在社会学系，学生和老已经卷入了激烈的纷争。

1月份的时候，学校当局曾让便衣警察监视学生并给最激进的学生拍了照。学生还以监视警察作为回应：他们拍下那些便衣的照片，并把它们放大后作为“通缉”的标志张贴在布告栏上。为了驱散抗议的学生，学校行政部门先是叫来了宪兵，后又叫来了防暴警察。

不断激化的紧张局势和不信任感在整个春季里持续升温。3月22日的晚上，因为反战示威有五位同志被捕的消息在校园里不胫而走。学生们召集紧急会议。学生们应该做些什么来支持他们的同志？要使被捕学生获得释放，他们能给当局施以什么样的压力？在3月份的一个寒冷的黑夜，学生们冲到了八层楼的校行政办公楼，冲开一扇扇锁着的门，占领了这个大楼。他们中有几百人在那儿过夜，讨论着学校官僚与法国政府之间、阶级统治的本质与镇压之间以及权利的本质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到了早上，他们将被驱逐，但是，对当局来说，那就太迟了。这次患难与共的经历，已经把学生们凝聚成了一支新的力量。“3月22日运动”诞生的力量在几个月以后名噪天下。

美国，华盛顿特区 再见，威斯特摩兰

约翰逊总统宣布威斯特摩兰将军的越南战场总司令一职将被撤换。怒目圆睁的将军在被拖走时还在叫：“我就要赢了。”

30日

英格兰的东南和法国的巴黎 电影院反了

当游行队伍的脚步声在布赖顿(Brighton)的皮尔宫(the Palace Pier)回响时，理查德·厄坦博罗(Richard Attenborough)正开始拍摄反军国主义的经典之作《啊，多可爱的战争》(Oh! What a Lovely War)。离这不远的肯特(Kent)，林德塞·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正在拍摄抨击英国公学制度的超现实主义的《假如……》(If...)

“有一个场面：高年级的男孩在小教堂的屋顶用斯特恩式轻机枪扫射，而下面战斗队的老嬷嬷们、唱诗班的男孩和校卫队的成员(军校学员)则进行着反击。我发现这部电影与我在每天早上从报纸中读到的许多事情有关联。”安德森这样解释道。



约翰逊总统向美国公众宣布他将不再谋求连任。

与此同时，琼·露琪·戈达德的新片《周末》(Weekend)在巴黎开机。

“人们整天都在作践自己——干着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推销着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而这一切又为的是什么呢？去买辆车并到海边度假去吧。”导演这样说道。这部电影追踪了资本主义的旅鼠们拥向海边时的交通堵塞和堵塞的高速公路。有一段不少于17分钟长的精彩的分镜头很有特色：镜头里出现了

一排被堵车辆和撞车事故中血肉模糊的受害者，并伴有从背景音乐中响起的汽车喇叭的混响。为这部电影的背景音乐作曲的是斯托克豪森(Stockhausen)。

“我将不寻求也不会接受我党对我作为你们新一任总统的提名。”

失败使约翰逊总统看上去一脸皱纹和满腹辛酸，他走上电视，宣布他将退出竞选连任。

全世界反对美国军事机器的人一片欢呼。

〔注 释〕

1 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1798—1855)，波兰诗人，献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代表作史诗《塔杜施先生》描写了波兰爱国志士反抗沙俄侵略的斗争。

2 陀思妥耶夫斯基(Feodor Mikhailovich Dostoyevsky, 1821—1881)，俄国作家，曾因参加革命团体被判刑流放，作品反映“小人物”的痛苦，描写社会上的不平，对人物异化心理刻画入微。主要作品有《白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

3 托尔斯泰(Lev Tolstoy, 1828—1910)，俄国作家、思想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其作品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世界文学有巨大影响。

4 普希金(Aleksandr Sergeyevich Pushkin, 1799—1837)，俄国诗人、俄罗斯近代文学奠基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之一。主要作品有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小说《上尉的女儿》等。

5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496?—406BC)，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一生共写123部剧本，传世剧作有《埃阿斯》、《安提戈涅》、《奥狄浦斯王》等7部。

6 莫里哀(Molière 1622—1673)，Jean-Baptiste Poquelin的笔名，法国著名剧作家、演员、剧团经理，首创法国现实主义喜剧的新风格，主要喜剧有《伪君子》、《愤世嫉俗》、《吝啬鬼》和《贵人迷》等。

7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 公元前525?—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相传写了八十多个剧本，现存《被缚的普鲁米修斯》、《波斯人》、《阿伽门农》等7部。

8 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łka, 1905—1982)，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6—1970)。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1934—1948)时受到批判，后因被控“进行破坏活动”而被捕入狱。获释平反后，任中央第一书记，因物价失控，引起骚乱被解职。

9 闪米特人(Semite)，旧译闪族，近代主要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古代包括希伯来

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亚述人等。反闪米特主义主要是针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

10 铁托 (Tito, 1892—1980), 南斯拉夫总统 (1953—1980),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 (1969—1980), 原名 Josip Broz, 曾领导游击队抗击法西斯侵略者 (1941—1945), 解放后任联邦政府总理, 在国际上倡导不结盟运动。

11 尤金·麦卡锡 (Eugene McCarthy, 1916—), 美国参议员、众议员, 反对越南战争, 以在各州民主党总统预选中向约翰逊总统挑战闻名 (1967), 后败于参议员 R 肯尼迪。

12 罗伯特·肯尼迪 (Robert Francis Kennedy, 1925—1968), 美国肯尼迪家族成员, 昵称鲍比 (Bobby), 族长 J. P. 肯尼迪的第三子, J. F. 肯尼迪政府的司法部长, 遏制种族迫害, 打击犯罪组织, 竞选总统中遇刺身亡。

13 诺克斯堡 (Fort Knox), 美国肯塔基州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 联邦政府黄金储备的贮存处。

14 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 1854—1900), 爱尔兰作家、诗人, 19 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的主要代表, 主要作品有喜剧《认真的重要》、《少奶奶的扇子》和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等。

15 野兽主义, 一种用大色块或线条构成夸张式变形以表现粗犷的绘画风格; 亦指一种展示未经装饰的巨大构件以表示结实和粗犷力量的建筑或雕塑风格。





196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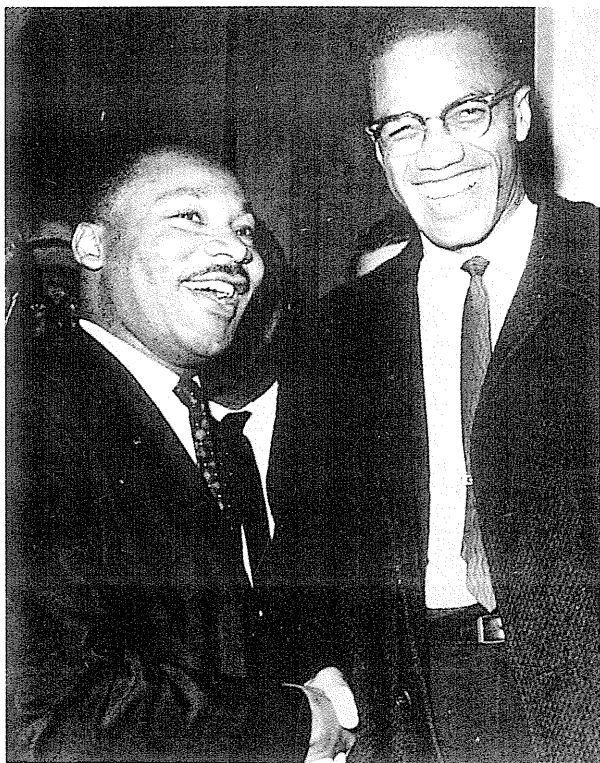
4月

“干草会把湿草点燃。”——由奴隶
带进北美的非洲谚语。

全副武装以抗击骚乱的国民警卫队为阻止黑人民权运动者封锁了田纳西州孟菲斯市(Memphis)的比尔街(Beale Street)。黑人胸前牌子上的文字为“我是人。”

4月4日，马丁·路德·金遭暗杀，标志着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非暴力战略的终结。金一直明白：只要他挑起美国黑人权利的大旗，他就会和成千上万的黑人同胞一样遭遇白人种族分子的子弹。

“我宁愿今天就死在亚拉巴马州的公路上，而不愿泯灭我的良知。”1965年，为要求法定选举权而带领人们向蒙哥马利（Montgomery）¹示威游行之前，他



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²：虽然目标一致，但两人对美国黑人歧视所作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有时候我疑惑啊
疑惑其他人是否疑惑
有时候我疑惑啊
疑惑其他人是否疑惑
就象我一样啊，哦，天哪，就像我一样。

——黑人民歌

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玛市就曾这样对人群说过。

今天仍然毒害着美国的种族偏见的痼疾，其根源在于种族灭绝和奴隶制度；而这两者是美利坚共和国的基石之一。以文明优越的名义对原住民的实际灭绝，为以奴隶贸易为特征的暴力行为铺平了道路。人们所熟知的黑人状况正是这些独特的美国因素造成的。

尽管内战中南部邦联战败、战后重建中奴隶制被废除、黑人被准许了一些有限的权利，但是，20世纪初黑人的情形依然是悲惨的，黑民众仍然遭受着残酷的剥削，社区里死气沉沉。为了让黑人明白自己在美国社会的位置，暴徒们动用私刑，强行阻止黑人行使他们投票的权利。这种替代奴隶制的制度化歧视的影响，具有与

奴隶制一样的摧残心理的后果。小说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在其自传《黑人男孩》(Black Boy)中这样评述道：

“憎恨有色人种的人，认为黑人生活的地方比白人的低贱；与白人拥有同样梦想的黑人，虽然知道有这样的区分却竭力把它埋在心底，因为它让他感到孤独和害怕。黑人遭白人痛恨，同时他们又是痛恨自己的那个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们会反过来痛恨自己身上遭别人痛恨的东西。但自尊又迫使他把自己的痛恨隐藏起来，因为他不想让白人知道他已经完全被他们控制，他的整个生活已完全被这样的心态所左右。然而，在掩藏对自己的痛恨的行为过程中，他又不由自主地痛恨起那些引起痛恨的人。所以，他每一天的每一刻都是在自我敌对中度过的，他的能量中很大一部分消耗在控制其难以控制的情绪上。他自己并不希望有这种情绪，但总是身不由己。他被他人的痛恨逼迫，受自己的情绪左右，总是与现实处于敌对状态中。他变得无能，识别和判断客观世界的能力也低人一等。当他到了这个地步时，白人就会看着他笑道：‘瞧，我难道没有对你说过黑鬼就是那种德性吗?!’”

尽管黑人民权斗争招致了白人种族分子的极端仇视，但它使那种能量的释放进步了。然而，即使在金遭到暗杀以前，美国黑人对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

4月5日和6日晚的黑人贫民窟爆发骚乱，芝加哥处在闷烧之中。



战略就存在着分歧。黑人穆斯林牧师马尔科姆·艾克斯认为：暴力是美国人的传统特性，它也许是战胜白人权力机构的惟一出路。

到1964年，马尔科姆·艾克斯已经公开与“伊斯兰国家”组织鼓吹的简单的黑人分离主义决裂。他开始主张黑人与白人联合起来反对种族主义和战争。那一年，他遭暗杀，此事震惊了美国黑人。金自己则对其遇害的对手给予了热情的颂扬。

金死后的1968年4月，席卷美国四十多座城市的动乱大潮是黑人社区愤怒和绝望情绪的标志；这些社区威胁要全面超越政治领域。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奥克兰（Oakland）的黑豹党（the Black Panther Party），被联邦调查局和警察当作敌人看待，经过一系列的枪战后被联邦调查局摧毁。黑人社区还指控联邦调查局，为了使问题非政治化和分化贫民窟居民而故意纵容毒品和武装寻衅。由于路易·法拉可罕（Louis Farrakhan）领导的排外的民族主义这股新的右翼力量的出现，黑人政治觉悟的瓦解在里根年代仍在持续。金死后30年的今天，黑人仍旧处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底层。

1日

巴西 严峻考验的时刻

在巴西，青年学生和工人学会了如何与1964年上台的军事独裁力量展开智斗。50年代，受美国投资的刺激，巴西战后经济快速发展，这让《华尔街杂志》（Wall Street Journal）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地方能获得如此大的收益呢？”但由此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却不愿承受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冲击，不愿承担大量的外国债务负担。到了60年代初期，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开始要求偿还这些债务。

到1963年，跨国公司和巴西民众相互冲突的需求把总统霍阿沃·戈拉特（João Goulart）的文职政府弄得忽左忽右。工业地区出现了一股股要求发放工资的罢工浪潮；遭受干旱的东北地区的农民，要求农业改革的躁动日盛；军队内部对军饷和职位也多有不满。古巴革命给左翼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激情，学生们投身于群众识字运动和反对巴西社会极端不平等的基础教育的行动之中。

千方百计寻求解决问题办法的戈拉特政府，开始允诺激进的社会和经济改革。1964年3月，在里约热内卢的一次集会上，戈拉特当着15万工人观众的面，签发了炼油企业国有化的政令和另一项授权农民征用闲置土地的法令。他

还宣布了经济收益控制、赋税改革和把选举权扩大到文盲（占人口一半）和士兵的计划。

未等这个月过完，巴西军队统帅部就在美国大使、旧的寡头政治集团和右翼政客的暗中支持下采取了行动。将军们命令坦克开上了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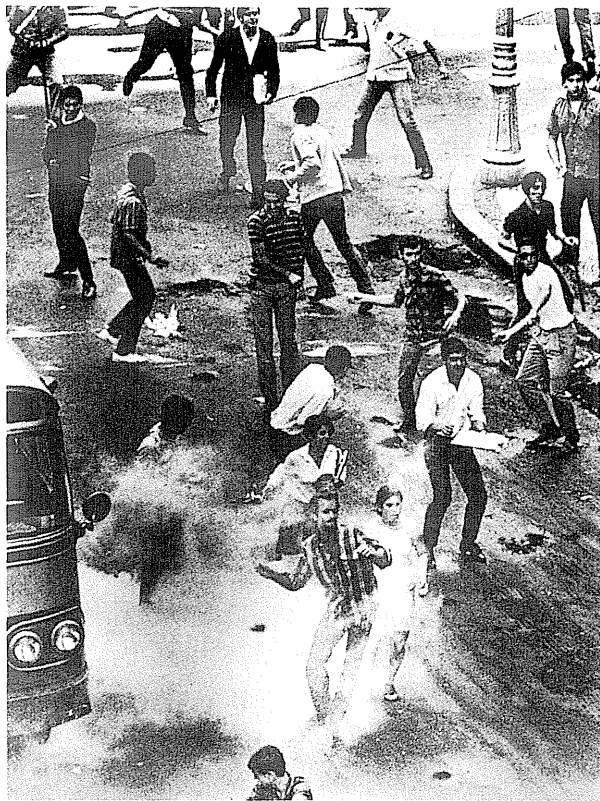
约有数千人在1964年4月的最初几天里遭暗杀，尤其是在地主的民兵武装对激进的农民发动了恐怖袭击的乡村。宪兵私闯民宅，无须逮捕令或正当的犯罪嫌疑证据就可以审讯公民。政变后那段时间，有一万五千多人被逮捕；政治的和民事的统治机构遭到残酷清洗——有一万多政府雇员被解雇或被迫“辞职”。

然而，事实证明：把整齐划一的军事体制强加于巴西这样一个活跃的多民族的社会是很难的。1968年对军事政权的挑战不断上升。3月底，一名17岁的学生在反独裁游行示威时被士兵开枪打死。有1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现在，每一个角落都站着武装警察。学生们等到夜幕降临后，冒险跑过拥挤的街道，高呼“独裁者，滚下台！”

他们在交通堵塞的掩护下，组织闪电般的政治集会，然后消失在街头巷尾。10分钟后，又在预先约定的地点重新集结。

警察中计，被牵着鼻子跑。市长召来军队把守城市。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占据了学生的哨位。作战部队在街上追逐着学生。一阵机关枪响，又一个抗议者倒下。

圣保罗、贝洛奥里藏特(Belo Horizonte)、戈亚尼亚和其他许多城镇爆发了反对现政权的抗议大潮。一位军事指挥官宣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制止更大



反对巴西军政权的里约热内卢的学生向防暴警察投掷石块，防暴警察则用催泪瓦斯反击。

范围的示威游行。示威者将被作为“侵犯祖国领土和威胁国家基本制度的敌人”看待。

尽管如此，悼念死去的17岁学生的集会仍在继续，全巴西的教堂里都挤满了悼念他的人。两周以后，15,000名钢铁行业的罢工工人又与学生们一道进行了反抗。

4日

越南 “有限的轰炸”

为了缓和和平运动或是为重新制定军事计划赢得时间，约翰逊总统呼吁与北越进行“认真的和平谈判”。为表示其诚意，他宣布对北越只进行“有限的轰炸”。

河内宣布将参加和谈。寻找合适会谈地点的工作开始了。

大来(Dai Lai)村的村民们叙述了他们在“有限的轰炸”中的经历——30岁的陈氏才(Tran Thi Sai)说：

“空袭开始时，我正和朋友们在一起。我们正在去田间的路上。听见飞机响，我躲进了一个防空洞。炸弹一落下来，我就向家跑。远远地，我看见整个村庄一片火海。

我的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他设法从大火中逃了出来。年仅5岁的弟弟试图跟着他，但没能跟得上。他在院子里被绊住了。我母亲抱起我12个月大的孩子，试图从房子里冲出来——他们被活活烧死在门口。10岁的女儿在外边放牛，所以幸免。丈夫正在这个村上碾米。为确保其他人都躲进掩体，他自始至终呆在外面。他就是这样死的。弹片把他的脑袋炸开了花。

当其他一些工人冲进火海试图救出他们的家人时，我站在那里尖叫、啜泣。我也想做——扑进火里救出我的母亲和孩子，但是我被人拦住了。为了在他们被抬出时，不让我看见他们的尸体，我被人拖走了。

我失去了母亲、襁褓中的孩子、5岁的儿子和丈夫。我们只剩下了三口人——两个孩子和我自己。”

裴文牛(Bui Van Nguu)，46岁：

1968年3月宣布有限轰炸之前，美国对北越实施的空袭是2500次。

1968年4月宣布有限的轰炸之后，美国对北越实施的空袭是3500次。

“空袭时，我正在家里为合作社扎笤帚。两个女儿在厨房。她们在用杵把和研钵忙活着。两个弟弟和她们一起呆在厨房里玩耍。妻子去水塘边洗衣服时，把我们最小的孩子——一个18个月大的女孩，留在吊床里睡觉。



UNTERSTÜTZT DIE WELTWEITE FORDERUNG:

Schluß mit den US-Bombenangriffen auf Nordvietnam!

KOMMUNISTISCHE PARTEI ÖSTERREICHS

奥地利一张巨幅海报谴责美国对北越的轰炸。

“当看见飞机飞来时，妻子开始往家里跑。但是，在她跑回家之前，她的双脚被一枚炸弹炸飞了。另一枚烈性炸弹击中了厨房，我们的四个孩子被埋。之后，房子就倒塌起火了。屋顶塌下来压在我身上。吊床中的女孩哭了起来。我挣扎着站了起来，把她抱在怀里，带着她从火焰中冲了出去。当我们跑到院子时，我看见妻子平躺在地上，一半的身子被埋在墙下的废墟中。她朝我大声叫唤。我把孩子放进防空洞后回头救她。当我来到她身边时，她正试图自己站起来。她的衣服已被撕烂，脸上流着血。我把孩子递给她，让她带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就匆匆赶去救我另外的四个孩子。

“我在废墟中寻找着。我能把他们三个的尸首拼凑起来，但就是见不着我大女儿的踪迹。直到第二天早晨，我才找到她的尸体。她被炸飞到30英尺以外的一个菜地里，埋在了一堆灰的下面。一开始，我们以为埋的是别的什么人，但仔细一看，她耳朵的形状我绝对不会认错。她只有13岁。”

黄宾 (Hoang Ban), 44岁:

“当听见飞机的引擎声和隆隆的爆炸声时，我们刚刚吃完午饭，正准备回到田里去。我在家里。我甚至都来不及进防空洞——我只是趴在地上。我能看见村子另一头的火光和浓烟，我意识到炸弹落在了我岳母家的房子上了。我站起身，开始朝那儿奔去。他们家是村子最后面的一家，火光冲天。我的妻弟逃了出来，后面跟着他的儿子。但是，大火突然间扩散到了整个房屋，墙壁塌了下来。

我们竭力救火。当火被扑灭后，我们在废墟中寻找，找到了我的岳母和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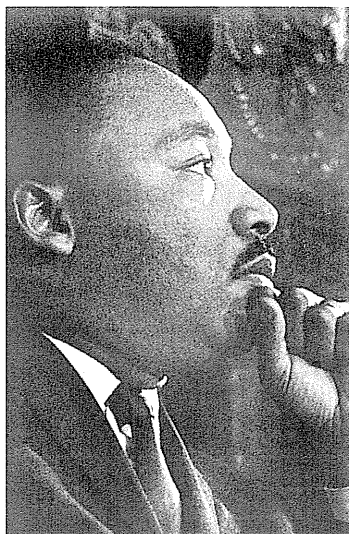
妹被烧焦的尸体。岳母家的一位邻居，原本是和岳母她们一起躲在防空洞里的，她两个月以后就要生孩子的，但现在却死了。她的尸体与岳母的一样——被烧得漆黑和皮开肉绽。

“我们把她们从防空洞里弄出来，在大约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入殓，并在同一天下葬。每当我看着自己的妻子，我就想到我的岳母和妻妹。我问自己：‘美国人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来呢？’”

美国，孟菲斯(Memphis) 他有一个梦

下午6点刚过，马丁·路德·金和几个朋友走到他们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洛兰汽车旅馆客房的阳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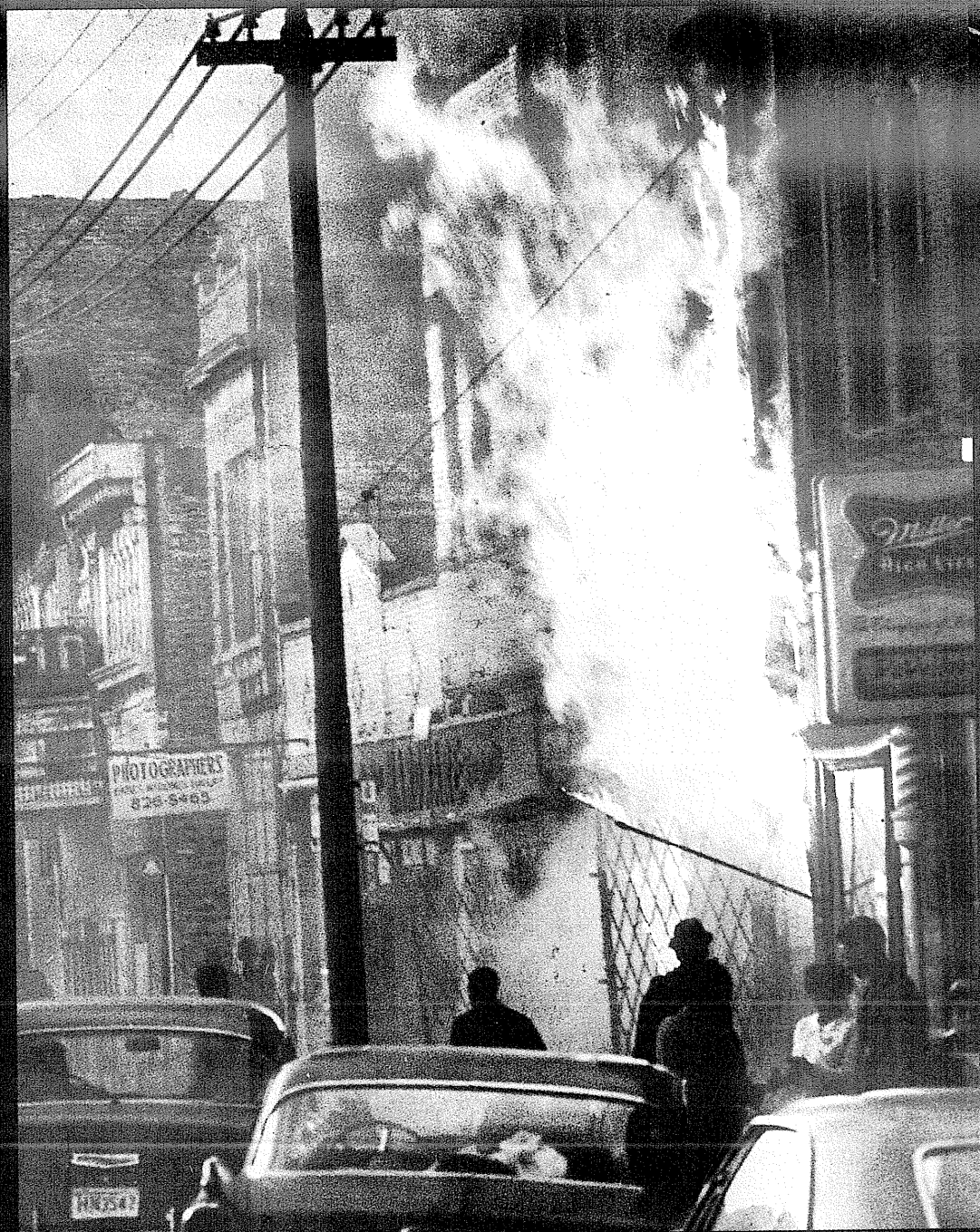
当地1300名环卫工人正在进行为期3个月的斗争，要求工会承认他们。金在城里领导示



上图：马丁·路德·金，极具魅力的黑人民权捍卫者和热忱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倡导者。

下图：金遭谋杀引起骚乱之后，宪兵在华盛顿特区巡逻。





黑人发泄着他们对金遭到谋杀的愤恨，芝加哥的西区在燃烧。

示威游行和集会来支持他们。整个孟菲斯的黑人社区团结起来支持罢工：金在一周前刚刚领导了15,000人的跨城游行。孟菲斯的白人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用催泪瓦斯、警棍和化学喷剂驱散了抗议的人们。一名黑人男孩被杀。第二天的游行将是对这种威胁恫吓的回应。

金探过栏杆，与停在下面的车子里的朋友聊天。这是一个怡人的夜晚——空气中散发着南方春天的气息。一切都是那么的友善、怡然。与他朋友在一起的是一位音乐家，他曾谱过“亲爱的上帝，用您的手来引领我。”(Precious Lord, Take Me by Thy Hand)。金请他在当晚的集会上演奏它。“我真的希望你今晚能演奏它。”他说道。

一声枪响，金瘫倒在水泥台阶上，血从他的嘴里和洞穿的脖子汩汩地往外

4月9日，哀悼的人们挤满了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街道，注视着骡子载着入殓金的棺槨从教堂缓缓走向该市莫尔豪斯学院 (Morehouse College) 的纪念公墓。



流。救护车用了15分钟才赶到。一位朋友在他张开的伤口里塞了块毛巾,但金的血仍然很快往外流。他被送进圣约瑟夫医院(St Joseph's Hospital)的急诊手术室。半小时后,金不幸身亡,时年39岁。

孟菲斯市长宣布全城进入紧急状态。州长命令4000名国民警卫队员占领了城市要道,但是,他们阻止不了人们涌向街头,人们悲痛欲绝,用哭喊来发泄他们的悲愤。

接下来的四天里,为了使美国黑人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看电视,而不是去街上抗议,新闻报道充满了马丁·路德·金谈论非暴力问题的镜头。

但这并没有用。

在纽约、华盛顿、巴尔的摩(Baltimore)、芝加哥——在遍布全美的四十多座城市中——年轻的黑人们极其愤怒地走上街头,烧、砸、抢并与派来阻止他们的警察交火。

在克利夫兰(Cleveland),种族平等协会主席弗洛伊德·麦基西克(Floyd McKissick)说:“金博士是非暴力运动最后的巨擎。非暴力已是一个死亡了的哲学。使之死亡的不是黑人,而是白人和反对它的白人种族主义分子。”

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后面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汽笛的尖叫声淹没了人们的叫喊声、砸玻璃声和跑动的脚步声。吉普车和坦克排列在砸烂的店铺前。到处都是碎玻璃和被烧得黑乎乎的车辆。



埃尔德雷奇·克利弗,黑豹党的情报部长,1969年亡命莫斯科时向人们展示他的“护照”。

6日 美国,奥克兰 狱中人

在奥克兰的圣弗兰西斯科郊区,黑豹党一直试图阻止孩子们在暗杀发生后闹事。

“不要与警察斗气而丢了自己的性命。”博比·西尔(Bobby Seale)和黑豹党这样对他们讲，“千万不要惹事。回家去。扔石块和瓶子不是真正的革命。”

在外面砸东西、放火的这些孩子，通常听不进他们年龄组之外的任何人的话，但黑豹党除外。西奥克兰黑人聚居的贫民窟中的两个年轻人休伊·牛顿(Huey Newton)和博比·西尔三年前成立了黑豹党，作为监督管理警察的机构。当警察在街上拦住黑人盘问时，黑豹党人就站在他们背后，检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嫌疑人保障合法权益提供建议并在筹措保释金或延请律师方面为黑人提供帮助。

牛顿在法律学校学过一年法律，黑豹党也注意使自己的建议囿于法律。但除此之外，他们丝毫不隐瞒自己对警察的看法。就奥克兰警察而言，他们也丝毫不隐瞒他们对黑人的态度。

黑豹党携带枪支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无论他们武装起来的其他后果是什么，反正自从黑豹党开始巡逻以来，西奥克兰的警察骚扰事件明显下降了。

对于大多数贫民窟的年轻孩子们来说，黑豹党是青少年崇拜的英雄。所以，当有消息说黑豹党叫大家冷静时，孩子们也就回家了。马丁·路德·金遭暗杀后，海湾(此处指圣弗兰西斯科海湾——译者注)地区并没有发生任何骚乱。但警察还是全副武装，以防万一。

诺伦·R·达纳尔(Nolan R. Darnell)和理查德·詹森(Richard Jensen)警官开着警车穿过西奥克兰时，发现有一个人正躲在一辆停着的汽车后。按照警方的说法，当他们下车调查时，有人打了一梭子弹。詹森警官皮肤受伤。达纳尔用电台求援。

奇怪的是，不仅奥克兰的警察，而且邻近的埃默里维尔(Emeryville)的大批警力几乎立刻就赶到了现场。两个街区的范围被封锁。据说有些黑豹党躲进了第18街1218号的一座楼里。警察包围了这座两层的木板楼房并开枪射击。

在其后90分钟的包围过程中，他们向楼房扫射了数千发子弹。这座破木屋被打得千疮百孔。夜幕降临时，他们拿来了探照灯，把目标及周边地区照得透亮。小楼被照得跟电影场景似的，约有二百个遭封锁街区的居民围在边上看热闹。

地下室里，埃尔德雷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和博比·哈坦(Bobby Hutton)正屏住呼吸，尽可能平地躺在水泥地上。子弹从他们头顶上方不到一英尺的狭小空间呼啸飞过。克利弗是黑人解放运动最杰出的战略家之一。正是他

一直主张黑豹党走出贫民窟，进入白人的政治舞台并与其他激进组织联合起来。17岁的哈坦还在上学。

一枚催泪瓦斯霰弹打了进来，直接命中了克利弗。他的衬衫着了火。在哈坦的帮助下，他扯下衬衫，看自己的体毛有没有被烧着。地下室的催泪瓦斯越来越浓烈。一阵曳光弹穿破木板，点燃了房屋。克利弗明白他们不得不出来了。

他扯掉剩下的衣服。“我们光着屁股出去。”他告诉哈坦，“这样，这帮猪猡就不能说他们射杀我们，是因为他们以为我们带着枪了。”但是，哈坦太没有经验、太害羞了。他脱掉了衬衣，但没有勇气把裤子脱了。克利弗没有时间来说服他。火苗已开始吞噬着房屋，催泪瓦斯越来越浓烈。他们必须马上出去。

克利弗叫喊着说他们要投降。警察吼叫着命令：他们必须首先把枪扔出来。

克利弗没带任何武器，但哈坦有支来复枪。克利弗把它从着火的地下室后面的窗户扔出。他的一只脚挨了好几枪。他们俩挣扎着向外走，克利弗吃力地吊着年轻人的胳膊，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

地下室的后面通向外面的走廊。这两名黑豹党被探照灯耀眼的灯光包围着。他们被喝令把手放在头上坐在人行道上。

“然后，”克利弗在他的书面陈述中说道，“一大群猪猡从街上跑过来，开始对我们又踢又骂，但是我们已感觉不到疼痛了。猪猡们叫我们站起来。小博比扶我站了起来。然后，猪猡们指着街中心的警车，叫我们跑过去。由于我的脚有伤，不能跑，他们就把小博比从我身边拖开，把他向前一推，叫他跑到车上去。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被催泪瓦斯呛得直咳嗽的小博比竭尽全力地踉踉跄跄地向前跑，当他跑到离我大约有10码远时，猪猡们就开枪打他。然后，他们又回过身向我扑来……”

但此时旁观的人群干涉了，他们尖叫、大骂警察的残暴。也许正是这救了克利弗的命，但也许是他在给旧金山一位报界人士的短信中所提到理由使他存活了下来。那封信将在下周被从瓦瑟维尔监狱(Vacerville Prison)偷偷带了出去——正是光着身子出去的决定救了他。

“这个决定是基于在狱中对猪猡们长期不断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所有的猪猡都是同性恋者。当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遭遇裸体男人时，同性恋者首要的冲动是去爱抚他。所以，奥克兰的猪猡们没有开枪打我，而是照着我的裸体又踢又踹。在那种情况下，与开枪比起来，踢或踹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爱抚。在我

周围大约有五十个手里握着枪的猪猡。只要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想对我直截了当的话，我早已成为死黑鬼了。

“在对警察的残暴表示愤怒时，黑人忘记了这样一个基本现实：警察只是执行那些政策制定者制定的政策的工具。警察的残暴只是恐怖与镇压机制的一个方面。在警察残暴的背后是社会残暴、经济残暴和政治残暴。从贫民窟的视角看，这是很难辨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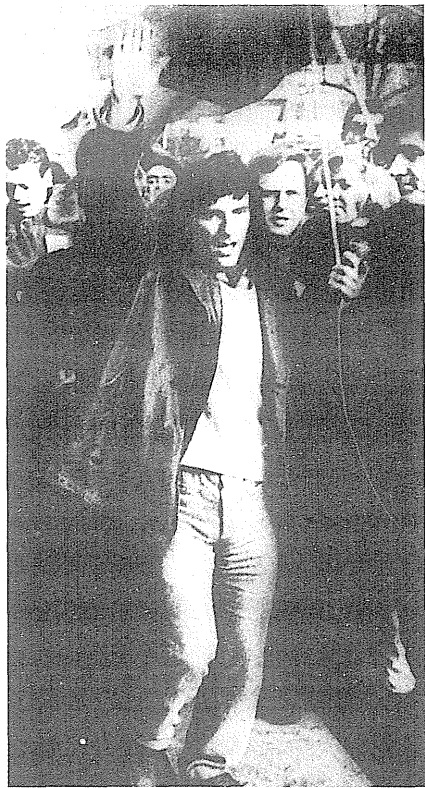
（转自埃尔德雷奇·克利弗的《狱中人》）

11-14日 西德 小报杀人

报业大亨阿克西尔·斯普林格(Axel Springer)控制了德国最大的出版集团，该集团对西方占领军尤其是美军，殷勤备至。他的报纸奴仆般地效忠于美国的全球政策，比起《华盛顿邮

报》和《纽约时报》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多数德国工业巨头曾是第三帝国的支持者。正如他们过去不希望得罪希特勒一样，他们现在又争着效力于他们新的保护者。像他们的产品一样，他们的忠诚坚固而且有效。

斯普林格的报纸，由《画报》(Bild Zeitung)挑头，对抗议学生进行了一连串的指责。鲁迪·达奇克被诬蔑为东德间谍，一个肮脏、下流的赤色分子，正在毒害着西德正派的好孩子的思想。这样的宣传让人想起纳粹杂志《冲锋队》(Der Stürmer)，其特色就是充满愤恨的煽动性攻击。达奇克被诬为“第一大公敌”。“不要把所有的脏活都留给警察！”出现在另一条斯普林格的头版头条新闻上。



鲁迪·达奇克——激起西德学生反对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存在的东德人。



约瑟夫·巴赫曼，加害鲁迪·达奇克的杀手。

约瑟夫·巴赫曼(Joseph Bachmann), 23岁, 来自慕尼黑, 是个失业的房屋油漆工。他每天都读这些报纸。他自己的境况让他感到痛苦和失望, 但他从阅读《画报》对学生的攻击中获得满足。

鲁迪·达奇克在西柏林一家药店门口, 等着给襁褓中的儿子买药。该市的气氛恐怖, 新左派与老右派严重对立。老右派复仇心切且充满怨恨。

约瑟夫·巴赫曼走近站在街上的学生领袖, 朝他开了三枪: 一枪打中了他的胸, 一枪打中了他的脸, 第三枪射进了他的头颅。

当医院里的达奇克在死亡线上挣扎时, 试图杀死他的人被逮捕并对抓他的警察吹嘘: “我听说过马丁·路德·金的死。因为我痛恨共产主义分子, 所以我觉得我必须杀了达奇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原是神学院学生的达奇克是东柏林的流亡者。

枪杀事件发生后几小时之内, 数千人在位于西柏林市中心的科赫大街(the

在西柏林和全西德城市, 谋杀鲁迪·达奇克的图谋激起了人们对斯普林格集团的攻击, 该集团的报纸制造了充满愤恨的氛围。



Kochstrasse)的斯普林格报社游行示威——这是他们所有愤怒和悲伤的靶子。

“这不是一个孤独、疯狂者的个人行为。斯普林格报业针对左翼反对派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敌视运动已经产生了这样的气候，一个人身在其中就会计划和实施这样的行为。”街上散发的一份用红墨印刷的传单上这样写道。

第二天，愤怒的学生示威大潮袭击了全德的斯普林格办事处。在西柏林，数千人胳膊挽着胳膊、20人一排地朝着斯普林格大楼迈进。斯普林格大楼正被带刺的铁丝和警察的重重警戒线所包围。叫喊声在周围建筑物间回荡：“鲁迪·达奇克，鲁迪·达奇克”；“斯普林格，杀人凶手。”

抗议者在警察高压水枪的喷射下后退着，后来他们自己也打开了笨重的移动式高压水炮。这一幕让人想起了身着深蓝色盔甲的矮胖的战神怪兽。被逮捕拖走的人之中，有一位是外交部长的儿子——彼得·勃兰特。

在慕尼黑，示威者设法闯入斯普林格报业大楼并蜂拥而入。在法兰克福，游行的抗议者进入了一座右翼牧师的教堂，用《国际歌》淹没了最后的圣歌。在巴黎和纽约的斯普林格大楼外，也有声援达奇克的抗议活动。

在伦敦，有一部分人从特拉法尔加广场为马丁·路德·金举行的盛大集会中走出来，举着“越南团结运动”和“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的旗帜，高呼“鲁迪·达奇克，鲁迪·达奇克”，往霍尔博恩广场(Holborn Circus)的《每日镜报》大楼中的斯普林格报社走去。警察试图夺走他们的标语牌和旗帜，逮捕骑在友人肩上向人群演讲的塔里克·阿里(Tariq Ali，本书作者之一——译者注)，但他们被示威者推到了一边。示威者委派代表进入大楼。富有同情心的《镜报》记者们在一位担惊受怕的股东支持下，答应示威者把第二天的头版用来评论他们的问题。

达奇克活了下来。他的妻子格雷切恩(Gretchen)收到阿克西尔·斯普林格儿子的一封感人的信。这位报界巨头的继承人对其父的政治行为以及报纸令人不快的风格感到惭愧。

从现在起，他将与达奇克保持定期的联系。达奇克也给他的未来杀手回信，试图解释德国社会主义学生为什么奋斗。



“释放政治犯”

他强壮、健康、结实，但是，要重铸他的思维方式，就显得困难了。我们认定他还没有悔悟，或悔悟还没有得到证实。就他所持的政治观点而言，监禁并没有改变他的个性。因此，瓦伦廷·卡帕要求假释的请求必须据此予以否决。”

动会，以抗议奥林匹克委员会决定让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以清一色的白人代表队参赛。许多非洲国家和一些白人运动员也加入了这项抵制运动。

为了避免遭到抵制，墨西哥政府拼命游说把南非重新排除在奥运会之外。与此同时，数百名政治犯正在监狱里遭受着折磨。

墨西哥政治犯辩护委员会正努力把诸如瓦伦廷·卡帕 (Valentin Campa) 这样的案件揭露出来。卡帕由于帮助组织铁路工人罢工于1960年被捕入狱。卡帕因为这个合法的行为已在铁窗中度过了八年，以下是他的假释被拒绝的理由：“因为他已经63岁，虽然从身体角度讲，

梅丽娜·默库丽在伦敦的一次集会上谴责希腊独裁者，号召全世界团结起来。



19日 联合王国，伦敦 复活节快乐！

被自己国家的军政府剥夺了公民身份的希腊女演员梅丽娜·默库丽(Melina Mercouri)抵达伦敦并领导了一场在希腊使馆前的游行示威。在上校们发动政变一周年之际，她向国内发出了复活节的问候：

“希腊人，我的弟兄，我从一个遥远的国度给你们写信。祝你们复活节快乐——Kali Anastasis!——祝愿希腊自由。希腊那帮上校们很快就会成为人们忘却的噩梦。

“这里是伦敦，是在希特勒占领的黑暗年代

里你们倾听的伦敦。在这新的占领中——这是希特勒那些贫穷而又愚蠢的亲戚们强加给我们的，我们要像我们希腊人每次在危机时刻所做的那样团结起来。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把我们无条件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最后一名犯人获释，直到民主再度通行希腊。”

哥伦比亚大学是与美国国防部国防分析研究所密切配合、为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开展研究的12所大学之一。

它作为一所有声望、有大量资助的常青藤联合会⁴大学，坐落在哈莱姆区边缘上，学校的阶级角色异常明显。当学校为扩大自己独享的设施而侵占公用土地，提出在哈莱姆的晨缘公园（Morningside Park）建造一座新体操馆的计划时，遭到主张黑人解放的学生和当地居民的一致反对。

一部分激进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的学生也一直进行着斗争，揭露其学校与其校长格雷森·柯尔克（Grayson Kirk）以及五角大楼战争机器之间的联系。

“争民社”——学生争取民主社会，是一个激进的学生组织，在全面投入60年代早期南方腹地黑人民权运动过程中发展壮大而来，拥有成员30,000人。它代表了包括嬉皮士、权力归花儿⁵派、背离社会习俗者、易比士和整个反正统文化学生的美国青年阶层的政治目标。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哥伦比亚大学分会主席马克·鲁德（Mark Rudd）与格雷森·柯尔克进行辩论：

柯尔克：“我们的年轻人——数量之多让人不安——似乎排斥一切形式的权威。我知道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的代沟更宽或更具潜在的危险性。”

鲁德：“你称之为代沟，而我则把它看作是那些现在掌管着事务的人——你，格雷森·柯尔克——与那些对你们统治的社会感到厌恶并受之压迫的人——我们，年轻人——之间真正的斗争。你也许想知道这个社会哪里出了问题，因为，毕竟你也生活在一个非常憋闷的自我创造的梦幻世界里。问题出在这里：越南战争和所有你们为保持对你们帝国的控制而准备打的其他侵略战争，却把我们当炮灰使。通过你们种族主义的大学扩张政策，通过你们不平等的用工制度，通过你们的城市统治和警察力量，就在你们大厦的窗户底下，你们帮助创

造了贫民窟。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索科尼移动(Socony Mobile)、国际开发协会(IDA)、康·爱迪生(Con Edison)是你们这部种族灭绝的军事工业机器上的机轮或其他齿轮,而这样的大学——你们的大学——则把我们训练成为服务于这部机器的律师、工程师和经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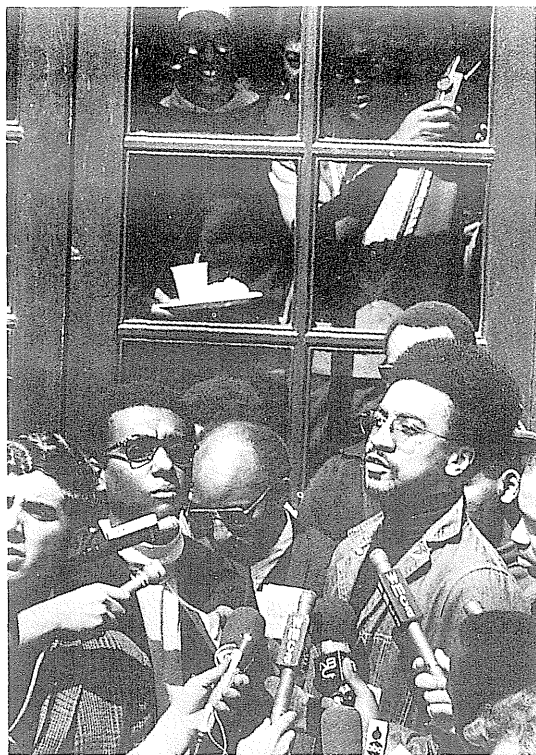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活动家们呼吁在春天某个晚上举行群众集会,以抗议校方要开除他们一些会员的威胁。黑人权力运动的学生也出现在现场。气氛令人振奋。整个学生群体汇集起来,从各个层面向作为贫民窟的房东、种族主义的土地征用者、误人子弟的教育者和国防部喽罗的哥伦比亚大学集团发起攻击。他们占领了行政大楼,以此来要求哥伦比亚大学从哈莱姆居民的公园里撤出、美国停止用汽油弹袭击越南人民的行为。

学生们进了学校,占据了五座大楼,并宣布它们为解放区。有八天的时间,校园成了宣讲会、讲习班、光影闪烁表演、爱之乐合奏和谈情说爱的的混乱场所。黑人学生与哈莱姆社区联系食物与给养。他们坚持要拥有自己的空间——汉密尔顿大楼。由于在美国,整个黑人社会都处于被包围之中,所以,他们宣布他们将与白人学生一块读书,但不会向他们割让空间或权威。这是事关革命的问题。

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的组织内部还提出了其他的问题:运动内部的压迫如何?“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本身就在简单复制着外部世界的权力关系吗?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前活动家马吉·皮厄西(Marge Piercy)在《苦力大坝》中写到了典型的学生运动的男性至上主义者:

“男性至上主义者往往会利用对运动感到陌生或处在运动外围的妇女。他对



黑人权力运动领袖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和H·拉普·布朗(H. Rap Brown)在哥伦比亚大学占领期间面对记者采访。

妇女的概念通常是父权制的：她们是供上床、做饭和生儿育女的；也是为他打字、管理办公机器、为他做单调乏味的研究的。妇女在定义上属于平庸之辈：她们是家庭主妇和居家过日子的人。一个开始独立行动的女人就是一个威胁，她将因此失去她受保护的地位。此后他再也不能使用她了。

这种男人会跷着腿坐在办公桌后面，指着一幅背着步枪的越南妇女的海报告诉你：‘如今，那才是真正解放了的妇女。当我看见你也像她那样时，我就相信你是革命者了。’

他汲取美国传统的哈尔贝利·费恩(Huckleberry Finn)所具有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傲慢。费恩从波莉姨妈(Aunt Polly)处顺流而下，一路逃亡，穿越海明威(Hemingway)时，妓女布莱特(Brett)把男人对男人的理解破坏了。女人差劲，而且一个女人竟然为自己考虑，这样的想法都是中产阶级的主观感情，天生就是反革命的。这场运动更多需要的是纪律，更少需要的是对中产阶级个人‘小我’的关心。”



保守派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左牌文字：我们支持伊诺克。右牌文字：黑人滚回去！

29岁的西斯琳·费伊·艾伦，伦敦第一位黑人女警官，她的警察生涯并没能维持多久。

29日

联合王国

“国家威胁”

因为一连串煽动性的新闻报道，再加上工党政府“英联邦移民法案”，英国掀起了白人种族主义的浪潮。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议员攻击棕色皮肤的英国公民，称他们是“国家的威胁”。当白人码头工人、汽车工人和希思罗机场(Heathrow Airport)⁶的移民官员对此表示支持时，新闻界匆匆写就的骇人听闻的报道，只会使“让英国保持白色”的心理更加膨胀。

当肯尼亚外交官约瑟夫·卡拉尼亚(Joseph Karanja)博士——来自蒙巴萨(Mombasa)⁷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的一位优秀的年轻历史教师——进入下院时,追随鲍威尔的码头工人把他推来搡去、嘲弄奚落。他们对他高喊:“滚回牙买加去!”

同一天,英国第一位黑人女警察西斯琳·费伊·艾伦(Sislin Fay Allen)在靠近伦敦的克罗伊顿(Croydon)开始上班。她已经在考虑退出警察队伍了,她说是因为她已经收到了数十封恐吓、谩骂的信件。“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坚持这份工作。这可不是一个容易做的决定。”

与此同时,在埃塞克斯(Essex)的哈洛(Harlow),申弗尔报业(Shenval Press)因为《黑侏儒》有抨击伊诺克·鲍威尔的内容而拒绝发行这份新的激进的报纸。一位编辑评论说:“支持伊诺克·鲍威尔的人宣称他们应该享有言论自由——但是,我们却发现即便对他稍有微词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发表。”

〔注 释〕

1 蒙哥马利 (Montgomery), 美国亚拉巴马州的首府。

2 马尔科姆·艾克斯 (Malcolm X, 1925—1965), 美国黑人领袖, 因被他所崇拜的黑色穆斯林运动中逐出, 宣布成立自己的宗教组织, 皈依正统伊斯兰教 (1964), 放弃其种族分离主义观点, 后被刺杀。

3 理查德·赖特 (Richard Wright, 1908—1960), 美国黑人小说家, 开创反种族歧视的主题, 代表作长篇小说《土生子》先被改编成戏剧, 后被拍成电影, 对后来的黑人文学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

4 常青藤联合会 (Ivy League), 指美国东北部哈佛、哥伦比亚、耶鲁、普林斯顿、康奈尔、布朗、达特茅斯、宾夕法尼亚等八所以学术成就以及社会地位著称的名牌大学, 原为这些大学体育联合组织的名称。

5 权力归花儿 (Flower-power), 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嬉皮士使用的口号, 主张通过爱情和非暴力实现社会改革。

6 希思罗机场 (Heathrow Airport), 在英国伦敦。

7 蒙巴萨 (Mombasa), 肯尼亚东南部港口城市, 在蒙巴萨岛上。



革命是历史的高潮；智者指
月，愚者望指（中国谚语）；鹅

社会只是一朵假花；呐喊吧；面
对现实吧——要求不可能实现；

1968^年

5月

行动 = 不反动 + 创造

卵石下面就是沙滩；把幼儿园、
大学和其他各种形式的监狱的
大门打开；我们要用最后一根
官僚的肠子绞死最后一个资本
家！哼！在官僚政府阴影的笼
罩下我们怎么能自由地思考？

释放我们的同志；保卫我们集
体的想像力；庸人的眼泪是众
神的美酒；商品是毒害人民的
鸦片；在鹅卵石中间，我活下来
了；我坚持追求真实的欲望，因
为我相信我的欲望是真实的。

愤怒的巴黎示威群众在街上游行，并在沿街的墙壁上书写标语。

在全世界的眼里，巴黎的“五月风暴”已经定格成为1968年的代表形象：身穿针黹衬衫和牛仔裤的不戴帽的学生、塞满大街小巷的路障、防暴警察以及漂浮在空气中的催泪瓦斯。学潮打碎了二战后西欧“盛世升平”的神话。地铁沿线的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语，其中随处可见的一条是：“地铁工人们，罢工！”那些掘开巴黎铺路圆石露出沙砾的学生所要求的还不仅仅是这些。

学生们造反的方式借鉴了法国悠久的革命传统。历史上人们曾不止一次在这些相同的街道上堆放路障，先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后来又在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当时的巴黎工人们将象征着蛮横统治他们白天时光的钟表全部扔到了大街上。法国1968年学潮运动的领导人对革命史了如指掌：不仅仅是1917年“十月革命”攻克冬宫，还包括1919年德国的柏林起义和慕尼黑暴动，同年发生在匈牙利的苏维埃革命，二战期间希腊、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暴力抵抗运动，以及他们同时代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反殖民斗争。

但学生造反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法国的内政问题：（一是战后法国僵硬、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里服从成了最为崇尚的品格；二是戴高乐的精英主义和法国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和青年一代的轻视。）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法国的学生率先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学潮在同警察的冲突中不断升级，最终酿成了5月10日到11日之间的“街垒之夜”。

警察在“街垒之夜”对青年们实施的暴行令举国感到震惊和愤慨，忧心忡忡的父母把医院和警察局围得水泄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工会举行了为期一天的总罢工和游行示威——工会的这一举措必将导致全面罢工和占领工厂，使整个国家处于瘫痪状态。罢工和占领活动逐渐超出学生的范围而蔓延至全体国民，从事汽车制造业和航空工业的激进的年轻工人接管了他们的工厂，这使得1968年的“五月风暴”成为了一场震撼法国社会根基的运动。

夏尔·戴高乐总统的助手们趁机向他大进谗言，说学生煽动了广泛的叛乱。听了助手们的汇报，这位统治了法国10年的老将军耸耸肩膀轻蔑地说：“Cette chienlit（这群臭狗屎）。”占领美术学院的学生们立即对这句谩骂予以回击，一



他才是臭狗屎！
图片说明文字：“他才是臭狗屎！”是学生们对戴高乐的回答。



经过了“街垒之夜”的巴黎拉丁广场。

夜之间，巴黎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画着大鼻子戴高乐侧面轮廓像的海报，海报上的标语是：“La chienlit c'est lui!(他才是臭狗屎!)”

危机还在加剧，有1000万工人参加了罢工，政府对局势失去了控制。总理蓬皮杜(Pompidou)和工会领导人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允诺给全体工人增加工资。尽管总工会的领导人表示愿意接受，但罢工的工人们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this 解决方案，他们所抗议和要求的绝不仅仅是金钱那么简单。

法国似乎走到了革命的边缘，而且这已不只是学生的看法。戴高乐趁着夜幕的掩护离开了法国，飞抵西德巴登巴登(Baden-Baden)的法国陆军基地。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群没用的家伙：一帮胆小如鼠的将军，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惨败仍使他们心有余悸。戴高乐说服他们，一旦学生和暴民们联合起来，他们将率领军队越过边境帮他靖国纾难。作为回报，戴高乐答应了他们的要求：释放萨朗将军(Salan, General Raoul)和他在“秘密军队组织”¹中的朋友，这些人因为在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犯下的暴行和叛国罪被判处终身监禁。

法国社会分裂成两大阵营。保守派认为学潮使社会面临崩溃，他们对此感到恐惧，在戴高乐回国后立即聚到他的麾下。忠于戴氏的阵营里还包括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在6月份用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恐吓、诱骗甚至恳求工会成员结束罢工和占领，在6月23日和30日大选举行之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他们毕竟是法兰西的共产党。”戴高乐心照不宣地冷笑道。但光凭傲慢的语言解决不了罢工，政府最终不得不使用催泪瓦斯、大棒甚至是子弹来平息工人运动。

戴高乐虽然在6月的大选中获胜，但他的总统宝座依然根基不稳，对他来说，一不小心就会煽起法国人民易燃的怒火。显然，他已不再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英雄。第二年4月，戴高乐在一场全民公决中失败并退休，为更为温和的乔治·蓬皮杜上台让出了道路。

1日 莫斯科，北京，圣保罗，布拉格，哈瓦那，河内，巴黎 五一节

万岁，万岁，
五月一！
开始幕天席地的性生活！

——佚名

五一节又称国际劳动节，是为了纪念1899年5月1日被警察杀害的芝加哥罢工工人而设立的节日。在芝加哥惨案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工人们自发纪念这个日子，显示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

然而在1968年的这一时刻，出现在全世界电视屏幕上的是莫斯科和北京的大阅兵。两国军队巨大的导弹、坦克方队和雄伟的阅兵方阵，使所有涌出工厂举行游行的工人队伍黯然失色。这是精心筹划的国家庆典，是在他们的冷战对手面前公开地炫耀武力。

但自发的庆祝活动仍然存在。

在巴西，五一节的集会是由国家资助的工会来组织的，这些工会已经成了军政府的傀儡，就连圣保罗的州长也被邀请作为集会的贵宾，于是对此不满的工人们决定组织他们自己的“大游行中的小游行”。集会当天，州长刚刚开始讲话，铺天盖地的鸡蛋、西红柿和政府布告牌立即朝他迎面飞来。州长和他的“工

会领袖们”只好逃到附近的市大教堂躲避，而几百名工人和学生则冲到台上，对着拥护他们的喧闹的人群，开始他们热情洋溢的演讲。

在布拉格，今年的情景也与往年不同。五一节这天没有举行阅兵式，而是举行了一次真正的市民游行，表达了群众对共产党改革派新政府的支持。在阳光下，簇拥着一大群孩子的家庭有说有笑地通过主席台，许多家庭在走过台前时还朝上面投去鲜花。有人看见杜布契克 (Dubcek) 动情地擦去脸上的泪水。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手下那些顽固不化的官僚则在莫斯科对着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笑脸干生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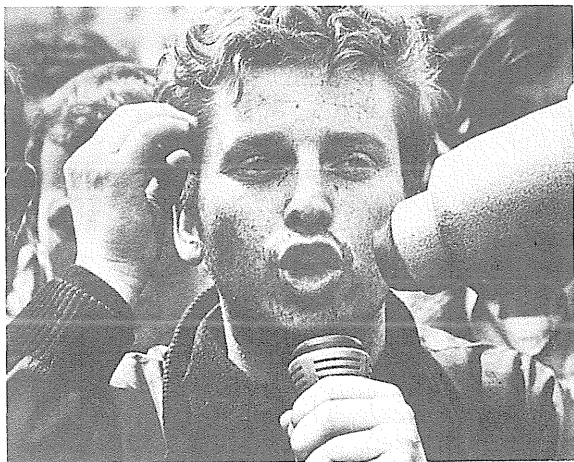
在哈瓦那，费德尔·卡斯特罗向参加集会的50万群众宣告：前一年对切·格瓦拉的谋杀吓不倒革命，也束缚不住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在河内，武元甲将军声称，如果美国不主动从越南撤军，它将在战场上遭到军事挫败。然而，几乎没有盎格鲁—美利坚媒体的评论员认真对待他的这番讲话。

巴黎的五一节平淡无奇，各大工会出面组织了传统的游行活动，由法共控制的总工会 (Confederation Generale du Travail) 牢牢把握着局势。在巴黎几乎见不到自发的群众活动，游行的人像尽义务似地呼喊着一五一的口号。但不管他们怎样懵然无知，他们的国家确实已经处在了爆发危机的边缘。

2日 法国巴黎 大卫和歌利亚

据报道，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和平谈判”将于下周在法国首都举行。澳大利亚记者威尔弗莱德·波开特 (Wilfred Burchett) 评论说：“西方列强中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核力量正处于顶峰的大国，现在却不得不和一个弱小、落后、分裂的国家坐到谈判桌前，商讨战争与和平的条件。在两个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对手之间进行如此高度紧张的交涉，在历史上还罕有先例。”与此同时，参加“3·22运动”的法国学生占领了巴黎北郊南代

丹尼尔·贡—邦迪 (Cohn-Bendit, Daniel) 在一次学生集会上讲话。他的无所畏惧代表了1968年的普遍情绪。





让-保罗·萨特在索邦神学院。

尔大学的一间学术厅。由于学生抗议的势头不断高涨,该大学的训导主任在前一周关闭了学校。而现在学生们则宣称,这所大学已经归他们所有。

在巴黎,学生们的炽热情绪与日俱增。这是一座左翼引领新思潮的城市。法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在二战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从那时起一直十分活跃的“左岸派”²知识分子,都为激进的左派思想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另外,悠久的革命传统在法国深入人心,这个国家的历史被1789、1793、1848、1871和1936年的多次革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1968也将成为这样铭刻历史的一年。

极少数学生在60年代初就已十分激进,由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等人领导的旨在反对法国在八年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所犯暴行的抗议活动鼓起了他们的热情。甚至在阿尔及利亚于1962年赢得独立之后,人们对法国政府曾是怎样一副可憎嘴脸仍然记忆犹新,因而既不相信太平盛世的神话,也不肯

对政府无条件地服从。

不仅如此,学生们发现他们居住和生活的校园过于拥挤和陈旧。和其他国家一样,巴黎的学生人数在二战后迅速增长,但院校设施却鲜有改善。而大多数学校的管理部门则和戴高乐政府本身一样,冷漠、严格而且专断。

待遇菲薄的学生是贫穷的,甚至有时还要忍受饥饿,但同其他人相比,他们还有自由。他们有时间去生活,去思考,去辩论,去谈情说爱。客观条件要他们住在拥挤的大宿舍里,在学生食堂一起吃饭,但这也使他们有机会共同为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

3-9日

法国巴黎 打倒警察！

5月3日星期五，南代尔大学的学生向他们在索邦神学院³的同伴求得支持，500名学生聚集在索邦神学院升旗的中央庭院内，听南代尔社会学系的学生丹尼尔·贡—邦迪（Daniel Cohn-Bendit）和其他一些参加过“3·22运动”的学生作演讲。校园外，一群新法西斯分子（他们中有些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成了让—玛丽·勒庞的有法西斯倾向的国民阵线的积极支持者）正在拉丁区闲逛，寻找左翼学生作为殴打目标。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类似的袭击事件已经发生了多起。越来越多的学生聚集在索邦神学院外面，他们都拒绝疏散。就在这

“斗争正在进行”。巴黎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继续向当权者施压。







铁棍、脚手架、砖头，学生们拿到什么就用什么。但大多数学生选择拉丁广场老街上的鹅卵石作为保护自己，对抗靠近巴黎大学的防暴警察的武器。

时，索邦神院校长打电话给教育部长，说服教育部同意派警察强行驱散院子里的学生。

下午4点45分，国家安全局（CRS）派遣的一队国家安全警察头戴钢盔、身着黑色制服、全副武装地冲进校园并逮捕了几十名学生。被捕的学生被塞进等在外面的警车，按在木头长凳上。透过拉着铁丝网的车窗，可以看见这些学生的脸吓得煞白。聚在校园外广场上的其他学生一见他们被捕，立即涌上前来堵住警车的去路并用拳头击砸警车的车体。这时有人喊起了口号，接着口号声越来越响，最后整个人群一起有节奏地喊着响亮的口号：“A bas la repression！（打倒压迫！）”

一些学生把停在一旁的汽车拉到街上来阻断道路：这是学潮中的第一个路障。一个穿牛仔裤的男孩跳到一辆小汽车的引擎罩上喊着战斗口号。国家安全警察戴上防毒面具，向人群发射了催泪弹。辛辣的浓烟在人行道上腾起，学生们惊叫着、流着泪朝咖啡店门前跑去，很快从这个小广场拥到了圣·米歇尔大道上。

身着黑衣的警察气势汹汹。皮革、钢铁和塑料。

被遗忘的梦魇。掩人耳目的面具。恐惧的阵线。

嘴里是甜腻的令人作呕的味道。干裂的唇腭。粪便。

第一次浪潮。

身着黑衣的部队现在就像是由黑衣人组成的潮水，用白色的大棒给人造成痛苦和伤害。落单就意味着被抓住棒打；摔倒在地，然后被一群人如饿虎扑食般猛踢。一个女孩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催泪弹乒乓作响，喷出蓝烟。

鹅卵石，树边的石头。

令人作呕的毒气弥漫在街道上和胸腔里。保护，重新列队，街垒的雏形，然后是——街垒。

被捕的学生关押在圣母院警察局。

10点钟时天开始下雨。

11点钟警察横行无忌。

索邦神学院——在黑暗中呻吟。

（安其楼·夸特罗其⁴（Angelo Quattrocchi）：《终结的开始》）



夜幕下的军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坚决阻止抗议者占领圣·米歇尔大街。这条大街是学生们据守拉丁广场的重要通道……

索邦神学院关闭了，几十名学生被捕。拉丁区一带狭窄的街道上到处是警察，随时准备殴打任何留长发和穿牛仔裤的人。震惊的学生运动领导人呼吁人们给予支持：一场浩大的游行示威将在5月6日星期一那天举行。

武装安全警察殴打示威的年轻学生的场面，在法国人民当中一石激起千层浪，对政府暴行的反感情绪急剧膨胀起来。甚至一些激进的中学生也上街罢课，支持他们的学长。

5月6日，巴黎和全国二十几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安全警察的暴行，其中巴黎的示威人数达到了3万。他们要求撤出拉丁区的警察，重开索邦神学院，释放被捕学生。

政府无情地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坐镇爱丽舍宫的戴高乐总统铁青着脸发出

命令：国家安全局要负责平息人们的聒噪。

在这一周里，游行的队伍每天都在扩大，成千上万的示威群众涌到大街上。民意调查显示，4/5的巴黎市民支持学生。

法国的新闻广播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但是独立的民间媒体卢森堡电台和欧洲电台都派记者来到街上，他们在无线电通讯车里把麦克风伸向游行的学生。

上百万个收音机现场直播了学生的示威活动，青年们从巴黎的各个角落赶来加入他们的队伍。他们的呼喊盖过了他们周围拉丁区街头上打斗的声音：示威者受催泪弹袭击后的尖叫声，跑动的脚步声，石头的撞击声。从学生们中间涌起阵阵整齐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Liberez nos Camarades(释放我们的同志)。”随着挥舞着大棒的安全警察再次进逼，学生的口号声向后退去，像是丛林中连绵不断的回响：“国家安全局就是党卫军。”

10日

法国，巴黎 街垒之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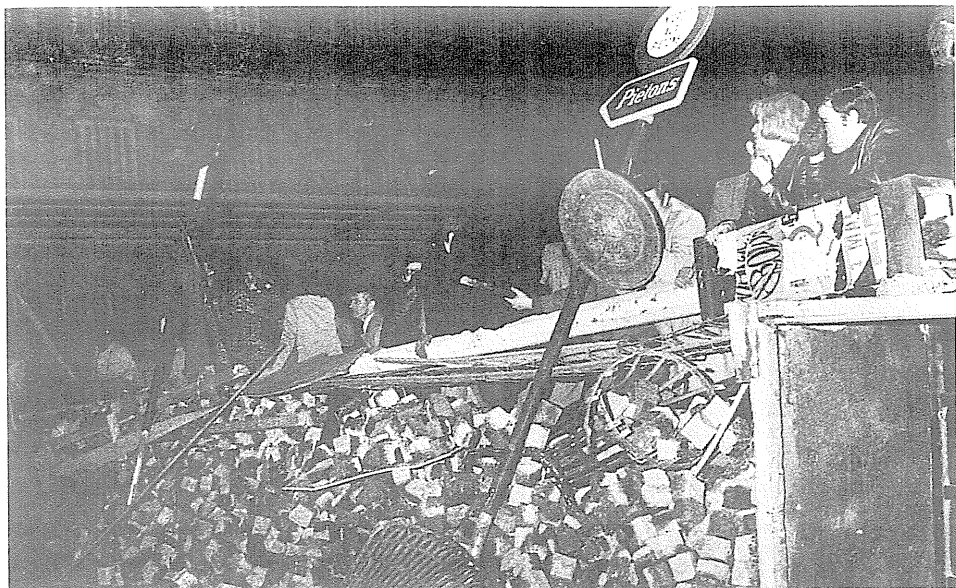
星期五晚上有消息传来，说政府准备撤回安全警察并重开索邦神学院。但学生们表示，若不释放他们的同志他们就不会屈服。当天夜里，在丹佛赫许霍(Denfert-Rochereau)灯光广场上聚集起了庞大的游行队伍，人群中传来抗议的怒吼：“释放我们的同志！”《黑侏儒》驻巴黎通讯员让-亚克·里贝尔给杂志发回的报道中写道：

“贡一邦迪和其他学生领袖问人群要去哪里游行。他们的回答是去国家广播公司(ORTF)。这家公司失真和带有侮辱性的报道已引起了人们的痛恨。

“我们环绕着由数千武装警察保卫的圣代监狱游行，然后转向塞纳河右岸和国家广播公司。但是道路被警察阻断了。人数众多的游行队伍被庞大的警察部队拦在圣·米歇尔大街内：我们被包围了。

“人们决定悄悄地占领拉丁区，避免惊动警察，但如果警察发动攻击的话就进行自卫。”

巨大的人群在迷宫般的街道上散开，人们捡来鹅卵石、交通标志、建筑工地上的脚手架和瓦砾——人们把手边一切能够检到的东西都堆在一起构筑起防范警察的工事。气氛越来越紧张火爆：就像是一个有3万个兴奋的人参加的狂欢夜。“这就是巴黎公社，”他们说，“巴黎公社：这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在巴黎升腾起的一股反叛力量，在1871年的革命尝试中它又再次被点燃。这种力量完全



这时，附近的学生正在保卫他们仓促修建的街垒。

由那些在寻求自治的道路上拼搏的人组成。”

对于南代尔的学生领袖丹尼尔·贡一邦迪来说，“那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时刻，突然之间，街上被人们自发地堆满了路障。人们在街上垒着鹅卵石，因为他们——很多人甚至是生平第一次——觉得想要投身到一场自发的集体活动当中去。人们在释放着他们压抑已久的感情，像庆祝节日一样精神振奋。成千上万的人深切地感受到彼此交流、互助互爱的需要。那一夜让我永远对历史感到乐观。经过了这样的夜晚，我再也不能说‘这种情景绝不可能发生’”。

到晚上10点钟的时候，学生们占据了拉丁区。几小时之后，让一亚克·里贝尔从巴黎发出了下面这则消息：

“现在是凌晨1点：我们这一组在歌鲁萨克大街和圣亚克大街的街角设立了路障。我们这一组包括6名学生，10名工人，一些意大利人，还有几位旁观群众和4个随后加入的艺术家。大部分人都是素昧平生，我们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姓名。

“有100个人帮我们搬东西堵住街道。从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我们的街垒旁边忙着协调大家的工作，无暇顾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据目击者说，当时在整个拉丁区人们都在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做着同样的事。

“我们的路障分内外两层：外围一层3英尺高的鹅卵石围墙，中间是20码宽的空白地带，然后是一道由木头、小汽车、金属杆、垃圾箱堆积成的高墙。我们的武器是从街上捡来的石头、碎金属等等。

“住在附近的居民主动提供了大量帮助。他们送来水、白糖、遮挡毒气的布料，并告知我们警察的行动。正是他们的帮助，使我们高涨的热情没有在看不到尽头的漫长等待中低落，而是一直保持到警察发动那场不可避免的攻击。”

谈判仍在进行着。在一辆移动通讯车的后面，学生领袖正和校长进行磋商，他们的谈话内容由卢森堡电台现场直播。学生们要求满足三个条件才肯疏散：释放他们的同志，撤离警察，重开索邦神学院。

据电台消息，大量警察增援部队正涌向拉丁区。

午夜刚过不久，贡一邦迪对媒体说：“我们告诉校长，今夜街上所发生的一切是整整一代人在反抗某种社会制度。我们还告诉他，警察若不离开拉丁区，今夜就要血溅街头。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所提的三个条件得不到满足，示威群众就会一直坚守在街垒后面。”

校长打电话给内务部，请求将谈判继续下去。但他已经束手无策了：在内务部的密室里，戴高乐强硬的安全和情报顾问雅克·弗格（Foccart, Jacques）和爱丽舍宫要人、总统助理伯纳·德里高（Tricot, Bernard）正敦促教育部长和内务部长采取强硬立场。这是一场叛乱，必须予以粉碎。国防部长当时也在场。

在夜幕下的街道上，成排的国家安全局武装警车泛着黑黝黝的光芒。成群的安全警察戴着护目镜、面罩和头盔，看起来不像人类，倒像是一堆昆虫。他们裹着皮衣，手持大棒、盾牌，还装备了催泪弹。第五共和国正赤裸裸地挥动着它的武力。里贝尔在报道中写道：

“凌晨两点钟：现在情况已很明显，警察正准备展开强烈的攻势。据电台广播，我们被重重围困，政府已经下令进行攻击。我们继续构筑着街垒，每隔100码就有一堆作为‘弹药补给’的石头和一个医护中心。我尽力协调在我们周围的街垒之间乱跑的人，但还没能把他们聚在一起，我们就陷入了警察的攻击之中。于是我们几乎断绝了来自拉丁区其他地方的消息。

“有人找来一面法国国旗——我们撕掉旗上蓝色和白色的部分，把红旗悬挂





飞跨过来：国家安全局的防暴警察向大学附近的卢森堡广场上学生修筑的街垒发起冲锋。

在我们的街垒上方。据说在其他街垒上空也有很多红旗和黑旗在飘扬。我们将小汽车掀翻堆在前面，防止警察用汽车和坦克发起冲锋。（电台说坦克正向这里驶来，但我们还没有看到。）

“警察袭击了卢森堡广场。他们的战术很简单：在100码的距离上发射催泪弹，让我们流泪、窒息，甚至晕倒。警察使用的毒气有梅斯毒气（越南和底特律都曾尝过这种毒气的滋味），催泪瓦斯，以及能点燃汽车的磷光手榴弹。警察还使用了小型爆破手榴弹：我们旁边有一名学生捡起一枚手榴弹想扔回去，却被炸掉了整只手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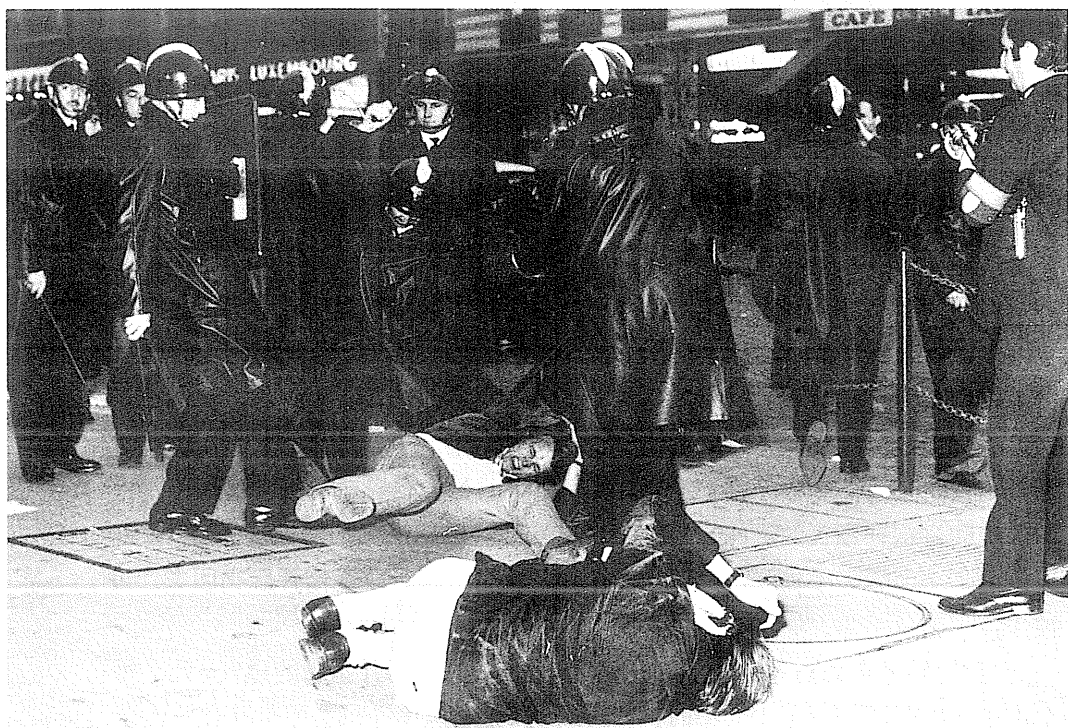
“我们竭尽全力防守。事后证明，尽管有令人失明而且窒息的毒气，几乎每个街垒都能阻滞警察至少一小时，有的甚至坚持到4个小时。警察从盖-吕萨

克街正面缓缓推进（人群四散奔逃，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使他们镇静下来，排着队沿盖—吕萨克街朝警察少的方向撤退）。

“警察同时在三个地点发动进攻：盖—吕萨克大街的两端和我们在乌尔姆大街的街垒。我们这边伤员剧增，大部分人被毒气熏得不省人事，还有一些暂时失明。成千上万个声音一起喊道：‘戴高乐是杀人凶手’，‘释放我们的同志’，‘革命’。有的人在做莫洛托夫燃烧弹，我尽量劝阻他们，因为怕警察会因此展开大屠杀。倒不是害怕屠杀我们，而是怕杀害旁观的无辜群众。旁观的人也已入了迷，整个气氛像是被催眠了一样。我们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的，突然之间真正成为大写的人，于是我们大喊：‘我们存在着，我们就在这里。’

“有一个男孩做出了惊人的英雄之举，他拔下一面红旗带领我们穿过毒气和手榴弹的烟幕向警察挺进。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人数压倒了警察，他们开始后撤。我们身后的人群高声欢呼起来。我们又撤回到街垒后面，只有一个人受

· 防暴警察在圣·米歇尔大街上围住两个学生，尽管当时有一个新闻记者在场，他们仍顺手打了学生。



了轻伤。但毒气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它让我们无法呼吸，也看不见东西。

“最后我们被打退了，街垒也着了火。那时我只记得我因为窒息昏厥过去。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走廊里，两个女孩拍打着我的脸，还把湿毛巾盖在我的眼睛上。水让我醒了过来。他们告诉我，是一个学生把我背到那里的。

“我向外望去，到处都是警察，我们的街垒还在燃烧，多处弥漫着催泪弹的黄烟，有些看不清楚。

“我想要跑出去重新加入远处我们的队伍。但手持催泪弹和棍棒的警察立刻从两边冲上来：我们被困住了。

“我们把公寓大楼里的人组织了一下：这里至少有60名学生，不是受了伤，就是昏迷不醒。我们试着把朝街的大门封住，还有人绝望地按着公寓的门铃，但没有居民敢开门。我们就这么拥在楼梯上。后来警察破门而入，抓住几个学生，把他们打得血肉模糊，还朝楼内扔了三颗催泪弹，呛得我们涕泪横流，难过至极，然后他们沿着街道继续追剿学生。

“一个住在三楼的女孩招呼我们进屋。我们挤在她的小公寓里，喝着她给我们的水，听着外面接二连三的爆炸声。”

法国一位著名的足球评论员被一家广播电台派去拉丁角报道当晚所发生的事件。他报道说：

“现在安全警察开始发起冲锋，他们像狂风暴雨一般冲上街垒——噢，天呐！一场战斗打响了。学生们正在反攻，你能听到嘈杂的声音——警察撤退了……现在警察又重新站好队，准备再次发起冲锋。附近的居民从窗户后面向警察扔东西——哦！警察进行了报复，他们向公寓里投掷手榴弹……”

做节目的人打断了他：“这不是真的，安全警察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我所说的话都是我亲眼所见……”他的声音消失了，他们切断了这次广播。

（斯塔伯格大学的学生整夜都在通过收音机追踪巴黎街头的巷战，早晨5点，他们占领并接管了斯塔伯格的行政大楼。）

上午6点，筋疲力尽的安全局局长福高特（Foccart）和三个部长来不及梳洗就驱车赶往爱丽舍宫，报告戴高乐总统暴乱已经被镇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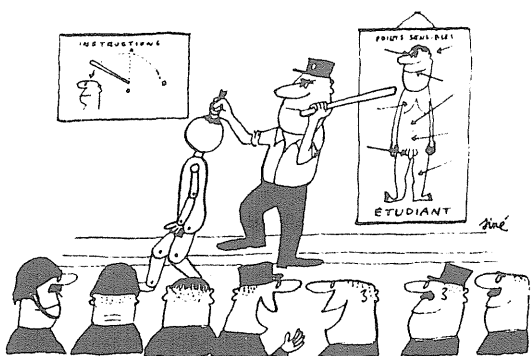
里贝尔的报道继续写道：

“早上6点，外面的战斗仍在进行，我们决定无论如何要找到红十字会，因为我们中有个人受了重伤。警察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任何手掌发黑，或带着

伤痕，或衣服上粘有催泪弹污渍的人都遭到殴打和逮捕。我们60个人决定一起走，以便情况紧急时可以杀出重围。我们把头盔给女孩戴上了。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我们跑到街上，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是怎样一个场面啊！到处是冒烟的街垒和翻转的汽车，长达半英里的街道一片狼藉。墙上刷着大幅标语：五月八日的公社万岁，打倒警察专制的国家……”

“我忍不住跑去看我们的街垒。它已被弃守，但并没有塌掉，几个行人正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个激斗之后的空战场。我们的人在盖一吕萨克大街一直坚守到凌晨四点半。”



国家安全局的警察——“我们也是学生”——在镇压暴乱的过程中学习了打击人体敏感部位的重要性。

“我让一个学生从他脏兮兮的红衬衣上撕下一块布，我把这块红布系在一根杆子上，插在我们的街垒后面，然后迅速跑开了：警察正从街的另一端冲过来。”

“我痛得几乎无法走路。我们绕着乌尔姆大街兜圈子，发现警察在到处抓人，甚至医护中心也难逃劫难。每一条街和每一个角落都有冒着烟的街垒和汽车。行人不断报告我们哪里有警察。许多开车的人和出租车司机都主动提出带我们离开这片警察密布的是非之地。随处可见大量的警

车满载着我们的人：他们成了满身疲惫、遍体鳞伤的阶下囚。

“革命已经开始了。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我们，那就是：
和我们并肩作战。”

收音机里传来丹尼尔·贡—邦迪嘶哑的声音，他号召全国进行总罢工，抗议国家在“街垒之夜”的暴行。

11日 法国，巴黎 早上好，蓬皮杜先生

一夜之间，法国已陷入社会危机之中。医院和警察局围满了找不到孩子的家长。反对派的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谴责警察暴行的特别评论。两个大工会联盟——总工会（CGT）和法兰西劳动者民主联盟（CFDT），决定在5月13日

星期一——也就是戴高乐就职10周年这一天举行一次全国范围的罢工和游行，以抗议政府的残酷镇压。

刚刚从国外赶回的蓬皮杜总理试图做出让步来息事宁人，他允诺将重开索邦神学院、撤离警察。但一切都太晚了。

13日 法国，巴黎 游行的百万大军

是日，一支庞大的队伍塞满了巴黎的大街小巷，足有100万人参加了这次声讨政府的游行。学生运动激发了人们藏在内心的悲愤的声音：反抗这冷酷专横、等级森严的阶级统治的社会秩序。

游行过后，人们云集埃菲尔铁塔下古老的阅兵胜地——五月广场。政府正在后退，安全警察已撤出了索邦神学院。消息传来，人群激动地高喊：“向索邦神学院进军！”

索邦神学院校门大开。有两万到三万人挤了进去，拥在学校古老的庭院和教堂台阶上。每个房间都坐满了人，大剧场里充斥着辩论的声音，人们就政治问题畅所欲言。几小时内，索邦神学院的墙壁上就贴满了振奋人心的革命标语，挂满了鲜艳的红、黑旗帜。

在接下去的五个星期里，被占领的索邦神学院成了一个革命活动的中心，一个嬉戏的广场，一个狂欢的殿堂。大剧场里每晚都举行一次全体大会，选出一个由15人组成的占领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权力被限定在一昼夜内，这样就不会产生任何官僚独裁。开会的时候人人都可以进来，人人都可以发言。

索邦神学院的大剧场和被占领的奥德翁剧院一起，在这场运动当中成为思想的发电厂和行动的指挥部。大剧场里的气氛总是那么紧张热烈、不同凡响。

14日 法国，南特 星星之火开始燃烧

萨德飞机制造厂的年轻工人继前一天参加了学生游行之后，举行罢工并占领了他们的工厂。

罢工工人准备整夜坚守工厂，他们的支持者从附近的学生旅馆里为他们拿来了毯子和食物。在沉寂的机器中间，工人们第一次听到了他们自己的声音。

戴高乐完全被隔绝在笼罩了半个国家的情绪和氛围之外，他离开法国去罗

索邦苏维埃

索邦神学院中挤满了人，插满了红旗，贴满了标语。在每间教室里，甚至在楼梯平台上或走廊中，各个“行动委员会”在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方案。这些委员会负责革命的各项事宜，从与工人保持联络的小分队到负责食品医药的保障。在巴黎，几乎所有的办公楼内都是这样的景象。

神学院的中部有个圆形剧场，可容纳五千人左右。关于革命前景的辩论在那儿夜以继日地进行着。许多演讲要求加强各派系之间的团结，要求学生宣誓，要求富有斗争精神的工人无论工会领袖说什么都坚决支持学生运动。

“奥德翁”音乐堂已被三千多名青年

学生和工人占据着，他们不会轻易地把它交出去。后台的更衣室和走廊里，几百名年轻人在工作着、讨论着、计划着。这里看起来很乱，好像没有领导在指挥，但诸事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在礼堂中，一场辩论正在进行着。比起索邦神学院，这里的听众文化层次低，更具有资产阶级思想，讨论常变得吵闹不已。但是，这里的政治氛围是一样的。戴高乐的铁桶政权已出现裂缝。人们首次感觉到有机会可以表达他们的思想，有地方阐明他们的观点。

这是革命的前期，大部分工作是在晚上进行的。我所听到的一次最精彩的演讲是在凌晨两点开始的，当时圆形剧场挤满了人。演讲者是个典型的青年革命者，穿着套衫、黑裤，一头蓬乱的长发，

马尼亚进行国事访问。

15日 法国，巴黎 工人们愤怒了

热诺厂的工人们举行罢工并占领工厂。热诺汽车工厂坐落在巴黎郊区的布伦一比朗格(Boulogne-Billancourt)，该厂的四千名工人在被他们占领的工厂里度过了第一个夜晚，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聚在周围，给他们带来卧具、食品和饮料。

在48小时内，罢工占厂运动席卷了法国全境。这场运动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工资，而是要反抗工厂的整个体制：管理机构的专权独断，机器对人的奴役。法兰西劳动者民主联盟(CFDT)的工会领袖向人们宣布：“学生的斗争



9 切·格瓦拉,革命精神的化身,俯瞰着在索邦圆形大剧场静坐抗议的学生。

眼睛中流露出疲惫和饥饿。

“这次革命,”他指着身后的旗帜道,

“是为了树立社会主义和工人国家的红旗而进行的,是为树立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黑旗而进行的。”人群爆发出赞同的欢呼声。

后来我同他说了几句话,但他疲惫得说不出话来,一阵猛烈的咳嗽表明,他是参加5月10日晚催泪瓦斯洗礼的勇士之一。

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也许这次难以取得成功,但他们再次给西方社会以沉重打击;他们坚信现存社会已腐朽不堪,并已腐朽了多年,他们要在社会腐蚀他们之前来改变它。

作者:克利夫·古德文(Clive Goodwin),《黑侏儒》1968年6月1日刊

学生们使大学民主化的斗争和工人们使工厂民主化的斗争是一样的:工人们占领了位于布伦—比朗格的多数热诺工厂。



是为了把民主带进校园，工人的斗争则是为了把民主带进工厂，二者的斗争具有相同的性质。”

18日 法国，巴黎 我们要写自己的广播稿

在国家广播公司 (ORTF)，新闻编辑、播音员和新闻撰稿人宣布，他们将不再听命于内阁部长和任何政治党派。

戴高乐中途结束了对罗马尼亚的访问返回法国。次日，2万法国工人举行了罢工。

23日 法国 再见，戴高乐，再见

10万工人在罢工。工厂、码头、油田、铁路、机关、银行、商场、邮局、政府大楼、中学、大学，全部陷于停滞状态，许多地方都被罢工的工人占领，大门上飘着鲜红的旗帜。反对罢工的人叫嚣着要戴高乐政府实行铁血政策。在巴黎的一次大规模反政府的示威活动中，年轻的工人和学生一边游行，一边挥舞着手绢高唱：“再见，戴高乐，再见，戴高乐。”嘎纳电影节的技术人员也参加了罢工，导演们则纷纷撤出他们的影片表示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当年的电影节因而破产。飞机场关闭了，火车、汽车、地铁也都停止运营。煤矿上再也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垃圾也没人清理。这场学生运动已经升级为更广泛的示威行动，并蔓延到了整个法国。

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北越和美国“关于和平谈判的会谈”还在进行着。越南代表团心旷神怡地呼吸着那个春天弥漫在巴黎的造反空气。法国共产党没收了曾经属于莫里斯·多列士⁶ (Thorez, Maurice) 的乡村别墅，并在那里举行鸡尾酒会来庆祝胡志明78岁生日。一个眼镜片厚厚的小个子越南外交官拍了拍一个高大的美国人的胸脯，并用温和但很坚定的语气笑着对他说：“永远不要忘了，你们是侵略者。”

25日 法国，巴黎 门后的交易

蓬皮杜总理在社会事务部会见工会领导人，想通过收买的方式结束罢工。

美术学院：大众研习的场所

“从内部挑战文化体系的结果是，迅速由对艺术的挑战转向挑战的艺术。”

文人骚客荟萃之地拉丁区的墙壁上贴满了海报、宣传画，这种新型的表达方式在极富创造力的五月天里顷刻间即传遍大街小巷。在雄伟的、透露着巴洛克式奇异风格的美术学院里，每天晚上都有大批学生、工人、建筑师、美术家、设计师以及激进派人士聚集在一起，讨论时下的政局，探讨这晚宣传画的主题、思想、设计和口号。

投票结束后，工作就开始了：在一间白色的画室里，有人将一块丝绸的布帘在工作台上摊开。着色上漆之后，整张画布便和着墨水、石油溶剂油和亚麻子油的气味以及一个晚上的香烟味被装裱起来。一个人呼哧呼哧地将油墨涂抹在布帘上；另一个人拿起固定布帘的边框，边上两人将湿的画布挂起晾干。

待到清晨，参加完讨论会、研习会的人都过来了。他们大都抱着满怀的宣传画，准备在晚间贴出去。黑暗中，有人站在各个路口把风，防止警察前来；有人拿

着大桶的胶水和排刷在墙壁上粘贴画纸。在破晓之际，这些闪烁着新鲜思想的画纸格外耀眼。

石版印刷室的大门口贴着一张告示，上书：

“人民的画室是也，
资产阶级的，非也”

一些美术家在散发解说传单：

“如果要让我们确切地讲出写在这张告示上的话的意思并理解其涵义，我们的回答是，可以认为它指出了我们

未来前进的方向。

“这些话表明我们的问题决不是一个对现状进行改革或曰改良的问题。改进的含义是，基本的原则不动，亦即现有的本身是不错的。我们不满于现状。现状是什么？是资产阶级艺术和文化。什么是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文化是统治阶级用以压迫人民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给予艺术家特权地位使其和其他群众相脱离的手段。特权恰似一座无形的监狱，将艺术家囚禁于其中。这种文化带来的隔离背后的基本观念是：

“认为艺术已经‘获得了自由’（马尔罗⁵（Malraux）——参见他在格勒诺布尔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所做的演讲）。



“为‘自创的自由’辩护：文化让艺术家生活在幻想的自由之中。

1. 艺术家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他们认为什么都是可能的；他们只对自己或艺术负责。

2. 他是‘创造者’，这意味着他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艺术的价值超越时空限制。他不像一个历史现实中挣扎的工人。“创造”这一观念赋予了他的艺术品一种超乎现实的品质。

“文化给了艺术家这种特有的地位，从而将他们置于一个不能产生什么负面作用的位置。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体系中充当着安全阀的角色。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现时的处境。我们都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写上‘人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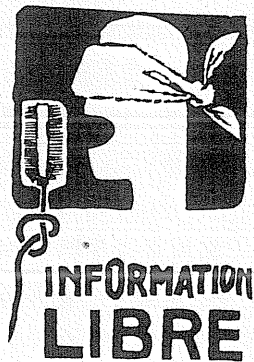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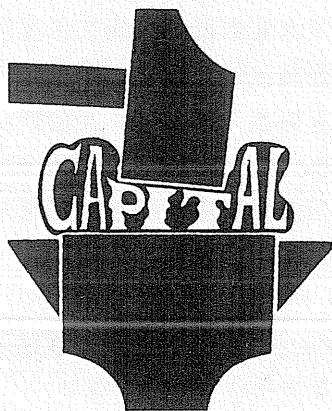
画室’时，这不可能只是一种改进，而是一种根本性的方向性的变革。

“这意味着我们决心要改变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

“需要说清楚的是，我们的意图不是要加强艺术家和现代技术的联系以便使艺术家和其他行业的工作者建立起更紧密的关系，而是要打开他们的眼界，让他们看到其他工人的状况，亦即我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现状。

“没有人可以教我们去熟悉这一现状。我们必须自己教自己。这并非是说根本就没有客观的亦即可以接受的知识，也不是说老一辈的艺术家、教师帮不了什么忙。因为他们也已决定投身于这一为改变自身角色而进行的自我教育的运动当中。

“资产阶级教育人的力量因此而受到挑战，人民教育人民的力量开始壮大。”



宣传画成为抗议运动的有力工具：图文并茂的宣传画生动传神。

他的策略是，轮流把每一位工会领导人带到一个小房间里，直截了当地问他到底想要什么，并许诺让他如愿以偿。

“墙壁看起来足够厚，”一个法兰西劳动者民主联盟的领导人如是说，“足以遮蔽工厂里和街道上喧嚣的罢工者的视听。”

会谈结束后，双方都显得如释重负。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工人只要结束罢工，就给他们大规模增加工资。

但让工会领袖们瞠目的是，罢工的工人拒绝接受这个协议。总工会主席乔治·舍基在布伦——比朗格的热诺汽车工厂遭到成千上万工人的起哄：他们需要的绝不仅仅是金钱，他们示威的目的要比涨工资重要得多。

在安全警察中间也出现了不满政府利用他们镇压示威工人的声音。现在甚至国家安全局的领导人也向政府摊牌：“请不要再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会服从任何命令。”

戴高乐的支持者从爱丽舍广场涌向凯旋门，他们在5月29日举行游行以支持这位上过战场的总统。



29日 西德，巴登巴登 大恐慌

戴高乐对危机的局势感到了惊恐，他秘密飞往巴登巴登的法国陆军基地以确认他能否得到军方的支持。军队的将军们要求他释放OAS（即“秘密军队组织”，曾在阿尔及利亚犯下无数战争罪行）的前领导人哈奥勒·萨朗。两星期后，萨朗和OAS的其他几个头目获释。

第二天，戴高乐返回法国并对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称法国受到了共产主义独裁的威胁，呼吁法国公民以行动来“捍卫共和国”，同时他暗示将采取暴力手段。

右翼人士举行了大规模游行以支持戴高乐的讲话，游行队伍阻塞了巴黎的街巷。通向爱丽舍广场的大街被堵得水泄不通，人们边走边呼喊着“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贡一邦迪滚回德国的达豪（Dachau）去”。

工人和学生团结起来与国家对抗



在巴黎周围开始了军事警戒，所有的预备役人员都被动员起来。

《新闻观察家》发表了让-保罗·萨特对丹尼尔·贡-邦迪的长篇访谈，萨特在访谈中写道：

“有趣的是，你们的行动在权力的宝座中植入了想像的空间。你们和其他人一样，都只拥有有限的想像力，但比起前辈来你们有着多得多的想法。我们被塑造成对什么是可能的而什么是不可能的有确切的认识。一个教授会说‘让我们取消考试吧’一类的话吗？绝对不会。他有可能改变考试的方法，但绝不会取消考试！为什么？因为他大半辈子就是在考试中度过的。

“工人阶级经常发挥他们的想像力来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但它们总是为形势所迫的权宜之计。比如在1936年，工人开创了接管工厂的斗争方式，因为这是他们保持团结、赢得选举胜利的惟一武器。你们则拥有更丰富的想像力，索邦神学院墙壁上的标语证明了这一点。在你们身上已出现了某种令我们的社会为之震惊、感到迷惑的东西，它否认了造成社会现状的一切因素。这就是我所说的可能性的延伸。请你们不要放弃。”

〔注 释〕

1 “秘密军队组织”，即OAS (Organisation de l'Armee Secrete)，曾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中犯下无数战争罪行。

2 左岸派 (left bank)，一个主要由前卫的电影导演等文艺界人士组成的文化团体，因为经常在巴黎塞纳河左岸聚会而得名。

3 索邦神学院 (Sorbonne)，Robert de Sorbon (1201-1274) 创立，巴黎大学前身。

4 安其楼·夸特罗其 (Angelo Quattrocchi)，意大利著名左翼诗人，其代表作诗集《终结的开始》描绘了1968年席卷世界的汹涌学潮。

5 马尔罗 (Malraux, Andre, 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活动家，戴高乐的追随者，当过情报部长、文化部长，曾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和法国抵抗运动，其长篇小说《人类的命运》曾获龚古尔奖。

6 莫里斯·多列士 (Thorez, Maurice, 1930-1964)，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国民议会议员，曾在法国政府中任国务部长、副总理，著有《人民的儿子》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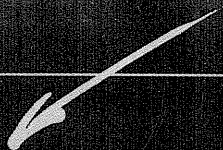




1968

年

6月



他们的梦魇就是我们的美梦——巴
黎街头的标语。

又一个月开始了，法国人民仍在举行游行。

6月，在法国风暴继续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同时，东欧国家也正经历着一场不断增长的骚动。在东欧诸国中，南斯拉夫总是与众不同。这个国家在二战中反抗纳粹的胜利，不是由斯大林率领的苏联红军带来的，而是通过当地人民自己英勇顽强的斗争赢得的，他们的斗争得到了莫斯科和伦敦的支持。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不是天使，但他们是能够团结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波斯



铁托总统（右侧）在6月11日的南斯拉夫—印度会谈开始之前会见印度领导人沙利荷·侯赛因（Zakir Hussain）博士。

尼亚和科索沃等民族以抗击他们共同的敌人——纳粹及其走狗——的惟一力量。正是巴尔干各民族的这种团结，保持了南斯拉夫在战后的统一。

甚至在抵抗运动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已经懂得如何使他们的盟友鹬蚌相争——让莫斯科对抗伦敦或是反过来。同样是这群领导人，在战争结束时拒绝接受雅尔塔协议中关于在南斯拉夫恢复君主制的条款。铁托¹（Tito）对斯大林和丘吉尔说，任何类似的想法都是对那些曾为胜利而战的人们的亵渎。两大国让步了，尽管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真正独立的姿态触

怒了斯大林。南斯拉夫的媒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谴责莫斯科，铁托则私下里警告斯大林：如果你敢入侵我们，我们的人民将会武装起来反抗你。南共的另一位领导人米洛万·吉拉斯²（Djilas, Milovan）出版了《新阶级》一书，尖锐地批评了斯大林主义。莫斯科也开展了强大的宣传攻势，但最终没有动用轰炸机和坦克。铁托在冷战时期拒绝成为苏联的走卒，使他在全世界又赢得了新的威望。

但尽管南共颇得赞誉，尽管南斯拉夫比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有着大得多的言论自由，1968年的南斯拉夫仍然是一个极权统治下的国家。共产党控制着社会，政治局控制着共产党，而铁托则控制着政治局。贝尔格莱德的市民比莫斯科和东柏林的居民少受愚弄，但却置身于相同的政府结构之下，这和官方的文

饰之辞自相矛盾。学生们撬开了传媒与事实之间的这道裂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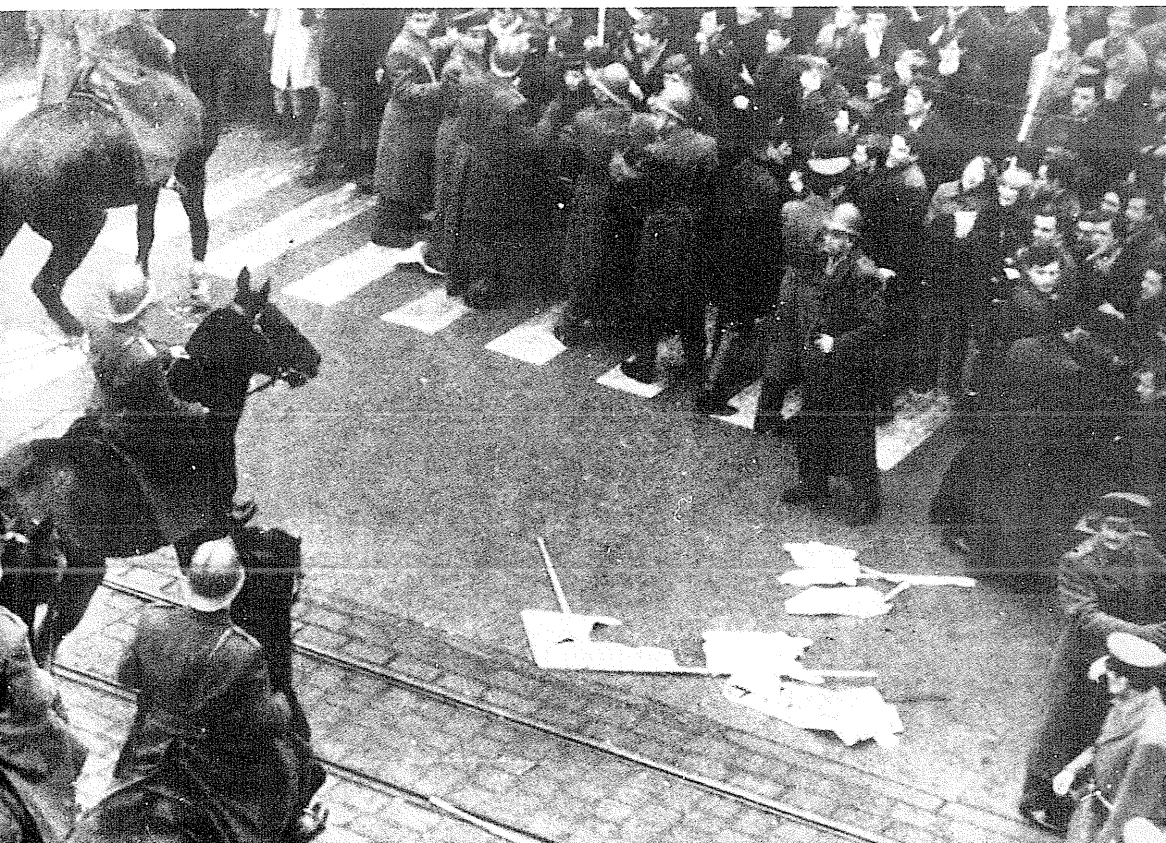
在贝尔格莱德，学生们要求获得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工人自治，并要求解决失业问题。他们反对增加管理人员控制工人阶级。

铁托不是戴高乐。他是个老共产党员，学生的游行让他深受触动。他通过捍卫学生们的要求平息了示威活动。他声称他支持学生的所有要求，并说南斯拉夫共产党将勇敢地接受他们所面临的挑战。街上的警察不见了，只剩下群众跳着欢乐的舞蹈。

很多事情本来是可以改变的，但事实上变化甚微。如果当年学生们所要求的结构改革真正得以贯彻并制度化，那么南斯拉夫人民或许可以免受铁托死后的南斯拉夫领导人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南斯拉夫也不会因为这种痛苦而最终解体。

20年后南斯拉夫的解体，既不是必须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南斯拉夫经济崩溃的结果。造成这种经济崩溃的因素有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1968年冬天，南斯拉夫警察在扎格莱德 (Zagreb) 的美国领事馆外驱散示威群众。在动乱持续了几个月之后，铁托总统再次露出了他专断的一面。



出于好意的指导，有欧共体各国间为经济增长而展开的竞争，更重要的原因是，领导南共的政治流氓为加强他们的统治基础而打民族主义的牌。欧盟在对南日耳曼人在斯洛文尼亚和塞尔维亚的阴谋方面，不负责任、措施无力，让这一切雪上加霜。人们潜藏的困惑就从那时开始显露出来并汇聚成形。

在贝尔格莱德，既有1968年示威学生的理想主义，也有25年后米洛舍维奇(Milosevic, Slobodan)对塞尔维亚民族沙文主义的卑鄙迎合。这一对比在南斯拉夫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明显。前者孕育着希望，后者则意在酿成恐惧的风暴。这种新的毒素最终毁掉了南斯拉夫。今天，“南斯拉夫”这一观念本身已经灭绝了，在它原来的位置上，差异受到了重视。这种昔日的民族乌托邦想像为当权者所窒息、所压抑、所利用。一首曾经充满希望的歌曲留了个悲剧的结尾。

1日 法国 到了革命的边缘？

阳光炽热，整个法国已经停止了运转。

垃圾堆在街上没人收拾，原来车水马龙的街道现在只剩下人群，原来机器轰鸣的地方现在只能听到人声鼎沸。不管走到哪里，你都能看见人们在交谈，人们在同他们完全陌生的人交谈，这在过去从未有过。

在南特，布里特尼的郊外，普里苏尼克大型减价商场被女售货员占领了，女孩们晚上就睡在经理室的安乐椅上。城里没有汽油；管理城市的罢工委员会把惟一的油泵留给医生使用。附近的合作社与当地农民一起，为城市提供便宜的面包和蔬菜，并为三口人以下的家庭免费供应牛奶。学生和罢工工人结队去农场帮助采摘土豆。教师则为罢工者的孩子设立了公共托儿所。

机器沉默了，在工厂的庭院中听不见它们的轰鸣，能听见的只有孩子们在阳光下嬉戏的声音。在标志着占领工厂的红旗和手绘标语下，男男女女随便坐着，不停地掰面包、吸烟、谈话。

在被占领的巴黎雪铁龙汽车厂门外，人们吊挂着民愤极大的安全局头目的傀儡像。工厂里设立了公共食堂，供应免费伙食。艺术家、音乐家和剧团都到工厂进行演出。占厂的工人坐在阳光下，在香烟缭绕中和外面来的人畅谈工厂及工厂的管理状况。一股浓烟从附近的垃圾站飘来，那是一支部队在奉命焚烧无人清理的垃圾。

资本主义的不满

在《黑侏儒》第二期上（6月1日在伦敦出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伯斯鲍姆³（Eric Hobsbawm）撰文写道：

“学生们起来造反，表达对给他们各种奖学金的社会的的社会的的不满；工人通过自发的行动来表明，他们的生活不仅是要靠加班费才能获得到巴勒马度假的‘权利’；这不仅仅是法国的现状，其亦将成为国际现象。

“我们知道——尽管政客们还未能意识到——人民对现状不满。他们感到，在消费者社会中，他们的生活毫无意义。即

使他们物质上感到惬意（其中许多人并不能如此），却比以前失去了更多的权利：被大公司任意驱使，失去人的尊严，成了机器一样的东西。

“他们知道，代表他们的官方机制——如选举、政党等——已逐渐变成流于形式的仪式机构。他们不喜欢这些，但又不知如何改变；不过，他们现在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做点什么来改变它。法国的形势证明：若有人向群众证实他们不是毫无权利的，他们便开始重新行动起来。或许，甚至可以这样说，只有无能的感觉才限制了我们许多人像男子汉而不是傻瓜那样行动起来。”

有的士兵还在军营里组织起来支持工人占厂。他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现在是举国团结一致的时候了。他们的传单上写道：

“士兵们，

“全国人民正起身反抗造成失业和匮乏的反人民的戴高乐政权。

“学生们正在街上和安全警察进行搏斗，工人们在占领工厂，农村的穷苦农民在反抗把他们驱逐出土地的垄断农场主。

“士兵们，

“你们是人民的儿子；你们的立场在工人、农民和学生这一边。

“政府希望你们像安全警察那样成为镇压人民的力量。

“他们在利用你们（却没有任何报酬）破坏公交系统的罢工。

“他们把你们关在军营里，为的是让你们脱离人民。

“你们是人民的儿子，你们永远站在人民一边。

“政府想利用你们镇压人民的反抗。

“你们必须抵制他们。

“组合起来。

“拒绝镇压人民。

“让我们一起来反抗这个压迫人民和制造匮乏的政府。

“签名：万塞纳士兵委员会。”

2日

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 只留给工人阶级

这是贝尔格莱德一个夏日的夜晚：燕子在宽阔的林阴道上空盘旋，街道两旁的咖啡馆里座无虚席。但在市郊以“新贝尔格莱德”著称的新建的大学城里，学生们却显得躁动不安。一个流行剧团即将演出，学生们本来提出，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观看，演出场地应该设在大学城的露天大剧院。

令人尊敬的人

“过去十年中发生的国际危机，比起现在危及许多国家内部稳定的政治裂痕来说要显得温和得多。法国已处于内战的边缘。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城市火光闪闪，黑人对于美国政府不能兑现诺言以解决他们的困境而感到愤怒，最后诉诸暴力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在西德，学生走上了大街，与联邦议院对峙，他们对政治上垂死挣扎、民主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制度充满了蔑视和排斥。就像越南格罗斯维纳（Grosvenor Square）广场上的游行一样，这次游行最后亦演变成了暴力行动。

“世界各地‘令人尊敬的’市民们要

么感到迷茫，要么焦灼不安，要么惊恐不已，要么怒不可遏——或者更多地，这四种心情兼而有之。‘令人尊敬的’这个词在这种语境下得加上引号，因为这些承认或默许他们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的人——他们的品性和个性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正是这些体面而有实力的平民，才会要求对学生采取严厉措施；他们憎恨的逻辑是，学生中有一位‘长头发的左倾主义者’。在英国，持这种观点者大有人在，伊诺奇·波维尔（Enoch Powell）煽动性的种族主义思想中就充满了对有色人种的固执与偏见……

“我们似乎生活在几个历史阶段交叉的时期。从真正意义上讲，苏联革命未能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只是从物质

但结果是，当局把观看演出的特权只给了执政党的年轻后备军——在附近参加夏令营的共青团员，并把演出定在一家小剧院。

政党精英的特权早已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去年夏天，学生们就曾冒着政治风险上演过一出政治讽刺剧《只留给工人阶级》。

一群愤怒的学生在演出开始时试图冲进剧场，但是被警察扔了出来。消息传开，一千多名学生聚集在剧场门外的街道上。他们都在电视里看过巴黎郊区南代尔大学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潮，现在，他们热血沸腾。

几分钟后，学生开始破坏剧院，他们把这座建筑本身看作特权的标志。剧院的门被推倒了，窗户被打碎了，当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连消防车也被掀翻在地并着了火。

警察向人群发起冲锋，学生们把汽车翻过来当作屏障抵挡警察，并投掷石

上为生存创造了一个社会化基础；而‘天下为公’的人类目标远未实现。而另一方面，战后资本主义在道义上让许多人感到恶心——不管这些人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不仅侵占了其国家内部广大无权阶层的利益，并且还损害了现在称之为‘第三世界’或‘欠发达国家’的利益。

“‘令人尊敬的平民’是该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真正标准了，而非以前所珍视的幻想的标准……他生活得相对舒心、无忧无虑，而世界上大部分人生活在受压迫和痛苦之中。他投票赞成他所在社会的体制，因为它能给他所需，但它却不能让他理解到这一点：即使所得的利益没有肮脏的成分，他得到的也只不过是极微小的一部分而已。要是出了什么差

错，他就会寻求替罪羊——黑人首当其冲，或者是犹太人，左派分子，甚至是下属——来发泄怒火，让他们来承担遭受的挫折。他会利用一切事物来赚钱，任何人的钱他都赚，只要有会，他会用最野蛮的破坏方式来赚钱。不管是生产还是消费，他都显得任意、无度。他建造了许多丑陋的城市，内部充斥着腐臭的气息和永不满足的欲望——可怜的治疗剂、掠夺的土地、微小的权力……

“这就是令人尊敬的人。”

作者：大卫·默尔瑟 (David Mercer) 《黑侏儒》1968年6月1日刊

克利斯多夫·朗格
(Christopher Logue) 写了一首
题为《黑侏儒》的海报诗，
号召被压迫者认清形势：

“认清你的敌人

他不关心你是什么肤
色

只要你为他工作；

他不关心你的工资

只要你能为他带来更
多利润；

他不关心谁住在顶楼
狭窄的阁楼里

只要他拥有这栋建
筑；

他允许你说任何反对
他的话

只要你不做反对他的
事；

他歌颂人道

却认为机器比人更值
钱；

与他谈判他会嘲笑你
和毒打你；

向他挑战

他会大开杀戒；

他会在失去他所拥有
的一切之前

摧毁这个世界。”

Know thy enemy.
He does not care what colour you
provided you work for him;
he does not care how much you earn;
provided you earn more for him;
he does not care who lives in the room
provided he owns the building;
he will let you say whatever you like
provided you do not act against him;
he sings the praises of humanity
but knows machines cost more than men;
bargain with him he laughs and beats you
challenge him
and he kills;
sooner than lose the things he owns
he will destroy the world.

KNOW



MY ENEMY

块进行反击。学生们撤到大学里，通宵开会商讨下一步的对策。第二天早晨，4000名学生聚集到10公里外的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去游行。半路上，他们遇到了从塞尔维亚各地召集来的数千名警察，就像敌人那样挡住他们的去路。警察开火了，在随后的激烈打斗中，大约有七十人受伤。

当天下午，一万多名学生在新贝尔格莱德举行集会，决定采取进一步的抗议活动。他们占领了哲学社会学系，在楼房正面贴满了海报和手绘的旗帜，上面写着“明天将不再有昨天出卖过我们的人！”和“打倒红色资本家！”

学生们在街道上和咖啡馆里散发传单，内容如下：

“我们的要求是：

1. 尽快解决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就业问题，现在有的大学生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国外去找工作。
2. 缓解南斯拉夫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3. 建立真正的民主和自治政体。
4. 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5. 警察局长辞职。
6. 贝尔格莱德所有报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主管辞职，因为他们对6月2日的事件故意进行了歪曲报道。”

头戴钢盔的防暴警察拥上贝尔格莱德街头，他们奉命制止任何游行。与此同时，南共领导人四处活动，以防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事实上，许多学生本身就是工人，只是暂时离开工厂和车间去读书。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贝尔格莱德的学生运动特别具有暴力倾向。

第二天，部分教授来到被占领的学院，帮助学生起草了《行动纲领》和致南斯拉夫工人的一封公开信，信的开头写道：

“我们并不是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斗争。我们对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巨大差异感到义愤。我们不想让工人阶级成为‘改革’的牺牲品。我们支持自治，反对增加那些寄生于工人阶级又控制工人阶级的人。”

危机开始升级。所有的报纸都叫嚣着要对占领学校的学生采取强硬立场。警察包围了学院并切断了所有入口。6月9日，铁托总统宣布要在第二天对全国发表讲话。

铁托的介入让每个人都吃了一惊。在1968年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中，他是惟一对学生们活跃的批评表示欢迎的：

“这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是一个挑战，将促使我们把我们的宗旨付诸于实践。是的，学生们中间有个别极端分子。是的，他们使用暴力是不对的。但他们的政治觉悟本身并没有错。恰恰相反，这种觉悟是我们自治的新型社会主义关系的产物。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应努力实践学生们的《行动纲领》。

“我发誓，如果学生们的纲领不能得到贯彻，我将辞去总统职务。”

学生们从校园里蜂拥而出，兴高采烈地在贝尔格莱德的街道上游行，他们欢呼着，大笑着，载歌载舞。头戴钢盔的警察奇迹般地蒸发了。

在铁托的干预下，示威活动被平息了。只有哲学系仍被占领，那儿的学生继续探讨如何对社会整体进行根本的批判。最后警察关闭了这所学院，而暑假的到来又使学生们各自散开。

与此同时，社会学系的学生们走上街头进行采访，试图确定6月的学潮对南斯拉夫各个阶层具有怎样的意义。

一群工人从一家轮胎厂走出来，他们被问及是否在学潮开始后和学生有过交流。

“我们当然有过。我们在下班后去看他们，确定我们不是记者之后他们就放我们进去。他们想知道所谓的自治体制实际上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就告诉他们，只有厂长和他的朋友们在对工厂实行‘自治’，除此之外，工人协商会议无聊得要命，要是没人强迫我们才懒得去呢。我们对学生讲，他们已证明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有的工人都承认这一点。我们还告诉他们，要改变现在的这帮领导人是徒劳的。”

“他们怎么回答的？”

“他们举双手赞同！”

在贝尔格莱德郊外的一个露天大市场里，负责采访的学生见到一位卖西红柿和桃子的农妇，于是请她谈谈对学生游行的看法。

“我真不明白这帮城里孩子想干什么，但是天知道，即使这帮孩子不到街上去打砸抢，我的生活已经够糟了。孩子们再这样闹下去的话会被当场枪毙的。警察还会敲开他们的门并把他们杀死在家里或学校里。孩子们最好能够安于现状，因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另一个卖活鸡的人在被问到是否看过号召学生、农民、工人团结起来的海报时，他如是说：

“是的，我在公园旁边那座学校大楼上看到过一张这样的海报，但我对这类

东西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想要的东西就是权力，如果哪天他们得到了权力，他们就会与其他当权者没有什么区别。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农村孩子参加了共产党，革命之后当上了共产党的官。不管怎么说吧，他最后还念了大学，在山上买了别墅，拥有精美的家具、豪华的轿车和一处避暑用的海滨别墅。终于有一天，他回到他出生的村子看望年迈的母亲。听儿子海阔天空地吹嘘了一番后，这位老母亲说：‘孩子，你干得可真不赖：住着装潢精美的大房子，坐着黑色豪华轿车，甚至还有一栋海滨度假别墅……可是，儿子呀，万一共产党来把这些财产都夺走，你该如何是好？’”

6日 美国 又一个被谋杀的肯尼迪

在民主党的基层选举中，罗伯特·肯尼迪像一匹黑马脱颖而出。这位年轻、迷人的候选人大声疾呼反对贫困、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无休止的战争。他带着一连串辉煌的胜利来到加州，又在洛山矶赢得了53%的选票。看来美国人有望在11月选出一位具有十字军精神的自由战士作为他们的总统。

在大使宾馆的舞厅里，记者们正等待采访刚作完胜利演说的肯尼迪。肯尼迪在穿过餐厅时停下来和服务人员握手，厨师和侍者们簇拥着他。作为一名对美国黑人悲惨命运念念不忘的白人政治家，他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也经常被黑人们这样围住不放。

这时，一个24岁的巴勒斯坦人斯万·比沙拉·斯万走上前来，把一串子弹射进了这位总统候选人的身体。

犹如晴天霹雳，196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下两个选择：民主党呆滞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⁴（Humphrey, Hubert）和共和党的里查德·米尔毫斯·尼克松。在充满反叛精神的年轻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看来，这更证明了他们愤世嫉俗的观点：美国的政治体制彻底崩溃了。

6-13日 法国 所有优秀的共产党员，来帮帮第五共和国吧

戴高乐背弃了要举行全民公决的承诺，而是定于6月23日展开大选。

现在开始有人努力让工人复工。总工会领袖乔治·舍基成了“复工运动”的领导人，他在国内四处奔走，到一个又一个被占领的工厂参加会议，用恐吓、



上面左图：在民主党集会上成功地发表了演说之后仅仅几分钟，鲍比·肯尼迪就被枪杀了——这不仅结束了他的生命，也扼杀了民主党在1968年大选中获胜的机会。

上面右图：6月9日，美国的穷人在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馆门前举行游行。

哀求、胁迫等种种手段劝地方工会领导人结束罢工。

总工会的另一个领导人安德列·巴热奈（Barjonet, Andre）则辞职表示抗议，他在讲话中说：

“多年以来，总工会总是不失时机地向工人们宣传，我们一定要清除戴高乐主义，向社会主义迈进。多年以来，我们从未掩饰这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总工会的目的不仅是要保护你们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消除戴高乐政府独裁的权力。

“然而，当时机成熟时，乔治·舍基却站出来发表讲话说，总工会除了那些



上图：一名总工会领导人号召雪铁龙工厂的罢工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下图：五月的回响：为了抗议警察溺死一名逃跑的学生，戴着头盔的学生们占领了索邦神学院并同进攻的防暴警察对抗。

日常要求以外，没有更高的目标。”

防暴警察被派到坐落在巴黎附近的弗林（Flins）的热诺汽车厂，他们要占领这家工厂并驱逐此处的罢工工人。接下来是一整天的追打。在法国东部梭雀斯（Sochaux）的宝龙汽车厂的一次工人大会上，占微弱多数的人支持和响应复工的号召，这次会议导致了该厂工人队伍的分裂。由于害怕激进的工人重新占领工厂，宝龙厂的管理部门叫来了警察。

第二天，罢工工人组织了纠察队，准备劝阻上早班的复工工人。防暴警察则用大棒和催泪弹冲开了工厂的大门，13名工人受伤，一名24岁的工人莫贝劳（Beylot, M.）被警察开枪打死。下午，准备上第二班的全体工人又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当地居民围在工厂门口，对警察起哄和冷嘲热讽。次日，整个法国举行了1小时总罢工，对警察的镇压表示抗议。

与此同时，在靠近法国首都心脏的圣米歇尔大街，警察与学生之间的冲突还在继续。

政府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所有在5月份参加过游行的非法国籍公民将被驱逐出境。5月的学潮已经有了专门的名字：“五月风暴”。为抗议政府的声明，所有参加过“五月风暴”的团体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游行，包括托派（由托洛茨基主义者⁵组成）、毛派（由毛泽东主义者组成）、“3·22运动”派等等。第二天，政府取缔了这些团体，并宣布大选结束之前的所有游行活动为非法。

11日

日本，北九州

血洒铁轨

日本铁路工人请求九州大学和北九州大学的全学联成员帮他们拦住一列从北九州开往山田美军军火库的货车，列车上满载着将用于越南战争的弹药。学生和工人举着旗帜在北九州火车站外集合，然后冲到铁轨上，在火车的必经之路上坐下来迫使火车停车。有的抗议者进入火车的机车里，向司机和他的助手解释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九个小时之后，日本的防暴警察终于把抗议群众从铁轨上驱逐干净，把一火车杀人武器运往目的地：越南的村庄。

20日

英国，戴根纳姆

同工同酬

福特汽车公司的戴根纳姆（Dagenham）工厂坐落在伦敦东郊。现在这里

的女缝纫机工正商量着要举行罢工。女工受到不平等待遇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英国妇女赢得选举权已经50年了，然而媒体仍充斥着妇女的总体状况是否真的有所改善的讨论。

福特公司对工人实行彻底的两性隔离。男工人在流水线上从事与金属打交道的工作，按等级拿薪水：他们根据技术熟练程度被划分为五个等级，从最低一等的熟练工人到最高一等的高度熟练工程师。女工在食堂和缝纫机车间工作。她们不分等级，她们的工作被认为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她们同属于一个比最低等级的男工人还要低的等级；她们仅仅是女工而已。

“这不是钱的问题，”罗茜·波兰德说。她是福特公司罢工女工里最坚决的人之一。“这是能否得到社会认可的问题。”

缝纫女工的任务是为汽车座椅安装坐垫。她们的工作繁琐而精细，要求心细手巧，而且长时间工作会损伤眼睛和背部肌肉。女工认为她们的工作属于不折不扣的技术活。然而她们比那些负责清洁工作的毛头小伙子挣得还少。

她们的罢工使整个工厂的生产陷于停滞。福特工厂的女工激进、勇敢、敢

福特戴根纳姆 (Dagenham) 汽车厂的罢工女工正向新闻媒体讲述她们对于这次争端的想法。



于讲话，她们到电视台去据理力争。工人队伍里的男性成员对她们的敌意多过支持，但她们的丈夫支持她们。

“他们在周末也会帮着操持家务，”罗茜·波兰德（Rosie Boland）说，“因此我们和北方的妇女处境不同。她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完全被她们盛气凌人的丈夫压倒，永远没有自己的权利。”

罢工最后以妥协告终，条件是由工会领导和雇主谈妥的，而他们都是男性。女工并不是很满意，但她们很高兴能捍卫自己的立场。这是全国范围内为争取男女同酬进行斗争的开始：是妇女获得社会认可的第一步。

戴根纳姆女工罢工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次年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的争取同工同酬的集会就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集会那天是一个星期日的午后，天下着大雨，第一批创立的妇女解放团体组织了这次集会。工党国会议员奥德瑞·怀兹在集会上发表了演讲。她事后回忆说：

“讨论自然是围绕着同工同酬展开，但和探讨其他与妇女有关的事情一样，话题不仅仅停留在工资问题上，在各种问题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我能想像这些妇女在家里所说的话：‘我要去伦敦参加集会，但我拿什么做盘缠呢？我走了谁来做饭和照顾孩子？’而换作是一个男人，他只要说一句：‘我要去参加游行了。’我从讲台向下望去，看见几千名妇女撑着雨伞在听演讲。她们如饥似渴地倾听着每一个字。我不禁想到，在那个星期天该有多少家庭没人做晚餐。”

22日

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 对不发达的记忆

一部由托玛斯·葛堤埃雷·阿里（Alea, Tomas Gutierrez）执导的古巴电影《对不发达的记忆》在卡罗维·发利（卡尔斯巴德，Karlsbad）电影节举行了首映式。这部新片立即引起了轰动。影片的主人公，一个“厌恶政治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财产被革命政府国有化了的古巴地主。他的妻子逃到了迈阿密，但他却决定留在古巴。“我知道那里会发生什么事，却不知道这里将来会怎样。”

贯穿整个影片的是主人公过去生活——也是古巴昔日岁月——的片断，这些片断作为记忆频频出现。导演运用紧凑的摄影技术，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特别能够表达意义的人物面部表情上。阿里在片中采用了很多特写镜头，其中有的镜头摄影机极度靠近人物，以至于人物形象成为颗粒状，甚至成为斑点，

仿佛流露出一种深入肌肤的欲望。影片中，关于古巴历史的意识成分与无意识成分彼此混杂，通过主人公变换的回想表现出来。

25日 瑞典，索尔纳 悲观的前景

当瑞典制片人英格玛·伯格曼⁶（Bergman, Ingmar）被问及他的政治态度时，他回答说：“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世界已处在崩溃的边缘。我们的政治体制极度地折衷调和，不会再有什么作为。我们的社会行为方式——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已被证明是彻底的失败。可悲的是，我们既不能，也不愿，更没有力量去改弦更张。现在革命已经太迟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已不再相信革命具有积极意义。这个世界即将成为一个虫豸的世界——总有一天，极端自我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会导致这样一个世界。除此之外，我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社会民主人士。”

26日 捷克斯洛伐克 两千字宣言

9月9日将召开一次特别国会，现在所有党组织内部都在进行国会代表的地方选举。杜布契克和他的同志们开始到全国各地的党务会议上作巡回演讲，呼吁人们支持他们进行基础改革的“行动方案”。

这次国会至关重要。它将选举出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

与此同时，6月初开始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演习的“华沙条约组织”军队，仍没有结束其军事行动的迹象。在乡间发现装甲部队的传闻像阴霾一样笼罩着这个夏季。

一份由70名捷克斯洛伐克的头面人物联名签署的宣言，发表在四家不同的报纸上。政府言辞温和地否认了这份宣言——但是布拉格广播电台报道说该宣言受到广泛支持。宣言的题目就是《两千字宣言》，它在最后写道：

“最近人们有一种恐惧：害怕民主化的进程已经停止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最近发生了很多令人担忧的事件，使人们感到疲惫和厌倦；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身处高位的人爆出惊人的内幕并辞去职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那种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大胆文字来编织动人言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然而，各种势力的争斗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显得不那么明显了。现在的斗争更具有实质意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法治，是要采取更为切实的步骤。在死气沉沉的表象之下，一场非常艰苦的斗争正在展开。

“近期最大的担忧是国外势力可能会干涉我们的内政。面对这些强大的势力，我们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体面地保持克制而不去挑起任何事端。我们可以向政府保证，只要它正确行使我们赋予它的权力，它就能得到我们的支持，如果有必要，我们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我们还向我们的盟国保证，我们将遵守关于友好、联盟和贸易的条约。

“在今年春天，就像那场伟大的战争刚刚结束时一样，我们又获得了一次巨大的机遇。我们再一次拥有了掌握我们自己命运的机会。不管这一事业的实际目的何在，我们仍称之为社会主义，并赋予它与我们以前的自信和令清誉更加名副其实的形式。今年的春季已经结束，时光不会倒流。等冬天到来的时候，一切都会明了。”

〔注 释〕

1 铁托 (Tito, 1892—1980)，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主席，原名 Josip Broz，曾领导游击队抗击法西斯侵略者，解放后任联邦政府总理，在国际上倡导不结盟运动。

2 米洛万·吉拉斯 (Milovan Djilas, 1911—)，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委员，国民议会议长，1954年被撤消南共联盟内外的一切职务，后被开除出南共联盟，并曾两次被判刑入狱。

3 埃利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英国著名左翼历史学家，代表作有《资本的年代》、《革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民族与民族主义》等。

4 休伯特·汉弗莱 (Hubert Humphrey, 1911—1978)，美国副总统，参议院自由派领袖，提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及“民权法”，支持越南战争，1968年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竞选，败给尼克松。

5 托洛茨基主义者，又称为托派分子。托洛茨基 (Leon Trotsky, 1879—1940)，苏联托洛茨基集团领袖，十月革命后历任外交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后被开除出党，逐出苏联，组成“第四国际”，在墨西哥被暗杀，著有《不断革命》。

6 英格玛·伯格曼 (Ingmar Bergman, 1918—)，瑞典电影导演，其影片均系自编自导，通过人际及人与上帝的关系，探讨伦理道德问题，代表作有三部曲《朦胧地透过玻璃》、《冬之光》和《沉默》。





1968

年

7月

“说‘不’需要勇气”。

1968年夏，加利福尼亚伯克利 (Berkeley)，国民警卫队与示威者对峙。

尽管人们对美国历史普遍存有错误理解，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充斥着暴力和战斗精神的历史。然而，美国不同政见之间的斗争通常是在经济领域。美国工人阶级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为改善工作条件和保障权利而进行斗争的历史，直到今天仍无人企及。而资本家私人雇佣的武装分子和政府豢养的军警对美国工人使用暴力的强度也同样无出其右者。



山姆大叔已经受不了。一幅要求美国政府退出越战的海报。

但是在西方世界里，惟独美国的工人阶级，尽管其战斗性很强，却没能缔造出一个政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历史已证明，美国的社会民主只是个胎死腹中的婴儿。持不同政见者或许声音响亮、言辞激烈，却仅仅局限于极少数知识分子和有政治觉悟的工人活动家。罗斯福的“新政”曾使他们的人数在二战期间成倍增长。但随着冷战铁幕的降临，美国国内滋生出一股煽动性的政治势力——麦卡锡主义，其目的就是要根除美国文化和学术生活中的激进思想和不同政见。

那些被强迫到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¹ (McCarthy, Senator Joseph) 的非美活动委员会接受质询的人，都被事先认定为有罪，他们为证明自己的清白，不得不指证“共产主义的同情者”。结果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美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付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被扼杀的惨痛代价。美国从来没有正式限制过表达不同政见的自由，但是，只有那些愿意研究“无争议问题”的人才有可能获得出版权、研究许可和政府津贴。因此在60年代初期，你完全有可能获得一笔丰厚的资助去采访迈阿密的古巴流亡者以“了解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的真实状况”，但是如果你想去古巴研究革命政府的普及教育和大众健康计划，你就不可能得到任何支持。中央情报局在世界范围内对个人和杂志提供秘密津贴以帮助他们从事“安全研究”。

这种病态的状况变得越来越普遍，以至于参议员富尔布莱特² (Fulbright, Senator James William) 公开声明，美国的领导集团认为有些外交政策的真相是“不能明说的”。所有这一切在1967年至1968年期间发生了改变，导致变化的直接原因是美国越战的失败。从印度支那半岛吹来的解放风暴驱散了冷战的迷雾。

学生们最先呼吸到这股新鲜的空气，他们在美国各大城市的街道上向政府



烧掉征兵证——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有力象征。

发出挑战。然而在当权者的眼中，还有比这更令人担忧得多的状况，即使在美国历史上它也是前所未有：越南战场上的美国士兵开始说“不”。

美国大兵的反战运动使五角大楼和白宫深感戒惧。这些人不是奶油小生、纨绔子弟，而是真正的士兵。他们中很多人都在战场上受过伤，一些重要的领导人还是因为在战场上勇气可嘉而获得过最高荣誉的战争英雄。军方企图通过监禁和军事法庭来镇压士兵的运动，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士兵的反战运动迅速壮大，上过战场的老兵们利用1968年全年的时间来筹划1969年的华盛顿大游行。数千名老兵参加了这次游行，他们穿着制服，坐着轮椅，告诉政府他们不愿成为杀人的团体。士兵们站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高

唱着：“胡、胡、胡志明，民族解放阵线³必胜。”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光彩的时刻，那些躲在五角大楼安全屏障后面观看的人都露出中风般惊恐的表情，这更让他们激动不已。在这样的地方举行如此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这在任何国家都算得上是一个壮举；而在意识形态事关全局的美国，这更是不可想像的。持不同政见的士兵激起的浪潮，席卷了美国在西欧的军事基地，很多士兵开小差甚至逃离营地。瑞典在奥勒夫·帕尔麦⁴（Olof Palme）的领导下公开表示反战。瑞典人举着火把去美国大使馆门前游行，帕尔麦本人就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瑞典还向美国逃兵提供政治避难的权利。白宫怒火冲天、厉声斥责，但又无能为力。历史学家们低估了美国士兵抵制越战的力量，事实上他们在结束战争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日

瑞典 逃避兵役

盛夏时节，在欧洲随处可见美国青年的身影，这些年轻人带着他们的音乐、他们的烟草、他们的激情和他们对越战的憎恨来到欧洲。随着他们的脚步，乡村乔（Country Joe）、吉米·汉崔克斯（Jimi Hendrix）、杰斐逊飞机（Jefferson Airplane）等著名乐队的音乐也跨过佛罗伦萨的阿尔诺河（Arno）和巴黎的塞纳河（Seine）进入欧洲，人们到处在谈论征兵和逃避服役的问题。

美国军队中的逃兵越来越多，甚至还有报道称，有的美国士兵站在敌方——民族解放阵线一边战斗并最终阵亡。

21岁的黑人士兵特里·惠特摩尔（Whitmore, Terry）曾因作战勇敢获得紫心勋章和铜星奖章，但在日本的医院里养伤时当了逃兵。他与日本平连（Beheiren）的反战组织取得联系，该组织藏匿了他并把他偷渡到斯德哥尔摩。

“我所在的部队主要由18到21岁的年轻人组成。我们的指挥官因为在战斗中失去了兄弟而立志复仇。在他到来之后的两个星期里，这伙年轻人变成了一群杀红了眼的野兽。我们没有时间思考，因为每天都充满了血腥的战斗，而夜里又会漫天发射火箭和导弹，要把我们两边的敌人都找出来。

“接下来发生了贡甸（Con Thien）战役。在那段时间里，贡甸成了最让美国海军陆战队惧怕的地方，陆战队员们通常管它叫‘被上帝抛弃的山头’。

“我们的连队当时在执行巡逻任务，结果碰到了北越的大部队。我所在的排遭到伏击，与连队的联系被切断了。除了我和另一个人之外，其他的人都中弹

倒地。我听到我们的指挥官在喊我的名字，于是在没有遮蔽的情况下冲到他身边，完全没顾及到周围的危险。当时我清楚地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之内，他们可以轻松地干掉我，但他们没有。为什么？

“我费了好大劲终于把指挥官挪到安全的地方，但耳朵里又传来倒在地上的其他人的哭喊和求救声。我和三个战友正站在一个伤员身边，敌人又一阵猛烈的炮火向我们袭来。我又一次处于敌人有效射程之内。我身边的三个人都被击中，三个都是白人。只有我，只有我没有中弹。为什么？

“但当时我没时间多想；我还得把其他伤员搬到安全的地方。一个战友帮我背起一个重伤员，我们跑了5英尺远，结果这个战友也中弹倒地。我再一次逃过了子弹。为什么？

“我还是没有思前想后的时间，因为其余伤员的呼救声越来越大。我又回到战场，还剩下6个人要救。敌人把他们完全压制住了。我和我的伙伴们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吸引敌人的火力，其他人趁着这个机会冲出去。这时，一枚迫击炮弹落在我身边不到4英尺的地方，冲击波把我掀起来重重地摔在石头上。我不能动了。尽管我和另一个伤员还倒在战场上，美国的战斗机却奉命开始轰炸。大约45分钟后，飞机把威力强大的航空炸弹投掷在距我们不足30码的地方。

“我一边躺在地上祈祷一边对自己说，如果我能活着出去的话，我再也不会回到战场上来。感谢上帝，我真的活下来了。三四个小时之后，一个连的士兵赶过来搜索我们。我获救并被送进了医院。

“我在金兰湾的医院里养伤期间，约翰逊总统向我颁发了紫心勋章和铜星奖章以表彰我在战场上的勇敢表现。人们把我当作真正的英雄，但我的内心深处仍然存有一串大大的问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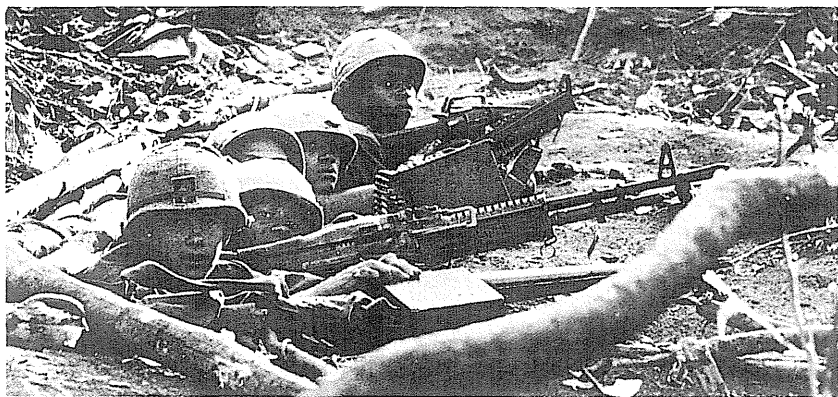
“为什么敌人有那么多次机会却没有向我射击？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击倒了我的战友却放过了我？难道是因为他们知道黑人和他们一样命运悲惨？他们知道我是被迫与他们作战的吗？他们知道即使我活着回到国内也还得同其他势力



在南越的美军士兵要靠精巧的水烟筒才能逃避战争的疯狂。



有些人逃了：
“无畏”号航母的逃兵在到瑞典寻求政治避难后学习瑞典语。瑞典政府反对美国在越南驻兵。



有些人则没逃
第173空降师的士兵在争夺875高地的漫长过程中艰苦作战。

进行战斗吗？

“我的美国战友们：

“你们当中某些人可能会认为我是个懦夫或是个信仰什么‘主义’的人。然而我既不是什么‘主义者’也不是懦夫。要够胆量、要有种才可以说不。我要大声说：‘不！’我上过一次战场而且必须当逃兵才能不再回去。听我说，我的伙伴们，我知道战场是什么样子。战争就是地狱。

“你们可以扪心自问，我们以什么名义去参战？越南问题是南北之间的国内问题。在我们自己家里出问题的时候（南北战争）越南并没有干涉，因为那与他们无关。同样，越南的家务事也和我们没有关系。如果你的朋友和他的兄弟吵架，你会掺和进去和他们打吗？我绝不会，只有疯子才会那么做。

“你们中间或许有人与这场战争无关。但我知道你会有参战的亲朋好友，他们现在也许正倒在某个土坑之中，或是在呼喊救命。他离得太远，你帮不上什

么忙，但你可以让他回家。我知道凭个人的力量很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但你们能够组织起来帮助在越南战场的同胞，让他们回家。

“对于那些正在战场上作战的人，我建议你们向我和其他数百个跑掉的人学习。记住，参战需要胆量，但说‘不’也要有种才行。任何人都可能有胆量，但只有男人才真正有种。”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 高兴的一天

特拉哥拉夫大街上挤满了欢乐的人群，在与试图阻止他们游行的加利福尼亚州警察进行了六天的暴力冲突之后，他们终于可以宣布自己是这条大街的主人了。

这场冲突开始于6月28日，当时警察向学生及和平示威者发射了催泪弹，试图驱散他们的游行队伍。这次游行的目的是支持两周前被法国当局取缔的左翼组织，声援他们被逮捕的法国同志和美国的政治犯，特别是奥克兰州的黑豹党领导人休伊·牛顿。

人群中中了催泪弹之后四散奔逃，警察挥舞着大棒在后面追逐，并逮捕被他们抓住的人。示威者开始匆忙修筑街垒进行自卫。他们从附近一个建筑工地找来小木块和其他建筑材料向警察投掷，还用上了手边能捡到的各种东西，但他们最终还是被驱散了。

第二天，特拉哥拉夫大街上的游行队伍更加壮大，暴力冲突也变得更为激烈。6月30日，市长华莱士·约翰逊（Johnson, Wallace）和警察局长比尔宣布整个地区实行宵禁，他们则利用这个机会在街上逮捕他们看着不顺眼的人。

于是示威者改变了他们的策略，转而去市政厅请愿，要求市议会准许他们在7月4号独立日那天在特拉哥拉夫大街上集会。7月3日晚上，市议会终于通过了他们举行集会的请求。于是在第二天，嘹亮欢快的音乐从特拉哥拉夫大街上传来，把演讲的声音都给淹没了，人们载歌载舞，用加州人的方式进行庆祝。

10日 美国，圣地亚哥 死亡威胁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学院哲学教授、德高望重的哲学家、70岁的赫伯特·马尔库塞⁵（Marcuse, Herbert）收到了“三K党”的死亡威胁。“三K党”很可能没读过马尔库塞的任何一本著作（《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反革命

与造反》),但他们知道媒体已开始把马尔库塞的学说列入造反学生的思想来源和精神支持。马尔库塞一直把这次死亡威胁当成儿戏,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的电话线莫名其妙地被切断了……

17日 英国,伦敦 《屁股》续集

大野洋子⁶ (Yoko Ono) 的新电影《作品五号》在伦敦公映,这部电影是

谁是赫伯特·马尔库塞?

如果你要阅读传记,
就不要去看传奇,
“某某先生和他的时代”,
而要去寻找这样的传记,
在它的扉页上印着,
“一个反抗自己时代的斗士”。
——尼采:《历史的作用和弊病》

赫伯特·马尔库塞是受到1968年这代学生所尊重的少数几位教授之一。马尔库塞1898年生于柏林,伴着一战后的德国革命风暴长大成人。基尔水兵暴动以后,士兵们开始哗变,各地纷纷成立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

马尔库塞被一个工人阶级的郊外社区选为“柏林士兵委员会”的代表。他参加了很多政治会议,在会上听过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等斯巴达克同盟革命家的报告。

尽管当时还很年轻,可他还是意识到“斯巴达克同盟”成员所表述的那种毫不妥协的激进主义超出了绝大多数德国工人的政治觉悟。当时他已经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认为,在柏林采取1917年彼得格勒革命模式的时机并不成熟,更不要说整个德国了。1919年柏林起义的失败和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的被杀证明了他的判断,但同时也让他感到沮丧和困惑。

作为一个具有伟大独创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马尔库塞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院关系密切。1934年,在希特勒掌权后的第二年,他和同事西奥多·阿多诺(Adorno, Theodor)、麦克斯·霍克海默一起移居美国。从此,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在海外飘荡。

二战期间,马尔库塞先后在“美国战略办公室”、哈佛大学和布兰代斯大学工作。与大多数学术同行不同,学生的反抗使他很激动,但在当时的左翼阵营中,只

《作品四号（屁股）》的续集。

“这部作品在观念上更为前卫，”大野洋子解释说，“在《屁股》里有很多明显的动景，而这部电影则安静得多。”

这部电影的拍摄只用了3分钟，但影片却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它描绘了约翰·列侬（Lennon, John）在花园里的情景。

“我们把它称为我们的微笑电影，因为约翰在电影里一直微笑并时不时地说：‘亲爱的，别担心。’”

有他清醒地认识到，1968年的学潮会导致统治者建立一个极端反动的、报复性的政权。

尽管在法国发生了“五月风暴”，身处美国的马尔库塞仍然对产业工人阶级能否作为一股社会变革力量这个问题深表怀疑。他认为，未来取决于“新生”工人：高薪收入雇员、技师和专家。他对学生提出的变革的必要性表示支持，但同时他也指出，在美国和西欧，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并没有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批评传统的列宁式的做法，并预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和方法已经过时。

作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者，他对其他一些左翼人士持批评态度，这些人总认为“毁灭才是必要的，毁灭以后才能看到结果”，而不是寻找其他可选择的方案。马尔库塞对此提出反驳，他坚持认为：“我们的目标、价值观和品德必须体现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要创造全新的

人——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必须努力成为这样的人。”

下面是他在1968年12月的一次激进的大型集会上的两段讲话，至今仍有一定的意义：

“虚伪的民主进程和保守媒体的半垄断状况（今天，我们可以补充一下，大多数电视节目日益沉默的本质）在多大程度上创造并不断再创造着同样的社会和沉默的大多数，那么，政治教育和准备就必须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传统的自由形式。”

“政治活动和政治教育必须超越讲授和听取，必须超越讨论和写作。左翼必须找到足够的方式来打破政治语言和政治行为中的墨守成规和整齐划一。左翼必须打破腐败政治的语言和行为模式。这就要求寻找不同于常见政治行为的语言和组织行动。”

“我最初是想拍摄一个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在微笑的电影，但后来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让约翰来代表每一个人，并把震撼传播出去。

“我相信500年以后，人们还会观看这部电影并感受到这种震撼。”

日本，成田 对美国的大型军用飞机说“不”

成田，东京城外30英里处的一块平原，有300户人家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耕种水稻。现在，这片田野正受到一个大型国际机场扩建的新计划的威胁——用美国总统的话说，新机场要能起降新式超音速运输机，这种飞机可以运送一支整编的小部队。扩建成田机场是美国扩大在日驻军的一个重要步骤。

成田的农民于是联合了学生和反战人士同这一新计划进行斗争。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一直在抵制机场公司的每一点蚕食，他们不断拆毁公司设置的边界墙，还阻挠土地测量员对这一带进行勘测。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每一次斗争都伴随着同防暴警察的大规模冲突。成田农民和联合支持他们的反战人士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些反战人士都成了成田农民的座上宾。

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土地测量员到成田进行最后一次勘测。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赶来驱散农民。农民则和他们的盟军一起构筑了临时工事抵抗警察。

双方僵持了10个小时，就像一些武士史诗里描写的那样。一边是手拿镰刀和削尖竹棍的瘦削、皮肤粗糙的农民和头缠白布、身穿陋衣、怀有理想主义的年轻支持者。另一边则是盔甲鲜明的警察，他们手持警棍和金属盾牌，随时准备执行他们不在现场的主人——东京和华盛顿的当权者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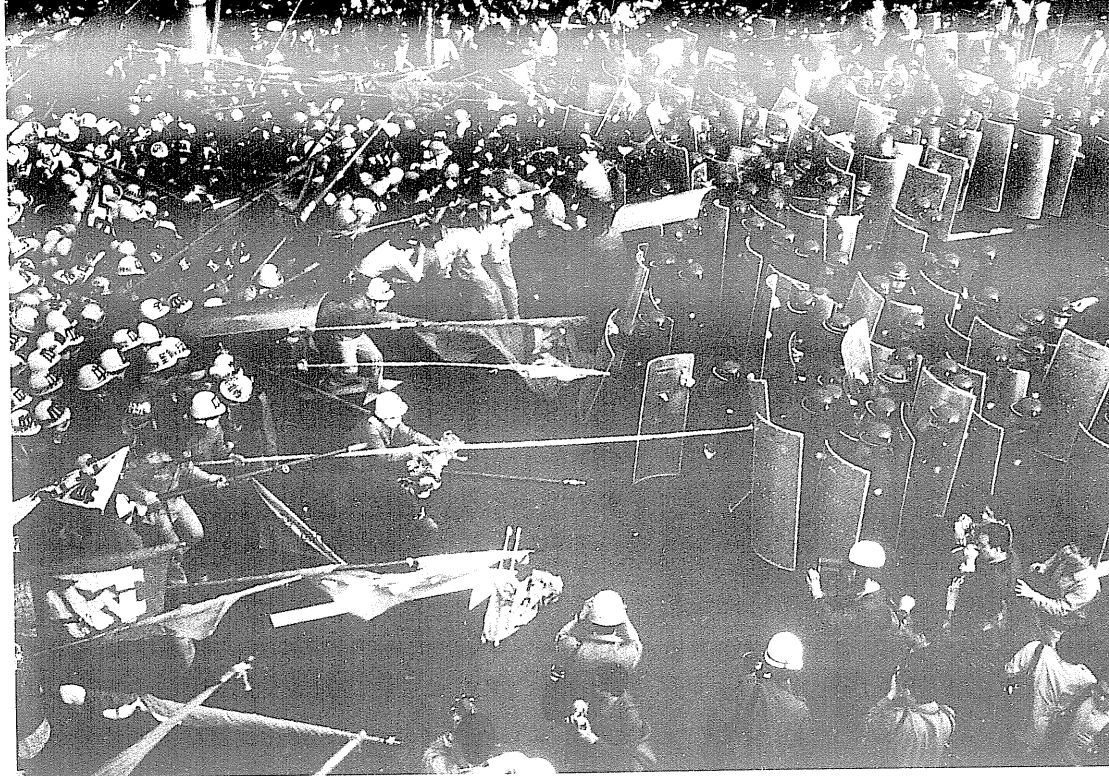
接下来发生了第一场冲突，伴随着尖叫声、呼喊声和“全学联”狂热的、有节奏的口哨声。

第二次冲突更具有决定性。警察经过第三次冲锋攻占了农民的工事，把反抗者驱散到田野里。于是公司的测量员在警察的保护圈里完成了他们最后一次的测量工作。

反抗者们在农民家里又重新聚在一起，他们发誓要把斗争进行下去。

捷克斯洛伐克 华沙来信

华约部队的军事演习在几周前就应该结束了，但有谣言说苏联的军队仍然



示威者和日本防暴警察的冲突持续到1970年。

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外国军队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撤出呢？”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媒体发表了一连串信件和文章后，布拉格的《今日日报》¹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官方为什么不发表明确的报告？含糊和矛盾的信息只会对那些散布骇人听闻消息的人有利。我们国家的公民有权了解真实的情况。”

这个月一天天过去，天气闷热得令人窒息。有传言说，雅库鲍夫斯基元帅（Yakubovsky, Marshal）又回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他命令苏联军队的护卫队只在夜间行军。人们开始认为，苏联的军事存在将会持续至9月9日召开关键性的党员大会的时候。

苏联的官方媒体《真理报》已经给“两千字宣言”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说它煽动捷克斯洛伐克武装脱离华约组织，转而投入西德和北约的怀抱。

苏联外交部长柯西金²（Kosygin）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友好的苏联军队的军事存在并不感到担心，只有捷克的媒体才杞人忧天。”

然而，苏联、东德、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却忧心忡忡地在华沙召开紧



捷克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契克意识到自己背后有人民的支持。

急峰会，讨论“捷克斯洛伐克的紧张形势”。最后他们致函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强硬的语气陈述了他们评议的结果。

信的开头写道：“你们国家所发生的事令我们深感担忧。”

事实上，这封信建议动用安全部队镇压捷克斯洛伐克持不同政见者的领导人，由共产党控制所有的大众传媒并取消新闻出版自由，还建议取缔所有的对立组织和封杀党内的一切反对派。

“我们不能坐视捷克斯洛伐克面临从社会主义阵营中分离出去的危险。这不再仅仅关系到你们一个国家，而是所有通过联盟、合作和友谊联系在一起的和工人党共同关心的问题。

“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曾付出过巨大牺牲和沉重代价，才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赢得了自由和独立，赢得了沿着社会主义的进步道路向前发展的权利。

“社会主义世界的边界延伸到了欧洲中部，推进到易北河和舒马瓦山脉。我们绝不能容忍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胜利和我们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受到威胁。我们也绝不允许帝国主义以和平或暴力的手段从内部或是外部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允许欧洲的力量天平朝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方向倾斜。”

亚历山大·杜布契克通过电视和广播向全国发表讲话。他宣布他将坚守自己的立场。他还呼吁全国人民给予帮助，在大局面前审慎考虑。杜布契克的这番演说表明，他知道挺身而出争取信任的时候到了。

第二天上午，举国上下都在召开临时会议，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个上午几乎停止了运作。工人们聚集在各处商讨对策，最后，他们以压倒性的票数决定支持杜布契克。于是电报、信函和决议像雪片一样飞进了杜布契克的办公室。

布拉格阿尔克龙（Alcron）饭店的30名员工停业召开会议。会议由大堂经理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戴着白色高帽子的厨师，还有锅炉工、客房服务员、侍应生和厨房工作人员。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写信给政府表示支持。信是费了一番心血写成的，每一名员工都在信的末尾认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现在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在召开这样的会议，”一个客房服务员对客人如是说。华沙来信被递交给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里守旧势力仍占大多数。中央委员会必须马上开会讨论如何答复这封信。

杜布契克一直努力阻止中央委员会在9月9日的特别党代会选出新委员之前召开会议。正在各地进行的党代会的代表选举已经显示出改革派获得了大量的支持。

经过一番机智的幕后活动，杜布契克使新选出的党代表中有60人获得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权，并将他们带进了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

结果，新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对华沙来信作了坚定的回答。这个答复首先向邻国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绝不会威胁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或是试图改变欧洲的力量平衡。但是：

“我们国家所有阶级和所有部门的绝大多数人赞成取消新闻审查，要求言论自由。捷克共产党正努力证明自己有能力用臭名昭著的官僚——警察体制以外的方式来领导国家。”

19日 苏联，莫斯科 无法拒绝的邀请

苏联政治局向捷共主席团的所有成员发出邀请，要他们下周到莫斯科商讨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在这种情势下，要让人不猜想他们乘坐的专机会在空中爆炸是不可能的。

杜布契克极力要求各方面人士在此关键时刻不要离开国内。

反之，他邀请苏联政治局到捷克会谈。

与此同时，苏联《真理报》报道说，在西德边境附近发现了美国秘密储备的武器，暗示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正在密谋为“苏德台地区⁹的复仇分子和旧秩序（资本主义秩序）的支持者”提供武装。

26日 捷克斯洛伐克，蒂纳河畔切尔纳 一个团结的民族

商讨危机的地点终于选定了。会谈将在靠近苏联边境的斯洛伐克小镇——蒂纳河畔的切尔纳——举行。

会谈前夕，捷克斯洛伐克媒体 Literarni Listi 刊登了一篇致捷克斯洛伐克



主席团的宣言：

宣言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给你们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值你们即将与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展开会谈。在这次会议上，你们将影响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很多次这种时刻——数百万人的命运要由几个人来决定。现在又到了这样的关头。此时此刻你们当然备感艰辛，我们希望我们的支持能使你们轻松一些。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我们国家的历史是一部受压抑的历史。除了两次短暂的机缘之外，我们一直被迫在不被认可的情况下建国。我们还多次被赶到灾难的边缘。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当1918年的解放带给我们美好的民主生活时，我们两个民族（捷克和斯洛伐克）都为之欢呼雀跃。

这种民主还算不上完整，因为它不能使工人群众获得社会保障。但正是工人阶级在《慕尼黑条约》阴霾笼罩的日子里，仍坚定不移地为维护民主同敌人进行着斗争。我们两个民族曾经热情高涨地欢迎1945年的解放带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但它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没有给工人阶级以创造性自由。我们一直在艰难地寻找这种自由，并在去年1月开始窥见它的门径。

于是我们国家在走过了几个世纪的艰辛道路之后，终于迎来了孕育希望的时刻。现在，我们可以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不仅是欠发达国家的临时选择，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唯一出路。

我们本以为我们的行为一定会赢得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同情。然而我们却被指控为叛贼。我们的同志向我们发来最后通牒，他们每一次表态都进一步证明，他们并不了解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被诬陷为违反了法律，还被怀疑怀有我们其实并不具有的思想。不公正的惩罚一直威胁着我们。如果我们真的遭到惩罚，也就是说我们的判断不幸言中，其结果将不仅是贬低了我们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将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蒙受羞辱。同志们，制止

这一危险是你们的历史责任。你们有责任让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明白，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化最终必然符合全世界所有进步运动的利益。

可以用四个词概括我们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联盟、主权、自由。我们提倡社会主义和联盟是要向我们的朋友保证，我们不会允许任何威胁到我们这些国家真正利益的事情发生。我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一直代表着这些国家的利益，忠实地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我们坚持主权，是为了确保过去几年里出现的失误不再重演。请向你们的谈判伙伴解释，正是因为官僚体制对创造性思想束缚得太久，迫使许多人压抑着他们心底的逆反情绪，才会导致在我们今天的讨论中时常听到过激的声音。请用事实让他们放心，现在在我们的国家里，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地位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要稳固。

告诉他们，如果给我们自由、和平和充足的时间，我们会成为更加自信和可靠的伙伴。‘人民’已不再是停留在纸上的一个概念，而且正如（斯大林所说），人民再次成为创造历史的力量。

同志们，你们可能持有不同的观点。你们中的一部分人尽管积极参加了！

左页图和下图：在与苏联政治局举行至关重要的蒂纳河畔切尔纳会谈前夕，布拉格和布鲁诺的市民纷纷在“宣言”请愿书上签字，表示支持杜布契克的领导。



月份的斗争，但在此之前却因为工作失误受到批评。这是政客的命运，过去七个月的经历证明，你们不会因此受到任何报复。

如果你们让任何个人感情凌驾于你们对国家所肩负的责任之上，那结果将是悲剧性的。不要忘记你们也是祖国的一分子。请用行动和言辞让他们知道我们将坚持自己的道路，而且只要我们活着就没人阻止得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将跟踪你们谈判的每一小时。请务必想着我们在等待你们的消息。你们正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上写下新的一页。请用你们的细心，更要用你们的勇气去书写它。失去这最后的机会将是我们的悲剧。我们信赖你们。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前所未有地紧密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二天上午，从布拉格市的纳罗得尼特里达（Narodni Trida）到纳普里寇普（Na Prikope），人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着购买一份《宣言》并在名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示支持。

头戴便帽、夹着公文包、面色凝重的中年人，穿着平底鞋、上了年纪的妇女，还有年轻人、士兵和家庭主妇等各种各样的人，全都在太阳下耐心地等待着，他们的身上充满反抗精神，对于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坚定不移。

人们在街上竖起几张破旧的桌子，就像是临时的投票站。大家都围拢过来签上自己的名字，有的还把地址写在名字后面。

“我们的代表团被赋予了崇高的信任和权力，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还极少有哪个参加外交谈判的代表团享受过这种殊荣，”代表团成员之一、国民大会主席约瑟夫·斯墨可夫斯基（Smrkoveky, Josef）如是说，“在《宣言》上签名的活动，规模之大几乎相当于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公民投票。整个国家都参与了，极少有人被落下。我们抵达切尔纳的时候，几名来自一个小选区——特兰辛或是兹里纳——的代表递交了他们收集到的所有请愿宣言……这些宣言签署着该选区所有公民的名字，包括那些生病的人——他们探望了这些病人并取得了他们的签名。一共有两万多人签了名，没落下一个人。我们的人民对于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致和觉悟。”

会谈在蒂纳河畔的切尔纳开始了。这真是一个小地方，除了一个火车站和

一条蜿蜒而过的铁路，就只有一条两边是木板房的街道。这个小镇从30年代起就没有过什么发展。小镇向东600码的地方就是国界线，线的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苏联大平原。两列卧铺车载着谈判代表并排停在小镇的火车站内。捷克斯洛伐克的列车停在自己的窄轨铁路上，苏联的火车则停在较宽的轨道上。每天一到晚上，苏联的列车都会退到国界的另一侧，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过夜。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们不知道的是，东德领导人乌尔里希¹⁰（Ulbricht）、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Gomulka）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兹乌可夫（Zhivkov）当时也去了，就待在离边境小镇乌兹哥拉德不远的地方。

谈判的会场设在1号月台旁边的铁路工人俱乐部里。俱乐部为了承办这次会议，用新的窗帘、红地毯和枝形吊灯重新装修过。气温高达华氏80度，会场里云集了双方所有高层领导人：在苏联方面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Kosygin, Andrei）、波德戈尔尼（Podgorny）、苏斯洛夫（Suslov）等人；在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则有杜布契克、斯沃博达（Svoboda）、切尔尼科（Cernik）、斯莫尔科夫斯基（Smrkovsky）等人——而一些捷克领导人如毕拉克（Bilak）、寇尔德（Kolder）、斯乌茨卡（Svestka）等似乎要在会上替苏联说话。

勃列日涅夫在“华沙信函”的基础上重申了苏联政治局的要求：限制舆论自由；取缔政治团体；与华约组织保持完全一致；加强“党的领导”；不召开具有特殊意义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他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落入一伙半法西斯分子手中，站在了背叛华约组织的边缘。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们则努力向他保证，实际情况与他所想像的恰好相反，捷共现在在人民眼中的形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大。

“勃列日涅夫同志，希望您到我们国家来看看，”斯莫尔科夫斯基对他说，“布拉格、奥斯特拉瓦、波尔诺、皮尔森、布拉斯迪拉发，您可以选择任何您想去的地方。我们愿陪您一同前往。您将会看到我们的人民是多么支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联盟。在布拉格有40万人、在伯尔诺（Brno）有10万人参加了‘五一节’的庆祝活动。确实存在极个别由极端分子组成的小团体，人数从五十人至一百人不等，但这是我们过去官僚主义失误的后遗症。你们被误导了，希望能来我们国家亲眼看看。你们在这里只知道一些大惊小怪的流言蜚语，而这些不足以影响我们国家的进程。”

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在捷克边境藏匿的“美国”武器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则出示了由他们的化学实验室提供的证据：对这些枪支的化验结果表明，



在决定捷克共产党命运的紧张峰会上，杜布契克紧盯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拿文件者），标志着他的国家不会被吓倒。

所有枪支的出厂标志都被笨拙地除掉了，而用于腐蚀这些标志的化学药剂则是东德出产的。捷克人甚至还拿出了这些武器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的行军袋的照片，行军袋上莫斯科著名的戈姆（GUM）商场的商标“nommer”清晰可见。

气氛骤然紧张，甚至令人感到窒息。第二天，乌克兰书记舍列斯特（Shelest）提出了一连串罪名，指控捷克人曾企图使跨越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的俄罗斯农奴制帝国从苏联中分裂出去。杜布契克于是站起身来声明，如果会议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将退出会议。

谈判破裂了。杜布契克回到他的卧铺车厢里。他忍受着胃病的折磨，疼得几乎流泪。其他人在月台上徘徊。最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人来到杜布契克的车厢。他们也觉得舍列斯特做得过火了，谈判一定还有进行下去的基础。杜布契克显然无力再撑下去了。两个小时之后，双方达成了某种和解。

谈判在星期三早晨又陷入了停顿。据称，勃列日涅夫同志也胃疼。还有传言说，苏联驻布拉格大使切尔沃南科（Chervonenko）曾企图煽动一些右翼分子于谈判期间在布拉格举行叛乱，而结果是劳而无功，“自己扇了自己的嘴巴”。

还传闻苏联一直与在乌兹哥拉德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商谈——其中东德领导人乌尔里希的态度最为强硬。

双方代表团找时间在切尔纳附近转了转。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们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鼓励，但他们只能报以疲惫而无奈的微笑。

空气中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中午，杜布契克通知他的代表团会谈结束了。谈判最终基于寻常的条件起草了一份联合声明。华约组织的六个核心国家定于周末在布拉迪斯拉发 (Bratislava) 召开会议进一步磋商，届时将签署一份更加正式的宣言。

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苏联领导人很快就会知道捷克斯洛伐克人是否会听命行事。

〔注 释〕

1 约瑟夫·麦卡锡 (Senator Joseph McCarthy, 1908—1957)，美国共和党参议员，20世纪50年代初煽起全国性反共运动，指控有大批共产党人渗入国务院和军队，其卑劣行为受到参议院谴责。

2 富尔布莱特 (Senator James William Fulbright, 1905—)，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富尔布莱特法案，设置富尔布莱特奖学金；曾反对越南战争和美国对外军事介入。

3 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即越共。

4 奥勒夫·帕尔麦 (Olof Palme, 1927—1986)，左翼政治家，瑞典首相，社会民主党主席，还曾任交通大臣及教育文化大臣，在首相任内遇刺身亡。

5 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1898—1979)，美籍德国政治与社会哲学家，批判现代社会的反自然性，主张用革命手段加以改造，被誉为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先知”，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

6 大野洋子 (Yoko Ono)，先锋派电影导演，“披头士”乐队 (Beatles) 代表人物约翰·列侬 (Lennon, John) 的妻子。

7 《今日日报》，Mlada Fronta，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大报。

8 柯西金 (Kosygin, 1904—1980)，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

9 苏德台地区，Sudeten，捷克斯洛伐克北部位于苏德台山脉一带的地区，在二战前夕曾被法西斯德国吞并。

10 乌尔里希 (Ulbricht, 1893—1973)，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曾任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名誉主席等职。





1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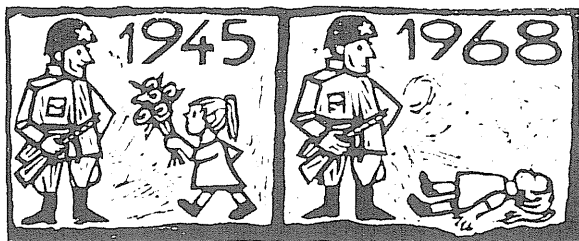
年

8月

“我们不愿跪着苟活。”

社会主义的面孔：杜布契克的支持者们在万塞斯洛斯
(Wenceslaus) 广场游行。

历史一直不曾善待捷克斯洛伐克。捷克的土地曾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下度过了漫长的几个世纪。第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于1918年在奥匈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总统是托马斯·马萨里克¹ (Masaryk, Tomas)，成为当时瑞士东部惟一的民主国家。1938年，这个共和国又由于英国和法国合谋出卖而被德国法西斯摧毁。因此，当苏联红军于1945年开进布拉格的时候，受到了绝大多数市民的热烈欢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纳粹占领之前就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知识分子当中也极具影响力。二战期间，捷共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捷共的受欢迎本来使莫斯科有机会在这里保留有限的民主。



但事实恰恰相反，和东欧其他民族的命运一样，当年满怀热望欢迎苏联红军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也被强加上可憎的斯大林主义的桎梏。

到1948年，这种官僚专政的新政体已经彻底统治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垄断了传媒和政权，政治局只对

莫斯科负责，逆来顺受在各领域、各部门都是最受鼓励的做法。僵化的指令性经济和陈腐的学术空气，促使党内外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探索能够将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民主融合起来的新道路。捷克的共产党人悄悄地研读了安东尼奥·葛兰西 (Gramsci, Antonio) 和罗莎·卢森堡的作品，这两个人都是他们那个时代反正统的思想家。而一些志同道合的党外人士则开始复兴已故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 (Tomas Masaryk) 的社会民主观念。这些思想逐渐传播开来。1967年夏天出现的“作家大会”和秋天的学生运动第一次表明，一个新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在努力挣脱斯大林主义的牢笼。

至1967年年末，党内的改革派已经认识到坚持斯大林路线的老顽固、党的一把手诺沃特尼必须被替换。在他们的鼓励下，官方控制的媒体就国家面临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自由的大讨论。辩论结果在党内党外都是爆炸性的，辩论最终超出了改革派设定的范围。新选出的党的





上图：捷克学生在街上游行，抗议苏联的入侵。

左图：苏联入侵后捷克报刊上的卡通画。

第一书记杜布契克和他的同事在感到担忧的同时更觉得兴奋。他们认为，通过推行经济改革、言论和出版自由、赋予斯洛伐克平等地位和倡导多元化，他们的国家能够缔造出“具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他们还承认了多党制的必要性。

苏联阵营的领导层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变化越来越感到戒惧。捷克人陶醉在大辩论带来的自由空气里，他们的思想在斯大林主义者眼中是绝对的离经叛道：居然要放弃党对权力和言论的垄断。这是最令莫斯科那些老家伙们感到惊恐的。因为如果眼睁睁地看着捷克人取得成功的话，他们就无法再阻止其他国家人民的类似要求。

1968年8月21日，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开始镇压那里“具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历史证明，这是共产主义阵营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杜布契克和他的同志们曾尝试探索“第三条道路”，以期建立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同于斯大林主义集权统治的社会体制。他们的失败，打击了其他有同样抱负的人士的胆量和斗志。直到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Gorbachev, Mikhail) 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共产主义改革派才终于又找到了一位新的领导人，但那时走“第三条”道路的时机却已经错过了。1968年盛行于世界各地的建立后资本主义秩序的风潮，到这时候也烟消云散了。美国在经历了政治、军事的挫败之后重新恢复了元气，于80年代初期大量装备了新式的巡航导弹和潘兴弹道导弹，使冷战又掀起了一个新高潮。不论从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度来讲，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都比20年前强大和专横得多。俄国最终得到的不是民主化和人道化的改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阿尔·卡彭(Al Capone)式的黑手党资本主义。

因此毫不奇怪，西方社会对于苏联入侵布拉格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美国、西德和英国在表示反对的时候都采取了温和的态度，他们似乎乐于看到这场有可能成为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榜样的运动被坚决地镇压下去。西德甚至大张旗鼓地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他们对勃列日涅夫回报以大笔援助和贸易机会，还向东德进一步敞开了大门。

在1968年8月21日之前，“后资本主义”国家所要走的发展道路还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但经过这一天，这些国家的命运就被禁锢在死气沉沉的勃列日涅夫模式之下，高级官僚的特权因此得以继续苟延残喘了几十年，他们的政权也由此彻底失去了民心。

21日

捷克斯洛伐克 谋杀社会主义

8月，酷热的伏天。捷克斯洛伐克紧张而且烦躁不安，希冀着那不会到来的安慰。出于保密的需要，捷共主席团关于切尔纳会谈的报告含混不清，更使人们心里充满疑虑。

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仍在为民主化道路进行艰苦的谈判，苏联关于出版审查的要求是最难达成一致意见的地方。

编辑们被告知：“我们不会退回到过去的审查制度上去，但现在还要进行自我审查。”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不停地给杜布契克打电话。这位苏联领导人想知道捷克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切尔纳达成的协议到现在还得不到执行。

“我们正在努力以民主的方式贯彻这些协议，”杜布契克近乎绝望地回答。主席团成员从8月20日下午2:30就在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大楼里开会讨论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这个棘手的问题。这次大会被视为党和国家在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经过投票表决，改革派占据了多数席位。不管切尔纳会议上说过什么，捷共最终决定举行这次大会。

已是半夜11:30，主席团仍在讨论大会的安排问题。这时切尔尼科被叫到隔壁听电话。他回来的时候脸色苍白，看起来完全被击垮了。他坐下来，并示意正在讲话的人停止发言。

会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然后切尔尼科说：“我刚刚得到消息，华约组织的部队已从北部、东部等多个方向侵入我国境内，匈牙利军队则从南面入境。我们的国家将在凌晨6点钟的时候被完全占领。”

这番话让在座的人呆若木鸡。杜布契克垮掉了，一时说不出话来。会议经过一阵混乱之后又重新开始，主席团开始讨论他们所能采取的对策和态度，以

苏联坦克在1968年8月21日进入布拉格。



及该如何履行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领导职责。

布拉格广播电台接到通知，捷共主席团即将发表重要声明。主席团起草了一份共同宣言，谴责这次侵略行径违反了《华沙条约》和国际法，全体成员轮流投票，赞成或是反对。杜布契克、切尔尼科和斯莫尔科夫斯基投了赞成票；亲苏派的寇尔德、毕拉克等人则投了反对票。宣言最后以7票对4票获得通过。

宣言被送到了电台，捷共领导人在中央委员会大楼里围着收音机收听宣言的广播情况。

音乐停止了。

接着是播音员的声音：“我们现在广播共产党主席团的决议……”声音突然沉寂，布拉格电台的广播被掐断了。

声音再次响起。这是另一家电台的广播。看来通讯部长霍夫曼已经站在了苏联一边，拒绝发布消息，并说刚才的播音是发送错误。主席团重复了他们的命令：

“通过所有频道播发这份宣言，并反复播音直至接到停止的命令。”

维也纳几乎立即接收到了广播讯号，宣言通过那里被播发到全世界。

窗外，天色已经变亮，马上就到5:00了。一辆苏联坦克沿着维尔塔瓦河右岸驶过来，停在中央委员会办公楼的大门前，把炮口对准了这栋建筑。装甲运兵车围在坦克的周围，一群伞兵包围了大楼的各个角落。其他士兵从汽车上跳出来，手持自动步枪破门而入。

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以及少数工作人员和支持者，都聚集在一楼杜布契克的房间里。一个身材矮小、佩戴着两枚“苏联英雄”勋章的克格勃上校正在向他们询问其他人的下落。这时从外面大街上传来呼喊的声音。一大群年轻人高举捷克斯洛伐克国旗拥向委员会办公楼，一排手持自动步枪的苏联士兵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士兵的身后是装甲车和坦克。

示威者向苏联军队迈进，齐声唱着捷克斯洛伐克国歌《哪里才是我的祖国》。当游行队伍距离部队不到10步的时候，部队得到了射击命令。士兵们举起手中的步枪向空中齐射——只有一个士兵，一个站在队伍末端的士兵，他的子弹射向了人群，击中了一个年轻学生的胸膛和脖颈。学生向后倒在地上，死了。他躺在冰冷的石子路上，头枕着一滩鲜血。

斯莫尔科夫斯基透过一楼的窗子看到了这一切。他冲到电话机旁，拨通了苏联大使切尔沃南科的电话。



入侵当天上午：挥舞着旗帜的示威者乘卡车环绕万塞斯洛斯广场，一辆苏联坦克向卡车开火。

“你，是你要为溅出的鲜血负责！”他吼道。但还没等切尔沃南科回答，一个苏联卫兵已抢过斯莫尔科夫斯基的电话并把它摔得粉碎。杜布契克也在打电话。另一个士兵冲过去扯断了墙上的电话线。杜布契克手握话筒站在那里，望着墙上晃动的电话线，一句话也说不出。

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被驱赶着走过漆黑的走廊，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军事法庭的审判还是监狱。他们中许多人都曾因反抗纳粹而被关过禁闭。

这些领导人被带到楼外的一个小庭院里，然后被塞进一辆装甲车。装甲车把他们三三两两地分开运到机场，然后再分开乘飞机送到不同的地方。最后，等他们被折磨得心惊肉跳、晕头转向、筋疲力尽时，他们会在莫斯科重新碰面，

在那里有一份写好的文件等着他们签名。

在这些领导人被武装卫兵带走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仍在向全世界现场直播苏联入侵的场面：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围着苏联坦克，向那些面孔陌生的驾驶员质问，“为什么？为什么？”许多苏联士兵尴尬地发现，他们占领的是一个和平的友好国家——他们原本以为自己在为抵抗德国的进攻而战。墙上、公路上和战争纪念碑上随处可见用俄文字母书写的标语“侵略者可耻”。莫斯科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发现，他们不得不增派两百名特警以平息他们自己军队中的不满。

入侵的部队达到50万之众。军车源源不断地穿行在捷克斯洛伐克乡村，飞机和直升机在天空轰鸣。愤怒的人群聚集在万塞斯洛斯广场，直到从一个架在民用汽车顶上的扬声器里传来苦苦的哀求声，人们才肯散去。到处都是悬挂着红、白、蓝三色旗的卡车和轿车。一群男孩乘卡车穿过万塞斯洛斯广场，一边喊着口号一边挥舞着捷克斯洛伐克国旗。一辆坦克在他们拐过街角时突然开火，大多数人中弹倒地。后来，这面血染的国旗又被人们高举着通过广场，人群爆发出发自内心的呐喊：“杜布契克，杜布契克！”

海报铺天盖地，有杜布契克和斯沃博达的画像，还有一些以交通标志的形式写着：“莫斯科：距此2500英里”，“禁止坦克入内”，“伊万，回家吧；娜塔

秘密电台通过广播号召全体公民支持那些反抗侵略的人。



莎思念你”。苏联士兵不停地撕毁这些海报，但它们像变魔术一般马上重新出现，而且数量成倍增长。电台大楼外发生了激烈的炮战，一辆坦克着了火，滚滚浓烟冲向薄暮的天空。当天夜里实行宵禁，苏联装甲车呼啸着在街上穿梭，向黑暗中一切移动的目标射击。国家博物馆的门脸已被炮火轰得一片狼藉。据说苏联士兵还以为他们到了柏林，正在向德意志帝国大厦射击。还有人说，是

苏联指挥官把博物馆错当成了布拉格广播电台的大楼。

令占领军最感到郁闷的是，所有街道的标志和房屋的门牌号码都被摘掉了。整个卡夫卡市（Kafka）变成了一座空白之城，一座没有标记的迷宫。负责缉拿政治犯的军官不知道该去哪里搜寻名单上的人。

许多秘密电台仍在奇迹般地坚持广播。它们的据点散布在各处：小公寓、工厂地下室、走廊的角落等。一台发射机被查获，马上就有另外一台替代它工作。苏联派了一列载有特殊无线电干扰设备的火车赶赴布拉格。秘密电台发出求救讯号，请求人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趟列车。沿线的铁路工人出足了力气：他们扳乱了道岔，更改了路标，挖断了铁轨。结果那些干扰设备始终没有到达布拉格。

虽然捷共高层领导人都被强行带到了莫斯科，但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仍在通过地下电台对全国进行广播。他们呼吁人民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保持平静并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捷克斯洛伐克与它的众多邻国对抗无异于蚍蜉撼树。惟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只有政治谈判了。捷共领导人劝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不要再让年轻的生命去做无谓的牺牲。与此同时，捷共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在秘密地点按计划召开，会议要对时局作出判断并为国家选出新的领导人。

虽然敌军密布、交通不畅，尽管时局动荡、危险重重，最后仍有一千二百余名选举产生的会议代表赶到了布拉格的秘密会场。他们在那里换上工厂制服，化装成工人，然后被三三两两地领进了位于威苏可尼（Vysocany）区的大型电子设备厂。

半数代表是利用夜班时间混进去的，另外一半人则在早晨6:00换早班的时候进入工厂。最后，代表们在工厂的大礼堂里会合了。工厂的屋顶上安排了人把风，工人们像往常一样继续生产，并把噪音弄得震天响。而代表们为了不引起注意，则避免鼓掌或是喝彩，只是举起如林的臂膀以表示他们对发言的赞同。大会主席在会议开始时宣布：

“同志们，在会议开始之前请允许我作一个技术性的说明。会议组织者特此向大家指出：如果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撤离会场的话，有两个紧急出口可供使用，一个通向食堂，另一个通向厨房。你们可以从那里分散到工厂各处……”

尽管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在侵略军的炮口下召开的，这次会议却成了捷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集会。第一次，会上没有任何事先内定的内容。这是一



“我们绝不投降”：1968年8月22日发生在万塞斯洛斯广场的抗议活动。

次真正办实事的大会，会议得出的每一项结论都经过代表们的认真讨论，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会议的议程包括分析过去几年的形势发展，讨论当前局势和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通过了在第二天组织罢工1小时以抗议侵略的决议，罢工将以号角声、警报声和震耳欲聋的教堂钟声作为信号。

大会最后起草了一封给仍被监禁在苏联的杜布契克的信：

“亲爱的杜布契克同志，

“今天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谨向您致以同志式的热情问候。我们对您为党和共和国所做的一切工作深表感激。昨天，我们的年轻人举着血染的国旗在布拉格游行，他们在高唱国歌和国际歌的同时，还呼唤着您的名字‘杜布契克，杜布契克’。这说明您的名字已经成为我们国家主权的标志。

“我们抗议对您和其他同志进行非法囚禁。经过大会选举，您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我们仍把您当作我们的主要代表。我们坚信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将会重新成为自己家园的主人，也相信您会回到我们中间来。

“署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但被囚于莫斯科的杜布契克这时已经是心力交瘁。

“你们现在不签字，一周后也要签；一周后不签，两周后也要签；两周后不签，一个月后还是得签。”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得到的警告。

他们共有二三十人，都被囚禁在克里姆林宫。杜布契克由于巨大的压力而心脏病发作。他头部缠着绷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在浴室滑倒摔到了浴缸外面。

“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勃列日涅夫说。他告诉他们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秘密召开的事，以及大会号召的罢工和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立场。苏联人要求代表团推翻捷共大会的决定，对媒体进行严格审查，按照苏联的要求改组政府并同意在捷克和西德边境驻扎华约组织的军队。

一旦这些“正常化”措施得以实施，占领军将马上撤离。

每一个面对这个抉择的捷克斯洛伐克人都曾流过痛苦的泪水：要么让祖国的大地浸满鲜血，要么中断民主化进程而倒退回压抑民主的老路。



一个陷入道德困惑的苏联士兵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到布拉格来。

“我们最终还是签了字，”国民大会主席约瑟夫·斯莫尔科夫斯基事后回忆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做出这个选择：签，或是不签。我们都犹豫过。我犹豫了很长时间，反复问自己该签还是不该签？”

“现在很难说出当时谁的反抗态度最坚决，谁的态度较为软弱，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表示过反抗，没人愿意签字。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严肃的选择，回国后我在讲话时说，我不能确定我做的究竟是对还是错。

“我最终签了字，这一点我绝不讳言。但我在那次讲话中说，总有一天历史将作出评判：我们是正确的，还是犯下了叛国的罪行。这个结果我现在无法知道，但在当时的情景之下，签字是我自己的决定，尽管我犹豫了很长时间。”

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当天夜里乘飞机返回国内，大家在途中都默默无言。第二天，地下电台“自由捷克”向全国广播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呼吁书：

“我们曾焦急地等待莫斯科的谈判结果，但我们从未抱有任何幻想。现在我们呼吁全体国民：支持杜布契克同志的立场和决定，这是我们目前惟一的出路。请你们保持冷静和谨慎。我们并不束缚你们的思想，但你们在采取行动时一定要三思而行。我们在此号召大家：支持杜布契克。”

5000人聚集在万塞斯洛斯广场举行了游行，这一次的主力军仍然是年轻人。他们每25人排成一排走向国民大会大楼，口里高喊着“我们要知道全部真相”，“我们不愿跪着苟活”。

当天晚上，杜布契克含着眼泪向全国发表了讲话：

“我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避免流更多的血，在协议上签了字。今天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直面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找到出路。当前首要的是让占领军逐步撤出……我们已经同意先让占领军部署在一些保留地区……最终目的是这些军队彻底离开……我们将不得不采取……”他的声音哽咽着，“一些权宜之计，这可能会损害到我们现在享有的民主，但我请求你们能够审时度势……我听到了一些对莫斯科谈判结果和撤军承诺不信任的声音。我必须提醒你们放弃这种想法。唇枪舌剑的争吵很容易，但我们已经付出了惨痛的牺牲，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我们必须权衡轻重。”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倾听着他的讲话，不由得心酸地想起了他们共同签署



西欧各国的学生纷纷到苏联使馆门前游行，支持捷克人民。上图是冲击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瑞典学生。

过的那份《宣言》：

“于是我们国家在走过了几世纪的艰辛道路之后，终于迎来了孕育希望的时刻。现在，我们可以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不仅是欠发达国家的临时选择，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惟一出路。

“我们本以为我们的行为一定会赢得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同情，然而，我们却被指控为叛贼……”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所有站在杜布契克一边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都将遭到清洗，代替他们的是一批更忠于莫斯科的人。

全世界正在反对越战的年轻学生和激进分子对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入侵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和惶恐。入侵发生后，世界各地的苏联大使馆门外立即爆发了群情激奋的示威活动。这些活动在许多国家得到了当地共产党的支持〔尽管法国有一小撮极左的电影艺术家对这次入侵表示了欢迎，因为他们认为这回“麦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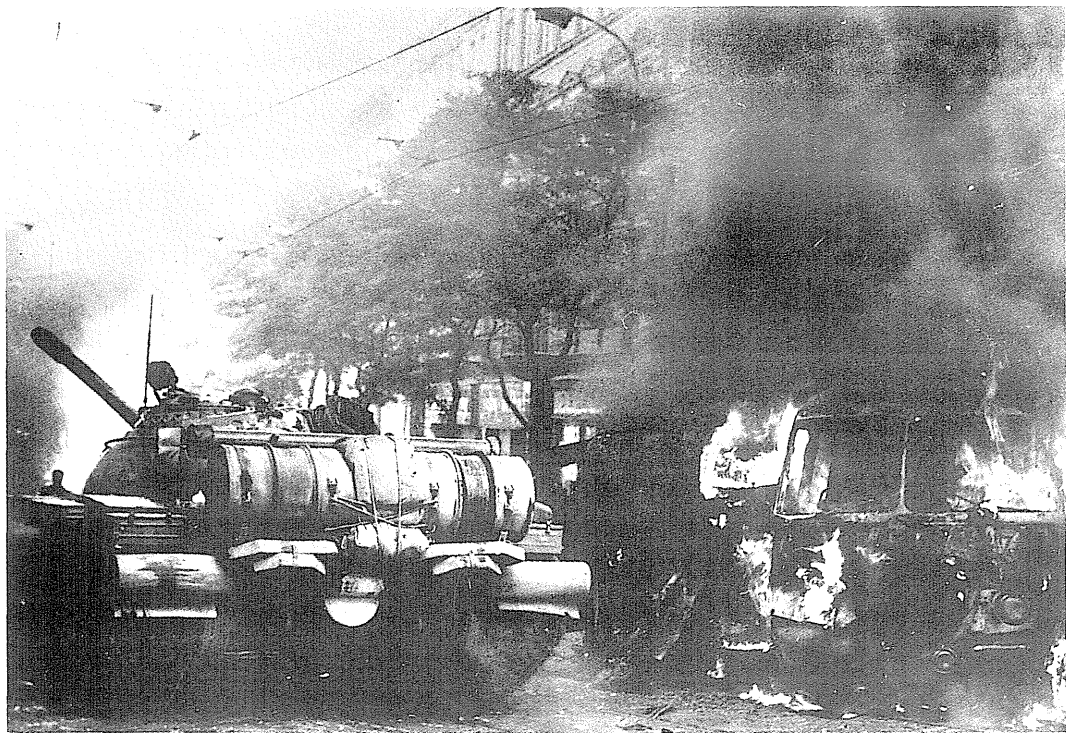
斯·弗曼 (Forman, Milos) 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电影的末日到了”；后来他们也承认他们犯了错误]。在伦敦，莫里斯·海顿 (Hatton, Maurice) 正在拍摄由约翰·萧 (Thaw, John) 主演的影片《赞美马克思，从枪口前走过》。他在该片中描述了人们在肯星顿的苏联使馆门前游行的场面。

8月25日，莫斯科的红场也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抗议活动，但是被警察粗暴地镇压了。警察逮捕了七个人，并没收了写着“把手从捷克斯洛伐克拿开”、“侵略者可耻”、“为了你们和我们的自由”等口号的旗帜。一个名叫维克托·费恩博格 (Fainberg, Viktor) 的示威者被警察打落了好几颗牙齿，后来又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这是勃列日涅夫政府惯用的一种臭名昭著的监禁方式。还有包括赖里莎·丹尼尔 (Daniel, Larissa) [在押的作家尤里·丹尼尔 (Daniel, Yuli) 的妻子] 和帕瓦尔·里德威诺夫 (苏联前任外交部长的孙子) 在内的五个人被指控犯有“聚众闹事和严重破坏公共秩序罪”——这一罪名用来指控苏联的侵略行径倒更为合适。

尽管东德的乌尔里希政权一直是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之一，但在8月22日和23日这两天，在东德各地都爆发了自发的示威活动。在埃尔福特和哥塔，数百名年轻的示威者走到街上，高呼着口号：“杜布契克好样的，乌尔里希大坏蛋！”在德累斯顿、法兰克福、于特博格 (Jüterbog) 甚至是东柏林也都出现了示威活动。据报道，总共有一百余名示威者被逮捕，其中大多数年龄在14岁到21岁之间，而且很多人都是共产党员的子女。

这次入侵造成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分裂。中国和罗马尼亚对于苏联动用武力提出了强烈抗议，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也反对这次行动。铁托在南斯拉夫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的公众集会，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自决。而对于古巴的卡斯特罗来讲，这次入侵标志着世界舞台拉开了悲剧的帷幕。在哈瓦那，面对着一大群听众，卡斯特罗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演讲。他痛苦地质问：难道苏联把它的坦克用于支持越南人民反抗美国的斗争不是更好？他还描述了旧捷克斯洛伐克的诺沃特尼 (Novotny) 政权的种种罪恶。

“众所周知，那个统治了捷克20年的旧政权错误累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等林林总总，使其称不上真正的革命政权，”卡斯特罗大声宣布，“他们把从纳粹那里缴获的武器高价卖给我们。他们还多次卖给我们技术水平落后的工业机器。他们甚至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失去了国际主义精神，松懈了革命警惕性，抛弃了建立一个没有自私自利、摆脱了贫穷奴役的的共产主义社会的



一辆苏联坦克和卡车遭到学生的“莫洛托夫鸡尾酒”²的攻击后在街上起火燃烧。

美好理想。”

但最终，卡斯特罗还是接受了苏联的解释：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代表了资本主义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

“我们毫不怀疑捷克斯洛伐克政权在向资本主义靠拢，而且最终将走向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世界对这种形势当然特别满意。他们不遗余力地鼓励这种变化，摩拳擦掌地等待着它给社会主义世界带来的灾难。这坚定了我们的立场。谁也不能说捷克的国家主权没有受到侵犯。因为那是说谎和歪曲事实。但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能否容忍政治形势的发展导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脱离自己的阵营而倒向帝国主义的怀抱……”

这也是古巴一直坚守的国际主义独立的最终结局。

然而，美国和西欧对这次入侵只是进行了极其温和的谴责，而且在事变发生仅仅几周之后，华盛顿和波恩就向勃列日涅夫政府提供了新的贷款和贸易协

定，这倒像是在报答苏联扼杀了中欧可能出现的一个广受欢迎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美国，芝加哥 猪年

今年，美国总统林顿·本恩·约翰逊³ (Johnson, Lyndon Baines) 将不去参加其所属政党的大会，因为那要冒太大的安全风险。他将和全国大多数人一样，坐在得克萨斯的家里看电视转播。

对于芝加哥市市长达累 (Daley)，这个机器政客、大资产阶级的朋友和芝加哥黑人市民的阴险对手来说，这是他向人们展示应该如何管理美国的绝好机会。

在即将作为会场的大剧院周围，有五个街区黑人聚居的简易贫民窟。现在这五个街区都被划在警戒线以内，这里的黑人居民不得不搬出来。但在附近还有一个大畜栏，美国全国食用的猪、牛有一大部分在这里被屠宰之后运往全国各地。畜栏散发出的浓烈气味始终漂浮在这一带的空气中，无法完全散尽。

大剧院外面竖起了木板篱笆，以免与会代表看见周围的贫民窟。篱笆上还有成排的铁丝网，用来防止留在附近街区的居民爬上篱笆看热闹。城市各处部署了1万名警察和50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警械库里储备了大量的梅斯毒气和催泪弹。由于易比派⁴成员威胁要在城市的供水系统中投放致幻药物，水库、滤水厂和水泵站也都加强了戒备，还把所有下水道的井盖用柏油封了起来。

实际上易比派只是开个玩笑。易比派有时也被称为国际青年党，成员主要是朋克⁵和报刊时事评论员。他们试图把抗议政治和地下嬉皮士运动结合起来，于是号召人们在公园里举行四天的摇滚狂欢以抗议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的大会——他们把芝加哥戏称为“捷加哥” (Czechago)，这令人从达累市长的防暴警察联想到了布拉格的苏联占领军。他们自封的使命是：

“1. 发动‘政治草叶运动’，将市井胡闹和政治融合起来，使嬉皮士运动和新兴的左翼思想相互吸收对方的营养。

2. 将自发的地下运动尽量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全国运动。

3. 创建一个另类的、全新的社会。

4. 用革命的舞台剧语言发表一份关于约翰逊总统、选举政治和民族国家的声明。”

或者，用一个易比派活跃分子的话说：

“让民主党人都染上毒瘾，使他们的会议自动中断。”

易比派制定了各种行动计划，包括建立行动小组，组织街边演出队，开设免费赠送商品的商店和印刷抗议宣传品的车间，组建公社、流动剧团和秘密传媒。易比派还推出一头猪参加总统竞选，竞选口号是“‘68’年大选，把票投给猪”。易比派还提出了其他口号：“在沙滩上做爱”，“追求快感的政治”，“大家都来嗑药”，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抛弃那些卑躬屈膝的肉球”。

星期天晚上，5000人聚集在林肯公园里，他们当中有嬉皮士、易比派成员、反战人士和芝加哥各行各业的市民。大家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唱着爱伦·金斯堡（Ginsberg, Allen）⁶的和平祈祷文，或者观看流动剧团上演的关于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副总统汉弗莱的短剧——达累市长的警察部队赶来之后，演出变成了四散奔逃。

杰里·罗宾（Rubin, Jerry）在《革命全景》一书中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

“坦克好像是从冒着烟的污水池里爬出来的怪兽，这些奇形怪状的巨大机器亮着明晃晃的探照灯冲进公园，向人群发射令人呕吐的毒气弹。

“一群戴着防毒面具的猪猡——看起来像不怀好意的外星人——冲在前面，像是地狱的恶鬼，把整个公园变成了毒气弥漫的世界。

“易比派和这些巨大的机器对峙到了最后一分钟，最后我们都跑到街上，高兴地呼喊，‘大街是属于人民的！’”

“易比派点燃了街边的垃圾箱，把它们推到大街上，打电话报了火警，还阻绝了交通。他们把四面八方都弄得一片混乱。

“警车追着我们蜂拥而至。我们只好倒在地上一声不响，等警车从我们身边过去。

“你如果找到几个信得过的朋友，那你们就算是一个基层的革命组织。革命的武器完全从大街上找到，树枝可以当木棒使，而石块则更是随手可得。

“市民向我们敞开大门，让我们到他们家里去躲避那些挥舞着大棒的猪猡。

“白皮肤的工人阶级的孩子帮助易比派修筑街垒。

“黑皮肤的汽车司机举行了罢工并加入易比派的行列，向当了工贼的白人司机投掷石块。

“记者来到现场采访和拍照，他们本以为自己和这场混乱之间隔着一条‘三八线’⁷。

“‘兵’的一声！一个猪猡手中的大棒正砸在一名记者的脑袋上。



在民主党大会的会场外面，芝加哥警方从皮格索斯（Pigasus）手里没收了一头猪，这头猪是易比派推出的总统候选人。——此图片版权归弗莱德·W·麦克达拉（Fred W. McDarrah）所有。

“叭”的一声！又一个摄影记者被打倒在地，白衬衣上血迹斑斑。

“又是‘叭’的一声！”

“嗨，我是美联社的记者。”

“噢，是吗，你这个狗娘养的，吃我一棒！”

因此，在接下来的四天四夜里，警察的残酷暴行都有扛着摄像机的记者向3000万美国观众现场直播。而这些记者也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以便在毒气弥漫的空气里呼吸，而且他们自己也经常在达累市长的打手们面前四散奔逃以躲避那些不讲情面的大棒。密歇根大街成了战场，摄影师和记者在这里也和示威群众、无辜路人一起遭到无情的痛击——甚至他们挨打的可能性还要更大一些。

“我们中有些人开始觉得我们就是靶子，”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今日要闻”节目的记者休·唐尼斯（Hugh Downes）说，“这个星期里，在芝加哥街头戴记者证的人就像是生活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犹太人。”

有关记者被毒打和受伤流血的报道接连不断。芝加哥警察似乎特别痛恨那些想要把这个国家的内乱拍摄下来的自由媒体的记者，一见到他们就脸红脖子粗。当警察挥舞着大棒冲向人群的时候，示威者高呼着：“全世界都在看着这一切。”但是摄影机的镜头对于制止警察的暴行起不到任何作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警察打倒一名示威者，并用左轮枪的枪托砸向他的头脸，还可以看到一个警察疯了似地驾着摩托高速冲向无路可退的人群，甚至还把摩托开到地铁客站的人行道上追逐逃跑的人。

民主党开会的大剧院处在缠着铁丝网的高墙之内，里面的安全戒备同外面一样森严。与会代表们像羊一样被哄来赶去，任何人都不得从大厅的一层到另一层去。荷枪实弹的警卫到处游荡，随时检查代表的通行证。一名来自纽约的代表因为拒绝向警察出示他参加会议的证明而遭到殴打——这一事件发生后，全副武装的警察被部署在会议大厅里。代表们一个接一个起立谴责外面街头上的盖世太保行径，而支持达累的代表则把他们的谴责淹没在一片嘘声、讥诮声和舞动的拳头中。

就在这家剧院里，大会本身和美国整个政治体制的真相都被戳穿——不过是一场空洞的做秀。大剧院里上演的政治闹剧只是一个拙劣的玩笑，每个人都知民主党的政党机器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已内定头发灰白的老头汉弗莱为总统候选人，每个人也都知道他一定会输掉这场竞选。

〔注 释〕

1 托马斯·马萨里克 (Tomáš Masaryk, 1850—1937), 捷克哲学家,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首任总统, 曾任布拉格捷克大学哲学教授。

2 莫洛托夫鸡尾酒 (Molotov cocktail), 一种燃烧弹。

3 林顿·本恩·约翰逊 (Lyndon Baines Johnson, 1908—1973), 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 民主党人, 提出建立“伟大社会”的改革纲领, 因使越南战争升级而丧失公众支持。

4 易比派, Yippie,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松散的激进青年组织。

5 朋克, 即punk的音译, 美国俚语, 指小混混。

6 爱伦·金斯堡 (Allen Ginsberg, 1926—), 美国诗人, 以擅长吟诵著称, 其诗集《嚎叫及其他》是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之一。其他诗集有《现实三明治》、《美国的堕落》等。

7 三八线, 此处喻停火线, 是指记者以为自己可以不受暴力侵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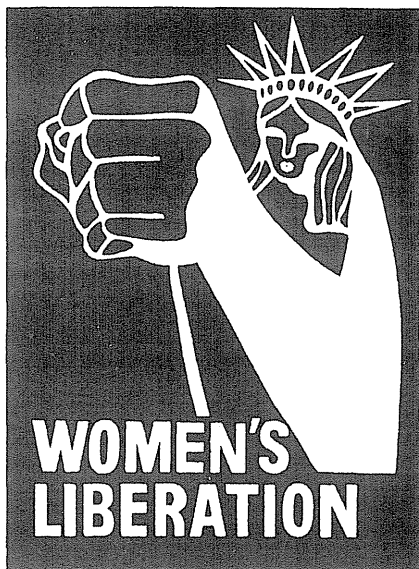
1968^年

9月

“为什么妇女不可以呢？”

运动的开始——妇女联合起来。

1968年9月，一场运动开始了它的第一次公开抗议活动。同这一年发生的其他运动相比，这场运动对世界的影响最为持久，这就是妇女解放运动。在亚特兰大城，美国小姐选美竞赛这场滑稽、躁动的闹剧把激进学生的乌托邦式的抗议政治带到了美国中部腹地。争取妇女权益斗争的高潮总是出现在更广泛的社会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玛丽·渥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和



美国最珍爱的偶像发挥了自己真正的价值。

奥林匹·德·古治（Olympe de Gouge）“为妇女争权”的呼吁效法法国大革命时期“为男人争权”的热潮。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女权组织就站出来，要求免费托儿、就医和组建社区服务性质的公共住房。

“女人为什么要屈从丈夫的权力呢？她应该和他一样，有权自由行事。消灭奴役，消灭主人，是我们捍卫自己权利的时候了。”1848年，巴黎的一份由缝纫女工、中学教师和助产士主办的报纸——《妇女之声》上的一封信如是说。19世纪美国的女权运动直接产生于废奴运动；20世纪早期英国和德国的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也有一股工业抗议和造反的浪潮作背景。

在1968年动荡中迅速诞生的众多妇女解放组织也不例外。甚至从它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们与同时代的其他斗争，如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以及黑人解放运动休戚相关、息息相通。年轻的妇女们长发飘飘，挂着嬉皮念珠，盘腿坐在公寓和空地的地板上，占据着纽约、多伦多、伦敦和柏林的大学校园，热情洋溢地谈论着核心家庭¹是妇女受压迫的中心；1968年激进运动中的公共乌托邦前景被她们用来描绘向往的新生活：一个为人民而存在而不是为少数统治者的超额利润而存在的世界；一个个体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基础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核心家庭可以更好地、更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即给予爱和支持、为孩子和老人提供一个充满温暖和关心的家庭。但它必须以



好戏在后头：一位抗议者在反对美国小姐竞赛的活动中稍作休息；
图中英文：“自以为是的”妇女们联合起来！！要爱，不要做妓女！

集体的方式组织，而不是靠单个家庭中孤立无援的妇女默默无闻的劳作。那些被冠以“女人的活”的劳动应该是整个社区的责任。因此，妇女解放运动要求大规模推广新式的、有组织的免费托儿所和幼儿园，要求建立灵活的、操作有序的住房服务公司，要求妇女有“和男人一样自由行事”的权力，要求均等的工作机会，要求自主、自由的堕胎和避孕。可是，这样的世界终未到来。相反，妇女们发现她们争取自由的斗争陷进了一种更难堪的境地，更加不平等，更加孤立，而她们互相之间也愈发的对立，竞争残酷一如选美竞赛。没有免费的、优质的幼儿护理，没有社会化的家务体系以及工作条件的改变，妇女们只能自己承担自立的代价。

60年代以来，妇女生活的变化并非全是妇女运动的压力所致，更广阔的经济变革更能说明妇女在有偿劳动领域的激增——在西方是服务于日益扩大的白领阶层和商业部门。而在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对年轻妇女的巨额剥削。大环境的变化同样能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妇女因为经济地位的改变而独立。但是，1968年以来，这一切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仍离不开妇女要求社会认可、独立和平等的努力。

亚特兰大市的抗议者兴高采烈地把所有能找到的象征着妇女驯顺和卑恭的东西都扔进了垃圾箱——代表妇女在办公室里卑从、谄媚角色的速记簿；代表她们在家里一干就是数小时默默劳作的抹布以及假睫毛和装有衬垫的胸罩。用这种方式，她们为妇女打开了一扇本来就没有关上过的门。

7日 美国，亚特兰大 消灭美国小姐

每年的这个时候，在新泽西州的海滨城市亚特兰大，总能看见一排紧张的、满脸笑容的年轻女子身着泳装，脚蹬高跟鞋，站在一堆中年男人面前，等着按魅力大小排序。为了这一天，这些女孩们几个月来一直在做准备：节食、护肤、美发、褪毛。她们的眉毛要修整，腿要上蜡，腋毛要刮干净。再花上好几个小时涂脂抹粉、堆云叠鬓。现在则是忐忑不安地等待结果，都希望自己的苦心能换来最高的奖赏——“美国小姐”的头衔。

但今年却大不相同了。亚特兰大市会议大厅外，一个妇女流动剧团正上演一出特别的戏。

几个月以来，这些妇女轮流在纽约各自的寓所聚会。她们大部分来自新左派或是反战组织。她们都感到需要扩大自己作为妇女在运动中的作用，对以往设想的角色意义做批判的重新认识。

仅仅“作为女人”来聚会，刚开始的感觉很不自然。没有人知道接下去该做什么。不过，没有男人在场，气氛有点新奇，更轻快了——没有男人在场。突然之间，说话很自由了，没有什么拘束。慢慢地，她们开始谈论起那些不为人知的共同经历；她们开始寻找彼此之间的共同点。不久，她们发现，自己每天干这干那，都是为了取悦男人；很快，又禁不住开始大声嘲笑这一切的荒唐。话题转到了一年一度的美国小姐竞赛，她们都一致认为，这是妇女争相取悦男人的最可耻的象征。

家务的政治学

听起来似乎非常有道理：我们都有工作要做，因此，为什么不能分担一下家务呢？我把这话和我那一位说了，他同意了——大多数的男人都很滑，他们可不会直接拒绝你。接下来的就是这几年来一直进行的对话：

他说：“我并不介意分担家务，只是我做不来。我们应该做些各自擅长的事情。”

意思是，很不幸——我不擅长干像洗盘子或者做饭这一类的活。我倒是能稍微做点轻木工活、换换灯泡、搬搬家具（你没事天天搬家具吗？）。

还意味着我可不喜歡这些乏味的、愚蠢的、无聊的事，所以应该你来干。

他说：“我并不介意分担家务，但你得先告诉我怎么干。”

意思是我会问很多问题，我每次干

活的时候你都得先把一切演示给我看，因为我的记性不大好。还有，我在干活的时候，你可别光坐着看书，因为我会把你烦得不行，直到你觉得倒不如自己来干轻松。

他说：“我们过去多开心啊！”（每回轮到他做什么的时候就会这么说。）

意思是我过去多开心啊。

他说：“我比你更恨这活。你可不像我这样讨厌它。”

意思是，家务是贱活。让我这样聪明的人来干真是掉价、耻辱，不过对你那样智商的人就不一样了……

他说：“妇女解放运动并不真的就是政治运动。”

意思是革命离家太近了。

派特·麦纳尔蒂 (Pat Mainardi)

红袜子小组 (Redstockings Group)

纽约，1968。）

“我们要消灭它，”一位妇女说道。

“我们大家几乎都曾是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或是新左派其他组织中的积极分子，但是我们却从未组织过我们自己的运动。”罗宾·摩根 (Robin Morgan) 写道，她是这群人中的一员。“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狂热和激动：和租车公司讨价还价，从亚特兰大市长那里套取游行许可，游行前每晚只睡三个小时，从别人那里借来牛角供我们军用。嘴里喝着纸包装盒里苦涩的咖啡，抽着已经捏不成形的烟盒里的烟；满眼血丝，眼镜一个劲地往下滑；脚也酸了，脖子也痛，嗓子早就哑了——但我却高兴得像做梦一样。



为自己而做——妇女解放运动的阵痛。图中文字：让我们把自己当人看；化妆能掩盖我们所受的压迫吗？每个人都是美丽的。

“每一次与其他抗议组织者开工作会议就好像是针兴奋剂：不论是一起设计海报、撰写传单，或是商量谁去对付记者，我们都在互相肯定我们征服世界的决心、希望和力量。我们也都感到，唔，长大了；我们是在为自己而出力，不是为了男人。而且，我们终于在做那些男人从来不让我们做的事，比如和媒体对话，或是和市长办公室打交道。我们不断战斗，放声大笑，兴奋异常。”

摩根在一篇写于1968年10月、收在《走得太远》里的文章中解释说：“美国小姐选美活动被当作靶子有很多理由。首先，它显然是对妇女的贬低（宣传一个没有头脑、只供泄欲的工具的形象）。它又是一个百合花一样洁白的种族主

义竞赛（从来没有一位黑人进入决赛）。获胜者访问越南，作为杀戮者的吉祥物去慰问部队。可这一切把戏却是一个商贩游戏，只为了把赞助商的东西卖出去。还能到哪里找到这样一个东西如此完美地把美国所有的价值观——种族主义、军事主义、资本主义——都汇集在一个“理想的”象征物、一个女人身上？这当然是抗议者要搅掉这场闹剧的根本原因——参赛者代表了所有女人以不同方式在这个社会中被迫扮演的角色：非政治的、恭良温顺的、被动的、脆弱的（但乐于劳苦的）东西。

“大约二百个女人莅临这个破镇，在亚特兰大市会议大厅前的人行道上开始了一整天的抗议活动，唱歌，演讲，流动剧团的演出从早到晚一刻未停。抗议者把抹布、便笺本、紧身褙和尖耸的胸罩都扔进了一个“自由垃圾箱”。（这最后一桩事被男人控制的媒体说成是‘烧胸罩’，这纯属杜撰行为。他们从来就只关注这等鸡毛蒜皮的事。）

“晚上，由大约二十个勇敢姐妹组成的‘内应别动队’成功地搅乱了这场活动的电视直播，她们发出让人恐怖的柏柏尔式的（Berber）尖叫（从《阿尔及尔之战》中学的），高呼‘女性要自由’。一幅写着‘妇女解放’的大旗从楼厅的栏杆上挂下来——这一切让这场全国直播的表演停顿了令人血液凝固的10秒钟。”

8日

美国，奥克兰 战争的囚犯

休伊·牛顿，美国黑豹党的创始人之一，过去11个月里都关在奥克兰的阿拉米达县监狱（the Alameda County Jail）中一个4.5英尺宽、6英尺长的单人牢房里，等着就1967年10月28日发生的一件事受审。

据休伊讲，那天深夜他和中学时的老友基恩·麦克基尼（Gene McKinney）开车去西奥克兰吃东西时，一辆警车跟了上来。

又来了，骚扰总少不了。这是休伊的第一反应。不过他已经被拦截无数次，早已有了准备。他的车里总放着一本法律书，因为他知道，只要他把现行的法律条文读给那些警官听，他们就让他走。他在想，这回又是为什么呢？他可是遵守了所有的交通规则。

警官下了车，走到窗前，把头伸了进来，离休伊的脸不足六英寸。

“来，来，来，看我们这里是谁啊？这不是伟大又伟大的休伊·P·牛顿吗！”
休伊没有答腔，只盯着警察的眼睛。

警察检查了他的驾驶证和注册证。另一辆警车从后面开来，又下来一个警察。

休伊和基恩被迫下了车，把手放在车顶上，警察开始搜他们的身。一个警察把休伊的衬衣下摆拉了出来，拍打着搜他的腿，摸他的臀部和私部。“他让人恶心，又搜得很仔细。”休伊后来说道。

“到后面那辆车上去，我要跟你谈谈。”那警察说着，抓住休伊的左胳膊，把他强行拖到后面的那辆警车上。休伊打开了一直攥在手里的那本法律书。

“你没有合法的理由逮捕我。”他开始说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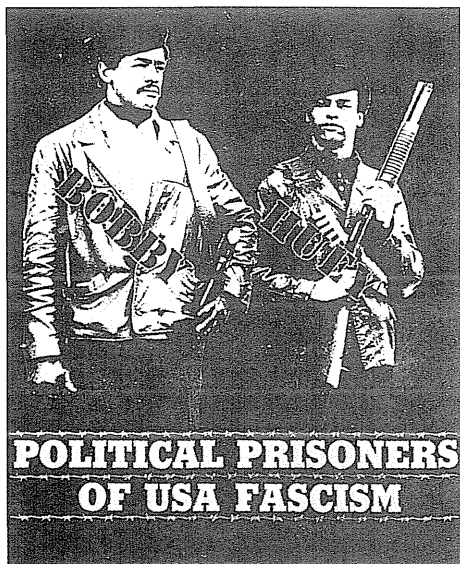
那警察站在他左边，稍微靠后一点。

“你最好把你那本鸟书塞你屁眼里去，黑鬼。”他说完，往前走了一步，照着休伊的脸就是一拳。

休伊朝后踉跄了四五步，半跪到了地上。等他开始站起身时，他看见那个警官拔出警用左轮手枪，瞄准他，然后开了枪。

“我的肚子仿佛爆炸了一样，就像被人从头到脚浇了锅滚汤，整个世界变得一片模糊。”

武装起来的鲍比·西尔和休伊·牛顿。图中文字：法西斯美国关押的政治犯。



又开了许多枪，是一次快射，但是，休伊根本弄不清是从哪里打来的。好像四面八方都有人开枪。他依稀记得自己手脚朝地趴着，脑子里一片眩晕，天旋地转。之后，他就什么都知道了。

等休伊醒过来，他发现自己被铐在病床上，屋子里都是警察，他们用毒气室，用枪支“意外”走火受伤，用拔掉他鼻子和肚子上的输液管来要挟他。他的罪名将是谋杀逮捕他的警官并打伤其他警察。但到了审判时，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休伊·牛顿曾经携带过或是开过枪。当时最可能的情形是，两个警察在朝牛顿开枪的时候打中了自己人。尽管这样，牛顿仍以谋杀罪被判2—15年的徒刑。

紧接下来的几年中，一系列闪电式的国家镇压——殴打、射杀、入狱——使美国新一代黑



愤怒的黑人要求释放休伊·牛顿。

人运动的领袖丧失大半，许多优秀分子消失在子弹的呼啸声中。但是现在，支持运动的队伍更迅速地扩大了，不光是在黑人居住区，自由、激进的白人也参与了进来。9月，艾尔德里奇·克里弗应邀到伯克利大学做系列讲座——这让加利福尼亚右派分子大为恼火。前好莱坞的蹩脚演员、现任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经常双眼放光，嘴角带笑，领导了阻止这次演讲的战斗。

“如果容忍艾尔德里奇·克里弗来教我们的孩子，他们说不定哪天晚上就会回来割开我们的喉咙。”他拖着长腔说道。

克里弗回敬道：“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罗纳德·里根，即使是以前他演烂片时——那都是些狗屁意思都没有的玩意——我感觉他就像罗伊·罗杰斯（Roy Rogers）和基恩·奥特里（Gene Autry）那样的非暴力牛仔：他们从不会激励人们去做些什么，更不会容忍别人有这样的行为。他们只是在那里占着地方，

浪费我的时间、金钱和智力。他们的风格中有一种很不真实的东西。我们知道电影就是制造一个虚构的世界，但是由里根这种营养不良的演员，用他那种乏味的演技在宽银幕上制造出来的虚构，在我——这个黑人、少数民族的、有色的我——看来却不过是用傻笑和龇牙咧嘴搅和而成的让人恶心的玩意儿。

在给加州大学的几千名学生演讲时，艾尔德里奇·克里弗向罗纳·德·里根挑战，要求与他进行一场公开辩论。



“但这样的事还是发生了：罗尼（罗纳德的昵称——译者）捞到了一个上电视节目的机会。在有钱的赞助商和一些一流撰稿人的支持下，再加上一个舞文弄墨班子专门写的时髦流行的艺术语言，他的平庸被粉饰、掩盖了起来。一面是这些好条件，而另一面是好莱坞最好的化妆师开始发现对付他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困难，那些皱纹正慢慢地把他的脸变成沟壑纵横、地力枯竭、只适宜种植单一作物的土壤；在这种情形下，他转到政治这一行上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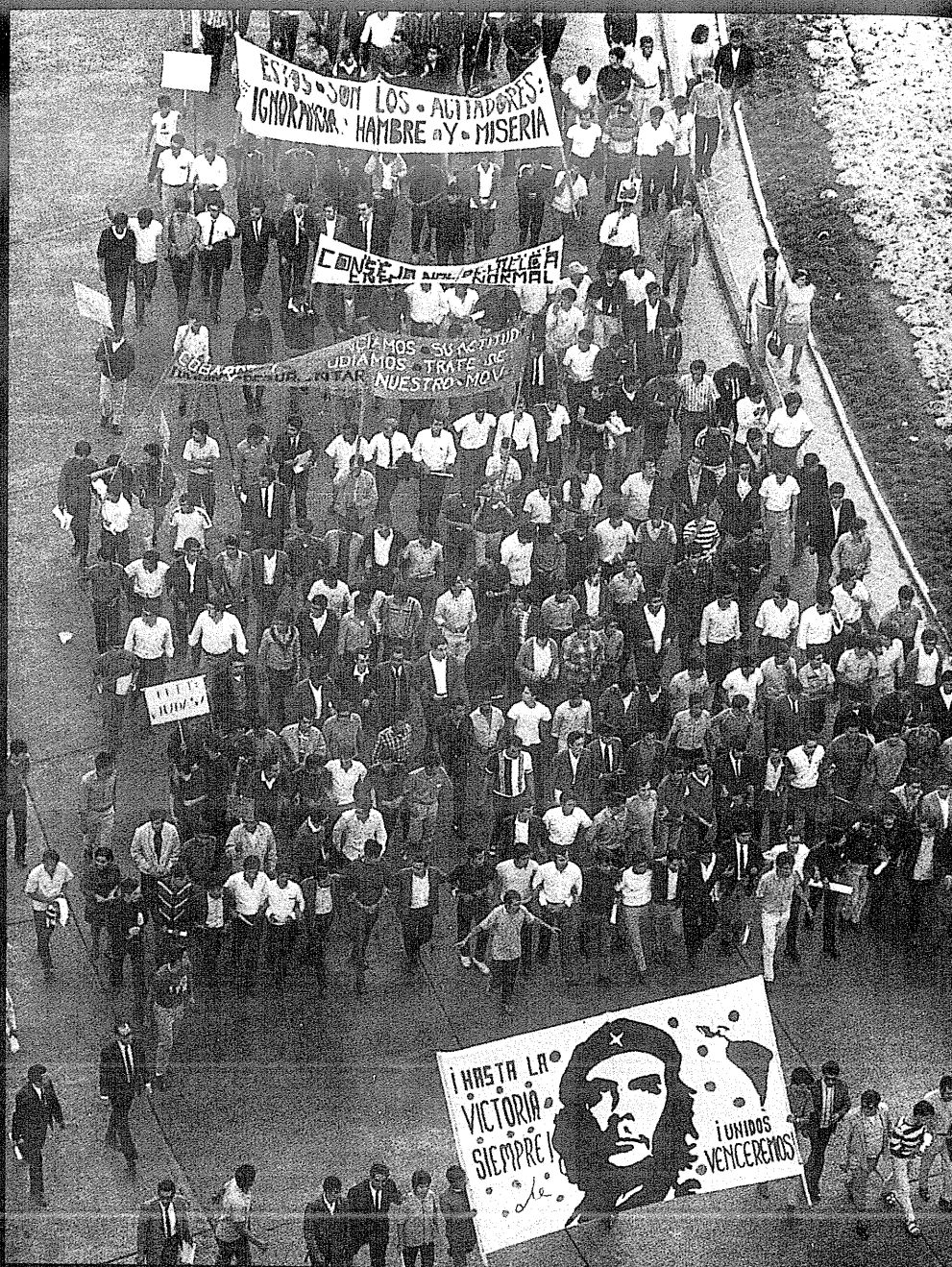
“而他又身处最能让他发家的一个州里。加利福尼亚州早就证明了把自己同荒谬政治联系到一起的能力，看看它选举出来的诸如理查德·尼克松²和麦克斯·拉弗提（Max Rafferty）这帮政治小丑就知道了。到了这么个适合他的位置，他当然也不可能有更好选择。罗尼制订了一套很合时宜的方针：专拣那些民众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然后对真正要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进行最疯狂的打击；然后代之以一大堆老得掉牙的、弱智的套话和流行语；一边唱着“星条旗之歌”，带着灿烂的、让人感动的笑容，一边向人们挥舞着国旗；演说时则摆出一副“我再也不能容忍了”的斗争面孔。最后，总记得，其他方法都行不通的时候，使用那些善于鼓动人心的政客们久经考验、行之有效的高招（在加利福尼亚尤其管用）——恶毒攻击美国梦的替罪羊：教科书中藏着的反动字眼，“大学的腐烂”、一小撮受共产主义阴谋影响的教授对学生的误导。

“啊，这一招确实有效。米老鼠（指麦克斯——译者注）当上了州长，唐老鸭（指罗纳德——译者注）要竞选议员。这才是我们必须担心，要有所行动的。

“有人说人民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领导。然而，我并不认为美国得到了它应该得到的领导。加利福尼亚州现在的领导断然不是它应该得到的。但我们还是有了他们，而今年又是选举年——美国梦的噩梦般的选举年。

“今年，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下。没人再不遗余力地遮掩。同往常一样，选举中的热点问题是如何处理黑人问题——只有这一回，这个问题被改成了如何处理黑人。从黑人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同样也发生了变化，即对这么个狗屁问题，我们该采取怎样的行动？”

今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墨西哥城举行，准备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墨西哥学生朝总统府进发。途中遭到防暴警察的攻击，他们奋力回击，从而引发了一场民主运动。

二千多名运动员已经抵达并开始训练。大学里最大的体育场为此装修一新，为了修建新的竞赛场地和跑道以及外国运动员的住房，再加上大量的广告宣传，墨西哥政府已经花费了数亿比索——尽管它从没有找到过这么多钱来花在贫民身上。

执政党——革命制度党——从1910年以来就一直统治着墨西哥，当时艾米里阿诺·扎帕塔（Emiliano Zapata）³和潘丘·维拉（Pancho Villa）⁴领导的起义农民，带着摧毁旧的大庄园主寡头政治的希望把革命制度党拥上了政坛。但现在的革命党也固化成为寡头政治，只有心血来潮时的平民主义论调才能让人们回忆起它革命的历史。

如今，制度革命党在总统迪亚斯·奥达兹（Diaz Ordaz）⁵的统治下越发无耻和虚伪，他们想在奥运会的时候把充满活力的、成功的“一党民主”作为墨西哥的成就来炫耀，但同时又极力压制墨西哥人民任何提高自己低劣的生活水平或是反抗现政权压迫政策的任何企图。

对正占领着大部分学校的墨西哥学生的处理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引发学生占领校园的是一场在7月份举行的纪念古巴革命的和平游行。数百个游行高举着卡斯特罗、尤其是格瓦拉的像片。墨西哥防暴警察——招来无数怨恨的军警（granaderos）——对手无寸铁的游行示威的年轻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用棍棒把许多人打翻在地。第二天，上千名学生集会，抗议军警的恶行。为了躲避警察的攻击，一些学生退到学校的建筑物里，并在门口设置了障碍。军警用火箭筒轰开大门，冲进校园，数名学生遭到杀害。这以后，越来越多的学生觉得对如此野蛮的行径再也不能坐视不管；越来越多的中学和大学建筑被占领；学生进行抗议，保卫占领的建筑。政府的那帮恶棍用机枪从正面扫射被占领的建筑，闯进去以后，抓到学生就拳棒相加。

5月和6月法国造反学生的形象闪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学生们也尽力像他们的法国同志那样建立各种联系，以便把他们的抗议扩大为社会性的革命。他们向每个人开放被占领的建筑，举办宣讲会，组织行动队到街上和工厂里散发传单，要求释放政治犯，要求防暴部队的头头辞职。

军警到处都能见到国外来的煽动者，尤其是来自法国的煽动者——他们都是五月风暴中的年轻的老兵。在警察的“主要煽动者”名单上，大多是带着外籍姓氏的墨西哥人，警方甚至把墨西哥姓名都给法语化后再记录下来，如把

Emilio, Antonio 和 Maria Antonieta 都记录成 Emile, Antoine 和 Marie Antoinette。

墨西哥刑法第145条，允许警察以定义得很不规范的“扰乱社会”罪在任何时刻逮捕任何人。不论他是墨西哥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有丝毫让人怀疑的迹象，就可逮捕。年轻人是最值得怀疑的对象。许多为看奥运会来墨西哥的年轻的外国游客被随意从街上抓走，投进监狱，面临着5年徒刑和5万比索的罚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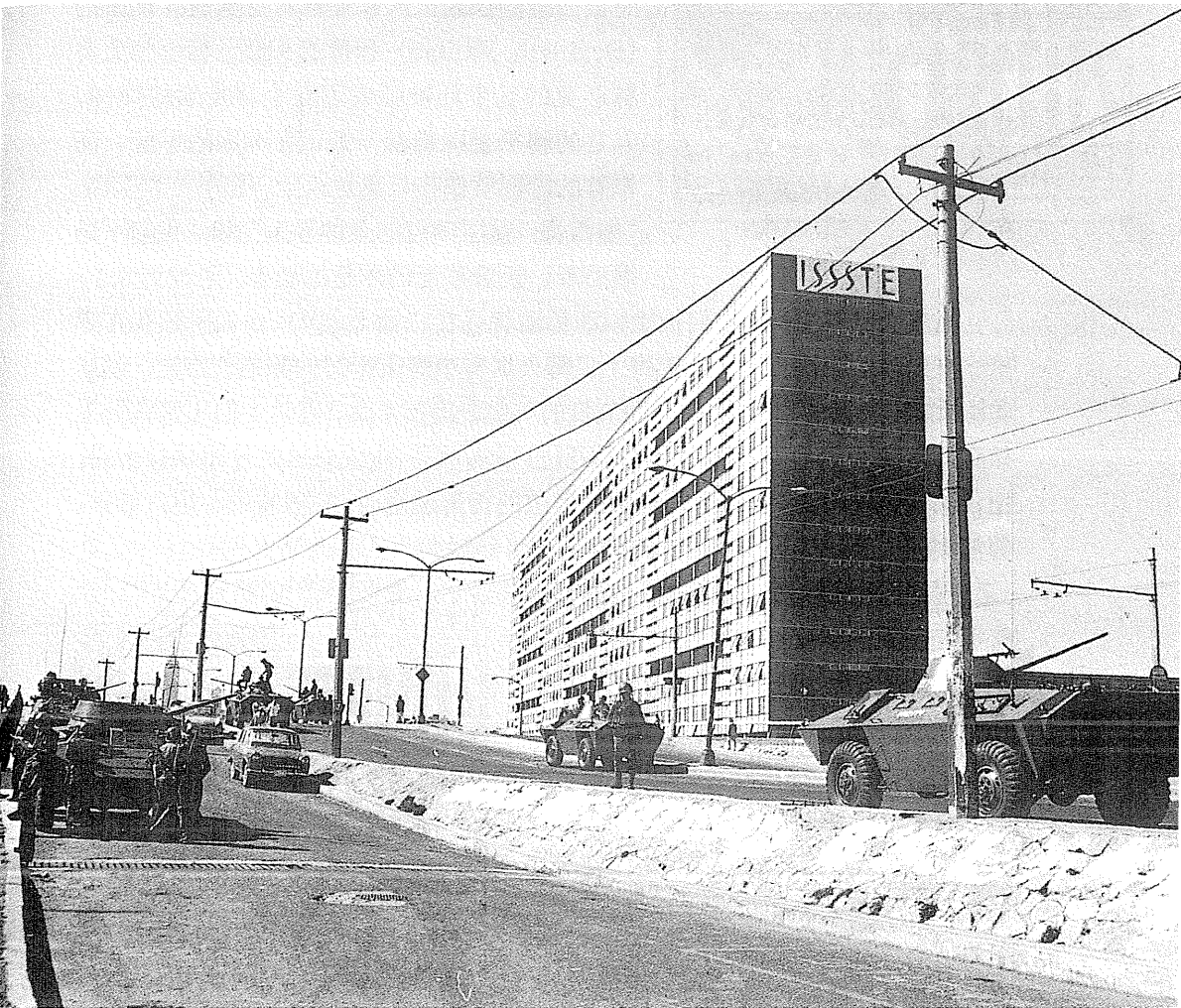
部队攻击并占领国家大学时，一名学生被捕。



——依据的就是第145条。民间歌手佩特·西格 (Pete Seeger) 的女儿米卡·西格 (Mika Seeger) 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抵抗运动也在继续顽强地反击，掀起了对政府残忍的过激行为越来越广泛的抗议。8月27日，由大约30万到40万人组成的一个大型的反政府游行队伍从位于查普特佩克 (Chapultepec) 公园的人类学博物馆，经过种满鲜花的列弗玛大道 (Paseo de la Reforma)，沿着华雷斯 (Juarez) 街而上，直到墨

士兵把枪口对准一栋工人宿舍楼，准备对付随时可能发生的起义。





“这是一个兽群组成的政府，人们过着苦难的日子”：迪亚斯·奥达兹 (Diaz Ordaz) 名字的双关语。(Ordaz 与“兽群”的英文 hordes、Diaz 与“日子”的英文 days 谐音——译者)

当集会结束时，学生们把旗帜和标语牌插在广场上，宣布他们将驻扎在那里，直到政治犯被释放。那天晚上，篝火烟雾中烤玉米饼的味道，吉他、说话和唱歌声让整个广场洋溢着一种节日的气氛。凌晨4点，当学生们正躺在地上熟睡时，4000名伞兵、步兵和军警开进广场，不问青红皂白就开始棒打脚踢，把示威者逮捕拖走。当惊慌的学生朝旁边的街道逃跑时，八辆装甲车炮口低垂，警笛尖叫，直冲他们而来。

现在能躲避政府治安部队的地方就只有那些占领的学校了。9月初，这些地方比以前防护得更加牢固了，而且还配备了砖块和玻璃瓶，用来抵抗野蛮的军警的进攻。

奥运会将于10月12日开幕。政府要么缓和局势，撤回防暴警察，并释放部分被拘留者，要么使局势恶化升级。

他们选择了后者。

9月18日晚，武装部队进攻并占领了

西哥城的左科罗宪法广场。这一次不仅是学生，加入他们的还有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更有组织起来的铁路工人、油井工人、电工、出租车司机和推车小贩，以及从偏远村庄来的一些农民。

游行者们举着民族英雄艾米里阿诺·扎帕塔、贝尼托·华雷斯 (Benito Juárez)⁶、米盖尔·依达尔戈 (Miguel Hidalgo)⁷ 的画像，还有被囚禁的铁路工人领袖德米特里奥·瓦雷约 (Demitrio Vallejo) 和藹的头像。标语牌上奥林匹克的五个环被画成了五个冒着烟的炸弹，其它的牌子上则画着一个正在奔跑的军警，高举着的警棍就像一只奥运火炬。图片文字写着：“墨西哥：镇压项目的金牌得主”和“我们不是煽动者，饥饿和无助才是煽动者。”

“人民联合起来！不要让他们用坦克和鬼话统治你们。”



主要的大学建筑，还击退了学生试图夺回它们的三次进攻。几十人被捕。这是对抗议者大规模进攻的序幕，其后的野蛮行径将震惊整个世界。

位于特拉特洛可广场 (the 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 旁的技术学校，也就是第七职业学校，在夏天时是最坚固的武装据点。〔这个广场位于市中心附近的奇奥达·特拉特罗科区 (the Ciudad Tlatelolco quarter)，曾经是抵抗科尔特斯 (Cortes)⁸ 率领的西班牙侵略军、保卫阿兹特克文明⁹ 最后的也是最英勇的战场〕。9月22日晚上发生的一切，被附近的居民看得一清二楚。其中的一个居民回忆道：

“6点钟的时候，我从厨房的窗户望出去，看到整个小区已经被军警包围。我从来没有见过在一个地方聚集这么多的部队，这还仅仅是我能看得见的。不过学校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固——尽管学生们没有什么武器，或者说有武器但他们从来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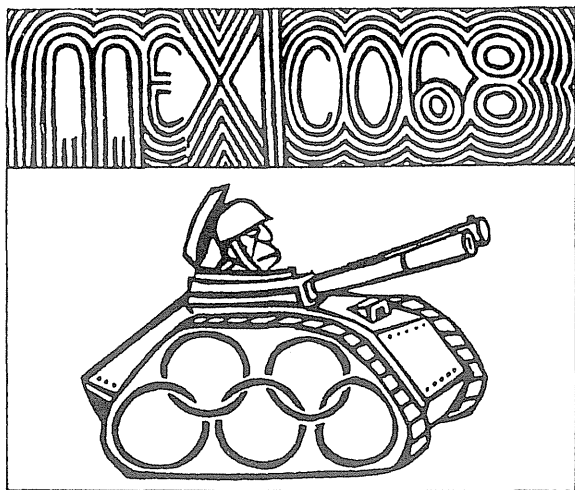
“学生们至少用了10辆巴士筑起一道防线，把车里的汽油放了出来，然后一栋屋一栋屋地搜集玻璃瓶和碎布。接着，他们帮助那些住在廉租房——ISSSTE (全称为“墨西哥政府雇员社会安全协会”) 内的人们做同样的准备。说实话，这是诱使军警进入大楼的圈套，而他们自己则不会从里面走出来。

“大约6点30分的时候，军警开始从各个方向聚集到这个地方，从卡乐·阿尔马斯内斯 (Calle Almacenes)，从改革广场 (the Reforma)，从曼纽尔·冈萨雷斯 (Manuel González) 和圣胡安 (San Juan de Letrán)，成千上万地来到这里。直升飞机在头顶盘旋，察看学生们设置的防御工事，然后发现从高空没法看到什么，就在大楼间穿梭，做低空飞行。有时候飞得特别低，学生们都可以直接朝它们扔石头和脏物。

“快到6点30分的时候，一组军警被派出去推倒组成防线的一辆巴士，好给部队打开通道。我估计这把学生们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这一切很快就完成了。军警先发射催泪弹，然后拥了进去。但是呆在学校里面的学生并不是很多。而在里面的又大多在屋顶上，而且早有准备，脸上都蒙着湿手帕。他们把石头、



“游客：想看墨西哥吗？来我们的监狱看吧。”



战火奥林匹克。

燃烧弹还有警察扔的催泪弹从高处雨点般地砸向下面院子里的军警。

“就在这时，看到军警进了大楼，从四周街区寓所的窗户发出一声大喊——或者说是一千声大喊：‘ABAJO ASESINOS!’ ‘MUERA DIAZ ORDAZ, ASESINO!’ 就在这些房屋的顶上，藏着更多的学生，他们从附近收集来的石头、砖块和玻璃瓶，足够他们抵挡一段时间。就这样，战斗扩大了。军队和军警不再注意学校了，实际上，学校也是攻不进去的。他们开始对廉租房内的人们实施攻击。这场战斗——在平民和国家军队之间——持续了两个小时……”

“而在这段时间里，喊叫声从未间断。‘ABAJO ASESINOS!’ ‘MUERA DIAZ ORDAZ!’ 9点钟，军警和士兵开始撤退。应该记住的是，参与这场战斗的学生还不足百人，其余的都是普通百姓。不光是男人，还有女人、小孩和老人。军警把催泪弹打进廉租屋的窗户，放火烧房子，人民当然要起来战斗，要把军警赶走。

“9点30分，人们袭击了位于第七职业学校正对面的外交部。即使在人们放火烧着了外交部之后，警察也只是靠近了一点，而不敢穿过废墟到大楼附近来。

“这期间，学校里一直悄无声息，但楼顶上的喊声却仍在回荡：‘ABAJO ASESINOS!’ 这时已是黎明了，趁着晨曦，上千人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有的步行，有的坐公交，有的开汽车。他们带来了食物和汽油，甚至还有钱，或者就是想来表达他们对特拉特罗科人们的支持。

“我想，墨西哥的人民不会希望把军队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普通平民。无论如何，墨西哥人已经有过一场革命，他们知道怎样战斗。”

警察部队暂时撤退了。但他们还会回来。

〔注 释〕

1 核心家庭 (Nuclear family)，指只有父母和孩子的家庭，与祖父母、已婚子女数代同居的大家庭 (Extended family) 相对。

2 尼克松 (Richard Milhous Nixon, 1913—)，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 (1969—1974)，共和党人，因水门事件而被迫辞职。总统任内访问中国 (1972)，与周恩来总理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开辟了中美邦交正常化的道路。

3 艾米里阿诺·扎帕塔 (Emiliano Zapata, 1879—1919)，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时期南方农民起义的领袖。1910年发动莫雷洛斯 (Moreles) 州农民斗争，影响巨大，先后推翻了迪亚斯和胡埃塔塔独裁统治。1919年遇害。

4 潘丘·维拉 (Pancho Villa, 1878—1923)，原名多罗特奥·阿朗戈。墨西哥革命和游击队领导人。1909年加入F·马德罗领导的反对迪亚斯独裁统治的起义。1920年推翻卡兰萨政府。1923年遭暗杀。

5 迪亚斯·奥达兹 (Diaz Ordaz, 1911—1979)，1964—1970年为墨西哥总统。


6 贝尼托·华雷斯 (Benito Pablo Juarez, 1806—1872)，墨西哥民族英雄、总统 (1858—1872)。出身印第安家庭。1847—1852年任瓦哈卡州长时，组织人民反抗美国的入侵。1859年颁布废除僧侣和军人特权的改革法即《华雷斯法》。1862—1867年粉碎拿破仑三世对墨西哥的侵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7 米盖尔·依达尔戈 (Miguel Hidalgo, 1753—1811)，墨西哥独立战争领袖，民族英雄。1810年9月16日，在中部瓜那华托州的多洛雷斯 (Dolores) 村发动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史称“多洛雷斯呼声”。1811年革命失败被捕，7月遇害。在大多数墨西哥人的心目中，依达尔戈神父的名字是独立运动的象征。9月16日被定为墨西哥独立日。

8 科尔特斯 (Hernando Cortes, 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1518年率探险队前往美洲大陆开辟殖民地，1523年征服墨西哥。

9 阿兹特克 (Aztec)，墨西哥印第安人，约自公元1200年起在墨西哥中部建立帝国，1521年为西班牙殖民者征服。





1968

10月

“政府里的那些绅士都是行尸走肉。
正因如此，他们屠杀我们。”

——何塞·里胡塔斯 (José Revueltas)。

运动的开始——何塞·奥罗斯科 (Jose Orozco) 的一幅壁画，描述了艾米里阿诺·扎帕塔和潘丘·维拉领导的1911年墨西哥革命。



“让古图 (Cueto) 和他的奥达兹去死。学生万岁！”一张向墨西哥警察局长和总统抗议的传单。奥达兹 (Ordaz) 被读成了“霍达斯” (Hordas), 即 hordes (意为“兽群”——译者)。

奥运会前夜，即10月2日发生在墨西哥城的屠杀学生抗议者的行为让整个西方世界认识到了墨西哥的血腥面目。过去几十年里，墨西哥一直是一个真正的一党国家，执政的革命制度党的领导夸口说，他们可以教苏联共产党几招，教他们如何把权力握在手里。和苏联共产党一样，革命制度党也有一个激进的过去。它的历史可以直接追溯到领导了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农民领袖潘丘·维拉和艾米里阿诺·扎帕塔。

扎帕塔受到爱戴，源自他反对地主的坚定立场。1911年11月他宣布他的计划时说：

“要让世人都知道，那些被大庄园主以专制暴政和司法腐败掠去的土地、森林与河流，马上就会回到有权力拥有它们的那些人手中，这些财产完全是背信弃义的压迫者从他们那里抢夺过去的。为了保卫这些所有权，他们将武装斗争

到底。”

和多年之后的切·格瓦拉一样，扎帕塔被惧怕他的掌权者秘密谋杀了。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使墨西哥成了拉丁美洲少数几个能见得到印第安人笑脸的国家之一。

这个国家还孕育了生机勃勃的艺术传统，随处都可以见到向世人倾诉的壁画。它诞生了20世纪最伟大的壁画家——迪亚哥·里维拉（Diego Rivera）。墨西哥的画家们，包括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里维拉的妻子）、西盖罗斯（Siqueiros）和奥罗斯科，大部分被认为是墨西哥左派各分支的成员。他们为人民说话，捍卫人民的权力。30年代，拉萨罗·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在台上的时候，这些艺术家还得到了国家补助金的鼓励和支持。

但1968年前后，制度革命党开始僵化了。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腐败，只为有钱的精英服务。不过，它仍容许一定的新闻和文化自由（这和苏联那一帮不一样），只要不威胁到它独占权力，它可以对攻击政府的文字视而不见。

1968年仍受人们拥护的墨西哥政治家只有拉萨罗·卡德纳斯，因为他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实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劳力重组，推行有利于本土资本的税收政策。卡德纳斯是惟一个解除了大庄园主的政治权力、并把他们的土地重新分到饥饿的农民手上的墨西哥领袖。在他1934年成为总统之前，总共有1700万亩土地被重新分配。而在他执政的6年之中，3400万亩土地以集体所有的形式从地主手里转移到了村社。1968年时他仍健在，住在墨西哥北部的一个农场里。年初的时候，雅奇（Yaqui）——一个好斗的印第安部落——要求见他。酋长们戴着在节日里才戴的羽毛，非常热情地迎接了他。他们已经有30年没有见过他了。

“您可记得，拉萨罗？”他们问他，“您把土地还给了我们。您给我们医院和学校。您记得么？我们想让您知道，富人把土地又夺回去了。医院变成了兵营。学校也改做了酒吧。”

卡德纳斯听着，眼睛里满是忧郁。他知道他的接班人把他的改革都颠覆了。他心底里厌恶新的革命制度党和现在的党魁——迪亚斯·奥达兹。他清楚在今天的墨西哥，有钱的人压迫欺凌没钱的人。

1968年的奥运会将在墨西哥城举行，这让爱慕虚荣而自满的革命制度党领袖们兴奋不已。奥运会会给他们带来名誉和金钱。但大学里日益上升的不满情绪与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呼声使他们很不耐烦，快乐也因此被冲淡了许多。他们

决心不让抗议者破坏他们的光辉时刻，奥运会一定要如期进行。

他们很坚决，但高举着扎帕塔和格瓦拉巨大头像的学生同样坚决。这是一群心里装着历史的学生。他们怀念扎帕塔。他们怀念卡德纳斯和头一年遇害的一切。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是不会让奥运会举行的。但是，他们手无寸铁，而他们的敌人是革命制度党控制下的武装部队所代表的墨西哥国家。这个国家将在整个世界的面前显示它的力量。

10月2日晚，在奥达兹总统的直接命令下，部队朝正在特雷·古乐图哈广场听演讲的一万多人开火。六十多人被残忍地杀害，还有一百多人受伤。

作家何塞·里胡塔斯写道：“政府里的那些绅士都是行尸走肉。正因如此，他们屠杀我们。”

2日

墨西哥，墨西哥城 屠杀之夜

这天晚上，约一万人聚集在特雷·古乐图哈广场，听学生发言人通过设在周围街区寓所一个阳台上的麦克风宣布，决不放弃对公民自由权的要求，不管奥达兹政权派来多少武装部队和军警。

本来今天晚上还有示威游行的计划，但是现在阳台上年轻的发言人正试图劝说大家取消游行。

“校园里现在有22卡车的士兵，14辆装备了机枪的吉普，还有许多坦克，”他解释道，声音在广场周围的大楼间回荡，“我们的委员会不相信无谓的流血牺牲。我们请求你们在这次会议结束后回家去。”

人群中传来了一阵轻微的嘘声，但他们是善意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住在附近的居民，他们头一个星期就加入了和军警的战斗——老人、妇女、男人和小孩，还有学生们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学生在人群中穿行，散发着传单。

头顶盘旋的直升飞机此时又增加了一架。突然，人群后面传来一阵不安的骚动。一架直升飞机朝渐渐黑下来的天空发射了四颗绿色的照明弹。

“不要动，别理会他们的挑衅，”学生发言人喊道。但是人群已经慌乱了，都朝广场中心跑，以避免后面的士兵。阳台上突然一片混乱，隐藏已久的特务勒住了学生的脖子。其他学生领导都在楼上阳台，而那里的特务更多。从人群的后面传来了机关枪震耳欲聋的哒哒声。

军队从广场的各个方向冲了进来，对着四散而逃的、尖叫的人群疯狂地扫射。子弹纷飞，把公寓楼每一扇窗户的玻璃都打得粉碎，墙上也溅起无数的碎石。一处公寓楼区燃起了大火，四处的灯光都灭了。然后下起了雨，雨水倾盆似地浇了下来，人们奔逃、滑倒、尖叫，也分不清是死是活，都拼命逃离这屠杀场。

墨西哥大学的学生玛利亚·爱丽娜（Maria Elena）回忆说：

“那天我和我15岁的弟弟一起去的。他是一个职业学校的学生，并不十分热衷于政治，只是刚接触而已。枪声响起的时候，我们在广场的南端，离阿兹特克废墟不远。我们先是看见了绿色的照明弹，也看到了阳台上发生的事；然后，后面就传来了机枪的哒哒声。马上，我们就被卷进了一大群人当中，万分惊恐地逃命。

“我听见弟弟喊：‘别丢下我。’我们紧紧地抓住对方的手，朝着右边跑，向废墟处的公园挤去。许多人已经在那里了，都希望在这里躲避让人心惊肉跳、到处乱飞的子弹。子弹的呼啸声压过了其他的声音；打到废墟石头上的子弹激起的碎片下雨一般地落下来。

“我仍然死死拽着弟弟的手，不让别人把我们冲散了。我努力地把她往自己身边拉。挤到我们中间的学生许多都摔倒了，有的是被打死了，有的是受了伤。我边上的一个女孩，脸上中了一颗开花弹——真是可怕。她整个左边脸都给打烂了。你能看见她的牙齿和上腭，可她自己还一点都没有意识到。

“呐喊声、惨叫声、哭泣声、哀求声和持续不断、震耳欲聋的枪声把特雷·古乐图哈广场变成了人间地狱。我拉了拉弟弟的胳膊。

“‘朱里奥，你怎么了？’我又拽了拽他。他眼睛半闭着，透出很悲伤的神情，我只能模糊听到：‘就是那……’”

“我当时来不及想任何事情。人群不断地拥来，我什么都听不清。后来我想，要是我当时就发现朱里奥马上要死了，我肯定立刻就会在那里做出些疯狂的举动来。渐渐地，人们给我们让出空来，于是我可以更靠近弟弟了。

“‘朱里奥，说话呀。’”

“‘他肯定是受伤了，’一个女人告诉我，‘把他的腰带松开。’”

“渐渐地，然后又突然地，我明白了可能发生的事。我松开他的腰带，手却滑进了一个伤口。现在，弟弟就在身边，我可以抬起头来，看看周围的情形了。我的第一印象是广场上躺满了人，活着的和死去的混在一起。我的第二反应是



10月3日，墨西哥警察在特拉特罗科街头屠杀了25名学生。照片的拍摄者罗兰·拉内兹博格（Roland Ranetsberger）也被捕了。被捕前，她把胶卷偷偷递给了一个逃出来的妇女。

我的弟弟被子弹打得浑身是孔。他的肚子、脖子和腿上都中了弹。他马上就会死去，就死在广场上。”

五十多人死在了特雷·古乐图哈广场上，还有数百人受了重伤。第二天，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²（Brundage）先生宣布：“我们从墨西哥政府那里得到保证，不会有任何事情阻止奥林匹克火焰在10月12日平安进入体育馆。我们完全相信，素以运动精神和热情好客闻名于世的墨西哥人民，必定会同奥运会的参赛者和观众携起手来一同庆祝这次盛典，因为它是动荡世界中真正的绿洲。”

在其他国家，人们对屠杀感到恐怖、震惊和愤怒，一场抵制奥运会的运动马上便点燃了。在尼加拉瓜，抗议的学生用石头攻击墨西哥使馆，并拿走了使馆的馆徽，说要等到墨西哥政府有了与其人民相配的使节之后再归还。在阿姆

斯特丹，学生们占领了墨西哥总领事馆以示对大屠杀的抗议；他们还在领事馆上空升起了一面红旗，缅怀倒下的同志。美国是迪亚斯·奥达兹政府最重要的朋友，圣地亚哥和智利的学生就在美国领事馆外游行示威，用棍子和石头对抗智利的防暴警察。数千名学生在米兰、斯培西亚(La Spezia)³、佛罗伦萨和罗马，在巴黎、格勒诺布尔(Grenoble)⁴和伦敦举行大规模的游行。

“如果因为政治家违反人道法律就要停止举办奥运会，那么就永远不会有任何国际比赛了。”布伦戴奇评论道。

10月6日，奥林匹克火炬由墨西哥游泳运动员以接力的形式在韦腊克鲁斯(Veracruz)⁵登岸。一群群人数众多的抗议者在水边站成一排，悲愤地哭喊着，最后他们被伞兵用来复枪的枪托击退。与此同时，美国黑人运动员正计划着奥运期间他们自己的抗议活动。

5日

英国，北爱尔兰，德里 奥兰治规则和奥兰治党⁶

这天下午，德里(Derry)⁷街头聚集的民权游行大都来自天主教街区的工人阶层，这些街区是英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失业率常常高居27%。在北爱尔兰基于财产多少的“独特”的选举制度中，这儿的许多家庭在市级选举中没有选举权，因为他们不是纳税人。而另一方面，当地的富豪巴希尔·麦克法兰爵士(Sir Basil McFarlane)却能有26张投票权。这样选举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由托利党和统一党一起把持的市政府，盛气凌人却又无所作为。德里的住房危机非常严重，但在过去的三年中，市政当局却只建了15座新房。今年2月，当地租房住的人们联合起来，组成了“德里住房行动委员会”(Derry Housing Action Committee)。他们没有选举权，因而效法几年前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来抗议。为了使贫民区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他们在市政会议时游行，组织房客集体抗租，封锁坏房东的家，帮助一个四口之家用帐篷封堵德里的一条主要街道，而这一家只有这个帐篷可以栖身。

随着这场运动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阶层加入进来，涉及的问题也越来越广泛：北爱尔兰不同宗教之间在居住、职业和政治方面的制度差异。虽然参加者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但是这场运动却完全是民权的而不是宗教的，更不是共和主义的。

争取民权的游行共吸引了一千多人参加，超过了组织者的预期——尽管北

爱尔兰内务大臣威廉·克莱格（William Craig）在游行前一刻发布了禁止令。游行队伍进发时，多少带着点恐惧，但同时也是斗志昂扬、生机勃勃。

公爵街（Duke Street）上，两排爱尔兰皇家警察部队堵住了他们的去路，一个个都把警棍拔了出来。游行队伍停下来商量对策。一个人想劝大家回去，喊道：“我们今天到了这里，就已经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但是，大伙的决心早定。

“墨西哥的学生是怎么做的？”

“还有越南那里呢？”

但是人群被堵死了，没有什么空间采取任何行动。警哨响了。几秒钟时间，公爵街就成了战场，激荡着警棍打到身体上的声音、从屋里向外观望的妇女发出的尖叫声和游行者的喊叫声。人们躲到商店的门廊里，但是，警察仿佛并不只是想把慌乱的人群驱散，而是要把他们一个个全都打翻在地。

一个实习记者、18岁的马丁·考利（Martin Cowley）出示了采访证件，但却仍然被地区巡查官罗斯·麦克金普希（Ross McGimpie）一次次打倒在地。另一个人被两个警察抓起来甩到墙上，掉下时断了一条腿。高压水枪也抬了出来，把试图逃跑的人群又冲回到警察的手底下。

游行队伍被赶回了天主教居民区。在那里，他们筑起路障抵抗警察，附近的居民都奔来帮忙，尤其是小孩。燃烧弹、砖块和石头堆积到路障旁。居民房变成了伤员中心，受伤的人都被抬到了家里。二十多人被送进了医院。

游行示威者之一的安妮·科尔（Anne Kerr）8月份在芝加哥参加了民主大会，她告诉记者说：“这里警察的手段与芝加哥的防暴警察一样毒辣。与今天在伦敦德里（Londonderry）所使用的方法比起来，3月份在格罗夫纳（伦敦）广场英国本土警察所使用的手段，就好像是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开的一场花园舞会。”

北爱尔兰省的内务大臣威廉·克莱格是一个强硬派统一党人。他马上跳出来为他的手下辩护，称当时绝对没有任何不必要的暴行发生。有人指控阿尔斯特皇家警察蓄意用警棍击打游行者的私处。对此，他回答说：“警棍使用条例规定：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游行者的伤害，警员应尽量击打腿部。”

第二天是星期天，冲突仍在继续，警察再次与试图从公爵街前往城门的人群发生对抗。人群被警棍击退。路障又设立了，水枪也抬了出来，人们开始和警察打游击战。夜幕降临时，伦敦德里的阿特纳杰尔文（Altenagelvin）医院



1968年10月，北爱尔兰德里市的第一次民权游行。

据报道已有96名伤员。人们要求克莱格辞职，在他贝尔法斯特房子外面竖起了一根木桩，上面写着：“克莱格恶棍”和“给伦敦德里一个公正的政府”。但是，这位大臣没有丝毫悔罪之意。

接下来的星期三即10月9日，一个庞大的民权游行队伍从贝尔法斯特的女王大学出发，到贝尔法斯特市政厅外静坐示威。爱尔兰统一党领袖艾恩·佩斯利 (Ian Paisley) 组织了反示威。一千多个支持他的人也聚集到市政厅附近，与静坐示威的学生和两排爱尔兰皇家警察相距约百码之遥。佩斯利的追随者唱着“德里墙” (The Derry Walls) 和其他奥兰治歌曲，奚落拿着联合王国国旗的学生。夜幕降临，寒冷的秋风吹过里能霍尔大街 (Linenhall Street)，双方紧张地僵持着。一位绝望的学生领袖拿着扩音器呼吁民权抗议者解散：

“如果今晚在贝尔法斯特发生流血冲突，整个北爱尔兰都将会回到暴力和屠杀的日子。我们已经达到了目的，现在让我们带点尊严回家吧。”

《卫报》驻北爱尔兰的特派记者在评论那五天的抗议时，写到了北爱尔兰的高失业率，尤其是许多人根本无望找到固定工作的天主教地区；写到了当地选区的不公正划分；当地政府把选举权与财产的资格限制联系在一起；以及统一党议员依据亲疏来分配市建住房：

“如果这些真实、深切的痛苦一直被压制着，它终将有一天会爆发。如果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英国议会所在地——译者）或者（更加不可能）斯多蒙特（Stormont，受统一党控制的北爱尔兰议会所在地）不采取一些矫正措施的话，那势必会有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发生。

“有些人觉得爱尔兰统一党党员比卡尔·马克思还要马克思，他们利用选民对宗教的关心，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工作、食物、教育和家庭上转移开来，这么做也许已使他们有点疯狂。统一党领袖们仍旧敲着奥兰治鼓，刺伤着教派的旧伤，挑逗（新教的）大多数反对（天主教的）极少数，收取偏执的果实，以此维持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他们的势力之大，不仅使得天主教徒，而且使得拒绝加入奥兰治俱乐部的自由主义新教徒都成了二等公民。”

12日

美国，旧金山

“那狗娘养的约翰逊”

旧金山一万五千多人参加的反对越战的游行因为五百多现役美国大兵的出现而沸腾起来，他们也在为反战而游行——尽管一支强大的宪兵部队正试图阻止他们。在公民中心的集会上，一个越战老兵向人们讲述了他们的露营地如何被越共的炮弹轰炸以及他的两个朋友惨死的情形：

“当彭斯跌跌撞撞地从掩体里爬出来，倒在拉利·克莱格的怀里时，他咕哝的不是‘那些狗娘养的越共’，也不是‘那些狗娘养的共党’。他反复咕哝的只有一句：‘那狗娘养的约翰逊，那狗娘养的约翰逊……’”

13日

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纳布卢斯

巴勒斯坦人的流放

数百名阿拉伯女学生在纳布卢斯(Nablus)的大街上游行，抗议以色列人占领他们的城市。巴勒斯坦人还没有从1967年的战争和“新以色列”侵略性的扩张主义政策的阴影中走出来。女学生举着的旗帜上写着：“我们绝不投降”、“我们绝不移民”、“我们绝不会向占领者屈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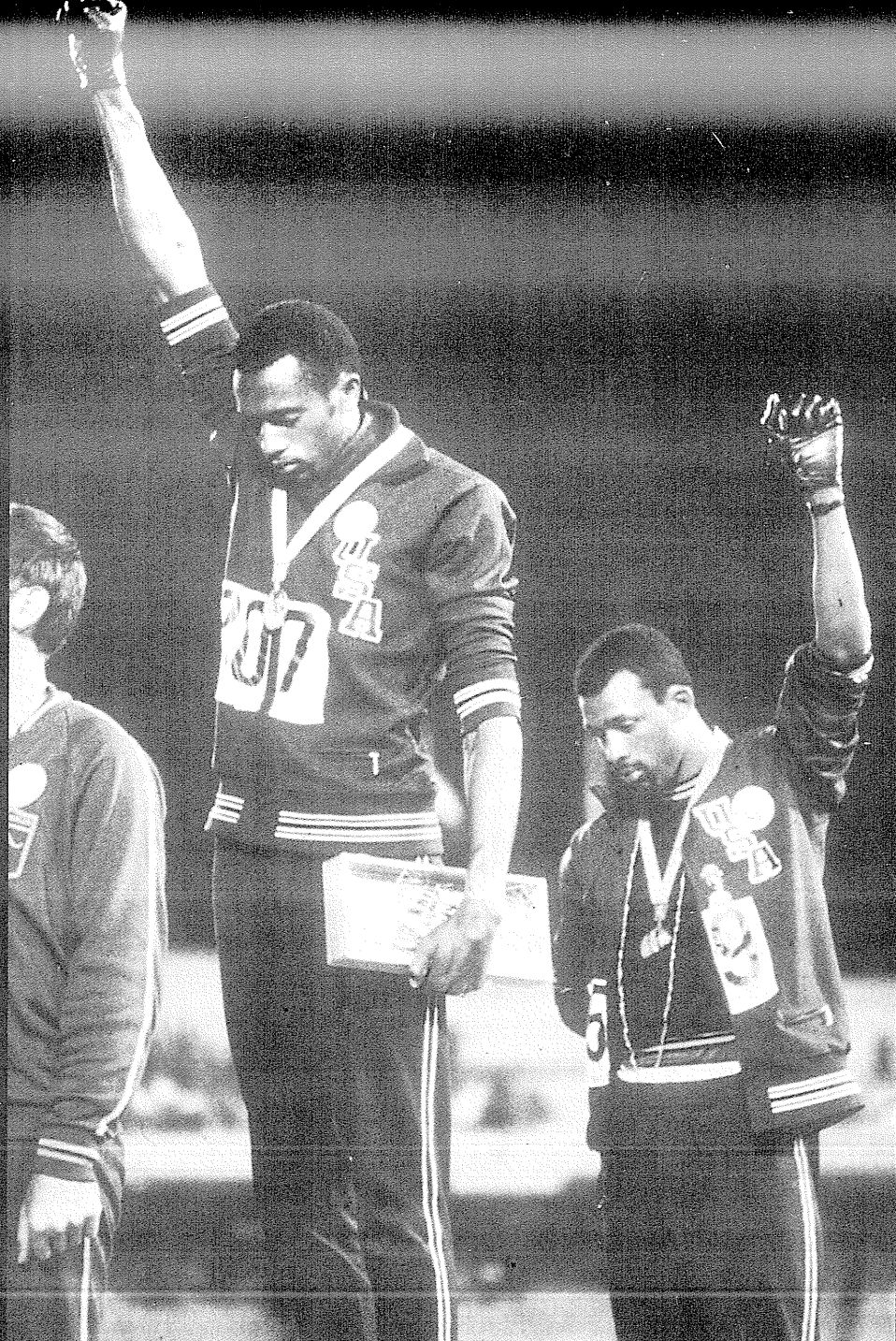
以色列的武装警察封锁了军队司令住所的门口，驱散游行队伍，真枪实弹地朝这些女孩的头顶上方开火，用高压水枪向她们喷射红色的水。这样，她们在后来的挨家挨户的搜捕时就容易辨认了。

一位巴勒斯坦的老妇人，法德瓦·图坎（Fadwa Tuqan）这样描述她把自己重新定位为民族女诗人的痛苦过程：“诗歌成了我灵魂和思想的全部，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我沉迷在自己全新的世界里，品尝幸福的滋味。我沉醉在创造自我、重获新生中……”她的诗歌“丢失在荒野中的脸”披露了这个经历：

而我的生命继续着——
 风把我融进我的民族
 在满是巨石和荆棘的可怕路上。
 但是在河流的后面，黑压压的长矛
 晃动着成长；怒吼的暴风雨
 揭开神秘，赐予沉默的巨龙
 言语的力量。
 冲动与喧嚣，烈焰与星火
 照亮了路——
 一群接一群
 倒下，拥抱同一种崇高的死亡。
 黑夜，不管有多长，将会继续
 孕育星星复星星，
 而我的生命继续着，
 我的生命继续着。

16日 墨西哥，墨西哥城 黑人权利

当男子200米项目的两位美国黑人获胜者——金牌得主汤米·史密斯（Tommye Smith）和铜牌得主约翰·卡洛斯（John Carlos）——在演奏美国国歌的时候，举起他们的拳头行黑人权利运动的致敬礼时，墨西哥城庞大的奥林匹克体育馆内一片寂静。这个抗议无声、高贵、感人，让人不由地想到黑人悲惨的境遇：无数人已死去，还有成千上万要继续活下去，就在整个观望他们



墨西哥奥运会上获胜的美国运动员行握拳礼,表示对美国黑人和墨西哥学生斗争的支持。

的世界的眼前。

“我们是黑色的，我们因为自己在白种美国人中是黑色的而骄傲。”卡洛斯后来在一个国际记者招待会上这样说道，“美国黑人清楚自己游行的意义。我们不是供展览的动物在做表演……”

第二天，这两位运动员被美国队开除，理由是“把政治同体育运动搅和在一起”。

“他们违反了作为运动员的基本标准和行为准则，而这在美国是很受重视的。”美国队的领队说，“因此才被立即从队里开除，并被勒令从奥运村里搬出去……如果美国队有其他队员重复这样的事件，肯定会招来最严厉的惩罚。”

然而，领队的威胁第二天就有了回应。另外三名美国黑人运动员——李·伊万斯（Lee Evans）、拉利·詹姆斯（Larry James）和隆·弗利曼（Ron Freeman）——登上男子400米比赛的领奖台领取金、银、铜牌，在美国国歌奏响时，他们举起了拳头行黑人权力礼。

20日

巴西，里约热内卢 切的遗产

美国的威斯特摩兰将军此时正在里约热内卢，在一个拉美国家的将军们参

运动：计时的监狱， 颠覆墨西哥奥运会！

很少有自我标榜永恒的观念遭到像运动是非政治行为这个观念那样少的攻击。就我所知，还从没有人说过整个这件事可能有悖于社会的道德规范。

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说明运动是应该反对的。

1. 它鼓励“好胜精神”；
2. 就目前的组织形式而言，它鼓励

最原始的国家主义；

3. 对“身体比例适当”的强调从根本上来说是军国主义的；

4. “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这一观点（言下之意即美丽的就是好的）是法西斯的。

不过，在现今的社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运动现在成了人们的麻醉剂。

运动最多只能为劳动阶层提供从劳作中“逃离”的假象。那些大牌运动员的自大和普遍的反社会情绪并不奇怪，只

要你想一想他们大多是出身劳动阶层的“成功者”就明白了。在以前，成功者所得的不过是能开一间小酒店或是运动服饰商店。无论如何，这是个进步。（北爱尔兰的足球运动员）乔治·贝斯特（George Best）的奢侈品也只是方式改变，本质并无二致……

然而，少数的成功被用来证明整个体制的合理性。最直白的表现是，当李·特维诺（Lee Trevino）夺得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冠军时，头版头条的新闻中洋溢着从穷人 to 富豪的欢乐气氛……

另外一种形式——奥运会——原本一直是用来体现制度和谐的好处，终于也招致批评。因为黑人运动员集体要求退出美国奥运队，也因为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⁸重新上任等因素，人权计划组织指出，传说的运动场上的“和谐”是虚假的。

对黑人运动员来说，成功的几率非

常小。但却总有数千人为了这伟大的一刻耗费他们宝贵的青春。还有成百上千的人因为同黑人明星有牵连而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对一个黑人田赛运动员来说，面对退出奥运会，或者是搅乱奥运会秩序而受到暴风雨般的辱骂，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也许他要考虑的事情会更多——白人报纸可能说这种行为只是纸老虎。

但是后来的事实将证明他们错了：这些提议的冲击所波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表面的涟漪；如果不理会其中传达的信息，即人民不可能永远被愚弄，那么，不仅是美国的体育界，而且整个世界的体育都会开始崩溃。

假如以前很少有人考虑过的“非政治的运动”成为革命的火种，这将是极具讽刺意味却又完全在意料之中的事。

戈登·皮特斯（Gordon Peters），《黑侏儒》，1968。

加的大会上作报告，谈他在越南战场上的教训。所有最新的“反叛乱”战术都在讨论之列，包括预防性地使用空军力量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村民，以保证他们在将来不敢向附近的年轻游击队员提供食物和藏身之所。

“格瓦拉的革命理论——‘制造两个、三个乃至更多的越南’——是非常危险的。”威斯特摩兰说道。将军们点头称是。切的精神现在在玻利维亚很受尊崇，许多农民家里都有供奉圣·厄内斯托⁹的神龛。在哥伦比亚和乌拉圭活跃着几支游击队伍；今年夏天，乌拉圭著名的图帕马罗¹⁰（Tupamaro）游击队绑架

了当地臭名昭著的政治寡头、地主和电话公司的老板皮雷拉（Pereyla）。图帕马罗源自18世纪一个南美印第安首领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他领导了一场为期两年的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革命。游击队员几天后便释放了皮雷拉（他们把他关在一个农舍里，让他享用古典音乐和切·格瓦拉作品组成的大餐）；然而这是在他们的学生支持者砸碎了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乌拉圭首都）大街上每一块可口可乐的广告牌之后。

在危地马拉，尽管在美国“顾问”的帮助下，政府对支持游击队的西部山区村庄进行了陆地和空中的疯狂攻击，游击队仍在继续战斗。委内瑞拉的情况也一样，数百名经过特别训练的反叛乱部队在“美国绿色贝雷帽”的协助下，与游击队交上了火。

更糟的是，拉丁美洲的部队根本靠不住。秘鲁那些年纪轻轻的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被从利马派进深山后，被那里农民的生活条件所震惊，他们原本是被派来镇压农民的土地没收运动的，现在反过来成立了左派团体，接管了油井，还把国家出版社移交给工人和农民的组织去经营。

同样地，在葡萄牙的殖民地——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几内亚，年轻的葡萄牙军官在先前接受反叛乱训练时阅读法依、毛泽东和格瓦拉的书，现在却身受其害：1975年时，他们把从“敌人”那里学到的东西用到反对自己国内政治寡头的群众起义中。

甚至就在威斯特摩兰讲话的时候，仍能听得见外面年轻的抗议者的声音。数千名孩子不顾被巴西军政权逮捕和折磨的危险，在外面的车辆间钻来钻去地与武装部队周旋着，他们喊着：“滚回家去，威斯特摩兰！越南必胜！”



法国左翼报纸向墨西哥学生致敬。

22日

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 斗争仍在继续

尽管有州长罗纳德·里根和其他人的阻挠，黑豹党领袖艾尔德里奇·克里弗还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校园里做了他的第一场讲座，但是学校当局却拒绝授予参加讲座的学生学分。警察逮捕了随后为抗议这一决定而静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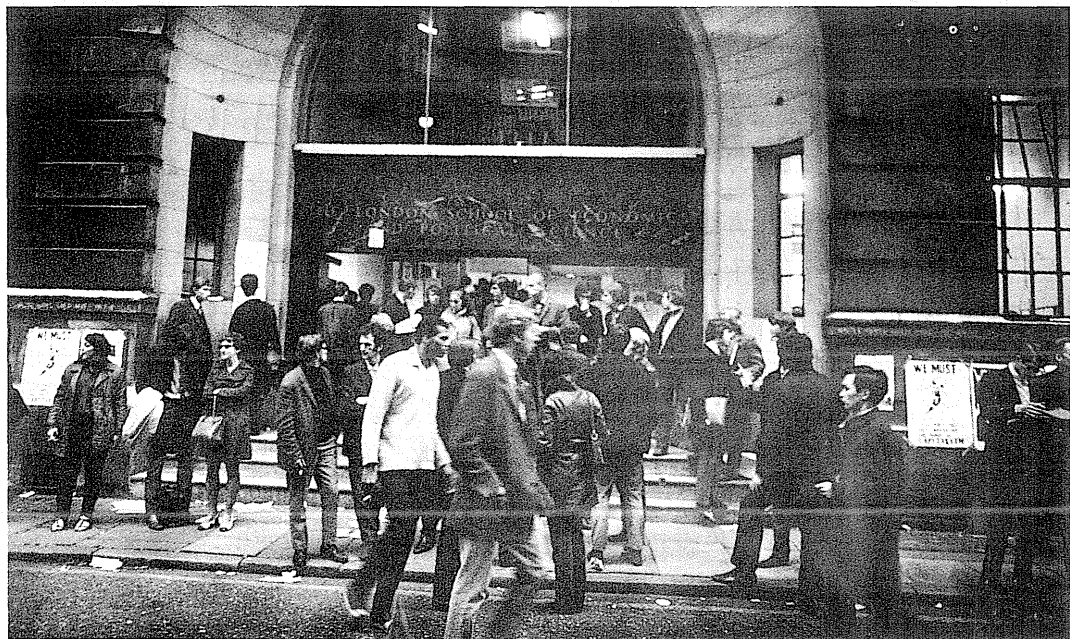
121名学生，把他们带走接受指控。学生们占领了大学的一个大礼堂以示反击。他们堵住了门，要求特赦被逮捕的同志。黎明前，门被撞开，大批加州警察冲进了礼堂，把墙上装饰的红色和黑色的旗帜扯了下来。学生们都被赶进了外面等着的警车里。

26—27日 英国，伦敦 到大街上游行

伦敦经济学校的学生占领了自己的学校，为参加第二天庞大的反越战集会和政治讨论会的抗议者提供庇护所。除了设立“10月27日法律保护委员会”的律师外，还有八位医生和护士也将参加游行。周末，五千多人不顾当局关闭学校的企图，拥进了伦敦经济学校。学生主持的关于“革命的社会学”、“殖民革命”和“与资产阶级文化作斗争”的论坛吸引了大批听众。

10月27日，历史见证了伦敦街头规模最大的一次反越战游行：将近十万人沿着白厅游行，50人一排，手挽着手，高呼：“胡，胡，胡志明，民族解放阵线必胜！”

支持10月27日游行的学生占领伦敦经济学校。





捷克人聚集在拉德肯尼 (Hradcany) 城堡外纪念独立50周年，高呼“杜布契克万岁！”

然后解散。结果没人管我们，事情也就像说的那样进行了。”“越南团结运动”的一位发言人说道。

米克·杰格 (Mick Jagger) 是这庞大游行队伍中的一员，他之后写了歌曲《街头战斗的人》(Street Fight Man)。英国的唱片公司都拒绝发行这首单曲，英国广播公司也不愿播放它。于是杰格把歌词寄给了激进报纸《黑侏儒》。

28日 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 杜布契克的眼泪

这一天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庆日：从1918年托马斯·马萨里克 (Tomas Masaryk)¹¹ 建国到现在，已经50年了。数千人穿过布拉格游行到拉德肯尼城堡的城门前，举着旗帜，高呼反对侵略军的口号：“莫斯科——慕尼黑”，“希特勒——勃列日涅夫”，“侵略者，从我们的背上滚下来”。晚上，游行者蜂拥过大街小巷，来到布拉格国家剧院，向前来观看斯美塔纳 (Smetana) 的爱国歌剧《里布舍》(Libuse) 专场的捷克斯洛伐克领袖欢呼。街上异常拥挤，杜布契克和斯沃博达 (Svoboda) 的汽车根本无法通过，他们不得走完最后100码路程。周围是疯狂欢呼的支持者。两人的眼里都噙着泪水。

从杜布契克领导班子8月26日从莫斯科回到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反对占领军的行动主要采取了消极抵抗的形式。侵略军的食宿要求遇到的是彬彬有礼的推诿和无法说清的困难。有时候，俄国货车在一个并不拥挤的十字路口等待的时间之长简直可以说是荒谬，而挂着捷克斯洛伐克车牌的汽车尽管后来，路障也会马上放行。在布莱诺（Brno）交易会上，当地工人称他们不会使用苏联的螺帽和螺栓，因此苏联的部队又不得被召去搭建苏联的展台，结束后再把它拆掉。每一个工厂、商店和办公室里都悬挂着杜布契克、斯沃博达、车尔尼科（Cernik）和斯默尔科夫斯基的巨幅画像，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抗议。大部分捷克斯洛伐克人都尊重领袖的呼吁，尽量避免给侵略军进行武装压制和流血行动的借口。

〔注 释〕

1 拉萨罗·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 1895—1970），墨西哥总统（1934—1940），以努力实现墨西哥革命党的社会和经济目标而著称。

2 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 1887—1975），美国体育的组织者，1952—1972年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他不止一次把重大政治事件说成与奥运会比赛无关，因而引起人们的义愤。

3 斯塔西亚（La Spezia），意大利西北部港口城市。

4 格勒诺布尔（Grenoble），法国东南部城市。

5 韦腊克鲁斯（Veracruz），墨西哥韦腊克鲁斯州中东部港口城市。临墨西哥湾。

6 奥兰治党（Orange Order），原名奥兰治社团，绰号奥兰治人；是英国基督新教反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天主教的一个秘密政治社团，成立于1795年。

7 德里（Derry），即伦敦德里（Londonderry），英国北爱尔兰西北部港口城市；伦敦德里郡首府。


8 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1942—），原名Cassius Marcellus Clay，前后三次获最重量级冠军称号的第一个（惟一一个）美国职业拳击手。

9 圣·厄内斯托（San Ernesto），格瓦拉的全名为Ernesto Che Guevara，即厄内斯托·切·格瓦拉，san即saint，圣人之意。

10 图帕马罗（Tupamaro），乌拉圭左翼城市游击队组织，约于1963年成立，以18世纪秘鲁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领袖图帕克·阿马鲁的名字命名。1985年乌拉圭恢复民主统治后改组为一个合法的政党。

11 托马斯·马萨里克（Tomas Masaryk, 1850—1937）哲学家，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缔造者和第一任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促使捷克和斯洛伐克获得独立而赢得国际声誉。





1968

年

11月

巴基斯坦的经验：怎样颠覆独裁！

西巴基斯坦的学生击退警察的进攻。

经历了墨西哥的屠杀、捷克斯洛伐克的挫败和德国、法国的僵局之后，年轻人席卷五大洲的革命浪潮似乎开始回头。11月的动荡起自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亚洲的学生一直在政治生活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在那些政治党派和工会被宣布为非法的国家里，学生们把自己看作是惟一的反抗力量，他们有着现成的集会地点——学校校园。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南越和泰国的学生，在反对他们的统治者的斗争中证明了自己的力量。尽管遭受了野蛮的迫害——集体被捕、惨无人道的折磨、冷酷无情的谋杀，但他们总是联合起来重新投入战斗。

11月的第二个星期，西巴基斯坦大规模学生游行的消息开始在西方传播开来。一个不为世界其他地方所知的国家开始占据报纸的头版头条，仿佛巴基斯坦学生们特意选定这个时间，用他们耀眼的起义光芒来冲散蔓延在欧洲的阴暗。

巴基斯坦是一盘特殊的菜。1947年它作为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家园在印度半岛上独立起来，由两部分组成——西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按理这两部分本应该因为宗教而紧密相连，但实际上却由于语言、文化、习俗的差异和一千多英里的印度领土而分割开来。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孟加拉人（60%），主要居住在东巴基斯坦——很快就会变成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全部的文化和军事精英都集中在西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Punjabi）¹。而占多数的孟加拉人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巴基斯坦”的概念离他们越来越远，因为在这个“巴基斯坦”里，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民主和经济权利。

1968年爆发的运动将是巴基斯坦历史上惟一一次全国一心的时刻，西巴和东巴一起反抗美国支持的陆军元帅阿尤布·汗²的军事独裁统治。这些日子真是充满希望的日子；如果政治家有能力把握住这次机会，这个国家也许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

警察的暴行引发了这次学生起义，然后起义蔓延到了每一个城市。要求很简单：恢复民主。尽管学生们面临警棍、催泪弹和死亡威胁，但是他们不愿就此败退。街上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学生们的勇气和决心震撼了大城市里的工人和失业者，还有那些小资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律师、医生、建筑师和其他人员。这些社会阶层开始加入战斗。政府关闭了学校，不给学生聚集的地方；但是这支流动的队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团结。他们的情绪也越发高涨，开始高唱起哈比比·贾里布和法伊兹（Faiz Ahmed Faiz）的诗歌，这两人都是禁



达卡 (Dhaka, 当时属于东巴基斯坦) 的女学生光着脚无言地游行, 她们以此悼念在斗争中死去的学生。

止在电视上露面的。其中有一首是法伊兹的《今天戴着镣铐来到市场》:

泪湿的眼睛, 狂暴的魂灵, 都不足够,
 指责那不伦的爱恋也不足够,
 今天就戴着镣铐到市场来,
 来挥动你的手臂, 来狂欢, 来跳舞,
 带着头上的尘土来, 带着衣上的血迹来,
 整个城市的爱人都在观望, 来吧,
 那里总督在等着, 还有大众,
 还有凌辱的重石, 和中伤的利箭,
 可怜白昼也有, 以及悲伤的破晓。
 谁还能做他们的密友, 除了我们?

在爱人的城市里，如今谁还纯洁
谁该送到刽子手的手里去？
绑好心的重负，挑起悲伤的担子，来吧；
让我们再去任它屠杀——朋友们，来吧。

铁路工人停发火车。工厂的工人让机器停滞。公交司机和人力车夫让城市交通瘫痪。妓女拒绝接待警察和军官。律师穿着高贵的黑袍在街上游行，支持学生的民主要求。人民已经丢掉了恐惧。而情势一旦如此，最有力量的政权也不再有力了。

那些忠于独裁者的政治家和内阁大臣不论走到哪里，都有数千游行者的挥舞着不同年代、不同大小的勺子来迎接他们。在印度北部，“勺子”一直是马屁精和狗腿子的象征。这种用法的来源一直存在争议，但有一种说法是：勺子是在殖民地初期变成一个脏词的。印度本土的贵族为了讨好英国人，不再用手吃饭，改用勺子和刀叉，于是民间开始称呼他们为“chamchas”，也就是英国人的勺子。1968年11月开始的反抗独裁者及其走狗的起义在次年3月以阿尤布·汗的倒台而告终。一个独裁统治被推翻了。巴基斯坦起义将是1968年所有起义中最成功的一例。

“同志们，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毛泽东思想》早期版本中关于“脚踏实地”的教导。

在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最有希望接替毛泽东位置的刘少奇被毛的支持者指控为“叛徒、内奸和工贼”，并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而他曾是这个党的创建人之一。刘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作者，这本小册子地位很高，在那些希望效仿中国革命的亚洲国家里，几乎是共产党员的教义手册。

刘少奇的倒台标志着毛泽东对党内反对派的最终胜利，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尾声（1968年“文革”并未进入尾声——编者注）。这场剧烈的国内动荡，是毛为了重建自己的权威而于1966年发动的。

毛泽东是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可争议的领导人。1949年10月，当获得最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终于进入北京时，是他在紫禁城门楼上面对着天安门广场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这样的地位是在许多年史诗般的斗争中、在长征和抗日战争中逐渐建立起来的。50年代，新政权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永远地摧毁了封建的过去。希望之光闪耀全国；整个亚洲也欢乐同庆。

毛在中国党内的杰出地位是因为革命取得了真正的成功，但这个党是建立在斯大林模式上的：党内不允许有争论，领导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最高的领导就是毛泽东。因此，直到毛自己作出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决定之后，党内的其他宗派才有机会冒出头来。

忠于毛的解放军官兵以上街游行的方式表示对“伟大舵手”的支持。



这些灾难中最严重的是1957—1959年的“大跃进”，毛想一下子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用三年的苦干和牺牲换取今后千秋万代的幸福。但事与愿违，大跃进时，重组农业，带着把中国工业产出增加两倍的希望而把数百万农民动员起来去建600,000个炼钢的土高炉，带来的却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可怕的饥荒。

刘少奇是毛的二把手，是党内老资格的党务工作者，1922年曾在莫斯科的东方劳动大学进修。1962年，他到自己的故乡湖南考察，之后就大跃进造成的灾荒和农民遭受的苦难作了一次批评味很浓的讲话，说饥荒70%是人为的。毛自己责备基层的党员干部曲解了自己的政策，而另一方面，刘和另外三位党的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则另起炉灶，开始了一套以稳定和节俭为中心的新经济政策，其中包括把一些生产自主权还给农民。对党的实际控制权仿佛正在一点点地从伟大舵手的手中流走。

1965年1月，毛曾对他的美国鲍斯韦尔(Boswell)³——艾德加·斯诺(Edgar Snow)说，刘必须得走。毛派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内、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发动广大群众揭发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1966年5月16日，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这一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这次会议上还设立了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它很快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的最高领导机构。

第二个星期，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大学开始。50岁的聂元梓，这位文化大革命中最狂热的空想家之一、哲学教师向北大校长鲁平发起了攻击。聂派贴出了一张揭批鲁平的“大字报”，用当时典型的语言宣布：“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同时，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和人民解放军中的毛派开始把大学和中学学生组织成红卫兵小组，赋予他们把革命推向前进的任务。数百万本《毛泽东思想》——“红宝书”——分发各地，对毛的崇拜发展成了一种新宗教：红卫兵都是与混进各阶层领导岗位的反革命牛鬼蛇神作斗争的“小闯将”。

怀揣着各自的红宝书，红卫兵们可以一分钱不花地在中国的铁路线上旅行。这对数百万十多岁的农村青少年来说是一次闻所未闻的奇遇和刺激，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身负的重任确实充满了理想和热情。他们拥进北京参加在天安门广场的大串联，人数超过了100万；在那里，备受他们崇拜的领袖从紫禁城的门楼



中国矿工支持毛并谴责他的敌人为“反革命走狗”。他们疲惫的脸上毫无激情。

上给他们作指示；而不到二十年前，也是在这里，他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悲剧在于，毛为这一切制订的目标仅仅是去揭批“敌人”——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敌人，他们还得去“挖掘”。老师们挨打，医生们受整。学术界的巨擘，党内的政治、军事人物，长征的老兵和无私奋斗多年的劳动者，都头顶小丑的高帽去游街，然后在非法的公堂上接受一大群人的批斗。古老的建筑、雕像、艺术品，甚至是葡萄园，都在人们对这个国家古老文化的疯狂敌意中被摧毁了。

一切红宝书以外的知识都被视为罪恶。很快，互相竞争的红卫兵小组又开始互相谴责对方为修正主义和“走资派”、毛泽东旗帜下的叛徒。毛泽东微笑着的、慈父般的面容随处可见，从墙上俯视着人们。

到1967年，许多地方都爆发了红卫兵小组之间的械斗，包括南昌、南京、新疆、云南、广西和广东。派去维持秩序的解放军部队经常发现自己陷进了宗派斗争的漩涡，弄不清谁是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哪一派。在重工业中心城市武汉，解放军部队在一场很快发展成地方内战的斗争里两头都打。到了1967年夏天，红卫兵开始劫掠解放军的军火，把中国送去越南的军事援助抢来自己使用。而到了1968年的春天，斗争发展到了军队内部，红卫兵的斗争打着这样的旗号：“把解放军内部的走资派揪出来。”

毛的妻子江青和解放军的领袖、毛的新任二把手林彪，都热衷于纠集党羽，在最高层建立自己的权力网，同时又不遗余力地巩固毛的偶像地位。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揭批国家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和他的副手邓小平，还举着他们异常丑陋的画像在北京城里巡游。1968年夏天时，刘、邓都被软禁在北京的领导人居住区中南海——皇城之内的一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步，文化大革命已经明显失控了。红卫兵组织开始具有政治自主性，有一些甚至开始挑战官方和毛本人的权威。而此时，党的领导在中央、省和市等各级事实上已经瘫痪。1968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入侵，这使得中国人在自己国内仍然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到苏联威胁这个问题上来。

1968年底，解放军得到新的命令，不惜代价扑灭仍在蔓延的地方冲突。在执行这些命令的过程中，损失更加惨重。然而，有了解放军的装甲车在许多城市大街上的巡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进入了尾声。几个月后，毛采取了一项很极端的举措：关闭全国的中学，把学生送到农村，到农田里干活，以此来确保红卫兵的消亡。

因此，出席1968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中央全会的人与几年前出席会议的人员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的人都是毛的亲信，全会的主要任务也只是审议关于头号走资派的报告。

刘少奇被公开指责为叛徒、内奸和工贼，帝国主义的走狗、当代修正主义者和国民党员。他被送进北京的监狱，在那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以至于不到一年，他又不得不因为肺炎和糖尿病被用担架抬着转到另一所监狱。之后，1969年11月，刘死在他的单人牢房里，身边只有他的看守员。他的一些支持者，比

如邓小平，也遭到公开的侮辱。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数万无辜的中国老百姓死去。但是，毛的清洗政策和30年代斯大林的不一样。毛的党内对手所受的惩罚一般只是流放，而不是死刑。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走资派都幸存下来，正是他们领导国家走上了80年代高速发展的道路。

3日 希腊，雅典 葬礼上造反

1967年4月军人政变之后一直压抑着希腊的恐惧这一天被打得粉碎，几十万人排列在大街上为帕潘德里欧送葬。他是前首相、反对党的领袖。如果1967年选举得以正常进行的话，他现在就会是执政党的领袖。

自从那次北约撑腰的政变之后，帕潘德里欧就被软禁起来。当时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而医生必须有卫兵在一旁监视才能给他看病。他的儿子安德雷斯（他在1974年创建了社会民主党——PASOK⁴，80年代执掌希腊政权）此时流亡国外，而帕潘德里欧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僚不是在监狱里，就是被流放到希腊周围的小岛上，不能和外界有任何来往。他死去时孤零零一人，但死去之后却让雅典人民自从前一年政变之后第一次团结到了一起。

“坐起来，老兄，看看我们。”鲜花装饰的灵柩拾过阳光明媚的街道时，庞大的人群里传来这样的呼喊。灵柩经过的时候，旁观的人们唱起了国歌，还抑制不住地喊着：“OCHI, OCHI, OCHI”，“反对，反对，反对！”——这是他们对9月29日举行的虚假的公民选举所作的回答；搞军事独裁的那一帮人想以此在北约的同盟前遮羞。

公民选举是想让希腊人民认可军人政权的新宪法，这部宪法对人们自由集会和组织商会作了严格的限制，而警察任意逮捕的权力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自从内战以来，除了帕潘德里欧在政变前的尝试之外，这个国家的警察部队一直就没有改革；它在政府想得到“同意”选票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选举法规定，每个选民应该同时拿到一张“同意”票和“反对”票，然后到一个屏风后面填写，并把结果放进信封，最后把信封投进官方的选票箱中。可是在一些小村镇里，根本没有什么屏风，有的选区甚至还有某些村民或警察局长自己到现场做记录，把那些愚蠢到索要“反对”票或是更愚蠢地想到什么屏风后面去的村民都记录在案。

亲官方媒体的数月宣传和投“反对”票者的骇人下场，再加上警察敏锐的眼睛，迫使许多农村的选民只敢拿“同意”票塞进信封。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能走出投票站，然后安全地回家。在这些地区，只有那些非常勇敢或非常愤怒的人才敢投票反对。

现在，当灵柩经过宪法广场时，从庞大的人群中传来的“反对，反对，反对！”的喊声标志着，希腊人民一直用来支持反对上校统治的民主人士的那种胆怯、受伤的沉默结束了。

5日 美国 尼克松当选

就像广泛预测的那样，狡猾、残忍、野心勃勃的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在美国大选中击败了民主党人休伯特·汉弗莱。汉弗莱是现任副总统，反战的选民

尼克松向来到费城祝贺他大选胜利的人群致谢。



都认为他的手上沾满了越南人的鲜血。

一旦上台,尼克松就表现出他对反越战运动偏执狂似的着迷和一种秘密轰炸像老挝和柬埔寨这样的中立小国的强烈嗜好。他想要在越南保全一点面子的想法让越战延长了数年,而他的“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⁵则开始了无数次的秘密和平谈判,试图劝说河内接受亲美的南越军事集团对国家的部分控制或者是类似的条件。

同时,为了平息美国国内公众的意见,防止部队内部纪律的完全松懈,尼克松又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撤回地面部队。1973年6月,国会禁止美国在越南的一切军事行动。1975年5月1日,西贡被重新命名为胡志明市。

7-8日

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 巴基斯坦炎热的冬天

“我们得知道:民主在巴基斯坦这样炎热的气候下无法存活。想要民主,就得有像英国那样凉爽的气候。”

——阿尤布·汗将军,1958年10月夺权之后

在伊斯兰堡苏联大使馆内,正召开纪念1917年革命胜利的招待会。大使和陆军元帅阿尤布·汗,在两旁“勺子”的注视下,互相举杯致意。

头一天,在别处发生了一件小事。白沙瓦(Peshaawar)⁶城北部25英里是兰迪·科托(Landi Kotal)商业区。它位于“部落地区”,因此世界各地的走私商品在这里都可以买到。中产阶级的女士在这里为自己的女儿购置嫁妆,安然自若地和那些军火商和毒品贩子混在一起。70名学生到兰迪·科托买完东西后,正在赶回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⁷。途中,一帮傲气十足的当地警察没收了他们价值5000卢比的货物,还给他们罗列了一堆罪名。这个小小的欺压事件引发了最成功的学生起义。

在西部,挑战独裁的唯一的政治领袖是祖尔菲卡·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⁸,一个不满阿尤布政权的前内阁大臣。这一天,布托正前往在拉瓦尔品第几英里外的工艺学校给那里的学生作演讲。兰迪·科托事件激怒了学生。11月6日晚,在戈顿学院(Gordon College)的学生宿舍举行了一个由学生领袖拉贾·安瓦尔(Raja Anwar)召集的通宵会议。会议决定号召在11月7日上午进行一次学生大游行。3000名学生参加集会谴责阿尤布·汗。他们中的

绝大多数投票赞成上街游行去迎接布托。途中，他们在秘书处（官僚总部所在）停留，把副秘书长的裤子扒下，当街抽打他的光屁股。

布托被警察阻拦，无法到达工艺学校。学生们向警察投掷萝卜。以往在冲突升级前，警察一般会用警棍和催泪弹来驱散学生。但是，这回他们免去了这些客套。双方对骂之后，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他们便开火了。一颗子弹击中了阿布杜尔·哈密德（Abdul Hamid），一名工艺学校的学生。这个17岁的青年当场死亡。被激怒的学生用铺在路上的石块和砖头还击，点燃了几辆警

车。学生行动委员会主席希萨姆—乌尔—哈克（Hissam—ul—Haq）宣布：“在过去十年里，阿尤布、他的家族和一帮谄媚者把我们的国家劫掠一空。在他的独裁统治下，20个家族控制了我们的国家80%的财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发怒，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拉瓦尔品第的学生游行支持布托。

布托被送到了位于拉瓦尔品第市中心的洲际饭店。学生们跟到了这里，组成了一支护卫队。警察向他们投掷催泪瓦斯，臭气甚至飘到了饭店里面。当一些学生开始向饭店扔石块时，一支小型突击队从后面发动了进攻，他们用石头攻击在游泳池旁晒太阳的美国外交官。学生们被赶出了饭店。但在整个晚上，街上的冲突没有间断。阿布杜尔·哈密德的死讯像草原大火一样传开，城市里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他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于是怒火笼罩了城里的贫民区。十年的苦难和沮丧在这个国家的军事中心——拉瓦尔品第的大街上爆发了。

第二天，阿尤布·汗对尼克松大选成功表示祝贺，并自称是“一个老友和崇拜者”。（这句赞美得到了回应，11月9日，林顿·B·约翰逊说：“巴基斯坦是一个在阿尤布总统睿智而卓越的领导下灵活发展的典范。”）巴基斯坦开始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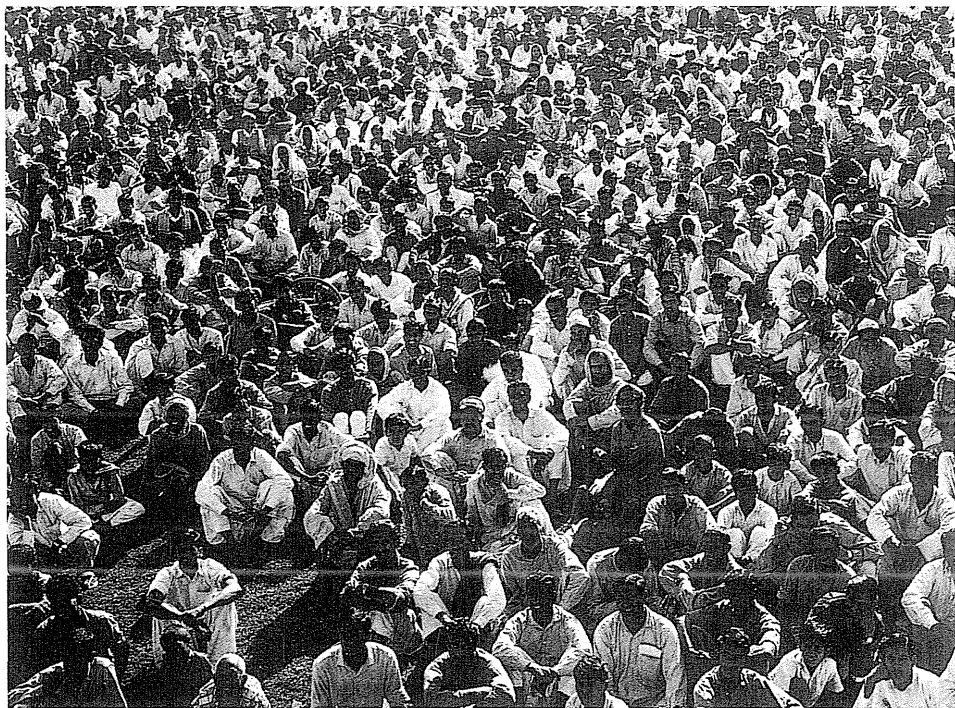
炸了。11月8日，数万学生走上街头，大喊：“处死阿尤布·汗”，“打倒走狗阿尤布”，并向政府的轿车和军官挥舞勺子。下午，整个城市都参与了进来。

起义之火传遍了全国。当人们从心底赶走恐惧，准备为自己的事业献身的时候，即使最强有力的独裁政权也该动摇崩塌了。11月8日学生领袖拉贾·安瓦尔宣称：“群众对我们行动的支持如此广泛，如果有一个严密的革命组织，我们早就把城市、无线广播电台和火车站占领了。”

起义蔓延，哈比比·贾里布和法伊兹的乌尔都语诗歌也传遍巴基斯坦。其中一首是法伊兹的《开口说》：

开口说，你的双唇是自由的；
开口说，你的舌头还是你自己的；
这笔直的身板依旧属于你……
开口说，你的生命依旧是你自己的。

一个大型集会，要求结束美国在亚洲的存在。



看看在铁匠的锻炉里，
火焰怎样跳跃、钢铁怎样变红，
挂锁张大它们的下颚，
每一条铁链把怀抱敞开！

这短暂的一刻就足够
只要身体和舌头还未死去，
开口说，因为真理仍然活着……
开口说，说必须说的一切。

11日 葡萄牙，里斯本 一个腐朽的制度

数百学生抗议丹尼尔·特谢拉（Daniel Texeira）同志死在国际及卫国警察局（PIDE）¹⁰的手上，这个人人切齿的秘密警察组织负责处理葡萄牙法西斯政权下所有的不同政见者。

老独裁者撒拉查9月份中风之后，顶替他的是一个更新式的独裁者——卡塔诺（Caetano）。他和他那些热衷于现代化的亲信们想把摇摇欲坠的葡萄牙经济朝欧洲靠拢。几十年来，葡萄牙一直依靠对殖民地越来越疯狂的压榨来维持国内的寡头政治。但是，尽管通过强制劳作从几内亚比绍（Guinea-Bissau）的糖料作物种植园、安哥拉的钻石矿和莫桑比克的棉花获得了巨额利润，葡萄牙人民却仍然是欧洲最贫穷的，文盲和婴儿死亡率与“第三世界”相同，里斯本五分之一的人住在简陋的棚屋里，很多村庄还没有电。另一方面，政府一半以上的预算都花费在武装部队上，他们正在葡萄牙的殖民地与声势愈发浩大的游击队作战——几内亚的几内亚与佛得角岛非洲独立党（PAIGC）¹¹、莫桑比克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安哥拉的人民解放运动党（MPLA）。

稳坐40年葡萄牙政坛的极权统治如今突然在各个方向上受到威胁。学生拒绝向陈腐的大学机构磕头。移民法国的葡萄牙工人中有很有一部分人卷入了“五月风暴”。兄弟、叔伯和表兄姨妹的消息从奴役他们的雪铁龙、雷诺汽车工厂里也渐渐传来，他们在那里接触了一大堆振聋发聩的新式的革命思想。最后是葡萄牙部队里的初级和中级军官，他们的任务是带领无数的远征军到非洲战场上镇压那里的起义，也开始被必读的“知己知彼”训练手册——诸如阿米尔

卡·加布拉尔 (Amilcar Cabral) 和切·格瓦拉的革命著作——感染了。结果是1973年的“武装部队运动”，直接威胁到葡萄牙军队能否担当在非洲进行灾难性战争和在国内维持专制独裁统治的作用。1974年4月25日，武装部队运动发动了颠覆卡塔诺统治的哗变。这次事件引发了次年葡萄牙社会的激烈动荡，险些就发展成为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那将是1968年欧洲革命的高潮，也是革命最后失败的终点。

17日

英国，北爱尔兰 民权运动与统一暴力

1968年的气氛在北爱尔兰的六个县体现得很明显，过去40年来，选举欺诈和对天主教在住房和就业方面的歧视使得奥兰治党和统一主义者保证了自己的强势，阻碍了这个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历届英国政府，不论是工党或是保守党，都没能解决这个杂症，使得后果更加严重。

黑暗的秋夜，北爱尔兰街头形势愈发紧张。11月17日，德里公民行动委员会 (Derry Citizens' Action Committee) 召集了一次大型民权游行，一万多人越过弗尔 (Foyle) 河上的克雷加文 (Craigavon) 桥，到内城集会。2天后，一大群佩斯雷的追随者从街旁的小巷攻击公民行动委员会的集会，酒瓶和石头越过爱尔兰皇家警察的头顶向集会者飞来。公民行动委员会的支持者试图冲到小巷去，但此时警察却对人群开始拳脚相加，并把警棍和高压水枪搬了出来，一片混战。

两个星期以前，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 (Harold Wilson)¹² 对北爱尔兰的统一党领袖们采取了强硬路线，他警告奥尼尔 (O' Neill)、克莱格和弗克纳 (Faulkner) (分别是北爱尔兰的首相、内务大臣和商务大臣) 说：如果他们不能满足民权运动者“一人一票”的要求，英国政府将越过他们直接干涉。但是，从那时到现在，克莱格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做出让步。德里的公民得到的不是民主，而是一个“发展委员会”，它将为市建住房的分配拿出一个新方案。英国政府的一份声明以威胁的口吻警告说：“现在还继续扰乱和平和这个国家正常生活秩序的人将被视为骚乱者，并将得到应得的惩处。”而民权运动者仍坚持自己的要求。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又一次民权游行在阿尔马 (Armagh) 被1000名佩斯雷的支持者冲散。这些人很多戴着安全帽，拿着铁锹柄、棍棒和椅子腿。他们



民权运动领袖约翰·休姆 (John Hume) 向德里市码头工人的游行队伍讲话。

坐长途汽车从贝尔法斯特和北爱尔兰的其他地方赶来，凌晨2点时在游行队伍第二天早上要经过的一条街上驻扎下，说什么也不肯离开。民权游行重新安排了路线，但是两派间的冲突却在城里的各处爆发开来。阿尔斯特警察依旧表现抢眼，他们为了“维持秩序”，而对一群来自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全景”新闻节目的工作人员拳打脚踢。

29日

西班牙，马德里 打倒佛朗哥！

西班牙防暴警察冒着倾盆大雨朝马德里的理科大楼前进，高举着灰白色的盾牌准备随时应变。一条大约三十英尺宽的红色巨幅旗帜从楼上的窗户悬挂下来，学生们为了维护自己在大学里建立自由的学生会的权利而占领了这栋大楼。佛朗哥的警察最痛恨的是学生们的不顺从和他们对大元帅的不肯卑躬屈

膝。几个星期前，精神高昂的学生在哲学系外的篝火会上焚烧了佛郎哥的画像，围着火焰高呼“自由，自由”、“佛郎哥，刺客！”

年衰的法西斯政权仍然死而不僵。卡特卢尼亚的罢工者被枪杀，巴斯克地区的镇压仍在继续。在那里，警察为了获得口供而动用酷刑。近二百名学生在马德里大学的占领中被拖走，有十多个人以“恐怖”活动的罪名被送上军事法庭。但是，运动是无法镇压的。第二天，马德里四分之三的学生罢课，抗议警察的入侵。

〔注 释〕

1 旁遮普省 (Punjab): 旁遮普地区原为锡克人控制, 1949年被英国人占领。1947年印度独立, 旁遮普分为两部分, 较小的东部划归印度, 称旁遮普邦; 较大的西部归巴基斯坦, 称旁遮普省。

2 阿尤布·汗 (Ayub Khan, 1907—1974): 巴基斯坦总统。1958年10月发动军事政变, 出任总统。1960、1965年两次当选总统。1969年迫于国内形势交出政权。

3 鲍斯韦尔 (Boswell): 苏格兰作家, 是英国作家约翰逊的密友。约翰逊死后, 他凭借自己对这位作家的细致了解写了英语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传记之一。

4 PASOK: 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

5 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1923—), 美国政治学家、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务卿。在1969—1976年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任内, 他是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人物。1972年促使美国与中国恢复邦交。197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6 白沙瓦 (Peshawar): 巴基斯坦北部城市。

7 拉瓦尔品第 (Rawalpindi): 巴基斯坦东北部城市。

8 祖尔菲卡·阿里·布托 (Zulfikar Ali Bhutto, 1928—1979): 巴基斯坦政治家, 总统 (1971—1973), 总理 (1973—1977)。深受群众爱戴的领袖, 但被军人推翻并处死。

10 国际及卫国警察局 (PIDE): 葡萄牙秘密情报组织。

11 即“the African Party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Portuguese’ Guinea and the Cape Verde Islands”, 几内亚与佛得角岛非洲独立党。

12 哈罗德·威尔逊 (Harold Wilson, 1916—1995), 英国工党政治家、首相 (1964—1970, 1974—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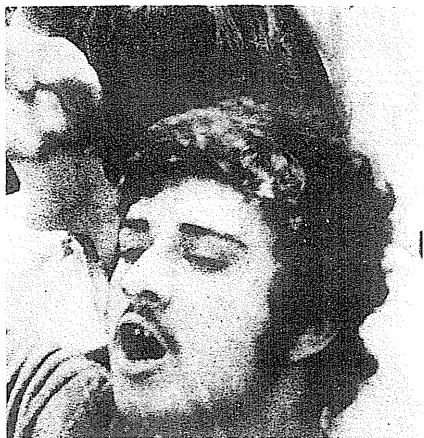
1968^年

12月

“没有无辜的旁观者。”旧金山州立
大学校长早川博士 (S. I. Hayakama) 说。

州长里根宣战后，一名旧金山州立大学学生躺在地上，血流不止。

意大利被认为是战后欧洲资本主义的成功故事之一：1958到1967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56%，人均收入增长的速度是英国的两倍。这是仅次于日本的建立在对南方农村地区的劳动储备大军剥削基础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政治却依旧被党派之争所主宰：一是北约支持的右翼基督教民主党；二是梵蒂冈罗马教廷；三是得过且过的社会党。而三者都决心不让势力强大的意大利共产党接近权力。



都灵市一名正在罢工的菲亚特²工人。

意大利政治偏执狂的风格在弗朗西斯科·罗西(Francesco Rosi)极富预见性的电影《杰出的尸体》(Illustrious Corpses, 1976)中得到了形象的描绘——远早于前任首相基督教民主党安德罗地(Giulio Andreotti)因接受黑手党的俸禄而受指控一事。该电影刻画了统治精英根本不考虑用谋杀来维持自己的权力有何不妥。这个时期的另一部开拓性的意大利电影，埃利奥·佩特利(Elio Petri)的《工人阶级上天堂》(The Working Class Goes to Heaven)，是理解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感到异化的直接尝试。一个车工像机器人一样劳作，但如果站在好战的学生的一边，他就会丢掉

工作。电影形象地刻画了他的生活如何受到提速、对工会的冷漠、危险的工作条件和低薪的影响。佩特利坚持认为，这不是个别工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环境的问题。

60年代的经济复苏使工厂斗争和工人阶级的军事斗争不断扩大，它对意大利社会的影响比“五月风暴”对法国的影响还要深。米兰、都灵(Turin)¹和罗马学生的战斗精神与从南部新招的工人中新产生的怨愤一道，为1968—1970年间震动意大利的总斗争推波助澜，并使基督教民主党和共产党产生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后者竭力想成为政府机构的一部分，现在却遇到了不容忽视的左翼力量的对抗：它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同时的挑战，内部是《共产党宣言》派，该派对党的左翼领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外部则是在校园政治中占优势的毛(泽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混合物。

与法国共产党不同，意大利共产党无法把自己和群众运动脱离开来，原因很简单：运动本身就反映在党的内部结构上。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拒绝激进派的

极左思想，采取了相对比较开明的态度，并同内部的左翼成员进行公开辩论。但是，这种开明又绝不能影响到意大利共产党与意大利政府分庭抗礼的立场。事实上，其温和派也公开地谴责基督教民主党未能让意共在社会中拥有其合理的地位，从而防止极端激进派的泛滥。

1969年“火热之秋”的工厂斗争狂潮吓坏了意大利政府及其支持者，也吓坏了意大利共产党。后者迅速采取行动制止向基层民主和工人委员会发展的趋势，而使所有的事情都通过工会这个狭窄的渠道作出反应。政府这边则开始了一系列挑拨活动以分裂群众运动。北约资助的秘密警察和臭名昭著的极右组织P2使用炸弹（后嫁祸给极左派组织）来培育无政府主义，制造恐惧。

一群受挫的激进主义分子对既定的社会结构失去了耐心，开始转向暴力和恐怖活动，最终导致“红色旅”（the Red Brigades）绑架并处决了自由基督

意大利工人举行群众性示威游行，支持实行浮动工资制。



教民主党领袖阿尔多·莫罗（Aldo Moro）³。学生运动的这支“恐怖派”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力量最强。这是他们对父辈们接受或容忍法西斯政权而感到愤怒和痛苦（但也是无法原谅）的回应。

意大利激进的后果到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真是历史甜蜜的讽刺。1968年后的近三十年里，意大利左翼和中间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居然是老意大利共产党占据优势，老意共穿着新衣，但它的政治生命却要依靠新建共产党这个间接继承了60、70年代震动全国的斗争传统的党派。其领袖弗斯特·贝特诺地（Fausto Bertinotti）是一个很有手腕的政治家，他试图为意大利激进的左派找到新战略。在一个右派和左派势力相当、“后法西斯者”仍有一定势力的国家，新共分子极力寻求一种政策，既能避免党派纷争，又能抵制机会主义、政务上的弄虚作假和赞助政治。

1日 美国 里根计划他的未来

州长罗纳德·里根新任命的旧金山州立学院院长、强硬派早川博士向11月6日以来一直在罢课的学生全面宣战。

旧金山州立学院有26,000名学生，大多数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它是美国最大的种族混杂的学院之一。当地的学生领袖从60年代中期就开始悄悄地利用学生基金从事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研究。1965年，他们建立了一所实验学院，在那里学生可以自己设计课程，自己聘请老师：他们想创造一个外部世界的社会微缩景观。

到1968年11月，校园里充斥着各种激进派别。黑人学生联合会（the Black Students Union，简作BSU）是黑豹党的学生先锋，墨西哥裔激进分子组织了第三世界解放阵线（the Third World Liberation Front，简作TWLF），一组毛（泽东）主义者则支配着当地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协会（SDS）。这些组织一致认为，旧金山州立学院需要设立一个黑人研究项目。但是有州长里根撑腰的学院否决了这一计划。11月6日，黑人学生联合会和其他组织的支持下，呼吁就此事举行罢课。倾向于妥协的学院院长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被里根无礼解职。

里根和教师中的鹰派决心打败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黑人、墨西哥裔及其白人朋友。12月1日，早川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命令学生第二天回到课堂上



在旧金山州立学院，一名黑人激进分子被警察棒打之后被捕。

去。黑人学生联合会和第三世界解放阵线在校园设置纠察队员，劝说同学们不要去上课。绝大多数的学生继续支持罢课。教师委员会的主席利奥·麦克拉克利 (Leo McClackley) 发表讲话，反对早川的决定，呼吁协商解决，并宣布“老师们不会在暴力的阴影下授课”。

这与在越南的战争出奇地相似。鹰派想用更多的炸弹，鸽派则想要协商解决。早川就是一架轰炸机。他现在决定采取赤裸裸的镇压政策。警察被请进了

校园，他们在图书馆外耀武扬威地检阅自己的装备。

整个12月，校园里不断有冲突、游行和示威。整个城市看起来是分散的，但却又令人惊讶地一致支持学院的学生。就在圣诞放假前，第三世界解放阵线向全校倡议举行一次第三世界团体日游行。反响很巨大：黑人、墨裔美国人、拉美人和部分中国人、菲律宾人和日本人的社团都公开表示了参加游行的意愿。早川害怕了，他关闭了学院。学生游行到市政厅，数千名支持者加入进来，包括一部分正在罢工的油矿工人。

最终，学生罢课被镇压，大批人被捕——450名学生受到一系列罪名的指控。

然而，它却更加强了加利福尼亚街头多种族的联合。在这里，上千名学生（90%是白人）曾在一起并肩作战。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警察派来意在煽动种族矛盾的内奸的活动下，分化产生了，但是人们关于12月那些日子的记忆却永不会褪色。

学生运动在春天产生的火花点燃了意大利工厂工人的不满情绪，引发了工人的彻底起义。在都灵，菲亚特工厂的年轻工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刚从南方迁徙过来——在12月的一次学生集会上夺过话筒，向大家讲述了他们的处境。过去几年中，装配线上不停的加速并没有大幅增加产量，却使工厂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仅去年一年就有6万南方人进入都灵，以填补汽车工业不断扩大后所带来的岗位，但是当地政府却没有为他们制定修建住房的计划。

当菲亚特的米拉菲奥里（Mirafiori）装配厂自发地爆发罢工时，学生们在每次交接班时都到工厂门口去迎接工人，和他们一起到咖啡馆，帮助他们撰写报告最新进展的传单。学生复制了50,000份材料，在工厂门口分发给工人。

这场反对工作条件恶劣、住房条件差、交通和服务落后以及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的抗议活动，变得越来越广泛。11月份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罢工支持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工人对社会保障的退休金拥有更大的控制权。11月底，学生们在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强烈抗议之后，赢得了在学校礼堂召开讨论会的权利。

农村的情绪也同样高涨。南方的农业工人不满南方极端的贫困而罢工，当



罗马50,000名工会主义者游行反对失业。

地的警察则和大地主沆瀣一气，野蛮地攻击工人纠察队和抗议者。11月2日，西西里一群农业工人因为工资问题和一个地主发生争执，当地警察朝人群开枪射击，致使两人被打死，六人受重伤。枪杀农业工人的暴行激起了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两万多人冒着倾盆大雨跟在两具灵柩后面到阿弗拉（Avola）小镇，在那里，死者被埋在光秃秃的杏树林里。就在同一天，三万多人的抗议队伍在罗马街头游行。而在热那亚、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米兰，人们狂风暴雨般地冲击了省长官邸、省政府和当地的警察总署。

第二天，全意大利有一百多万人走上街头罢工，抗议西西里的杀戮。工厂、商店、银行、办公室、电影院和学校都关了门，交通陷入停顿。在罗马的圣约

翰拉特兰教堂广场 (the Piazza of St John's Lateran), 50,000人举行了大型集会, 抗议低工资和失业。抗议活动将持续下去, 声势不断壮大, 直到1969年意大利的“火热之秋”才结束。

12日

巴西, 里约热内卢 戒严

军队撑腰的巴西总统阿瑟·德·哥斯塔·西尔瓦上校 (Colonel Arthur da Costa e Silva) 关闭了“推选”他的国会, 颁布戒严令, 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行使特权。这使得这位上校能够停止宪法的效力, 用自己的亲信替代选举产生的省长或市长, 完全控制审查制度。而且, 只要他认为罪行是“政治性的”, 他就可以随意停止其人身保护权。总统还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开除公务员, 取消立法者的授权和政治权利。与此同时还有镇压活动, 例如大规模地逮捕学生积极分子、持异见的政治家、好奇的报纸专栏记者、工会领导以及两位巴西前总统——库比契克 (Kubitshek)⁴ 和奎德罗斯 (Quadros)⁵。

导致关闭国会的刺激来自反对党众议员马西奥·莫莱拉·阿尔维斯 (Marcio Moreira Alves) 两次影响很大的演说, 他呼吁取消每年的阅兵典礼, 并劝说巴西的母亲们不要让自己的女儿与军人约会。哥斯塔·西尔瓦对此作出了反应。他宣称: “整个国家都能理解军方不会接受以懦弱的国会豁免权作掩护的批评与诽谤。”军方想把阿尔维斯提交给军事法庭审判, 要把他的脑袋搁在盘子里端上来, 但是愤怒的国会议员们以216票对141票重新确认了他的豁免权, 于是哥斯塔·西尔瓦立即关闭了这个立法机构。

巴西从美国得到的援助比任何一个拉美国家都要多, 因此, 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新的动向是得到了华盛顿批准的。1968年11月16日《纽约时报》声称: “对上周末阿瑟·德·哥斯塔·西尔瓦总统制定的新制度, 巴西人显得漠不关心”, 然后告诉读者天气很好、很热, “海滩上挤满了人,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伦敦的《卫报》就没这么乐观了。该报驻拉美的记者里查德·哥特 (Richard Gott) 警告说, 巴西的学生受法国和墨西哥的鼓舞, 正处于动乱之中, 而“一支分裂的军队有没有能力控制住这个局面值得怀疑”。但他对起义并没有表示过分的乐观: “目前危机最可能的结果是一个新的强人出来, 哪里有起义就到哪里野蛮地镇压。”

巴西电影导演格劳伯·罗彻⁶ (Glauber Rocha) 的电影《黑上帝与白魔鬼》(Black God and White Devil) 和《恍迷之地》(Land in Ecstasy) 以其眩目的意象和寓言般的影射力量, 在欧洲银屏上掀起了巴西“新电影”(cinema novo) 浪潮, 他现在正准备这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他向一位欧洲评论家这样解释自己的电影:

“《黑上帝和白魔鬼》再现的是1940年以前的岁月, 《安东尼奥之死》(Antonio-das-Mortes) 的背景很显然是设在60年代末期即现在。一部分精英认为巴西走上了发展之路, 因为建了高速公路、电厂、医院、学校等等, 而这些都是进步的标志。

“嗯, 在我的新影片中, 我想表明, 今天与这种‘进步’的势头以及那种想像出来的现代气氛并行的, 还有一种野蛮的环境, 一种专制和压迫的中世纪体制, 那些地主就和古代的领主没有什么两样。

“我还想表现一种对我自己很重要的东西: 用一个暴力神话来表达大众文化……我惊奇地发现, 我们现在的政治混乱大半是由于愚昧和偏见的结果, 也是统治着这个国家的那些资产阶级精英歇斯底里的品行所致。

“巴西的真面目是印地安的、黑色的(现在还有非洲宗教的残迹)、神秘的、暴戾的、野蛮的和情绪化的。因为这些原因, 革命必须基于我们国家的真实结构来制定计划。它必须脱离偏见和主观主义的种族歧视; 资产阶级的特点之一就是种族歧视, 而人民大众已经通过广泛的宗教和种族混合克服了这一点。因此, 我在电影里把圣乔治(St George) 塑造成为一个黑人圣者。《安东尼奥之死》讲的是一个被遗忘的民族, 他们没有唧唧喳喳的精英分子, 遇到问题和矛盾总是试图通过酒神式的狂欢来自己解决。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一种永远疯狂的状态, 天马行空的创造代替了愚昧, 不负责任、幽默感和嘲弄的心态用来补偿既定价值观的缺失, 而好斗进取则避免了落后情结在社会中的存在……”

13日

东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 一个国家的诞生

战火仍在西巴基斯坦燃烧。因为无法在公共场合露面, 军事独裁者、陆军元帅阿尤布·汗视察了千里之外的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省。统治精英一直把孟加拉看成是总督管辖地, 他一来, 迎接他的就是达卡(Dhaka) 和吉大港



1969年3月，亚哈亚·汗 (Yahya Khan) 将军接替了阿尤布·汗。

(Chittagong) 大规模的罢工。成千上万的学生在大街上游行，要求全面恢复民主。警察得到命令，向学生开火；这天虽然没有人死亡，但有几十名学生受伤，其中许多人伤势严重。七名学生激进分子被捕。

阿尤布现在惟一的支持者们都在国外：大部分是英国和美国报刊专门采访领袖的记者们，他们受到外交部和国务院的鼓励。他们害怕在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战争中失去一个强有力的同盟。冷战培养了许许多多这类“自由斗士”：穿着军装的暴君，在镇压自己的人民方面，他们是靠得住的。

东巴基斯坦的学生行动委员会 (the Student Action Committee, 简作SAC) 把学生运动所有不同的派别都联合起来——革命派和改良派，温和派和极端派，毛(泽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学生行动委员会11点纲要”的语调是激进的，它要求立即进行大选，保证对大企业进行全面的国有化，承诺采取反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学生行动委员会成了全国的领袖，它呼吁巴基斯坦在1969年1月17日进行一场全国总罢工。无论在西巴还是东巴，这类联合行动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整个国家陷入了瘫痪。

在未来几个月里，许多激进分子被杀害。独裁者倒台后，阿瓦米联盟 (the Awami League) 中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者在大选中以压倒性的多数获胜，但是阿尤布的继任者镇压了他们，引起了一场血腥的内战，从而使孟加拉国在1971年11月独立出来。西巴的学生和工人（也因为那些见风使舵的政治家）没能成功地阻止巴基斯坦部队在东巴的血腥镇压，巴基斯坦的命运就这样定格了。它不可挽回地分裂了，使1947年8月穆斯林领导认为至关重要的印度分治成了人们的笑柄。

从1968年11月到1969年12月，东巴的孟加拉学生和工人准备与西巴的学生和工人们一道开创共同的事业。1968年的战斗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理想主义却因愤世嫉俗的政治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熄灭，其影响到90年代尤为明显。

19日 英国，伦敦 反抗的呼声

在海克尼（Hackney，英国伦敦一郡）的一间地下室里，一个红头发的年轻女人缩在煤气取暖器前，飞快地写着，周围是一大堆笔记。《黑侏儒》准备为妇女出一期特刊。它将包括一些平等工资和避孕的内容、一篇单身母亲的文字和一篇由读过威廉·赖希⁸（William Reich）的男人撰写的社论。但是与此有关的一些女读者希望刊登一点特别的东西，能够真正反映她们的内心情感。谢拉·罗伯特汉姆（Sheila Rowbotham）主动把此事承担了下来。

楼上，集体宿舍里满是人，坐在餐桌旁讨论、争吵、煮东西、卷大麻烟，谈情说爱。楼下的地下室里，谢拉写道：

妇女：反抗的呼声。

革命发生在微小的事情上。

那些无时无刻不发生在你身上的小事，每天、每处、一辈子都在发生的小事。就是这些具体的小事温柔地把你推进一种消极的状态。

于是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别人，找到自己。

我们也许是所有受压迫的人群中最分裂的一群。

在实际环境中分裂，在对我们的处境的认识和感觉上分裂。

我们属于不同的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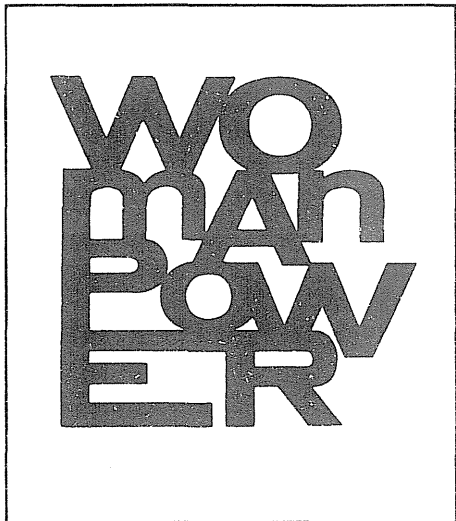
因此，我们互相吞噬、利用。

我们的“解放”不过是让那些特权者加强、巩固了自己的优越地位——劳动阶级的妇女受的是双重的剥削：作为工人被压迫，作为妇女被压迫。

我们有家庭，又没有家庭。

因此我们互不信任。

拥有家庭和孩子的妇女怀疑没有任何家庭牵连的妇女，把她看成是威胁自



早期妇女解放海报。图内文字：

妇女力量

已领地安全的潜在危险物。

单身女子感觉已婚的女人对她们总是带点挑剔的意见，因为她们没有扮演一个女主妇的“角色”，没有完成生儿育女的“作用”。

所以她觉得自己总被人指责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我们走路、说话、思考，都处在矛盾之中。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发现这个过程太过痛苦，因此也就毫不在意停留在有限的自由区域里。我们在每一条前线都放弃了战斗，退缩到逆来顺受的小空间里。

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正确地指出了妇女的隶属地位，是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相互吞食过程的一部分。除非对整个社会关系结构进行改变，没有哪一个群体能够得到解放。

但是这又被曲解成呆滞和无为的巧妙托词。

等待吧，直到革命；我们那时就会把平等施舍给你们。（啊，不，你不会的。权力从不给予——记得么？）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通过努力把无数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可能性就会变得更可行，而且能让事情更明了。争取平等工资和经济独立的斗争就是一个例子。

那家庭呢，为什么只有幼儿园，而不能在母亲和父亲工作的地方都设立托儿所呢？这样，他们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和孩子在一起玩，孩子们也可以和两个家长都熟悉起来。或者大量地设立街道和房屋管理机构，帮助照顾小孩、安排保姆和看望老人。如果年轻人，不论是年轻工人还是在学校的学生，不愿在家里住，为什么不让他们去住在他们自己管理的房屋里呢？这还能提供照看老人的另一个方法。

对很多妇女来说，这些无疑就是真正的解放。但是，隶属地位并不仅仅是经济或社会机构的问题。它也不仅仅只牵涉到避孕、堕胎、性欲高潮和性平等，尽管它们也很重要。

它是那种自己心中的低人一等，它表现在那无言的表情、虚假的笑容、不安全的感觉、绝望的地位差异，表现在这一切里。

低人一等的看法在人们的头脑扎根，然后每次当他们不说话、当他们以为没人听得见的时候，这种低等的概念就冒了出来。它驻扎在把两性都悲剧性地拖进去的结构里。男人和女人都一样，因为每次当某个男人想突破这个结构时，他遇到的不是其他男人的敌意，就是那些钟情于传统两性游戏的女性提出的完

全相反的要求。

只有女人才能解开这个结。只有女人才说得出她们的感受，因为这些经历是她们独有的。

男人，你们失去的不过是你们的镣铐。再不会有人光着身子，一边偷看一边从你身边爬走；再不会有人可以让你来炫耀，做你雄性、地位、自负的象征；再没有人诱骗你、控制你，你再不会像打了麻醉、像一朵云在塑料蓝天里高不可攀地飘荡；再不会有人拿着手帕给你安慰，让你安心地从压抑你、窒息你的自我炫耀的清高中爬出来。

只有数以亿计的女人值得去发现、接触和相处，只有她们会对越南女孩说：“让我们互相学习吧。”只有当你说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新世界，在那里我们不会再以剥削者和被利用的东西而相逢的时候，她们才会理解你。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才能互相爱护，才能诞生全新的人类。

25日 英国，伦敦 圣诞节的辩证法

弗雷德·韩礼德在1968年底的一期《黑侏儒》上谈到圣诞节的意义：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典型的圣诞节——礼物、火鸡和布丁、张灯结彩、雪、喜气洋洋和酒。然而正是这种对圣诞节的稔熟和它年复一年的出现，很容易地阻止了人们对它在我们社会中的作用进行批判和完整的认识。而且，对如此完美地轻松享受和酒精麻醉的机会进行冷酷的分析，肯定会被认为是极端病态的行为。

“但就是圣诞节的这种广泛性和重要性，使得它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后期的主要公众节日，每个人都过，但没有人理解；而后资本主义的节日，和封建、氏族社会的节日一样，在维持社会的连贯和统一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是在一个压抑的社会里富足的日子，因此它们也就既是蔑视压抑的节日，又是支持压抑的节日。

“这就是圣诞节的辩证法。圣诞节曾给了西方音乐和绘画最伟大的作品以启发，也没有人能否认圣诞节表达了苦难中的人们最深切的渴望——渴望和平、幸福、精美的食物、社会平等和物品的自由索取。但是，这些释放的情感必须受到社会仪式的控制，就和史前时代一样。而仪式的作用就是提供一种控制人类情感的方式，使之不至于破坏它们所反抗的社会结构。



一张把耶稣画成游击队员的古巴海报。

“圣诞节的解放就受到了表达方式制度化的控制。人们本应该自己来选择何时发泄他们的情感、赠送礼物和互相爱护；但圣诞节却规定并仪式化了这一切。你必须在一年当中的特定日子里庆祝这一切，从而阻止你在其他时间来表达它们。以这种方式表达的自由，其实是不自由的表达。圣诞节的幸福掩盖了社会的不幸。

“这就是圣诞节意义的辩证法。对幸福的渴求用仪式来引导，用来为制造痛苦的工具辩护，而意识形态控制下的神话符号也被用来悄悄淹没圣诞节的批判的和解放的内容。要打破幸福的制度化，就要把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从用上帝和慈善来替代自我拯救的需求中解放出来，然后把人的希望重新定位到自觉的历史性的行动上去。在圣诞节看

似无害的外壳下，同时包含着压抑、解放和革命的渴望。清教徒取缔了它，古巴人推迟了它，我们可以超越它，而这就需要把革命的潜能从后资本主义的形式中释放出来。同时，我们理所当然也可以享受它。”

〔注 释〕

- 1 都灵 (Turin)，意大利西北部城市。
- 2 菲亚特，Fiat，即 Fiat SpA，Fabbrica Italiana Automobili Torino，跨国控股公司和意大利汽车工业及其零部件的大制造商。1899年创建，现在在许多国家都有装配工厂和特许

的专利生产。生产汽车的牌号包括法拉利 (Ferrari) 和兰西亚 (Lancia) 等。

3 阿尔多·莫罗 (Aldo Moro, 1916—1978), 意大利法学教授、政治家、天主教民主党领袖, 历史上曾五次任意大利总理 (1963—1964, 1964—1966, 1966—1968, 1974—1976, 1976)。1978年遭恐怖组织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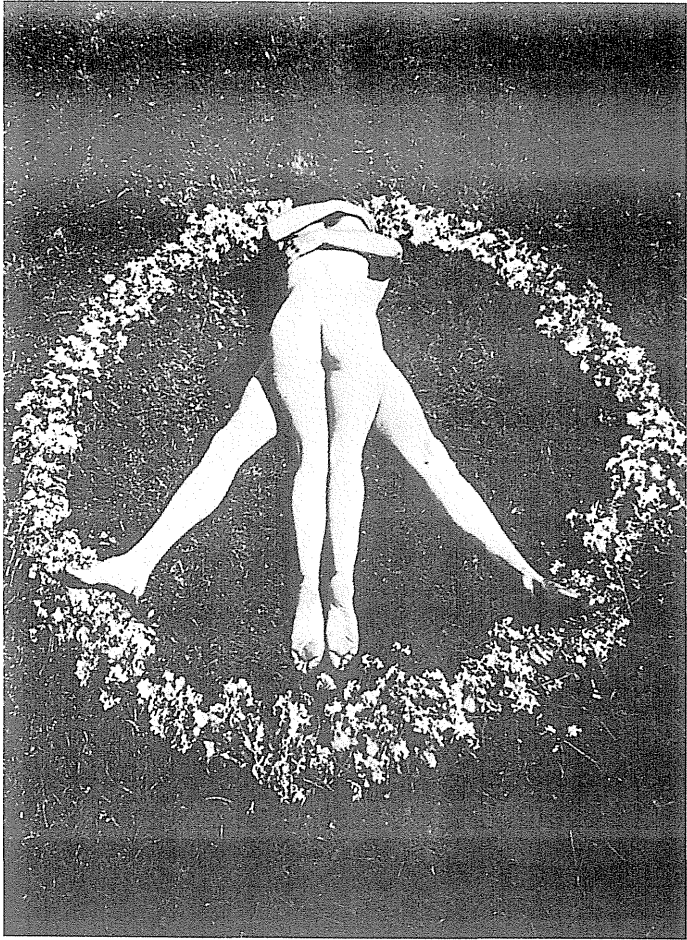
4 库比契克 (Kubitschek, 1902—1976), 巴西总统 (1956—1961), 以兴办公共工程, 特别是修建新首都巴西利亚而闻名。

5 奎德罗斯 (Quadros, 1917—), 1960年当选巴西总统, 1961年8月反政府势力发动政变时被迫辞职。

6 格劳伯·罗彻 (Glauber Rocha, 1938—1981), 巴西电影导演, 巴西“新电影”的领袖人物之一。其影片以一种风格化的、常常是暴力的形式表现巴西的历史和社会政治的动荡。

7 吉大港, Chittagong, 孟加拉国东南部的港口城市。

8 威廉·赖希 (William Reich, 1897—1957), 奥地利心理分析家, 他认为性压抑是很多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根源。



要爱、不要战争。

跋

论历史与幸福

历史与幸福

很相似：

它们曾发生过——

或者即将发生、爆发。

或者它们根本没有发生过

啊，历史；啊，幸福。

——大卫·沙普罗 (David Shapiro) “乔·塞拉瓦罗梦中笔记和诗一首”

(A Note and Poem by Joe Ceravalo in a Dream), 选自《丢失的原版之后》

(After a Lost Original)

每一个时代、每一段时期、每一代人、每一个背景都有自己的政治语法，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只是各个时期表现出来的程度不同而已。1968—1975年的政治、文化和性别动荡在每一个像我们这样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身上都留下了痕迹。那个时代的一些战士，现在已经到了显赫权贵的位置。但是，他们并不都是带着好感来回头看那些日子的。

其中一些人把他们在战斗或是在总统官邸前的和平运动中磨练出来的本事全派上了用场。体现最明显的三个例子分别在华盛顿、里约热内卢和科伦坡。

1969年5月，韦尔斯利学院管理协会 (the Wellesley College Government Association) 主席希拉里·罗德汉姆 (Hillary Rodham) 在韦尔斯利第91个毕业



1968年2月，韦尔斯利学院领导选举。校长竞选人（从左到右）：娜娜·若托、希拉里·罗德汉姆（获胜者）和弗朗茜尔·鲁森。电烫发时代之前。

典礼上这样向她的同学们说：

“长久以来，那些领导我们的人把政治看成是‘实现可能性的艺术’。现在摆在他们和我们面前的挑战是，要使政治去把那些看似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正如法国学生在索邦神学院墙上写的：‘头脑要现实！但要索求不可能的东西！’我们的要求也不能丝毫降低。”

她说过的这些话大部分都在通往阿肯色州州长官邸的路上给忘掉了，剩下的也在她稳稳地进入白宫时给埋到了心底。现在，政治不是实现可能性的艺术，而变成了不惜代价地握紧权力。

费尔南多·恩利克·卡多索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曾是六七十年代巴西最有天赋的马克思主义者，80年代末却突然以一个保守、正统的财政部长的身份出现在巴西的政治舞台上。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被选举为巴西的总统。他的对手是神话般的工人领导人路拉 (Lula)。曾是《新左派观察》上“拉美附属性的资本主义发展”这样划时代的文章的作者，如今的费尔南多·恩利克·卡多索，已变成了一个充满激情的新自由主义者，为稳定巴西的货币而把它和美元牢牢挂钩。

1968年5月，一个年轻的斯里兰卡学生，钱德里卡·班达拉奈克（Chandrika Bandaranaike），在她投身于巴黎拉丁居民区的起义中，因为见到成千上万的罢工工人和工厂的占领而热血沸腾。现在她做了斯里兰卡的总统，对工会的政策却比她的右翼前任更加强硬。

过去的经历，毫无疑问，仍缠绕着这三个政治首脑，但是他们没有时间来回忆他们以前是怎样的人。他们为现在而活着。

60年代美国的激进分子拦截军用运输火车、在股票交易所烧钱、计划炸毁五角大楼，和世界各地的其他激进分子一样，他们这样做是在向权威挑战，是试图重建民主政府宣称的公共对话，但这种行动在当时是遭到压制的，而现在更是如此。

1975年，紧张和冲突开始结束：西贡被越共攻破，葡萄牙55岁的法西斯政权被推翻。这两件事对左派和右派来说都是影响深远的大事。

而此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领导下，美国的扩张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获得的胜利比它1989年以来最疯狂的野心还要大：目睹了苏联体系的崩溃，随之而来的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黯然失色。但今天的左派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有些人认为，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倒台仅仅表示甲板被清理干净了；于是我们现在拥有纯粹的、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制度了；再不用通过官僚独裁的有色眼镜来看敌人了。这种看法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纯朴，但它只是一个幻梦。

重建对改革的希望和信任绝非易事，而且需要时间，同时还有工会代理人的棘手问题。勤劳的劳动阶级被资本家理性主义的这个最新发展阶段改变得面目全非。他们只在巴西、韩国和南非还依然存在，但即使在这些国家，1989年后共产主义运动的跌落也带来了一种宿命主义的论调和对社会现状的逆来顺受。他们肯定会为改善自己的条件而战斗，但是此后的前景却仍然暗淡。

因此现在许多人要复仇一般地寻求利润，要人人只为他/她自己，要嘲讽对那些还认为现代国家有责任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和社会正义的人。不光是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甚至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¹和克鲁斯兰德（Anthony Crosland）提倡的社会民主，更不用提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²的温情自由主义或是启蒙运动的普遍价值观，都被他们当作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任何要在大多数人的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培育一种平民文化的人，都被看作是患上了一种无法治愈的、荒谬可笑的病。我们被告知，我们住在一个“追求差异的文



1985年，持有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外欢迎救世的曙光，他们脸上充满期望。

化”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保住我们自己独立的身份。因此，享乐主义的自我体现是今天的年轻人被劝说接受的信条。

一个害怕聆听不满的制度往往鼓励人们远离那种人人都能分享的政治。这种方式播下了绝望的种子，开辟了一块以“追求差异的文化”为基础的土地，使仇恨在上面生长。土耳其和越南的移民家庭被年轻的德国新法西斯主义者活活烧死，那堵墙如今只在德国人的心中还有；法国民族阵线（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公开宣扬对法国北非移民的仇恨，每一个星期都有针对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和其他非洲人的暴力事件；贩卖首饰的埃塞俄比亚人经常遭到“很宽容”的意大利人的痛打，有时候甚至被他们杀死；种族残杀仍在当代英国继续；今天在美国监狱里的黑人比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还多。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

真正活着的政治不是靠昨天甚或是今天的钟表活着，而是靠明天的钟表。那些在六七十年代成熟起来的政治家相信未来会更好，他们竭尽全力——尽管有错误和幼稚，但要创造一个美丽的世界。他们失败了，但是失败并不能否定整个过程。今天，我们可以来问一问自己，这一切意义何在？我们在那些日子是怎样生活的？如果可以重来，我们的行为会有所不同吗？

总体来说，对后面这个紧要问题的回答是：不会。在1968年听起来虚幻、荒谬的一些东西，在今天听起来却非常有道理。苏联的解体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全球问题。资本主义不可能永远是夏天。

一般来说，我们靠行动来证明自己。我们知道自己正在创造历史，我们便很幸福。幸福的来源有多种，但是这里所指的快乐并不是今天享乐文化里很普遍的由可卡因刺激的那种，那种快乐其实是想掩盖在当代资本主义内核中深藏着的忧郁。热衷于MTV的“别担心，要高兴”的一代有很多生存形式。他们可能和蔼而无忧，但是他们同样也是，呵，内心痛苦的。毒品、烈酒、挥霍和电视并不是缓和剂而是麻醉剂，是为了掩盖日常生活的痛苦。

我们幸福，是因为在我们的心中怀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世界上那些受压迫的人；为了每一个人。那个憧憬决定着在我们心中什么才是重要的。我们要的不是那种软毒品幸福或者极乐（那也是随处可见的，许多房间里都充斥着大麻的气味），我们的幸福是为了推进人道事业而去冒险、去战斗、去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感觉在英国也许表达得不够，但是在欧洲大陆和美国却很强烈，这是埋在那恶帝国心脏里的正义的力量。

我们僵化的文化禁止独立的思考和持有异议。我们被告知，既然没有什么别的替代制度的存在，那么任何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都是不合时宜的。这种语气的转变，反映在电视和国家其他媒体的宣传报道上。当然也有一些地区性的变化——德国和法国仍然尽力保留了一些严肃的报刊——但是整个潮流都在朝着另一个方向，朝着把社会和政治问题庸俗化，把注意力集中到消费、性丑闻和犯罪一类的社会问题上。如果这不是一种迫使人们闭口缄默的过程，那又是什么？这难道不是一种信号，即告诉年轻人他们只需要看自己的肚脐眼就行了么？这个过程的深处是反民主的，因为它把了解真实信息的权利都完全保留给了少数的精英分子。

一种文化如果没有一些坚定的、永远在质疑的异端和一群无情批判和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者，那么这种文化注定要产生出桑丘³这样的人物来。这样的文

化迟早要枯萎死去，而所有的人，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会开始寻找一种替代物，这种替代物终将触及大多数媒体都回避的地方——心灵。

异端确实是一种威胁，因为他们挑起思想的爆炸，批评我们领导的平庸，让舒服的不舒服，让每一种奴才都恼羞成怒。异端对每一种教条呆板的外壳都充满敌意。他们挑战那些容忍社会变得停滞的静默。

如果批评美国控制下的全球性金融机构把自由市场经济强加给俄国和东欧，那么这个批评马上就会被贴上匕首或恐龙的标签。而且，这还是自找挨骂的、愚蠢的、有气无力的废话；因为自由是有代价的，如果前苏联和东欧那些可怜的公民想要发展，这就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是如果这些人为了创造一个更合他们心意的世界而联合起来呢？有些人已经投票选举老牌的共产党了——半带着希望、半带着信念，相信他们至少会像以前那样为穷人提供一个保障体系。因为怀有这样的想法，波兰、匈牙利和俄国的人民遭到了英国和美国的自由评论家的谴责。带着善解人意的笑容，西方的权威人士们互相安慰，都觉得民主并不是一夜就可以建立起来的：终有一天，这些最近才从共产主义中走出来的可怜蛋们，也能够把恐怖机器与那些真正给他们带来自由的政府区分开来。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转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希望似乎正在泯灭，恐惧似乎占领了整个世界。但是，希望仍促使我们行动起来，恐惧只能产生冷漠、消极，谨慎和保守又可能使人无所作为。在这样的气氛里，人们难怪要模仿丛



等到我们再见面……

林的法律，难怪要回到最原始的自卫本能，但这些做法只能解决燃眉之急。

人们一直梦想着更美好的生活。下面几行话不是马克思、罗伯斯庇尔或者托洛茨基所说，而是通过莎士比亚《科里奥兰纳斯》中一介庶民之口说出来的：

市民甲：我们都是苦百姓，贵族才是好市民。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吃饱了，装不下的东西才可以救济我们。他们只要把吃剩下来的东西趁着新鲜的时候赏给我们，我们就会以为他们是出于人道之心来救济我们。可是在他们看来，我们都是不值得救济的。我们的饥寒交迫，我们的形容憔悴，就好像是记载着他们富裕的一张清单；他们享福就是靠了我们受苦。

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武器，趁我们还没有瘦得只剩下几根骨头。天神知道我说这样的话，只是迫于没有面包吃的饥饿，而不是为了复仇⁴。

〔注 释〕

1 伯恩斯坦 (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社会民主党宣传家、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企图修正马克思的原则，被称之为“修正主义之父”。

2 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财政家和报刊撰稿人，因针对长期失业提出革命性经济学说 (凯恩斯经济学) 而知名。

3 桑丘 (Sancho Panza)，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著小说《堂吉珂德》中的人物，堂吉珂德的仆人。象征着胆小、轻信和人云亦云。

4 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悲剧卷 (下)，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313—314页。

参考资料

本书出版者以最大努力与文学资料与图片资料的版权所有取得联系并获得了它们的使用权,有些已在“致谢”中予以说明,但还要在此感谢以下报刊图书的作者和出版者。

杂志和报纸

Das Argument, West Berlin, 1968.

Black Dwarf, London, 1968.

Guardian, London, 1968.

Great Speckled Bird, Atlanta, 1968.

Intercontinental Press, New York, 1968.

Knocker, Frankfurt, 1968.

New Left Review, 1968-72.

Le Nouvel Observateur, Paris, 1968.

Observer, London, 1968.

The Nation, New York, 1968.

Quaderni Piacentini, Rome, 1968.

Quaderni Rossi, Rome, 1968.

Ramparts, San Francisco, 1968-9.

Rouge, Paris, 1968.

The Times, London, 1968.

Village Voice, New York, 1968.

World Outlook, New York, 1968.

著作和文章

Atelier Populaire, *Text and Poster*, London, 1969.

Tariq Ali, Pakistan: *Military Rule or People's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1969.

Tariq Ali, 1968 and After, London, 1978.

Tariq Ali, Can Pakistan Survive? London, 1984.

Tariq Ali, Steet Fighting Years, London, 1987.

Perry Anderson, 'Component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New Left Review*, no. 50

Paulo Flores d'Arcais and Franco Moretti, 'Paradoxes of the Italian Political Crisis', *New Left Review*, no. 96.

Robin Blackburn and Alexander Cockburn, *Student Power: Problems, Diagnosis, Action*, London, 1969.

Bui Tin, *Following Ho Chi Mink*, London, 1995.

Wilfred Burchett, *Vietnam Will Win*, New York, 1968.

Daniel Bensaid and Henri Weber, *La Repetition Generale*, Paris, 1968.

Daniel Bensaid and Alain Krivine, *Mai Si!* Paris, 1988.

John Berger, *Ways of Seeing*, London, 1968.

Julien Besancon, *Les Murs ont la Parole*, Paris, 1968.

Stig Bjorkman, Torsten Manns and Jonas Sina, *Bergman on Bergman*, New York, 1993.

Gerard Chaliand, *The Peasants of North Vietnam*, London, 1969.

Eldridge Cleaver, *Soul on Ice*, New York, 1968.

Bernadette Devlin, *The Price Of My Soul*, London, 1969.

Ronald Fraser, 1968; *A Student Generation in Revolt*, London, 1988.

Ronald Fraser, 'Spain on the Brink', *New Left Review*, no. 96.

Erich Frid, *100 Poems Without a Country*, London, 1987.

General Vo Nguyen Giap, *The Military Art of People's War*, New York, 1970.

Che Guevara, *Reminisence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ary War*. London, 1987.

General Vo Nguyen Giap, *The Military Art of People's War*, New York, 1970.

Che Guevara, *Reminisence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ary War, London, 1968.

David Halberstan, *The Making of a Quagmire*, London, 1992.

David Horowitz, *Containment and Revolution*, London, 1967.

George Jackson, *Soledad Brother*, London, 1971.

Boris kagarlitsky, *The thinking Reed*, London, 1988.

Alain Labrousse, *The Tupamaros*, London, 1973.

Jean Lacouture, *Ho Chi Minh*, London, 1968.

Ernest Mandel, *Europe versus America: The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London, 1968.

Ernest Mandel, *Marxist Europe versus America: The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London, 1968.

Ernest Mandel,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two vols), London, 1968.

Ernest mandel, 'lessons of May', *New Left Review*, no. 52.

Herbert Marcuse, *Negations*, London, 1968.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sation*, London, 1969.

Gavan McCormack, 'The Student Left in Japan', *New Left Review*, no.

Ralph Miliband, *Parliamentary Socialism*, London, 1967.

Juliet Mitchell, '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no. 40.

Robin Morgan, *Sisterhood is Powerful*, New York, 1970.

Robin Morgan, *Sisterhood is powerful*, New York, 1970.

Robin Morgan, *Sisterhood is Powerful*, New York, 1977.

Michael Myerson (ed.), *Memories of underdevelopment: The Revolutioinary Films of Cuba*, New York, 1973.

Huey.P. Newton, *Revolutionary Suicide*, New

York, 1995.

Jiri Pelikan, *The Secret Vysocany Congress*, London, 1971.

D. Plamenic, 'The Belgrade Student Insurrection', *New Left Review*, no. 53.

Joao Quartim, *Dictatorship and Armed Struggle in Brazil*, London, 1971 Angelo Quattrocchi and Tom Nair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London, 1968.

Robin Alison Remington (ed'), *Winter in Prague*, Massachusetts, 1969

Witold Rodzinski,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1988.

Sheila Rowbotham, *Dreams and Dilemmas*, London, 1983.

Sheila Rowbotham, *The Past is Before Us*, London, 1989.

Michele Salvati, 'The Impasse of Italian Capitalism', *New Leftt Review*, no. 76.

Patrick Seale and Maureen McConville, *French Revolution 1968*, London, 1968.

Richard Soler, 'The New Spain', *New Left Review*, no. 58.

Leslie B. Tanner (ed.), *Voices Women's Liberation*, New York, 1970.

Clyde Taylor, *Vietnam and Black America: an Anthology of Protest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1973.

Constantine Tsoucalas, 'Class Struggle and Ditorship in Greece', *New Left Review*, no. 56.

Petr Uhl, *Le Socialisme Emprisonne*, Paris, 1980.

Peter Weiss and Guilla Palmstierna-Weiss, 'Limited Bombing' in Vietnam, London, 1969.

Richard West, *Sketches from Vietnam*, London, 1968.

Raymond Williams et al., *May Day Manifesto*, London, 1968.

图片来源

图片来源后的数字为英文原版书页码,必要时还标注了图片在原书中的位置。

塔里克·阿里(Tariq Ali)186-187,196,197,216
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图片108,109,166,175
布鲁诺·巴贝/火药筒(Bruno Barbey/Magnum)图片92-93,104,131
史蒂夫·贝尔(Steve Bell)217
《黑侏儒》(Black Dwarf)8,18,45,57(右),62(左),83(上),99,112-113,184(大图),184(小图),200-201,205,206,208,211
勿信战争委员会(Committee to Unsell the War)124
科尔贝斯-贝特曼(Corbis-Bettmann)/UPI 16,20,24,26(大图),27,28,29,33(左),38,41,54(大图),62(左),66-67,69,70,73(上),74,75,77,78(下),81,82,87,95,,98,106-107,132,149,150,154-155,157,159,163,164,180
捷克新闻社(Czech News Agency)54(小图),55,134,135
大卫·金(David king)收藏6,34-36,40,48,191,192
EDI媒介(EDIMEDIA)91,94,100,101,105,118(上)
《常青评论》(Evergreen Review)集团17
伽马/弗兰克·斯本纳(GAMMA/Frank Spooner)

图片90,97,141,146,147

弗朗茨·古斯(Franz Goess)140(上),140(下)
伦敦市政厅通讯社(Guildhall Press)199
赫尔顿-多伊奇(Hulton-Deutsh)收藏50-51,64,145,183
赫尔顿·盖蒂(Hulton Getty)83(下),120,138-139,177
国际图片社(Interfoto)/S.O.A.37,47(上)
拱顶石(Keystone)57(左)
国会图书馆,华盛顿特区19,65,73(下)117(右)
罗杰·马洛赫/火药筒(Roger Malloch/Magnum)

图片125

弗雷德·麦克达拉(Fred W.McDarrah)153
加利·杨克(Gary Yanker)25,72,80,156,160,209
海报文印公司(Poster prints Inc.)
私人收藏/目录/布里奇曼美术图书馆,伦敦/纽约
马克·里博德/火药筒(Marc Riboud/Magnum)
《胭脂》(Rouge)
《严厉》(Stern)
啪啪图片(Popperfoto)14-15,39,118(下),126,127
托普汉姆图片(Topham Picturepoint)
简宁·威德尔
《世界为望》(World outlook)
韦尔兹利学院档案馆 Topham Picturepoint

致 谢

我们首先需要感谢的是布卢姆斯堡的莎拉·波尔登 (Sarah Polden)，没有她坚持不懈的激情，这个课题就无法问世，也无法完成。蒂姆·弗斯特 (Tim Foster) 和沙利·斯摩伍德 (Sally Smallwood) 在他们的设计室里就已经把握了20世纪60年代的精神。安妮·切特巴罗 (Anny Chettleborough) 在无数的卷宗里搜索、寻找本书所使用的照片。理查德·多斯 (Richard Dawes) 为本书排版，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这样看来，这本书其实是集体努力的成果。

我们还要感谢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私人藏书的朋友，他们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来源。他们是：理查德·歌特 (Richard Gott) 和维维恩·卫希礼 (Vivien Ashley)，马里恩·科扎克

(Marion Kozak)、彼得·戈万 (Peter Gowan)、罗宾·布莱克波恩 (Robin Blackburn)、谢拉·罗伯特汉姆 (Sheila Rowbotham)、弗雷德·韩礼德 (Fred Halliday)、阿德里恩 (Adrian) 和西里亚·米切尔 (Celia Mitchell) 以及克里斯托弗·洛戈 (Christopher Logue)。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60年代在格拉斯哥战斗过的两位老兵——托尼·苏萨尔 (Tony Southall) 和戈登·摩根 (Gordon Morgan)，他们是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卷宗的保管人。我们与他们联系后，他们很快便热情地寄来回信以及一些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当时政治杂志的原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1968年:反叛的年代 / (英)塔里克·阿里, 苏珊·沃特金斯著
范昌龙等译.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1

ISBN 7-80603-705-5

I. 1.1... II. ①阿... ②沃... ③范... III. 政治事件
— 世界 — 1968 IV. D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6

CLASS
Arts
Arts
Arts

Poetic
imagi
the ac
"noth
the in
of the
ness,
terms

责任编辑 傅光中

装帧设计 宋晓明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60055—5420
市场部 (0531) 2053182 (传真) 2906847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s.com.cn>

电子信箱 webmaster@www.sd-pictorial.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70 × 228 毫米

17.75 印张 156 幅图 200 千字

版 次 2003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